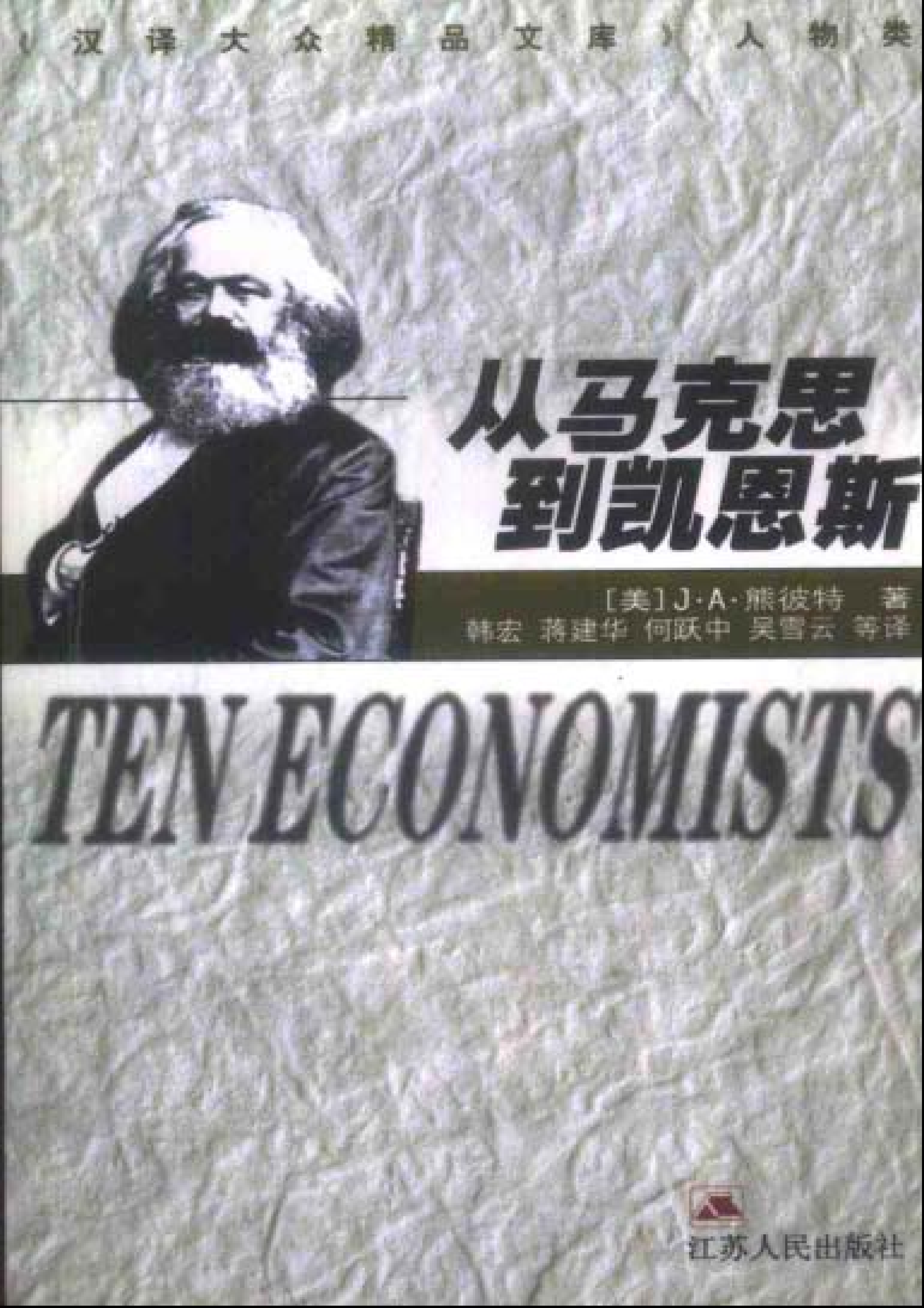

《汉译大众精品文库》人物类
从马克思到凯恩斯
[美] J·A·熊彼特 著
韩宏 蒋建华 何跃中 吴雪云 等译
TEN ECONOMISTS
江苏人民出版社

《汉译大众精品文库》人物

精译

从马克思到凯恩斯

[美] J·A·熊彼特 著

韩宏 蒋建华 何跃中 吴雪云 等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美)熊彼特著;韩宏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3(2000重印)
(汉译大众精品文库)
ISBN 7-214-02460-8

Ⅰ.从... Ⅱ.①熊... ②韩... Ⅲ.经济学家-评传-世界
Ⅳ.F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13419号

书　　名	从马克思到凯恩斯
编 著 者	[美]J·A·熊彼特
译　　者	韩宏　蒋建华　何跃中　吴雪云等
责任编辑	刘　焱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扬州印刷总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9　插页2
印　　数	4 126—8 140册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00年2月第1版第2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460—8/F·572
定　　价	13.00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本书中的这些文章是在1910—1950年这40年间写的，最早的三篇（瓦尔拉、庞巴维克、门格尔）是用德文写的，其余各篇是用英文写的。除了关于马克思的那一篇外，它们都是为一些杂志写的文章，有的是为某位经济学家的去世而写，也有的是为了某些事件的周年纪念而作，例如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发表50周年、帕累托诞辰100周年等。因为这些文章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匆忙写成的，熊彼特认为将它们出版成书的价值不大，但有时需要用到它们，而刊载它们的杂志又不易找到，所以在1950年1月，即熊彼特去世前几个月，他最终同意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将它们出版。

这十篇主要的文章，除了关于马克思的那篇以外，都是由熊彼特本人亲自挑选的。他本计划收录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00周年而为《政治经济学杂志》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中的社会学与经济学》（1949年6月）这篇文章，后来我们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中的第一部分《马克思的学说》取代了它，因为它更全面地论述了作为预言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我十分感激卡斯·坎菲尔德先生和哈培尔兄弟出版社，他们慷慨地准许将这篇文章收入本书。借此机会我还要感谢

《经济学季刊》、《美国经济评论》、《经济学杂志》等杂志的编辑和出版商们，是他们同意将原先在他们的杂志上已刊登的文章收入本书，还有些文章刊登于以前的《国民经济》杂志，该杂志现已停刊。

附录中关于克纳普、维塞尔和博特基威茨的三篇短文是根据哥特弗里德·哈伯勒教授的建议收入的，他认为应该重新出版它们，并和其他传记体的文章一起选入本书。这些文章分别是熊彼特作为驻奥地利通讯员（1920—1926年）和驻德国通讯员（1927—1932年）为《经济学杂志》撰写的，在这期间熊彼特离开德国的波恩大学转到了美国哈佛大学。

作者和这些传记文章的主人公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他钦佩他们的工作，而且是因为他和他们中的一些人很熟悉，和其中几位还有着深厚的友谊。但马克思是一个例外，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而熊彼特和凯恩斯一样，恰好在这一年出生，凯恩斯是十位经济学家中最年轻的一位。熊彼特和马克思有着一点共同之处——对经济过程有着相同的看法。在他的《经济发展的理论》中，熊彼特试图提出“一种关于经济变化的纯经济理论，也就是说，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建立在推动经济体系从一种均衡过渡到另一种均衡的外部因素的基础上的”。在这本书的日文版的序言中他写道：“开始时我不清楚，但对读者来说很快就会看清，是什么思想、什么目标（熊彼特本人的）和构成马克思的学说的这些思想和目标完全一致。事实上他和他同时代的以及他以前的经济学家的区别正在于对经济过程的看法，即这种过程是否由这个经济制度本身所引起。在其他的所有方面他只是引用李嘉图的概念和观点，但是关于经济发展的概念，他把它放在次要的黑格尔的背景中，却完全是他自己的意思。这可能是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总是重新提起他的原因，虽然他们

可以找到许多可以对这一概念进行批评的地方。"在他的《经济分析史》手稿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思想总的纲要中,发展不是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经济静学的附属物,而是该时期经济的中心问题。他把他的分析重点集中在揭示经济过程是怎样由自身的逻辑决定的,揭示不断变化的整个社会的结构。"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结果却完全不同:它使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社会,而使熊彼特成为资本主义的热心的辩护人。

对熊彼特来说,经济学是一门要借助于眼光和技术的学科。他推崇马克思关于经济过程的眼光,同时也推崇他只见过一面的瓦尔拉的纯经济理论。关于这点,他在《经济分析史》里说:"……经济学是一辆大公共汽车,它载着许多兴趣和能力不相称的乘客。但**就纯经济理论来说**,我认为瓦尔拉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均衡体系,把'革命的'创造性和古典的综合性结合在一起,这是惟一能和理论物理学的成就相类比的经济学家的作品。"

马克思和瓦尔拉截然不同,一个试图给出经济变化的逻辑解释,另一个给了我们一个"理论工具,它在我们的科学史上第一次有效地使用了经济数量之间互相依赖的纯粹逻辑"。

熊彼特的特点是:对历史的和纯理论的东西、计量经济学和收集到的大量实际资料、社会学以及统计学,他持赞赏态度,认为它们有用。如此广泛的兴趣也反映在这些传记性的作品中。

他在维也纳学习期间就认识了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塞尔。门格尔和他的两位弟子——庞巴维克和维塞尔可以算是奥地利学派的共同的创始人。那时门格尔已从大学退休。熊彼特只和他见过一两次。但是这些传记的作者是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研

讨班的积极参加者(1904—1906年)。后来,他和庞巴维克就利息率的问题展开了著名的论战;1921年庆祝维塞尔70诞辰时,他是三位发言者之一。

虽然他很看重奥地利学派,在这个学派中受到了训练,但他对提出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的另一个学派——洛桑学派更感兴趣,这个学派源于瓦尔拉的著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学派的创始人是帕累托。帕累托是瓦尔拉的学生,后来接替瓦尔拉,在洛桑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教授。直到现在,对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学家来说,他们的著作是太"数学化"、太"理论化"了,同时英美经济学家发觉,阅读用其他文字写的经济学著作也是困难的(也许是浪费时间)。但是洛桑学派在早年就有了两位第一流的美国信徒——欧文·费雪和H.L.穆尔。本书中的十篇文章有三篇是献给瓦尔拉、帕累托和费雪的。在关于帕累托的文章中,熊彼特描述了一次集会,会上谈论了许多经济学家,帕累托对欧文·费雪大加赞扬。熊彼特说:"在我听到他(帕累托)高度评价(费雪的)《资本和收入的本质》时,颇感意外。"

1906年,熊彼特在维也纳获得学位以后,又到英国待了几个月。在那儿他拜访了几位经济学家,并在1907年首次遇见了马歇尔。熊彼特在1933年12月写给《经济学杂志》的有关凯恩斯的《精英的聚会》的书评的注释中描述了这次会见。在评论凯恩斯关于马歇尔的文章时,他写道:"当我在1907年的一个早餐时间隔着桌子看他时,我告诉他(马歇尔)说:'教授,在我们谈话之后(关于我的科学计划),我的确感到我就像一个不慎重的恋爱者正在尝试一场冒险的婚姻,而您就像一位慈祥的老伯试着劝我放弃这个念头。'他回答道:'这本来就是如此,如果在这方面能有什么作为的话,老伯的劝告就没有用了。'"熊彼特在本书中表明了他对马歇尔著作的态度,这篇论文在《美国经济评论》

上发表之后，他收到玛丽·马歇尔 1941 年 6 月寄自英国剑桥的一封短信。信里说："刚收到《美国经济评论》，我正以极大的兴趣阅读你写的纪念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发表 50 周年的文章。我知道你对他的著作评价很高，我很高兴你能借此机会如此热烈地、恰当地表达这种评价。这篇论文的最后一段尤其使我感到欣喜。我也和你一样欣赏凯恩斯的《纪念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一文。"

在评价美国经济学家（陶雪格、费雪、米切尔）时，熊彼特可能是第一次遇见他们。那是在 1913—1914 这一学年，熊彼特可能是作为交流学者来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在此之前，他阅读过他们的著作，而且至少和陶雪格通过信。陶雪格于 1912 年 11 月 27 日从剑桥写给他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赞扬这位青年经济学家的英文，然后讨论了后者提出的一个理论问题。"我对于你的论证没有争议，但我的倾向是以更现实的观点来探讨这些问题。"陶雪格在提供了一些供给图表以后说道，"我想把和资本、土地一样的论证运用于劳动力，并发展一种'租赁'劳动理论。我已经草拟出一个大纲。你当然知道，我的朋友 J.B. 克拉克进行过这种论证，而后来欧文·费雪也进行了更仔细的论证。这个论证还没有最后的结论。我并非如此不谦虚，以致自认为可以由我来得出这个结论，但我希望能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贡献。"这样的友谊一直持续到 1940 年陶雪格逝世为止。实际上，在熊彼特到哈佛的头几年（1932—1937 年），他和陶雪格一直住在斯考特街 2 号。

同样，他钦佩欧文·费雪和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和他们也有一定的感情。他和费雪共同创办了计量经济学会。当熊彼特到费雪在纽黑文的俭朴的家中访问时（那儿没有烟、酒、咖啡，甚至连肉都见不到），咖啡是为这位"堕落的"客人准备的。阿尔

及尔大学的 G.H. 布斯凯教授在 1950 年第 3 期《政治经济学评论》杂志上描述了这次发生在周末的谈话。本书中纪念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逝世的文章是在熊彼特逝世前一两个星期完成的。米切尔和熊彼特都研究商业循环，他们都相信，为了成功地研究这一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现象，需要最广泛的实证研究。熊彼特辛勤地收集资料，几乎没有别人的帮助，因为这就是他的工作方法，但是他对那些能够明智、有效地利用国家经济部门的有关资料的人十分赞赏。

虽然凯恩斯曾经长期担任《经济学杂志》的编辑，而熊彼特从 1920 年起就是这个杂志在奥地利的通讯员，但直到 1927 年熊彼特和凯恩斯才见了面。由于一些不易解释的原因，他们两人的关系无论从个人角度还是从专业角度来说，都不十分密切。

对瓦尔拉、门格尔、庞巴维克的那三篇文章的翻译曾出现过困难。正如保罗·斯威齐在他的《帝国主义和社会阶级》序言以及哈伯勒早些时候在《经济学季刊》中提出的那样，熊彼特的德文风格特别难翻译。哈伯勒说："他的有些书卷气的笔调，也许最可以被形容为'奇异的风格'，这种风格恰好能表现他的复杂的思想结构。这种风格的特征表现在长句子、大量的修饰短语、对修饰语的再修饰、对涵义差别的辩解。他的这些风格特征，正如人们所想到的，在他的德文著作里特别显著，因为德语更适合于复杂的结构。"熊彼特意识到这一点，特别是关于庞巴维克的那篇文章。他认为那篇文章太长，应加以删改，并为英语读者而重写。他着重指出，不那样做是不行的。

本书中关于庞巴维克的文章，比原来的删去了一半。这项工作是由哈伯勒和它的译者赫伯特·查森豪斯教授一起进行的，而赫伯特·查森豪斯是作者的学生。在这儿我要表达我对哈伯勒教授以及三位译者的感谢，感谢他们慷慨的关心和帮助。我

还要感谢保罗·斯威齐，他和我一起阅读了全文，帮我润色英文以及在多处澄清涵义。出于某些考虑，我不得不对有些章节中的直译和模糊不清之处作了修改，特别是那篇关于庞巴维克的文章，因此它的责任在我，完全由我一人负责。

其他的论文都是用英文写的，这次按原样发表。除了一些小的印刷错误，以及为了保持格式的一致而作的一些小的改动——比如大写字母、标点符号、注释的排列等之外，没有作其他改动或修订。

伊丽莎白·布迪·熊彼特

1951年2月2日

目　　录

卡尔·马克思*
(1818—1883)

绝大多数智者的创造或幻想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便永久地消失了。这段时间可能只是一顿饭的工夫,最长不超过一代人的时间。但另一些作品却不是这样。它们经历过失落,但它们重新出现了,它们不是作为未被认识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出现的,而是以作者个人的方式、带着个人的印迹出现的,这些是人们能看到、感受到的。这就是我们称之为伟大的东西,把伟大和生命力联系在一起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按这个意思说,伟大这个词无疑适用于马克思的学说。将伟大和生命力联系在一起的做法还有一个优点:它可以免受我们的喜好憎恶的影响。我们不必相信一个伟大的成就必定是在它的基本的构思和细节方面完全正确、一点错误也没有。恰恰相反,我们可以相信它应是黑暗中的一股力量,我们可以想象它基本上是错的,或者不同意其中任何一个特别的观点。对于马克思的体系来说,这样的非难,甚至是完全的否定,并不能给予马克思的体系致命一击,而只能有助于揭示出这个体系的力量。

---

* 选自 J.A.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1942 年版。哈塔尔兄弟出版社允许转载。

过去的20年里，世界目睹了马克思学说的有趣的复兴。这位社会主义信仰的伟大导师在苏联受到敬仰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只是在马克思理论的真实涵义和布尔什维克的实践与思想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正像低微的宗教的教义和中世纪的领主的观念与实践之间存在差距一样。

但另一个现象却不易解释，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复兴。这一现象是很有趣的，因为直到20年代，在美国，无论是在工人运动中还是在知识分子的思想中都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放在重要的位置。在那儿，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一直是肤浅的，马克思主义被看作是不重要的，因而是没有地位的。而且，布尔什维克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在那些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国家中并没有产生同样的反响。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国——它在所有的国家中有着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一个规模不大的正统学派在战前社会主义思潮高涨时期保持了活力，正像先前经济萧条时期那样。但是社会主义思潮的领导人(不光是那些和社会民主党有关系的领导人，而且还有那些在实践上过于谨慎保守的领导人)在继承旧的信条方面有些误入歧途。同时，他们对马克思的这些教义有着对神一样的态度，与它保持一段距离，像其他经济学家一样看待经济问题。美国的现象也很独特。我们不关心它的原因是什么，但概括一下许多美国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关于马克思的预言的轮廓和内容以及它们的涵义，还是值得的。[①]

---

① 我们尽量不多引用马克思的著作，也不提供有关他生平的资料，因为这似乎是不必要的。想得到马克思著作的目录和其生平资料的读者，可以在其他有关的字典里找到，特别是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或《社会学百科全书》中。研究马克思，从《资本论》第一卷开始最为方便，在众多的传记作品中，我认为F. 梅林的最好，至少对一般读者而言是这样的。

一、作为预言家的马克思

本节的题目用了一个宗教界的比喻，这并非是由一个小的失误造成的。这不仅是一个比喻。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信仰。[1]对信仰它的人来说，它首先表现为一种生活的意义，一种判断事件、行为的最终标准。其次，它提供了一个把人类或人类的一部分从罪恶中解救出来的指南。我们可以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也属于那种在坟墓前指引通向天堂之路的学说。我相信用文字来阐述这些特性将提供一个分析、评价马克思学说的机会，更能从社会学意义上对马克思主义作更深入的分析，这比由经济学家来完成来得更深入。

说马克思属于一种宗教信仰还有次要的一点：它解释了马克思主义的成就。从纯粹的科学成就的角度讲，马克思做得很完美，但这不可能赢得不朽的历史意义。他那个党派口号的弹药库也不能做到这些。他的一些成功，虽然是很小的一部分，确实归功于他在他的同伴们面前演讲时随时可用的热烈的词语、激烈的谴责和愤怒的手势。关于这点要说的是，这个弹药库已经被运用了，并按预期目的被很好地运用着。但它也带来了一些弊病。为了铸造这样的为社会斗争所需的武器，马克思不得不常偏离按他的体系的逻辑发展的观点。然而，如果马克思仅仅是华丽词藻供应商的话，他的学说今天早已消亡。人们不会

---

[1] 原文如此。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熊彼特仅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一种思潮来加以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及相关事物的分析和评价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有些甚至是错误的。对此，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加以接受。为反映原貌，这一类论述本书予以保留，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其观点的肯定，特此说明。下同。——编辑注

感谢那种形式的服务，会很快忘掉那些为他们的政治歌剧谱写歌词的人的名字。

但是他是一个预言家，为了理解他的成就的本质，我们应该用他那个时代的眼光来看待他的理论。那个时代是资产阶级物质成就的顶点，又是资产阶级文明极度衰落的时代，一个没有表现出新的文化、新的生活方式正在孕育的迹象的社会，表现出令人憎恶的陈腐的景象。社会所有阶层的真实信仰很快地被抛弃，工人中仅有的一线光明也已消失，而知识界宣称他们对穆勒的《逻辑体系》和贫困的法则感到满意。

现在，在亿万人的心里，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是地球上人类的天堂"的预言意味着一线光明和生命的新的意义。如果你愿意，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称作是一种不真实的信仰或是一种对信仰的歪曲的模仿——这儿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不要忽视或不承认他这一成就的伟大。成千上万的人不能理解和正确评价马克思的预言的真正意义。这一点并不重要。这是所有预言的命运。重要的是这预言是以一种在当代有实证主义思想的人可以接受的方式组织、表达出来的，而实证主义无疑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但是，这与"马克思主义是从资产阶级思想中产生的"并不矛盾。这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完成的：一方面，像许多不成功的人感到的那样，他们受到阻挠和不公正的待遇，因而有着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愿望；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将把人类从灾难中解救出来"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推理。

看一下在这里马克思主义者的高明的艺术是如何成功地将那些非理性的期望——它们没有了信仰，像一群丧家之犬似的在乱闯——和现在的不可避免的唯理主义倾向结合在一起的，后者不能容忍没有科学或伪科学的涵义。宣传自己的目标不会有效果，对实现社会主义的过程的分析只会使几百个专家感兴

趣。但是用分析的形式宣讲，而分析又针对人们内心的需要，这样就能避免被情绪支配。抱着这样的信念，一个人为之而奋斗的东西不能被打倒而终将会取得胜利。这给了马克思主义者最大的胜利。这个当然不是成就的全部。个人的力量、预言的光辉对信念的内容起了很大的作用。没有这些，新的生活、生命的新的意义都无法被揭示出来。但我们在这儿先不涉及这些。

关于马克思要证明的"社会主义目标不可避免地要实现"这个论点的说服力和正确性，这一点我们还要说一下。只此一点就足以对他上面关于不成功的人的感觉的阐述作出说明了。这当然不是有意识或下意识地对实际感觉的真实阐述。我们宁愿把它称作试图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或错误的揭示来代替实际的感觉。马克思这样做，是不实际地把他自己的"阶级觉悟"的术语（很不实际地）用于群众，他无疑是曲解了群众（这集中在工人的愿望是成为小资产阶级的一员以及利用政治力量取得这一身份上），但他仍然写出并强调这一术语。他没有为社会主义的美妙理想流出充满感情的眼泪，这是他自称优越于被他称为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人的地方之一。他也没有把工人夸耀为每日刻苦工作的英雄，像资产阶级在为自己的利润而焦虑时所做的那样。他完全不受任何倾向的摆布，不像某些追随者那样刻意奉承工人。他很了解什么是群众，他所期望达到的社会目标不是工人所能完全理解的，而且他从没有教过别人由他自己树立的什么理想。他和这些空洞的东西从不相关。像每一个真正的预言家称自己为上帝的代言人那样，马克思自称，自己只不过是阐明社会发展史的逻辑罢了。这里有一种可贵的品质，弥补了许多琐碎和粗俗的东西，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这两类事物非常奇妙地结合了起来。

最后，有一点不能不提，马克思本人十分有教养，以至于不

能和那些粗俗的社会主义的教授们相提并论。他们看见了圣堂，但不承认它。他完全能够懂得他的"相对的绝对"价值，不管离开它多远。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能够比《共产党宣言》更能为他的宽宏大量提供证明的了。在这本小册子中，他对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一一列举，即使在宣判资本主义在将来的死刑时亦是如此，他从未忽视它的历史作用。这样的看法包含着许多马克思本人也不愿接受的东西，但他对此无疑是坚定不移的。他对历史逻辑的洞察力使他能够更容易地给他的历史理论一个独特的表述。社会问题对他来说变得有规律可循，在他一生中的许多时候，他有可能成为谋士，但他鄙视那些事。他并非完全迷恋于社会主义以至于使其他生活色彩完全消失，制造出一个对其他文明的不健康的愚昧的仇恨和轻蔑的观念。从更多的意义上说，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和他的基本立场以及社会主义意志是结合在一起的，那就是科学社会主义。

二、作为社会学家的马克思

现在我们不得不做一件会遭到忠实于马克思的信徒反对的事了。他们自然要反对贸然分析那些对他们而言是真理的源泉的理论。但是他们最反对的事就是"肢解"马克思的著作，然后一篇一篇地讨论。他们会说，这种做法显示了资产阶级在把握整体内容方面的无能，因为每一个部分都是相互补充、相互解释的，只就某一方面某一部分内容本身来考虑，其真正的意义立刻就消失了。然而我们别无他法。在犯过了上面的错误，把马克思当作预言家分析之后又当作社会学家来讨论时，我没有否认马克思的社会整体视角的存在，这种视角为他的分析提供了一种整体上的统一性。但我也不否认，在马克思著作中有许多相

似的整体，事实上每一个部分都有其本身的独立性，这些部分是被作者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在这个广阔的领域中有着众多独立的部分，使得研究者能够吸收某一部分劳动成果，而暂不涉及其他内容，但在运用这些重要的、能起激励作用的真理的同时也获得了一些东西，这反而比把那些已经无希望的、应抛弃的内容搀杂在一起的做法要有价值得多。

先用这个方法分析马克思的哲学。我们先抛弃前面的方法而用整体的方法。马克思有着以德国方式训练出来的充满思辨的头脑。他有非常深厚的哲学基础，对哲学有强烈的兴趣。他是从德国的纯理论哲学开始他的研究的，这也是他青年时代热爱的科学。他曾一度想把哲学作为他的真正职业。他曾是一位新黑格尔学派哲学家，这就是说在接受这位大师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的同时，他和他的同事们剔除了许多信徒对黑格尔哲学的陈旧解释，并用相反的观点加以替代。只要有机会，这种现象就会出现在他的著作中。毫无疑问，他的德国和俄国读者有着同样的智力和训练基础，都能掌握这一秘诀并以此作为理解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关键。

我相信这是一个错误，是对马克思的科学能力的一种不公正的看法。他在一生中保持着早年的爱好。他喜欢某种形式的类推法，这可以在他和黑格尔的争辩中找到。他喜欢证明自己是个黑格尔主义者并引用黑格尔的语句。但仅此而已。他从未将实证科学引人形而上学的歧途。他自己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也是这样说的。他说的是正确的。分析他的观点，你不能证明其中有他自己的想象，他的主张都不是源于哲学领域，而是建立在社会事实之上的。而那些评论者和批评家们，他们从哲学的角度出发，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有关社会学的知识。创建一个哲学体系的倾向使得他们只能接

受来自哲学的解释，只能从某些哲学原则出发得到结果，因而，他们把对经济问题的阐述看作是哲学问题，这样就将问题引入错误的轨道，误导了朋友甚至论敌。

马克思作为社会学家，为完成他的使命运用了一个武器，这就是掌握和支配广泛的有关历史和现实的资料。他对现实的了解总是有点过时，他很书生气，因为他的基本资料，除了报纸之外，到他的手中总是有些滞后。但他那个时代的历史书籍，即使只具有一般的重要性，也很少有不为他所涉及的，尽管有许多专题性的文献除外。我们不赞扬他在信息方面有着完整性，但我们得赞美他在经济理论方面的博学，他的社会洞察力不仅表现在他的广博的历史知识上，而且在许多细节上，他肯定要超过同时代的其他社会学家。他对一些事件瞥上一眼就能透过其杂乱无章的表象洞察到其中深刻的历史逻辑。这不只是一种热情，也不只是一种分析的冲动，而是兼而有之。他尝试对那个社会逻辑进行阐述的结果，即所谓经济史观，无疑是他个人对当今社会学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在过去，这个问题未能受到重视。与此相比，这个理论源于何处，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前人，德国的或是法国的，此时都显得不太重要了。

经济史观并不意味着人类行为自觉或不自觉地、全部地或主要地为经济动机所驱使。相反，对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和机制的解释，以及个人心理对社会的影响都是这个理论的基本内容，也是对社会起作用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马克思并不认为宗教、玄学、艺术流派、伦理学思想、政治主张可归结为经济动机或者不重要，他只是要揭示影响和决定历史发展的经济条件。马克斯·韦伯的资料和论点和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完全相符。社会团体和阶级以及这些团体和阶级所阐述的它们自己的存在、地位和行为自然是马克思最感兴趣的。他对那些历史学

家以及他们的态度极为不满，他们用浮夸的语句来阐述社会现实。但是，如果思想和价值准则对他来说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动力，它们也不会毫无影响。打个比方说，它们是社会的引擎——起传动作用的部件。有必要指出，马克思在这方面始终被误解了。甚至他的朋友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也给这个理论下了这样的定义：个人和集团的行为主要受经济动机的支配。这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是错误的，而在其余的方面是浅薄的。①

当我们这样认为时，我们要为马克思辩护一下，以免引起另一种误解。经济史观通常被称为唯物史观。马克思本人一直这样表述。这个短语很快就在一部分人中被使用起来，但在另一些人中却没有被接受。但这毫无意义。马克思的哲学并不比黑格尔的哲学更具有唯物主义的特征，而他的历史理论和其他经验科学的历史理论相比也是如此。那些理论试图把历史的过程解释为由经验主义科学支配的东西。必须清楚，这和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和宗教的信仰——关于对世界的物质面貌的看法——也是一致的。中世纪的神学就提供了这样的方法，用它就可以建立这种理论的一致性。

这个理论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两个命题：

(1) 生产方式或生产条件是社会结构的基本的决定因素，并由它产生了人们的处世态度、行为和文明的方式。马克思有段名言表达了这个思想："手工作坊"产生封建制度，蒸汽机工厂产生资本主义。这句话过分强调技术因素，但是在理解了技术并非全部的影响因素的前提下是可以接受的。通俗一点说——这样做我们会忽略它的很多涵义——我们可以说：是我

① 见本书第3页注①。

们的日常工作决定了我们的思想，是我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决定了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或者说决定了我们看到的事物的某一面，也即我们的社会生活空间决定着每一个人。

(2) 生产方式本身有它自身的逻辑。也就是说，它们是根据它们的内在需要而变化的，而且按自己的方式产生出它们以后的形式。仍以马克思上面的例子来说明：以手工作坊为特征的社会制度创造了一种经济的和社会的环境，它所采用的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变成了一种实际的需要，个人或群体无力改变这种需要。蒸汽机的出现和应用又创造了新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新的群体和观念，它们的互相作用和发展又产生出它们自身的结构。这样我们就有了经济发展的推进器，它首先是推动经济变化，其结果也推动了社会的其他变化，这是一个不需要任何外力推动的推进器。

两种表述无疑包含了很多的真理，是非常宝贵的、有用的假设，正如我们以后将在几个不同的地方看到的那样。目前大多数的反对完全失败了，例如那些用伦理的因素、宗教的因素来反对的观点，或者是伯恩施坦[①]提出的简单的、直率的说法：人是有头脑的，因此会自己选择如何行动。这些观点都失败了。关于上述论点，我们几乎不需要详述它们的弱点了。当然，人们不是被迫直接从周围环境、客观事实中选择他们行动的过程，但他们的选择所依据的立场、观点、倾向不是从另外的独立的事实中来的，而是客观环境所反映的事实。

然而，又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经济史观只能是一个大致

---

① 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派首领，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1896—1898年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一系列文章，宣称马克思主义“过时”，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全面“修正”。——编辑注

的估计，它在某些情况下的作用会不如在另一些情况下的作用那样令人满意。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例子。社会结构、类型、观念就像硬币一样不易熔化。一旦它们铸成了，就会固定下来，可能在几个世纪内保持不变。既然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类型显示了不同程度的生存能力，如果我们试图用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过程去推测，我们几乎都能发现实际的群体和民族的行为和我们根据生产过程的主要方式所作的推测多少有些差别。这是很普遍的情况，如果我们将一个已固定的社会结构搬到另一个社会中，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日尔曼统治者在西西里制造的社会环境将能说明我的意思。马克思没有忽视这样的事实，但也没有意识到它的全部涵义。

另一个有关的例子有着不利的意义。想一下6、7世纪在法兰克王国出现的封建的地主所有制，这自然是改变存在了多年的社会结构的最重要的事件，同时它也影响了生产的状况、需求和技术。但简单的解释可在军事领导的职务上找到，这些军事领导过去是由家庭或个人来充当的，这些人由新领地的征服者变成了封建地主。这不符合马克思的纲要，而且容易导致不同的结论。这样的事实的性质无疑会被一些人用来作为另一个辅助的假设，但引入这样的假设通常是一个理论终结的开始。

在试图用马克思的论证方法来解释历史变动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许多其他的困难，但只要承认生产领域和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影响，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基本真理的魅力正存在于这种真理所具有的单一关系的严谨和简明之中。如果这一点有问题的话，经济史观就不得不与其他类似的理论并列，作为许多部分真理的一部分，或者让位于其他更好的基本真理。然而，无论是将它当作一个成果，还是作为一个有用的假设，都不会有损于它自身的价值。

当然，这个理论确实是理解所有人类历史秘密的万能钥匙。如果我们有时对它的运用感到过于幼稚的话，我们应当记住它是用来取代什么样的观点的。只要我们记住这一点，甚至是还不够完善的经济史观的姊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理论就会变得更加容易理解了。

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最重要的贡献。很奇怪，经济学家对社会阶级现象的认识过程比较缓慢。当然，他们常常对他们所研究的相互作用并产生了各种过程的人们进行阶级的分类。但是这些阶级只是一些个体的集合，它们显示了一些共同的特征。这样，一些人被划分为地主，因为他们拥有土地；另一些人被划分为工人，因为他们出卖劳动力。然而，社会阶级不是这种理论的信奉者制造出来的，而是一种实际存在着的东西。其存在完全被忽视，在这种理论的信奉者看来，社会就像是由一群杂乱无章的个人和家庭组成的一样。可以相当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社会阶级现象对于纯经济理论的研究有多重要？这对许多实际运用的问题是重要的，对于社会发展规律方面的问题无疑也是重要的。

大致地说，社会阶级首先出现在《共产党宣言》中著名的论述中：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当然这是一种比较笼统的说法。但即使我们说得具体一些，历史事件也可能经常由阶级利益、阶级立场以及现存的阶级结构等原因引起，它们永远是解释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它们足以使我们有可能把它们看成是和经济史观一样有价值的概念。

很明显，阶级斗争原理的继续发展取决于我们自己建立的具体的阶级理论的正确性。我们对于历史的描写，对所有文化模式、社会发展机制的解释都随着我们对阶级理论的选择而不同，例如，阶级的种族理论，像哥宾诺把人类的历史归结为种族

斗争的历史的理论，或者像现在流传较广的施穆勒或涂尔干[①]的劳动分工理论，以及把阶级对抗解释为不同职业的人群之间的利益对抗的理论。分析的范围并不局限在阶级本质的可能的差别上。无论我们对阶级的看法是什么，不同的解释来自于对阶级利益的不同的定义以及这个阶级本身所显示的行为。对这个问题近来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还很难达到形成学科的水平。

据我们所知，马克思没有写出他关于这些问题的系统的观点，这很难理解。他迟迟未能完成这个任务，可能因为阶级这个概念是他看问题的根据，以至于他感到没有必要写出它的明确的定义。同样，这也有可能是一些观点在他的脑中尚未得到确立，他在建立一个成熟的理论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这些困难是他在建立一个纯经济理论和试图得出过于简明的概念的过程中遇到的。他本人和他的追随者都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运用过这种不成熟的理论，其中，他自己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就是一个杰出的例子，除此之外还没有取得真正的进展。他的主要合作者恩格斯关于劳动类型分工的理论本质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除此之外我们只有一些他对这些问题的从偶然的启示和直觉得来的想法，有一些显示出思想的力量和光芒，它们散布在大师的著作中，特别是《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中。

把这些零碎的思想整理出来在目前是困难的。然而，其基本思想是很清楚的。划分阶级的原则在于是否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包括工厂厂房、机器、原材料以及工人必需的生活资料。这样我们就把阶级分成两种：一是所有者，即资本家；另一种是

---

① 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 今译作迪尔克姆、杜尔克姆，法国社会学家，现代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1896年创办《社会学年刊》，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致力于著书立说。主要著作有《社会分工论》、《社会学方法论》、《论自杀》。——编辑注

劳动阶级或无产者，他们被迫出卖劳动力。当然，我们不否认中间群体的存在，如农民、手工业者，他们雇佣劳动者，但他们自己也从事体力劳动，还有职员和自由职业者等。他们当然是存在的，但他们从事的职业被看作是不确定的，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逐渐消失。这两个主要的阶级，由于他们所处的位置的必然联系，基本上是相互敌对的，这和任何个人意志无关。阶级之间的裂缝，它们之中某一部分的冲突，可能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但根据最后的分析，起决定作用的分裂和冲突是偶然发生的。有一个对立的东西不是偶然的，而是始终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结构中，它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上的，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关系中的最本质的东西，即阶级冲突——阶级之间的战争。

我们即将看到，马克思试图揭示在阶级的战争中资本家将如何彼此相互摧毁，最后甚至将摧毁资本主义本身，他还要揭示资本主义所有制将如何导致进一步积累。但这样的争论方式，以及用所有权来作为社会阶级特征的定义，只能增加“原始积累”问题的重要性，也就是说，资本家在一开始是怎样成为资本家的，或者说他是怎样获得财富的，即根据马克思的学说，他是怎样获得能使他开始进行剥削所必须拥有的财富的。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说得不十分清楚。资产阶级的童话这样说：一些人不能成为资本家，而另一些人能够成为而且正在成为资本家，是因为后者比别人更聪明、工作更勤奋以及储蓄的缘故。马克思轻蔑地驳斥了这个童话。嘲笑是对付一个令人不悦的理论的绝好办法，正如每一个政治家在知道这将有利于他们时所做的那样。用公正的眼光看待历史和现实的人不会不注意到这个“童话”，即使它不能说出全部真实的故事，但仍能说出不少。超常的智力和精力成为取得工业成就的原因，特别是在工业的创建

时期，十有八九都是如此。正是在资本主义的初始阶段，任何个人在创业时，储蓄是成功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这和传统的经济学的解释不完全一致。通过节省工资和薪水来积累资金、以积累来装配他的工厂而取得资本家身份的人确实不多。大部分积累来自利润，而积累已成为取得利润的条件，这是区别储蓄和积累的正确依据。特别地，创建企业所需的财力有时可以从别人的储蓄中取得，小额储蓄容易解释，还有银行存款为筹建企业提供了财力。然而，后者不是普遍的规律，储蓄的作用在于能使他不至于为了日常的生计去从事单调乏味的劳动，使他能够有时间考察环境、扩展计划、获得合作机会。因此，作为一个经济问题，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家有关储蓄作用的论述的否定，虽然有些夸大了，但还是有根据的，只是他的推理不能得出结论。如果古典理论是正确的，那种嘲笑就不能说是对的了。

然而这个嘲笑起到了作用，它帮助马克思为原始积累理论排除了障碍。但是这个理论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确定。武力——掠夺——镇压，镇压促进了进一步掠夺，掠夺又促进了镇压，这当然是成立的，正好和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意见相符合，在今天更是如此。但这明显没有解决以下问题：如何说明一些人是怎样获得征服和掠夺别人的权力的？通俗作品不会去顾及这些。我不想和约翰·里德讨论这个问题，但我们是在研究马克思。

马克思的一切主要理论至少提供了有历史质量的相似结论。他认为资本主义从封建社会产生是因为其基本的逻辑，而不仅仅是事实。当然关于社会分化的原因和机制也被提了出来，但马克思实际上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观点，即封建主义是暴力统治，它对民众的镇压和剥削早已成为事实。阶级理论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提出的，它已扩大到了它的前身——封建社会，有许多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理论概念的解释，以及一些

在封建社会最棘手的问题，以它们原本的形式、以数据的形式、以分析资本主义的形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剥削者取代了封建社会的剥削者。在这样的情况下，封建地主实际上成了资本家，这的确将解决遗留的问题。历史事实为此看法提供了一定数量的证明，许多封建地主，特别是在德国，建立和管理了工厂，经常通过他们的封建地租取得资金，从农业人口中获得劳动力（并非必须是农奴，但有些是）。所有其他可用来说明这个问题的材料都明显要差一些。坦率地说，这个情况就是，按马克思的观点，这里没有满意的解释，也就是说，不求助于导致非马克思主义的结论的非马克思主义因素，就不能说明问题。

然而，这从历史和逻辑方面破坏了这个理论。由于大多数原始积累的方法就是以后进行原始积累的原因，和过去一样，贯穿整个资本主义时代始终，因而我们不能说，除了在很远的过去的那个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以外，马克思关于社会阶级的理论都是正确的。但坚持一个理论中的缺点可能是不必要的，这个理论甚至不是接近它要解释的现象的中心的最好例子，因此对此不必过分认真。这些例子主要存在于资本主义发展时期，能够从那些占多数的中等规模的由所有者自己管理的企业中见到。除此以外，阶级地位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多少反映了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地位，但经常是取得经济地位的原因而不是结果：经营成就明显不是取得显赫社会地位的惟一途径，只有在生产资料所有权偶然才能决定一个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的地方，才是这样的。然而，即便如此，用所有权作为决定的因素就像定义一个偶然有枪的人为士兵一样。对人们进行严格分类，一些人（和他们的后代一起）永远被认作资本家，而另一些人（和他们的后代一起）永远被认作无产者，正如我们经常指出的那样，这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忽视了一个问题——一些家庭不断

地退出上层阶层或进入社会的底层。我提到的事实都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它们没有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围中，原因只能是它们的涵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考虑一下那个理论在马克思的理论结构中发挥的作用，问一下我们自己分析它的目的何在——这和马克思将它作为一件为鼓动者而准备的工具是有区别的，这并不多余。

一方面，我们必须记住，在马克思看来，社会阶级理论和经济史观的理论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是两个独立的学说。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前一个理论是以特殊的方式对后一个理论所作的补充，这样就限制了对生产条件或方式的运用。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的结构，而且通过社会结构决定了所有文明的形式、文明的进程和政治历史。但是在所有的时代，除了社会主义时代，社会结构是用阶级来划分的——真实的登场人物是两个阶级，同时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逻辑的直接产物，并通过这种生产体系影响了所有的东西。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不得不把他的阶级问题归结为纯粹的经济现象，甚至是一个狭义的经济现象：由此他不能从更深的角度去看待它们，在他的分析纲要中，由于他把阶级放在这样的位置上，所以别无选择。

另一方面，马克思试图以与定义阶级分化相同的方式来定义资本主义。读者稍微想一下就会相信，这不是一件必需的或是必然的事。事实上这是一个大胆的分析策略，他把阶级现象的结局和资本主义的命运联系了起来。根据定义，把事实上和阶级是否存在没有关系的社会主义社会变成了除了原始社会之外，惟一可能没有阶级的社会。这个有独创性的叙述不能同样地从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定义中得到，而只能从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定义中得到。由此，社会中只有两个阶级——所有者和非所有者，因而所有其他的划分原则，那些似乎有道理

的原则，不得不被忽视，或让位或归结于阶级的原理了。

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性的夸大，要超过对在它们之间划分界限的确定性和重要性的夸大。对那些没有被像念经一样对待马克思学说的做法弄乱脑筋的人来说，很明显，它们之间的关系在正常的时候主要还是合作的关系，而相反的情况大多只能在非正常的时候出现。在社会生活中，对抗和统一是普遍存在的，事实上是不可分的，在少数情况下除外。但我几乎要冒昧地说，过去关于阶级之间和睦相处的观念完全是胡话，不过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使用者之间的鸿沟不可逾越，这样的说法也过分了一些。另外，他别无选择，不是因为他要得出一个革命的结论——这些他同样可以从其他很多可能的纲要中得到——而是因为他自己的分析的需要。如果阶级斗争是历史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产生社会主义的手段，如果这里只有两个阶级，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在原则上必须是对抗的，否则在马克思的体系中就失去了社会动力。

虽然马克思从社会学方面定义了资本主义，也即，根据生产资料的私人控制的制度来定义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却是从经济学理论中得到的。这个经济学理论揭示了社会学的材料，诸如阶级、阶级利益、阶级行为、阶级之间的交换等概念，是如何通过经济价值导出利润、工资、投资等概念的，又是如何得出它们最终将打破自己的制度框架、同时为另一个社会制度创造环境的结论的。这个社会阶级的特殊理论是一个分析工具，它把经济史观和经济利益的概念联系了起来，用它理顺了整个社会现象，使所有社会现象一致起来。因此，这不是一个仅仅用来解释某个单独现象而和其他现象无关的理论，它有着组成整体的作用，它作为马克思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远比作为解决一些眼前的直接问题的成功措施重要。如果我们要了解为什么有着一些缺

点的马克思理论有如此强的分析力量，则必须看到这个作用。

总是有一些热心的人钦佩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但更容易理解的是这些人的感情：他们钦佩这个理论整体的力量和伟大，而不是其中需要修正的有缺点的任何部分。我们应该自己去评价（见本文第四部分），但首先我们必须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结构是怎样完成其总任务的。

三、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博学的人。马克思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直称他为天才和预言家，而我认为有必要突出上面这一点，这似乎有些奇怪。然而，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预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专门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为他们不是某方面的专家，因而具有独创性。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什么能说明他缺少作为学者的素质，或缺少理论分析技术方面的训练。他是一位贪婪的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遗漏重要文献。他消化他读过的所有东西，深入思考每个事实，怀着热情争论不寻常的问题的细节，他习惯于透视包含整个人类的文明和延续发展的历史。或批评，或反对，或采纳，或综合，他对每一个问题总是要探索透彻。最突出的证明就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是理论方面的里程碑。他不间断地为武装自己而学习，努力掌握一切应该掌握的知识，从而避免使自己形成偏见、形成非科学的其他目标，虽然他是在为达到一个确定的目标而工作着。由于他的聪明才智，他不由自主地把对问题的兴趣本身看得最为重要，而不管他在多大程度上把注意力集中在最终结果上。在工作时他主要关心的是用他那个时代的科学来使分析工具变得锋利，关心如何使逻辑困难得到解决，

关心建立一个理论基础，以获得一个在性质上、目的上完全科学的理论，不论它可能有什么缺点。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反对者都会误解他在纯经济领域中成就的实质。对他的朋友来说，他比单纯的专业理论家高出许多，以至于对他们来说，给予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太多的声誉本身似乎就是一种亵渎。对他的反对者来说，他们对他的看法和他的理论观点感到不满，他们几乎不可能承认，如果他的有些工作是由其他一些人做的，他们会给予这些人很高的评价。而且像冰冷的金属似的经济理论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浸润在如此热烈的语句中，以致获得了不是这个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热度。如果有人对马克思被认为是在科学意义上的分析家有所怀疑，那他一定是想到了那些语句而不是他的思想，想到了充满热情的语句，以及对“剥削”和“贫困化”的控诉。当然，所有这些和其他许多方面，例如他对奥克内女士的刻意的影射和批评，都是这些表现的主要部分。它们对马克思本人很重要，对他的朋友和怀疑者也很重要。它们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坚持把马克思的理论看成是在与他的导师相类似的主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东西，有些东西甚至是从根本上和其导师的主张不同的，但它们并不影响他的分析性质。

那么马克思是否有导师呢？有。真正理解他的经济学要从这一点开始，即作为一个理论家，他首先是李嘉图①的学生。这

---

① 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1817年发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在许多方面发展了斯密的经济学说。他批判了斯密的多元价值论，坚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原理，并从这一原理出发，考察资本主义的其他经济范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他的学说，特别是比较成本理论对经济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编辑注

一点不仅因为他自己的论证明显是从李嘉图的命题开始的，而且因为他从李嘉图那儿学到了分析的艺术。他总是运用李嘉图的工具分析每一个以难题的形式呈现在他面前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是他以前在学习李嘉图的理论时遇到的，他还利用他从李嘉图那儿发现的为今后进一步工作所需要的启发。马克思本人是承认这一点的，但他不认为他对李嘉图的态度就像一个学生到教授那儿去时所做的那样：听他几乎是不间断地反复讲人口过剩、过剩的人口加上机器又使人口过剩，然后回家把功课做出来。围绕马克思争论的双方都不愿承认这一点，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

李嘉图的理论不是惟一对马克思的经济学产生影响的理论，但没有比魁奈[①]影响更大的了，从他那儿马克思得到了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过程的基本概念，这需要在这儿概要地提及一下。在 1800—1840 年间，有一群英国作者试图发展劳动价值论，他们可能提供了许多建议和细节，但这包含在了我们要提及的李嘉图在当时的思想中。有几个作者，马克思不甚友善地对待他们，他们也和马克思保持一段距离，他们的工作在许多地方和马克思相近（西斯蒙第[②]、洛贝尔图斯、J.S. 穆勒），在此不拟

① 魁奈（François Quesnay，1694—1774） 法国古典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经济现象，把经济规律理解为自然规律。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纯产品，即剩余价值，并把关于剩余价值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直接的生产领域，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主要著作有《租地农场主论》、《谷物论》、《经济表》。——编辑注

② 西斯蒙第（Jean Charles Léonard Simonde de Sismondi，1773—1842） 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法国的最后代表，经济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历史学家。1803 年发表《商业财富论》，宣扬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后转为经济浪漫主义者，1819 年发表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38 年又发表《政治经济学概论》，对《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的理论加以补充。主要历史著作有《法兰西人史》。——编辑注

详述，因为并非每一件事都和主要的争论有关，例如马克思在货币领域的成就就明显要弱一些，他在这方面没有达到李嘉图的水平。

现在，对于一个极简略的马克思观点的概要，对于《资本论》的结构，难免有许多指责是不公正的。这部著作有些部分尚未完成，有些部分遭到不少的非难，但它仍然在我们面前展现了非凡的轮廓！

(1) 马克思自己在一些方面也和当时以及后来的理论家一样，用价值理论作为其理论结构的基石，开创了理论的新纪元。他的价值理论继承自李嘉图。我相信像陶雪格教授这样杰出的权威不会同意这点，他总是强调它们的差别。他们的理论在语言表达、推断方法、社会学涵义上有许多差别，但在今天的理论家关心的纯理论的内容方面没有多少差别。李嘉图和马克思都认为每一个商品的价值都和这个商品包含的劳动量成比例(在完全均衡、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这个劳动量是由现存的标准的生产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两人都用劳动时间来衡量劳动量，用相同的方法把不同性质的劳动归结到单一的标准上来。两人都用这个方法来解决开始研究时遇到的相同的困难(也就是说马克思在向李嘉图学习时就遇到了这个困难)。关于垄断或者我们现在所称的不完全竞争就无需说什么了。两人都用相同的论点回答批评者。只是马克思的论点不那么客气，更加冗长，以及更富有哲学意味(我们用这个词的不好的意思)。

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价值理论不令人满意。在关于这个问题的大量讨论中，正确的东西确实不是总在一方，它的反对者用了许多错误的论点。基本的问题不在于劳动是否是经济价值的真正的"源泉"和"原因"。这个问题也许是社会学家主要关心的问题，他们要从中推导出伦理学的结果，马克思本人当然并非对这

方面的问题毫不关心。然而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它要描述和解释实际的过程，问一下"劳动价值论是如何发挥分析工具作用的"也许更重要，真正的困难在于它做得是如此不好。[①]

首先，在不是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它就不适用了。其次，即使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它也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除非劳动是生产的惟一要素，而且劳动只能有一种形式。如果这两个条件不能满足，则另外的假定必须引入，分析的困难又会增加，问题立刻变得难以处理。这样，用劳动价值论来推理只在很特别的情况下才可行，因而没有实际的重要意义，虽然可以说，从历史的趋势看，它有着大致相近的意义。最早用于代替它、现在有些过时的理论，是边际效用理论。一般认为，它在许多地方更为优越，但其真正的优点在于更普遍、适用性更强：一方面，在垄断和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适用；另一方面，在出现其他因素和其他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劳动时也都适用。此外，如果我们将已提到的限制性假设引入这个理论，就可以得出价值和劳动量之间的比例。因此问题应当是清楚的，像他们以前想做的那样，不仅让马克思主义者来质问边际效用理论的有效性是荒谬的(这是他们面对的)，而且认为劳动价值论是错的也不正确。

(2) 虽然李嘉图和马克思都没有充分意识到以此为出发点的不足，但他们对有些不足还是看得很清楚的。特别是他们两人都尽力解决剔除"自然的因素"所引起的问题，也就是使自然因素在生产和分配中的作用由惟一的劳动决定价值的理论来决定。人们熟悉的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实质上也就是要解决这种"剔除"问题的，马克思的理论也同样如此。一旦我们有了分析工具，把地租问题像工资一样处理，所有的困难就会消失。因此

① 见本书第3页注①。

无需再来说马克思绝对地租学说较之级差地租学说所具有的优点和缺点,也无需再说它和洛贝尔图斯的关系。

但即使我们不考虑自然因素的问题,困难仍然存在,它产生于作为生产资料而存在的资本。对李嘉图来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在他的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四卷第一章中,他引入并接受了一个事实而没有试图质疑,这就是:资本货物,例如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等用于生产一种商品,这种商品会以给这些资本的所有人一个净回报的价格出售。他意识到这个事实与花费在从投资到生产出产品的过程中的时间有关,它将使这些产品的真实价值和包含在其中的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有所偏离,这也包括生产资本货物本身的劳动时间,而这个时间在所有行业中都不一样。对于这一点,他冷静得就像这是在赞同而不是反对他的价值理论一样。除了这点以外,他没有把自己束缚在和这个问题有联系的次要问题上,显然,他相信自己的理论仍然说明了价值的基本决定因素。

马克思也引入、接受、讨论了同样的事实,并且从未对其真实性表示过怀疑。他还意识到这似乎和劳动价值论有矛盾。但他认识到李嘉图对待这个问题的不适当之处,在以李嘉图给出的形式接受这个问题的同时,认真地着手解决问题,像李嘉图一样用几百页纸来进行阐述。

(3) 在做这些分析的时候,他不仅揭示了许多和问题本质有关的概念,而且还发展了他接受的许多观念。例如他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工资)的划分适当地取代了李嘉图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划分,用"有机构成"这个更严密的概念取代李嘉图的"生产过程期间"这个不成熟的概念,有机构成取决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关系。他还对资本理论作出了许多其他贡献。然而,我们现在仅讨论他对资本的净收益的解释,也就是他

的剥削理论。

群众不总是感到他们在承受苦难、遭受剥削。但替他们表达看法的知识分子总是告诉他们说，他们受到了剥削，不过这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没有那个短语，即使马克思想这样做，他也没法办到。他的功劳就在于他察觉到了各种观点的弱点，在他前面的众多的思想的导师曾试图说明剥削是怎样发生的，直到今天仍是这样。那些通常所说的讨价还价的能力、欺诈行为不能使他满意。他要证明的是：剥削不是一种偶然的、意外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完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行为。

他是这样论述的。形成劳动力的人们的大脑、肌肉及神经像以前一样只是潜在的储备或资本。这种储备或资本在马克思看来是以一定数量存在着的物质，在资本主义社会它是一种商品，像其他商品一样。我们只要想一想奴隶社会的情况就会很清楚。马克思的观点是，在工资合同和奴隶买卖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所谓雇主对“自由”劳动力的买卖就和奴隶社会的情况一样，不是真正购买劳动者本身，而是购买他们潜在的劳动力的一部分。

既然劳动力（不是劳动服务或者实际的劳动时间）在那个意义上是一种商品，价值规律就一定要起作用。也就是说，它的价格必须通过竞争形成，和“生产”它的劳动时间的数量成比例。但是生产这个存在于“产品”上的潜在的劳动力的劳动时间是多少呢？这应该是与劳动者得到的吃饭、穿衣、住房、哺育下一代的费用相当的劳动时间。这些构成了劳动力资本的价格，如果他将其中一部分出售，用几天、几个星期来表示，他就能得到和这部分劳动力价值对等的工资，这正像奴隶贩子在奴隶市场上出售奴隶一样，他得到的是和生产这个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对等

的价格。必须重申，马克思很清楚那些普遍的口号，尽管形式各异，它们都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市场上工人被掠夺、被欺骗，而且因为他的可悲的弱点，他只能被迫接受任何形式的欺骗。事情还不只是如此简单，他还获得了他的全部潜在劳动力的全部价值。

但是，一旦“资本家”获得了那个潜在的服务，他们就能使劳动者工作更长的时间——提供比生产那个劳动力或潜在的劳动力更多的服务。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能够强迫工人劳动更长的时间，这比他们支付的要多。既然最终的产品的售价也和生产它所需的劳动时间成比例，这就使两个价值间存在差别——不是从其他地方产生，而是从马克思的价值规律的运用中产生的——它必然要依靠资本主义市场机制而归于资本家，这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家对劳动者进行剥削，虽然资本家付给劳动者的报酬不少于其潜在劳动力的全部价值，从消费者那儿获得的收入也不多于他售出产品的全部价值，但他攫取了剩余价值，也就“剥削”了劳动力。我们还应注意到，马克思没有借助于产品价格的不公平、限制生产或是欺诈等原因来分析。马克思当然没有否认有这样的事情存在，但他用正确的眼光看待它们，并未把结论建立在它们之上。

让我们顺便欣赏一下这个理论的教学方法。不管“剥削”这个词现在的涵义如何特殊，或者和一般的涵义有何不同，不管它从自然法则、经院哲学家的哲学以及启蒙作家那儿得到的证明是多么值得怀疑，它已经进入了科学理论的领域，并起到鼓舞马克思的追随者在斗争中前进的作用。

在看待这个科学观点的优缺点的时候，我们必须认真区分它的两个方面，其中一个方面总是被批评家所忽略。在一般的水平下，在静态的经济过程中，很容易说明，按照马克思的假设，

剩余价值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劳动价值论，即使我们假定它对每一种商品都是正确的，也不能用于劳动力商品，因为这意味着工人像一台机器那样，是根据一定比例的成本生产出来的。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假设劳动力的价值和"生产"劳动力的劳动时间成比例。从逻辑上说，如果马克思接受了拉萨尔①的"铁的工资规律"，或者直接和马尔萨斯主义展开辩论，像李嘉图做的那样，他就会改变他的见解。但既然他明智地拒绝那样做，他的剥削理论从一开始就失去了一个基本的支柱。

另外，可以看出，在所有的资本家雇主都能从剥削中得到利润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存在完全竞争的均衡。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每个人都试图扩大生产，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工资增加，使利润变为零。无疑可以用不完全竞争的理论，用竞争的摩擦、制度的阻碍，用强调货币信用领域所有可能的障碍等，来对此情况作一些修正。但用这种方式只能得出一个折衷的状况，这样做是马克思所鄙视的。

但是事情有另外的一面。我们只要看一下马克思分析的目的就会懂得他不必去应战，因为这很容易伤害他。这是很自然的，只要我们了解剩余价值理论只是完全均衡条件下在静态经济过程中的一个定理。既然他的分析针对的不是一种均衡的状态，根据他的理论，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会达到，相反它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则前面有关的批评并不完全是决定性的。剩余价值在完全均衡的条件下可能不会产生，但因为均衡永远不会建立起来，因此剩余价值总是会出现。它们总是趋于消失，

① 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 1825—1864) 德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派别的首领。1863年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统一德国工人运动，但同时推行机会主义，宣扬"铁的工资规律"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对其机会主义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编辑注

但又总会产生，它们总是不断地被重新创造出来。这个辩护不能挽救剩余价值理论，特别是用于劳动力商品时，或者用于它支持的剥削观点时。但是这将使我们对其结果有更好的解释，虽然有关剩余价值的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会将剩余价值从马克思主义的涵义中除去。这个方面被证明是很重要的。这也使马克思其他部分的经济分析的结构更加清晰，从而说明了那个结构遭到了针对它的基本原理的攻击，却没有造成致命破坏的原因。

（4）然而，如果我们对马克思学说的讨论以平常的水平进行的话，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越来越多。或者我们会看到，当马克思的信徒按照导师的方法去做时，他们面临的困难也会很大。首先，剩余价值理论并不能使问题的解决变得简单，前面提到，这是由劳动价值论和明显的经济事实间的差异所决定的。相反，它使差异变得更大，因为根据这个理论，不变资本，即不含工资的资本，不会把比消耗在生产中的价值更多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只有工资性的资本是这样的，而且企业的利润随着它们之间的有机构成的不同而不同。马克思认为，是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使总的剩余价值在企业之间重新分配，以使每个企业得到和其总资本相对应的利润，或使个别企业的利润率能够相等。我们容易看出，困难总是来自于制造一个没有根据的理论的企图。[1] 然而，马克思相信上面的理论不仅有利于产生一致的利润率，有利于解释以下问题，即由于这个因素，如何根据商品由劳动决定的价值产生了商品的比价关系，而且提供了对另一个“规律”的解释，也就是在古典学说中有重要地位的利润率有内在的下降趋势的规律。这种趋势事实上在那些在总资本中固定资本相对较多的、工资较高的行业中是很可能发生的。如果这

---

① 见本书第3页注①。

些行业中机器设备的相对价值增加较多，正如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发生的那样，而且剩余价值率或者说剥削率保持不变，那么总资本的利润率一般就会下降。这个观点曾得到许多赞赏，马克思本人大概对此也甚为满意，正像我们自己的理论解释了一个用过去的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一样。讨论一下这个理论的优点以及马克思在创立这个理论时的某些错误，会是件有趣的事。我们无需专门这样做，因为它的前提就是不适用的。但我们要讨论另一个有着相同的性质的不同命题，它是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力量的一个理论，它把剥削理论和马克思的下一个分析内容联系了起来，这个理论通常被称为积累理论。

资本家将从被剥削者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的主要部分(按有些信徒的说法是全部)转化成资本——生产资料。如果不用马克思的术语的涵义，这个部分就是平常人们很熟悉的储蓄和投资。对马克思来说，光有这个事实还不够：如果资本主义过程呈现为一个不可抗拒的逻辑过程，这事实就应是这个逻辑的一部分，那就意味着它是必然要发生的。从资产阶级的心理因素解释这种需要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例如像马克斯·韦伯那样用清教徒的行为——不用取得的利润去享乐——来说明资本家积累的主要原因。马克思并不忽视任何他认为可以借助这个方法得到的支持。但对于马克思那样的理论体系来说，这里必须有一个更本质的东西，是它迫使资本家去积累，而不管他们感觉如何，这比从心理上的原因去解释要有力得多。所幸的是这儿的确有这种东西。

为了说明强迫储蓄的本质，也为了方便起见，我将接受马克思的一个论点，也即我像他那样假定，资本家进行储蓄时，实际上意味着相应增加了实际资本。这种变化起初总是发生在总资本中的可变部分，即工资资本部分，即使它的目的是增加总资本

中的不变部分，特别是被李嘉图称为固定资本的部分——主要是机器设备。

在讨论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时，我曾经指出，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中，剥削所得将促使资本家扩大或试图扩大生产，因为赚取更多的利润是他们的根本出发点。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们不得不进行积累。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工资率或降低产品价格，将会导致剩余价值的减少，这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一个极好的例子，马克思对此非常熟悉。对于每一个资本家来说，这个趋势本身构成了追使他们进行积累的另一个原因，这最终又会使整个资产阶级的状况变得更糟。像我前面指出的那样，即使在一个“静态”过程中也有一种强迫积累的因素存在，这个过程不能达到均衡状态，直到积累使剩余价值减少至零，最后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然而，对强迫积累而言，更重要、更起作用的是另一些因素。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不是也不可能是静态的，更不会以静态的方式扩大。它不断地被任何时候都存在的新企业、新商品、新的生产方法或产业结构中的新的商业机会从内部革新。任何现存的工业结构、经济环境总是处在变化的过程中。任何事物在它还没有被淘汰以前就已经被改变了。经济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意味着混乱。在下一部分[①]我们将会看到，无论是否是完全竞争，在这种混乱中竞争的方式和在静态过程中的竞争是完全不同的。以生产新产品或以更便宜的价值生产旧的产品以获取利润的可能正变为现实，这就要求有新的投资。这些新的产品、

① 本文节选自《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一书，在英文版《从马克思到凯恩斯》一书中，篇名为《马克思的学说》。为反映原貌，译文中保留了“在下一部分我们将会看到”等字句，但相应部分未收入本篇，下同。——编辑注

新的方法和原来的产品、原有的方法的竞争不是在同等的条件下进行的，是建立在前者的决定性优势上的，它可能意味着后者的灭亡。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就是这样取得的。为了不在降价中受损，每个企业最终都被迫进行投资，同时，为了这样做必须抽出一部分利润，也就是进行积累。这样，每个资本家都要进行积累。

马克思比同时代的经济学家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一产业变化过程，也更充分地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这并不意味着他正确地理解了它的本质、正确地分析了它的机制。在他看来，那个机制变成了众多资本解决自身问题的惟一机制。他没有适当的企业理论，他没有正确区分企业主和资本家，加上他在理论技术上的缺点，造成了许多不合理的推论和谬误。[①] 但是对马克思而言，仅仅是看到这个过程本身就已经足够了。如果从马克思的论证中得不到的结论可以从另一种论证中得出，那么上述推论就不再是致命的缺点了。即使有一些明显的错误和曲解，也可以由包含这些错误和曲解的论证在总体上的正确性来弥补。

我们前面有过这样的例子。从本来的情况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但资本主义过程能经常产生暂时的高于成本的利润，其他理论也能很好地说明这点，虽然不是用马克思的方法得出的。马克思的下一步则是论证积累问题，这没有因他前面的疏忽而受损。同样，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令人满意地创立强迫积累的理论，而这对他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但他在解释方面的缺点没有产生多大害处，用前面提到的方法，我们自己就能很容易地找到满意的解释，利润的下降可用其他原因加以说明。从长远看，整个工业资本的总利润率，不一定像马克

① 见本书第3页注①。

思所说的那样由于不变资本相对于可变资本的增加，或是由于其他什么理由而下降。这一点能够证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以下这条就够了：每一个企业的利润不断地受到实际的或潜在的竞争的威胁，这种竞争来自新的产品、新的生产方法的出现，这种竞争迟早要使企业受到损失。这样我们找到了驱动力，还是和马克思的观点相类似的观点，即不变资本不能产生剩余价值，因为个别资本货物的集合永远不是剩余价值的源泉。这不必依靠他的那些观点，因为它们的有效性是有疑问的。

另一个例子来自于马克思理论链条中的下一个环节，这就是资本集中的理论，也即他对于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工业企业和控制单位有扩大规模的倾向的论述。他的所有的说明，除去比喻，归结到一个简要的说法上就是“竞争战是靠降低商品的价格来进行的”，而这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要依靠一定的生产规模，依靠大企业吃掉小企业。这种说法很像现在的教科书里的说法，不怎么深刻和令人赞赏。特别是它是不完整的，因为马克思只是强调个别“资本”的规模，在对效率的描述中，马克思在技术上遭到许多阻碍，不能有效地说明完全垄断和寡头垄断下的情况。

然而，除马克思的信徒以外，这么多经济学家宣称钦佩这个理论并非是没有理由的。考虑到马克思当时所处的时代，预言大企业的出现这一件事，就是一个成就。但他做的远不止这些。他巧妙地把集中和积累过程联系起来，把前者视为后者的一部分——不仅从实际形态方面，而且从逻辑上。他正确地看到了一些结果，例如，众多私人资本的大量增长成为生产方式本身发生革命的不可阻止的物质基础——而其他因素至少是片面的或是歪曲的方式。他以阶级的战争、政治使人们兴奋，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他的理论比那些枯燥的经济学原理要高出许多，对那些

没有任何想象力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最重要的是他可以没有障碍地做下去，而不受由他个人的性格而形成的动机以及在内行看来是不严格的因素的影响，因为毕竟工业巨人已经出现，而它们要创造的社会环境也同样已经出现。

(5) 加入另外两个内容就将完成这个框架：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和他的(也是恩格斯的)商业周期[①]理论。前者的分析和看法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而后者的分析和看法都显示了优点。

马克思无疑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劳动人民的实际工资率和生活水平在较富裕的阶层中是下降的，在低收入的阶层中更是得不到改善，阶层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或是外界因素造成的，而是由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内在逻辑决定的。作为一个预言，这当然是不恰当的，各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很难将出现在面前的截然相反的情况解释清楚。首先，即使在今天，一些个别的例子也显示了试图拯救那个"规律"的明显趋势，这些例子是用工资的统计数字来证实存在这样的趋势的。然后，又有人试图给出不同涵义的解释，也就是说，说明它不是参照实际工资率或不是参照分配给工人阶级的实际份额的绝对数，而是参照劳动者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相对份额。虽然事实上在马克思著作中的某些章节里可以作这样的解释，但这明显与大多数章节相悖。此外，接受这个解释没有多大意义，因为马克思的主要结论是：劳动者人均收入的绝对额是下降的，至少是不会增加的。如果他真的考虑过那个相对份额，那么只能给自己增加困难。最后，这个命题本身仍是错的。因为整个收入中的工资和薪水的相对份额是在变化的，但每一年变化很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固定的，明显没有下降的趋势。

---

① 亦称商业循环，是西方学者对经济周期的称呼。——编辑注

然而，这里似乎有另一种克服困难的办法。一个趋势在一定的时间内有可能不能正确地显示出来，在此情况下还可能会显示出相反的趋势，也可能隐藏在被调查的对象内，或可能被其他的条件所掩盖。这实际上是大多数现代马克思主义者采取的方法。例外的情况，比如在殖民扩张时期，或者更常见的是在19世纪建立新的国家的时期，它被认为是创立了一个被剥削的受害者的“禁猎期”。下面我们会涉及这个内容。同时，我们应注意到一些事实在表面上支持了这个论证，这个论证在逻辑上也不特别，如果那个趋势是本来就有的，则这个论证也能克服困难。

但是真正的困难在于，马克思的理论结构在这个部分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在这里分析的基础和见解都遇到了问题。贫困化理论的基础是“产业后备军”，也即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创造了失业人口。产业后备军的理论又是建立在李嘉图关于机器的学说的有关章节的基础之上的。除了价值理论，马克思没有其他观点像这样完整地建立在李嘉图之上而不增加任何基本内容。我当然指的只是这个现象的纯理论问题。马克思确实总是补充一些次要的论点，比如将不熟练工人被熟练工人代替这种恰当的概括归入失业的概念中。他还引用了大量的实例和术语，最重要的是他增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背景——广泛的有关社会发展规律的背景。

李嘉图一开始赞同这个看法，一般来说，在生产过程中引入机器不可能给劳动者带来好处。当他怀疑这个观点或对它的普遍规律地位产生怀疑时，他以他特有的坦率作风改变了主张。以同样坦率的个性，他持有了相反的看法，用他习惯的“设想一个特例”的方法，举出一个为经济学家所熟悉的例子，以说明问题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出现。一方面，他并不否认他只是证明了

一种可能性，未必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也不否认使用机器在日后的总产量、价格等方面，最终将给劳动者带来利益。

所举的例子在它的范围内是对的。今天更精确的方法证实了它的可能性，这些方法还能阐明决定将来发展的结果是否正常的条件。这当然是纯理论都可以做到的。为了预测实际结果，还需要更多的数据。但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李嘉图的例子呈现出更有趣的特征。他假设：一个拥有一定数量的资本、一定数量的工人的企业决定实现机械化。相应地，企业安排一组工人去建造机器，建造好以后，企业可以将其中的一部分人解雇。利润最终可以保持不变（经过比较调整，将去掉任何临时收入），但总收入将会改变，这个数字正好和先前付给那些现在“自由”了的工人的工资相等。马克思的关于用不变资本代替可变资本（工资）的处理方法几乎和它是完全一致的。李嘉图强调的多余人口和马克思强调的过剩人口如出一辙，马克思用它代替“产业后备军”这个术语。马克思完全接受了李嘉图的学说。

只要我们想到马克思建立在这一薄弱基础之上的理论，李嘉图本来能够接受的观点就变得不正确了，这事实上成了体系不一致的原因，对最终结果的正确看法也于事无补。马克思自己似乎也有这样的感觉。同时，他全力抨击那些发展了李嘉图在补偿方面的涵义的作者们，这个涵义是：即使采用机器会带来损害，但机器时代对劳动者总有好处（补偿理论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最不喜欢的东西）。

他有理由这样做。因为他的产业后备军的理论非常需要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除为一些次要的目的服务之外，它主要服务于两个基本目的。首先，我们看到，他反对将他的有关剥削的理论说成是利用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作为其理论的支柱，他对这点甚为反感，这很容易理解。他放弃了我们所说的他的剥削理

论的一个支柱,那个支柱被因为经常产生而经常存在的产业后备军取代。其次,他采用的关于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机械的范围的狭隘观点是和《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句子相呼应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仅是马克思这一卷著作的结论,而且是整个理论的最终的结论。我将较完整地引用它们,比在讨论中所涉及到的更加完整,以便让读者对马克思有所了解,不论读者对马克思的态度是如何大相径庭,是对马克思怀着热情的人,还是对马克思有所轻视的人。无论这是对真理的预言,还是与事实不相符。它是这样说的:

> 和这种集中或多数资本家为少数资本家剥夺的现象联在一起……一切民族在世界市场网中形成的密切联系,从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际性质,跟着发展起来。把这个转化过程所有的利益横加掠夺,并实行垄断的资本大王的人数在不断减少,穷乏、压迫、奴役、退步、剥削的总量,则跟着在增加;但是,人数不断增长,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构自身所训练、所联合、所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愤激反抗,也跟着在增长。资本垄断,成了这种和它一起,并且在它下面繁花盛开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会被炸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响起来了。剥夺者被剥夺了。[1]

(6) 马克思在商业周期领域里的贡献是难以评价的。许多

---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 841 - 842 页,人民出版社,1963。——编辑注

真正有价值的部分包含在许多言论、注释中间，其中大部分是偶然形成的，散布在他的许多文章中，也包括在许多书信中。这些零散的、稍纵即逝的东西除了一些初步的想法的雏形外，甚至在马克思本人的脑海中也没有形成体系。将这些东西重新整理出来形成一个体系的尝试，由不同的人做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由那些钦佩马克思的人来做可能会以一种可以理解的倾向使它变得更糟，实际上那些后来的研究成果只是他们把自己证明的东西归于马克思的结果。

由于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众多的贡献，一般的朋友和论敌过去和现在从未认识到摆在评论者面前的是什么样的任务。马克思如此频繁地对该问题发表评论，说明这明显和他的基本主题密切相关，他们认为这里必然有一些简单、明确的马克思关于商业周期的理论，它可以从他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其他逻辑中产生，正如剥削理论从劳动价值论中产生一样。于是他们着手寻找这种理论，可以想到他们的情形如何。

一方面，虽然他的内心不是非常地激动，马克思无疑称赞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社会生产力提供的巨大动力。另一方面，他突出地强调不断增长着的劳动群众的苦难。把危机或萧条归咎于受剥削的群众无力购买不断扩大的生产设备生产出的或将要生产出的产品，以及由此造成的无需重复的利润率下降导致企业倒闭等原因，这难道不是最自然的事情吗？这样我们似乎真的可以根据我们想要强调的事物，提出“要么是消费不足、要么是生产过剩”这种最不值得重视的理论。

马克思的理论事实上属于消费不足产生危机的理论。有两个事实可以支持这个结论。第一，在剩余价值理论和其他的一些理论中，马克思的学说和洛贝尔图斯以及西斯蒙第有着密切关系，这是很明显的。这些人支持消费不足的看法，因此推断马

克思也有同样看法，是很自然的。第二，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一些文献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关于危机的简要的陈述中看到这个观点。虽然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说得更多一些，但这无关紧要，因为马克思很理智地否认自己是这方面的权威。

事实上他没有一个简要的有关商业周期的理论，也不能从他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规律”的逻辑中得到这个结论。即使我们接受他对剩余价值的产生所作的解释、有关积累和有机构成提高的理论（与不变资本相对增加有关）以及人口过剩的理论——过剩人口无情地加深了劳动群众的苦难，再把它们和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逻辑链条联系起来，即使这样，我们仍然需要解释周期性波动的原因，以及繁荣和萧条的内在联系。毫无疑问，我们可以找到总会发生的许多偶然的事件，用以弥补那些基本解释的不足。这里有计算错误、预测错误、乐观和悲观的波动、过度投机以及对这种投机的反应，还有各种各样的“外部因素”。尽管如此，马克思的积累过程的机制是匀速运行的，他描述的过程也是**可能**匀速运行的，从这个逻辑出发，应该没有繁荣和萧条。

当然这并非不幸。许多其他的理论家曾经认为而且现在也认为，在任何时候，一些重要的因素发生了问题，危机就会产生。一般说来，这并不是什么障碍，因为这就把马克思从他的体系束缚下解放出来，让他能够自主地看待事实，而不必去曲解它们。相应地，马克思考虑了许多相关程度不同的因素。例如：他多少有点肤浅地仅用在商品交易中的货币干预，而没有用其他因素来反驳萨伊关于不可能出现供过于求状况的观点；用银根宽松的市场来解释和以耐用资本货物为特征的投资相一致的不均衡的发展；用开放的市场这种特殊的激励因素或者出现了新的社会需求来解释积累的突然增长。他尝试将人口的增长作为引起经济波动的因素，但不是很成功。他看到了生产的扩张是“突

然的痉挛式的"(虽然没有真正地作出解释),他有针对性地说:"信用的伸张和收缩,不过是产业循环周期变化的症状。政治经济学会把这种症状看为是产业循环周期变动的原因,不说别的,单有这点,已经显示出它是如何浅薄了。"[①]当然,在有关章节中,他对不断发生的偶然的事件也作了着重的解释。

那些都是常识,基本上都是对的。从开始认真分析商业周期起,我们实际上已经找出了所有和它有关的因素,总体上说没有错。此外,不要忘了仅仅是认识到周期运动的存在,在当时就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在他之前许多经济学家对此已有模糊的认识。然而他们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引人注目的、破坏性极大的事件上,也就是我们现在称为"危机"的现象。但他们没有从正确的角度看待这些危机,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看到这些危机仅仅是周期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的事件。他们不看这些事件的前因后果,认为这些现象是孤立发生的灾难,是由于错误、过剩、渎职或是信用机制方面的错误造成的。我相信马克思是第一个超越传统的经济学家,走在了克雷蒙·朱格拉前面,除了统计上的补充以外。虽然商业周期的现象清楚地呈现在他的眼前,而他也了解它的机理,但他没有给出一个充分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像朱格拉一样,他毫不犹豫地提出持续十年的周期被一些小的波动所打断。他对周期的时间长短感兴趣,而且认为这正像棉纺织厂里的机器有使用年限一样,它们有某种联系。和危机理论不同,他在商业周期问题上的研究有许多领先之处。这足以使他在现代周期理论的研究方面享有创始人的地位。

另一个问题必须提到,在大多数情况下,马克思使用"危机"这个术语时引用的是其一般的涵义,如像其他人一样,指1825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696页,人民出版社,1963。——编辑注

年或1847年的危机。但是他也使用它的其他涵义。他相信资本主义的发展总有一天将摧毁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框架，他认为在真正的毁灭发生之前，资本主义将出现越来越多的摩擦而且呈现许多致命的弊病。对于这个可以想象的长短不一的期间，他使用了一个术语。他揭示了把那些周期性危机和资本主义秩序下发生的独有的危机联系在一起的趋势。他甚至认为，前者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最终毁灭的预演。既然对许多读者来说，这在一般意义上可以看作是马克思关于危机理论的一个线索，我们有必要指出：根据马克思的理论，那些导致资本主义最终毁灭的因素，如果没有另外的前提，就不能作为周期性萧条的原因；而那个线索没有使我们超越"剥夺剥夺者"这个主张，只不过它在萧条时期比繁荣时期更容易实现罢了。

(7) 最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将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不可避免毁灭理论）能提供一个例子，一个将不恰当的推论和有助于挽救最后结论的深刻的远见结合起来的例子。

马克思的"辩证推理"是建立在"劳动者的苦难和所受的压迫将迫使他们起来反抗"的结论上的，这个结论被不恰当的推理破坏了，因为它使"贫困的增多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结论无效。另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已开始对"生产资料的集中必定和资本主义的外壳不相容"的命题表示了怀疑。他们之中第一个用系统的观点表达这种疑问的人是希法亭①，他是重要的新马克思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他实际上倾向于相反的推断，也就是说，通过集中，资本主义会变得稳定。关于这个问题留待下一

① 希法亭(Rudolf Hiferding, 1877—1941)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派首领之一。原为奥地利人，后入德国籍。主要著作有《金融资本》。——编辑注

部分再说。但我仍要说，希法亭说得似乎太过分了，尽管我们将会看到，目前在我们国家，"大企业会变成生产方式的桎梏"这个信念还没有根据，尽管马克思的结论和他的前提是不一致的。

然而，尽管马克思的论据和推论的毛病在过去多于现在，但他的结论可能是正确的（他断言，资本主义的发展将摧毁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我相信这是对的。我把这个在1847年就揭示出的结论称为深刻的远见，这不是夸大其辞。这在现在是很平常的话了。首先这样看的是施穆勒。施穆勒教授是普鲁士枢密院官员，不太像是革命党人，也不能称作是鼓动家，但他朴素地表达了相同的真理。至于为什么这样、怎样去做的问题，他却未能说明。

几乎没有必要作详尽的概括。不管多么不完善，我们的纲要已能够建立起来了：首先，没有人会计较纯理论分析是否绝对准确；其次，没有人担心大胆的解释会完全失败。

在对理论方法进行批评时，不正之辞必须颠倒过来。坚持一个早已不正确的、在马克思的时代就很快变得陈旧的分析工具；一系列不正确的或完全错误的结论；如果从基本的推论上改正错误，有时会走向它的反面——所有这些都可以用来指责马克思这个从事理论工作的人。

即使是这种批评，也要受到两个因素的限制。第一，虽然马克思经常犯错误，有时还不可救药，但对他的批评也远非总是正确。既然批评者中间有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也只能记在他的账上了，因为他未能和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见面。第二，对马克思的许多个别的贡献，无论是批评的还是肯定的，也是如此。像这样的问题我们都没有办法列举，更不用说去公正地评价它们了。但我们在讨论中对他的商业周期的理论还有我们的看法。我已提到过一些对有形资本结构理论的贡献。他在那个领

域里的设计纲要虽不是无懈可击的，但在最近的研究中被证明是有用的。

虽然这还面临许多理论问题，但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似乎要被全部推翻。因为这里真有一个伟大的成就能弥补他的过失。他的分析虽然有些缺点甚至有不科学之处，但仍体现了一个基本思想，这既不是理论的思想，也不仅仅是一些没有联系的以独立形式出现的东西，而是上述形式的实际结果，或者说是经济在某一历史阶段、某一时刻按它自己的轨迹发展并且按自己的状态决定以后的状态的实际过程。这样，有这么多错误看法的作者，仍是第一个提出对于今天来说仍然预见到了将来的经济理论的人，而我们现在还在慢慢地、不辞劳苦地收集着它们的片砖碎瓦、一些统计的事实和有用的方程式。

他不仅是构思那个思想，而且努力地去实施。因为他的观点要服务于伟大的目的，所有有损于他的作品的缺点，都必须给予另外的评价，即使不能完全借此挽回名誉。然而，实际上他获得了一个有关经济学的基本的方法论。经济学家总是要么为经济思想史而工作，要么就是在利用其他人做过的历史性的工作。但是经济史实被分为单独的空间。他们利用历史仅仅是为了举例，或者是为了证明某一结论。他们把历史机械地搀和在一起。而现在马克思是用化学的方法去"搀和"它们的，也就是说，他把历史引入产生结论的论证中。他在一流经济学家中第一个懂得并系统地教授经济学理论如何进入历史分析、历史的叙述怎样转变为历史论证。他并不想解决和统计学有关的问题，但这意味着他要解决其他的问题。这也回答了本文第二部分结尾处提到的问题，即：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充实他的社会学框架时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它没有成功，但在此过程中，它确立了目标和方法。

四、作为导师的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的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现在摆在了我们面前。作为综合的整体是怎样的？这个问题不是多余的。如果它是正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总体比部分的总和更正确。此外，综合的整体可能破坏了精华而利用了糟粕。两种情况可能在每一点上出现，整体的东西就其自身而言，可能比部分的东西更正确或者更错误。最后，还有只能由整体得到的启示。对这后一点不用说得更多。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回答，这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我们的时代反对固执的专门化，因而呼吁综合性，在社会科学领域，这种呼声更高，而在这个领域内非专业因素更加重要。但马克思的体系表明：虽然综合可能意味着新的见解，但同时也意味着新的束缚。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的社会学和经济学观点是如何相互渗透的。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在目的和实践方面是一致的。经济学和社会学中所有主要的概念和命题在两个层面上有着相同的涵义。这样，经济学中的"劳动力"这个范畴和社会学中的"无产阶级"这个阶级至少原则上是同一的，它们事实上就是一个概念。根据对经济学家有用的"分配"概念的涵义，在社会学中，收入是指对生产性服务的回报，而不考虑社会阶级；而在马克思的体系中，任何这样的收入都要在阶级之间分配。这样它们之间就有了不同的涵义。又如，资本在马克思的体系中只有在特定的阶级手中才是资本，同样的东西在工人手中就不能称之为资本。

毫无疑问，这样的分析方法由此具有了活力。经济理论中幽灵一样的概念开始有了生气。无生气的定理活动活跃起来

了，它没有失去它的逻辑质量，它再也不仅仅是抽象的体系中具有逻辑性的一种命题，而是描绘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这样的分析不仅表达了所有经济分析描述的丰富内容，而且包含了广阔的领域，它描述了各个阶级的行为，而不论这一行为是否符合商业过程的一般规律。战争、革命、各种类型的法律、政府的结构变动，总之，所有这些被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简单地视为外部干扰因素的事物都包含在马克思学说的范围内，和机器设备的投资、劳动力的交易一同出现，所有这些都包含在一个简明的纲要中。

同时，这样的做法也有缺点。概念按这种形式安排，很容易在它获得生动性的同时失去同样多的功能。如果其他例子不行的话，工人和无产阶级这一对概念可以作为一例。在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中，所有的个人劳务报酬都带有工资的性质，无论获得报酬的人是高级律师、电影明星、公司经理还是街道清洁工，因为从所涉及的经济现象看，它们具有共同之处。这种概括并非毫无益处，相反，它对探索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会有所裨益。但是把劳动力和无产阶级等同起来，就把问题搞得不清晰了，事实上我们在自己的描述中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同样地，一个有价值的经济学原理可以被它在社会学中的变化弄得破绽百出而失去丰富的涵义，反过来也是如此。因此，一般的综合，尤其是马克思在某些方面的综合可能会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变得更糟。

一般来说，综合，即将各种方法和结果结合起来是一件困难的事，只有少数人能充当此任。结果是一般人总不能解决好这个问题，而且从那些被教育得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的学生那儿，我们听到的只是对森林的不满声。他们没有认识到造成困难的部分原因在于材料太多，综合的森林看起来像个知识的集中营。

这种综合，按马克思的方式，也即把经济和社会的分析结合起来服从于一个目的的方法，当然特别像那种知识的集中营。它的目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地位的论证，是很宽泛的，但分析的结构不是这样的。这儿的确有政治事实和经济原理的联姻，但它们是由强力所促成的，哪一方都不会很服帖。马克思主义者宣称他们的体系要解决所有使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困惑的重大问题，他们确实做到了，但只是删削了这些问题。这一点需要详尽论述一下。

我前面说过，马克思的综合的理论体系包括了所有那些历史事件，比如战争、革命、法律的变化以及那些社会制度——如财产权、契约关系、政府的形式等。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习惯于把这些内容作为干扰因素或论据来对待，这意味着他们不打算解释它们，而只是分析它们的运行方式和结果。为了界定任何研究项目的对象和范围，这样的因素和论据当然是必需的。如果它们没有得到说明，那只是因为研究者认为每个人都知道它们是怎样的。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特征之一便是将这些历史事件和社会制度本身归入经济分析过程，或者说，就是不仅把它们作为数据，而且把它们作为变量。

这样，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美国国内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大革命、1830 年和 1848 年革命、英国的自由贸易、劳工运动以及任何其他的特殊现象、殖民扩张、社会制度的变化、任何时候任何国家的民族和政治党派，所有这些都进入马克思经济学的领域内，而这些现象都可以找到理论上的解释，这些解释的根据是阶级之间的冲突、积累、资本构成的变化、剩余价值率的变化以及利润率的变化。经济学家们再也不能满足机械的回答，而代之以教给人们深藏在这些斗争里的涵义。“政治”再也不是一个可以和必须从基本原则中抽象出的独立的因素，

再也不被个人的偏爱所决定，去充当一个淘气男孩的角色，当工程师背过身去时做那些瞎捣机器的恶作剧，或者充当一个用不知是否是人类的神秘的智慧和美德来扭转乾坤的英雄的角色（也就是被称作政治家的那一类人）。不，不是这样的，政治本身是由经济过程的结构和状态决定的，在经济理论的范围之内，它变成了经济效果的指示器，正像任何买卖行为一样。

另外，我们能够理解，综合的方法能产生出很大的魅力，我们感受到的正是这一点。年轻人和那些报界的有识之士特别理解这一点。对他们来说，似乎上帝已赋予他们永久的青春。他们耐心等待机会，渴望能以某种方式来拯救世界，他们厌恶教科书中难以形容的冗长乏味，激动和理智地表达着不满，但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完成综合这项工作。然而，他们却在马克思那儿寻找到了他们渴望获得的东西。这里有揭示最本质的秘密的钥匙，有调度着重大的和次要的事件的指挥棒。我现在要暂时提一下黑格尔主义，他们注视着它的纲领，这个最全面、最具体的纲领。他们不再需要从中去找出重大的问题，立刻就能识破政治和商业的木偶后面是什么——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考虑到这里有那么多的选择，谁又能指责他们呢？

不过，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分析有多大贡献呢？我不知道。这位描述英国向自由贸易的过渡和英国早期的工业立法成就的谦卑的经济学家似乎忘了——或者从没有记起——产生这些政策的英国经济状况。如果他在一门课程或一本纯理论书籍中没有这么做，那仅仅是为了使分析更简洁、更有效。马克思主义者要做的只是坚持它的原则和用以补充这一原则的特别狭窄的、被歪曲的理论。毫无疑问，这个理论提供非常简洁、明确的结论，但我们只须将它系统地用于个别情况，以免对无休止的关于所有者和非所有者之间的阶级斗争的说教感到厌倦，或

者更糟，觉得它是陈腐的、平庸的。如果不强调这一基本的纲要，我们就会感到厌倦，否则，就会产生后一种感觉。

马克思主义者习惯于骄傲地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固有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趋势的分析是成功的。正如我们看到的，可以证明，马克思比同时代的许多作者更清楚地看到了企业向大规模发展的趋势，不仅如此，他还看到了随后会发生的情况的一些特征。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预见有助于分析，它能弥补后者的一些缺点，使综合的意义比分析给出的一些结果更正确。但仅此而已。而这个成就必然要被那个"不断增长的苦难"的预言的失败所抵消，它是错误的预测和分析产生的结果，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今后社会事件的预测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要是有人完全依赖马克思的综合的方法来理解当前所有的形势和问题，则可能会是一个遗憾的错误。实际上，现在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尤其是没有理由为此而感到骄傲，因为马克思的这个综合的方法是从过去十年的经验中得到的。任何萧条和复苏的延长都恰好证实悲观的预测，也将证实马克思的预测。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相反的印象就会被失去信心的资产阶级和受到鼓舞的知识分子的谈话制造出来，而从他们的害怕和希望中自然就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的色彩。但是没有确凿的事实来证明马克思的判断，也不能推断我们见到的情况不单纯是一次衰退，而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变化的征兆，正像马克思预测的那样。在下一部分我们将看到，反常的失业、投资机会的缺乏、货币的贬值、亏损等现象都发生在众所周知的衰退占主导地位的期间内，像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发生的那样，恩格斯曾谨慎地对其加以评论，为今天的热心的追随者树立起了一个榜样。

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马克思的综合的方法作为解决问题的

工具的优点和不足之处。

首先，我们将研究马克思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在马克思主要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它的根源，但它在新马克思主义学派那儿得到了发展，并在本世纪一二十年代进入繁荣时期。这个学派没有放弃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捍卫者如卡尔·考茨基的关系，并在体系上融入了新的内容。维也纳是它的中心，奥托·鲍维尔、希法亭、麦克斯·阿德勒是它的领袖。在有关帝国主义的理论领域里，许多人仍在继续工作，其中主要有罗莎·卢森堡和弗利兹·斯滕伯格等。马克思的主要的观点如下：

一方面，没有利润，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存在下去，这个经济系统就不能运行；另一方面，利润在那个制度的作用下正不断地减少，因此不断地尽力维持利润就成了资产阶级的中心目标。正如我们看到的，伴随着资本构成的质的变化的资本积累是一种补救办法，但最终将使事情变得更糟。因此，在利润率下降的压力下——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它的下降是因为相对于可变资本的不变资本在增加，同时如果工资有上涨的趋势、劳动时间也要缩短的话，剩余价值率就会下降——资本要求在其他国家寻找出路，因为在那儿仍有劳动力可供任意剥削，在那儿机械化过程还未到来。这样我们就向不发达国家输出资本，主要出口资本货物或消费品，用来购买劳动力或者用来购买换取劳动力的商品。但这也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输出，因为进口国家不会或至少不会立即用商品、劳务或货币来交换这些进口商品。为了保护投资不受所在国环境产生的敌意行为的影响——你也可以这样说：防止对剥削行为的反抗——同时也为了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竞争，资本输出就变为殖民行为，而不发达国家就处于政治上受支配的地位。这通常要借助于军事力量来完成，它由宗主国的资产阶级自己来提供，或由殖民地国家的政府提供，

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①当然，那个军事力量不只是用于保护投资，它还用于征服、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摩擦以及资产阶级竞争对手之间的自相残杀。

完成现在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还有另一个因素。既然殖民扩张是由资本主义国家利润率下降引起的，它就应该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后期阶段——马克思主义者所讲的帝国主义主要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因此，它要和资本主义对生产的高度集中控制同时发生，也要和中小型企业的竞争类型的减少同时发生。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把重点过多地放在对产量的垄断性限制以及随之产生的采取国内保护政策以防止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入侵等问题上。也许他过于看重他作为经济学家的身份，而不愿在内容上走得过远。但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人乐意涉及这个领域。这样我们不仅得到了另一个帝国主义的政策产生的原因和另一个导致资本主义混乱的根源，还得到了一个副产品，一个不是帝国主义必然产生的现象的理论——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理论。

应注意，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点，它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者解释以后的困难。当不发达国家发展起来以后，我们所说的这种资本的输出将会减少，于是就会出现宗主国和殖民地国家交换制成品和原材料的时期。但是到了最后，当殖民地的竞争迫使宗主国维护自身的利益时，制成品的输出也同样会减少。企图阻止这件事的发生所带来的进一步的摩擦，成为每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和其殖民地之间发生战争的根源。但无论怎样，殖民地大门最终将对宗主国资本关闭，它们将再也不能从国外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3页，人民出版社，1972。——编辑注

富饶的牧场中赚回在本国消失的利润。缺乏销路,生产能力过剩,陷入彻底的僵局,最后,不断发生的国民经济的破产或其他的灾难——也许是彻底绝望了的资产阶级发动世界范围的战争——就是无法避免的了。

历史就是这么简单。

这是马克思用综合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并取得这方面权威地位的较好的、也许是最好的例子。整个结论像是从根植于这个理论体系的基本前提中漂亮地得出的:这就是阶级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当代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像是完全由此引起的。对整个世界政治的迷惑一下子就被一个有力的分析澄清了。我们来看在此过程中阶级行为为什么总是有着相同的内部原因,这和政治或商业行为总是由周围环境决定是一样的。在有利可图时,财产和机会在资本家手里可能会产生一次贷款的谈判,同样是财产和机会也会产生战争。后者和前者一样可以进入经济学理论中。现在甚至连单纯的贸易保护主义也从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中产生出来了。

另外,这个理论显示了被马克思称为应用经济学的学科中的概念的许多相同的优点,即它和历史的以及现实的事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概每一个读者仔细阅读了我的摘要后,都会对呈现在他面前的每一个观点所占有的历史资料留下深刻的印象。难道他没有听说过欧洲人在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压迫其他国家的劳动者,没有听说过美洲南部和中部的印第安人在西班牙等国殖民者手中所受的苦难以及掳取奴隶、贩卖奴隶的交易吗?资本输出难道不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吗?它们难道不是总是用军事行为来征服当地人,并用这种方法来和欧洲其他国家进行斗争的吗?殖民化难道不是总有明显的军事的一面,尽管所做的事完全是商业行为,正如东印度公司或英国南非

公司那样？马克思自己能有什么比赛西尔·罗兹和波尔战争更好的例证？殖民野心是否至少是欧洲1700年以来引起的所有纠纷的重要因素呢？现在，谁没有听说过"原材料战略"和热带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欧洲的反击呢？还有其他的事实。至于贸易保护主义，那是再清楚不过的事了。

但我们最好谨慎一些。表面上真实、显而易见而没有经过仔细分析的证明往往是不可靠的。此外，正如每一位律师和政治家都知道的那样，用众所周知的事实将容易使陪审团或议会接受某人的申诉。马克思主义者充分利用这一点。在这个例子中，这一点特别成功，因为问题中的事实任何人都略知一二，但彻底了解的人很少。虽然事实上我们不能在这里进行详细的讨论，但即使稍稍想一下也会产生以下疑问："是这样的吗？"

在下一部分里，我们要讨论几个关于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关系的问题。我们现在来考虑以下问题：如果马克思关于资本输出、殖民化、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用不确切的、错误的术语来描述这些现象的时候，它是否还成其为一个理论？当然，我们总可以用马克思的定义来解释帝国主义是什么，我们也可以声称所有那些现象**必然**可以用马克思的方式来解释。但如果那样做，帝国主义这个问题只是用"同义反复"的方式得到了解决，就像是在说"就算这是正确的"一样。无论是采用马克思在那个问题上的方法，还是采用任何纯经济学的方法，都必须考虑由此得出的结果是否有同义反复的可能性。然而这和我们关系不大，因为在我们得出结论的时候，那个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

初看起来，这个理论似乎和一些情况还是相符的，最重要的例子是英国和荷兰征服热带地区的国家，但与另外一些例子，例如新英格兰的殖民化就很不相符了。而且即使对于前一个例

子，用马克思的帝国主义理论也不能得到满意的解释。只认识到利益的引诱是促使殖民地扩张的原因是明显不够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不主张重提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如果这些情况对他们重要的话，殖民扩张也必然按照已指出的方式发生，在由利润率决定的资本积累的压力下，这是资本主义趋于腐朽或走向成熟的标志。但是殖民冒险的"英雄"时期正是资本主义尚未成熟的早期，资本积累还在开始阶段，在这样的阶段，显然不存在对国内劳动力进行剥削的障碍。垄断并不是不存在的，而且比目前还要明显，但它只是使把垄断和征服作为日后资本主义的特点的说法更加不妥当。

此外，这个理论的另一部分——阶级斗争理论，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你必须戴上眼罩，才能特别注意从来只起次要作用的殖民扩张方面的问题，才能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解释有着阶级合作的明显的例证的那些现象。它可以是一场争取提高工资的运动，正像它是一场以增加利润为目的的运动一样，从长远看它更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是有利于资产阶级(部分原因是对国内劳动力的剥削)。①但我在这里不想强调它的结果。基本的一点是，这个运动的原因和阶级斗争没有多大的联系，它还不如包含在其中的团体和个人的领导权归属问题、殖民企业上升为资本家阶层的问题来得大。然而如果我们摘掉这个眼罩，不把殖民问题或者帝国主义问题仅仅看成阶级斗争的附属品，那么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了。亚当·斯密在这个问题上说得一样好，事实上还要更好一些。

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关于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这个副产

---

① 熊彼特在此处的论证是缺乏说服力的。读者在阅读时应充分意识到这一点。——编辑注

品仍然存在。古典著作中充满了咒骂“邪恶的利益”的语句，那时的利益主要是、但不全部是有关土地的利益——这主要针对损害大众利益的罪行。因此，对传统的关于保护所有权——不光是财产——的理论，加上保护现代大企业的利益的内容也是合适的。赞同马克思主义的现代经济学家更应知道，即使是现在，他们的资产阶级同事仍不能理解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和大集团控制的趋势之间的关系，虽然这些同事可能认为没有必要强调这么明显的一个事实。古典学派及其现代继承人在保护主义问题上都不正确：和马克思的解释一样，他们的解释过去和现在都是片面的，这些错误不仅仅是发生在对其结果和所涉及到的利益的评价上。但是至少在50年前，古典经济学家已经了解了马克思主义者所知道的所有关于保护主义中的垄断的内容，考虑到这一发现的一般特点，了解垄断这一内容并不困难。

古典学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要比马克思优越。不管他们的经济学说的价值如何——也许不太重要，他们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一个优点。有一种意见认为，实行保护关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企业的压力，它们要保持国内较高的价格，或是为了使商品在国外卖得更便宜。这个说法是个老话题，但却是正确的，虽然从来没有任何关税完全甚至主要是为了这个特别的目的。马克思的综合的方法使这一观点成为不够充分或错误的观点。如果我们的目标仅仅是为了弄懂现代贸易保护主义在政治、社会、经济方面的所有原因和涵义，则上述观点是不充分的。例如每当美国人民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时，他们总是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不是因为他们忠于大公司或受大公司的支配，而是出于建立和维持自己的领地，摆脱世界上其他国家盛衰对本国的影响的强烈愿望。综合方法如果忽视这样的情况就不是优点而是缺点。但如果我们的目的是为了

把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的所有原因和涵义只归结于现代工业的垄断因素，把它看作惟一因素，上述观点就是错误的。大企业可以利用众人的感情，并一直在这样做，但如果说是大企业创造了众人的感情，那就不对了。综合产生了，我们宁可说，这样的结果还不如没有综合。

不顾事实和常识，将资本输出理论、殖民地理论解释成国际政治的基本问题，把它们解释为垄断资本家集团之间的相互斗争以及每个资本家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结果，会使问题变得更糟。这种东西可以作为政党的有用文献，否则只能说明童话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专利。事实上，大企业能向对外政策施加的影响很小，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型企业或是银行家的幼稚举动会导致灾难。资产阶级对待他们国家的政策的态度主要是与之相适应，而不是成为形成政策的原因，在今天更是如此。同样，他们着眼于短期考虑，而非长远计划，也不以明确的阶级利益为出发点。在这一点上，马克思陷入了大众的迷信的俗套中了。[①]

在整个马克思的结构中还有其他相同性质的例子。比如，从《共产党宣言》中引用的关于政府性质的定义确实有真理的成分。在许多情况下，这个真理可以说明政府对所有日益明显的阶级对抗现象的态度。这个理论虽然正确，但价值不大。值得花时间去研究的是，为什么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理论和事实不相符，或者即使相符也不能正确地描绘那些“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的实际行为。而且，实际上在所有的情况下，理论都是可以用同义反复的方法来证明其正确性的。[②] 除

① 见本书第3页注①。
② 见本书第3页注①。

了消灭资产阶级的政策外,可以认为没有一个政策不可以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包括经济的或经济以外的、长期的或短期的,至少从它能够不使事情变得更坏这一点上说,是这样的。然而这并不能使这个理论更有价值。让我们再来看一下马克思的综合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第二个例子。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标志就在于证明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实现,而不管人们的意志如何。正如前面提到的,所有这些意味着,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导致了资本主义的毁灭,并且创造出社会主义的新秩序。马克思在多大程度上证实了这些趋势的存在?

关于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趋势的问题早有答案。马克思尚未建立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纯经济的原因的学说,希法亭的异议足以表明这一点。一方面,一些对传统的观点来说必不可少的对将来事实的判断、特别是"苦难和压迫必然会增长"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毁灭未必按照这种方式进行,即使它是正确的。但是马克思看到了另一些因素,即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所以我希望揭示它的最终结果。考虑到后者,也许有必要把马克思的表述换一个说法,"灭亡"这个词也许是用词不当,特别是按我们的理解,"灭亡"的意思是指资本主义丧失了生产的动力所引起的后果,但这不影响这个学说的本质,虽然这可能影响它的一些涵义。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终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很明确的问题。资本主义和任何其他的秩序终将被摧毁——产生新的经济和社会的秩序,而社会主义的长生鸟仍不能从它的灰烬中产生。[①] 也许会出现混乱,除非我们

---

① 见本书第 52 页注①。

把所有代替资本主义的不混乱情况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这里有别的可能性存在。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所预想的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至少在布尔什维克出现之前，当然只是许多可能出现的情况之一。

马克思本人没有详细地描绘社会主义的细节，这是非常明智的。他重点说明它的产生，一方面，已经存在的巨大的工业控制体系极大地便利了社会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存在着压迫、奴役和剥削，同时也产生了为数众多的、有纪律的、团结的、有组织的无产者。两个阶级之间经过长期斗争，已到了抉战阶段，每个阶级都严阵以待，准备作最后的斗争。马克思还说明了这以后的情形，阐明了这样的观点：无产阶级将接管政权，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如果我们要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是信念家族中的一员，这也就足够了。既然我们关心的不是那个方面的问题，而是一个科学的预见，这就明显不够了。施穆勒的理论更有把握一些。虽然他拒绝描述社会主义的细节，但他明确地把它设想为一个逐步的官僚主义化、国有化等等的过程，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至少他给出了一个明确的表述。因此马克思并没有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确定下来，即使我们承认整个毁灭理论；如果我们不这样认为，这个预见可能就会失败。

然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管我们是否接受马克思的理论或是其他什么理论，社会主义的秩序都不会自动实现；即使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马克思所说的所有条件，要达到这一目标，还必须采取明确的行动。这当然是和马克思的说法相符的。他的革命理论仅仅是对那个行动的设想。对那些在其性格形成时期经历过 1848 年的动荡的人来说，强调暴力是可以理解的；对那些可能鄙视革命思想的人来说，也从来不可能摆脱它的影响。

况且，马克思的大部分听众都不愿一直听那种没有嘹亮号角的信息。最后，马克思虽然看到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但至少在英国还看不到这种迹象。在他那个时代不易看到这种可能性，而他所谓的两个阶级严阵以待的局势也使他看不到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他的朋友恩格斯实际上不畏艰难地研究过这方面的策略问题。虽然可以将革命归入不重要的事物中，但是采取明确的行动仍然是不可缺少的。

这是否也能解决将马克思的追随者划分为革命派和改良派的问题？如果我掌握了马克思的意思，这个问题将不难回答。改良对他而言是社会主义的起源。他从社会的固有的内在逻辑出发，相信革命可以完全取代改良的所有作用。革命终将会到来，但只有当所有前提都具备时才会到来。因此，马克思的革命在本质上、作用上和资产阶级的激进派以及社会主义的阴谋家的革命是有天壤之别的。它是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才进行的革命。有些不喜欢这个结论的信徒，特别在将它运用于俄国的情况时，确实能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找出许多和这一结论相矛盾的地方。但在这些章节中，马克思自己否认了他的最深刻、最成熟的思想，而它讲出了无懈可击的《资本论》的分析结构，正像任何思想都要由事物的内在逻辑产生一样，他的这些思想在不确定的、令人迷惑的观点下表达了一个清晰的、可靠的涵义。没有一个严肃的观点总是无条件地支持一个“主义”。简而言之，对马克思的阐述有些保守，只能说他是被认真地对待了。

马利·埃斯普里·里昂·瓦尔拉
(1834—1910)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位学者的一生时,最使我们感动的是他的伟大的淳朴——表现在他无条件地投身于工作。他的学说的固有逻辑、必然性和力量自然地加深了我们的印象。他在纯粹经济学方面的独特沉思形成了他学说的内容。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干扰他整个学说的统一性,在其学说中,也没有其他成分是重要的,只有这种独特的沉思影响着我们。他一生的著作,似乎是由于其沉甸甸的分量,缓慢而稳定地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很快了解了他的生平事迹。我们从瓦尔拉的自传中获得了围绕他那具有历史性的科学学说的朴素框架的材料。瓦尔拉于 1834 年 12 月 16 日出生于法国埃夫勒。他的学习过程表明,这位思想家对现实生活很不适应。例如,我们本指望他通过对丹斯卡茨和牛顿的研究能作好各种技术的准备,但是他却失败了。又如,他对按照陈旧的方法去探索问题总是缺乏热情。于是他开始尝试新闻写作,为不同的企业写稿,而这些企业又都缺乏成功的特质。然而,这件事对我们却很重要,因为早在 1859 年,在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瓦尔拉就试图批驳蒲鲁东的基本思想。他深信经济理论可以用数学方式来论述。从那时起,他明白了他所要做的事。从那时起,他全力以赴实现这一目标。在这里,他工作

的缘由在于研究方法而不在于分析具体问题。尽管他还不能立即知道自己这样走下去能走多远,但是他感到有一股力量在推动他沿着这个方向前进。这样,他就很难得到必要的调整和休息。他在自传中以辛辣的嘲讽描绘了法国科学界的气氛。然而,总的来讲,他还没有成功地站稳脚跟。

在这个关键时刻,他得到了一个为科学服务的机会。1860年,瓦尔拉参加了在洛桑举行的税收会议。对税收的讨论为他发表第二篇文章提供了启示。这两篇文章的连贯性导致他在十年后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经济学学会主席。这个任命对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瓦尔拉本人来说,也是如此。瓦尔拉在自传中不无庄严地记述了这一过程,任何敬重瓦尔拉的人都会被这部分内容深深打动:他是如何前往省长官署并获得了出国许可,然后又是怎样"从卡昂经过昂热、普瓦提埃、穆兰和里昂,于1870年12月7日到达洛桑"。抵达洛桑后,他立即开始工作,将毕生心血都倾注于工作之中。

1892年,瓦尔拉离任。但作为名誉教授,他仍与大学保持联系。他在克拉伦斯附近的小公寓里继续写作。1910年1月4日,瓦尔拉在公寓中辞世。

我不得不记下另一个客观事件。由于他的著作遭到冷遇,他的最后30年生活蒙上了阴影。这是一个陈旧的故事。在这个世界上,真理的命运如同绝色佳人的命运一样,总是悲惨的。尤其是当新生事物注重于观察事物的方法而不注重于吸引人们的兴趣和理解的发明创造时,更会遭受冷遇,但是,最后人们终于对后者感到厌倦而转移了视线。瓦尔拉遭遇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人们由此懂得一个人获得外界的认可、走向成功是既艰难又缓慢的过程。如果我们对这些情况都加以考虑的话,那么,则无需对已经得到的东西表示不满。也许人们应该为取得如此

多而不是如此少的成就而感到惊讶。瓦尔拉创立了一个学派，这个学派主要通过马歇尔而扩大了影响。长期以来，伦理和政治科学院一直否定他的著作，并对他进行了评判。然而，毫不夸张地说，这部著作仍然具有深远的影响，且这种影响与日俱增。虽然瓦尔拉长期没有辩护人，但他在有生之年仍然盼到了胜利的时刻。这时，他已不需要为自己的思想辩护，同时他的思想已超越了科学领域，他为此喜悦，但他永远忘不掉自己的失败和奋斗。他以嘲讽的语句来结束他的自传，他在思想上似乎一直很痛苦，因而他的一生充满着悲剧性的彷徨。

1909年春，瓦尔拉看到了雨后升起的彩虹，这使他十分感动。他没有料到会得到如此多的同情和赞美，他受到了他从来不敢奢望的赏识，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经济均衡理论是瓦尔拉的不朽主张。这个伟大理论以其水晶般透彻的思想阐明了纯经济与一个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结构。洛桑大学授予他荣誉的纪念碑上铭刻的字句正是“经济均衡”。确实，他的这个基本思想使他取得了很多实际成果。他比任何人更信服地鼓吹过土地国有化。此外，在货币政策领域中，他所作出的贡献也是其他人难以超越的。但是这些成就同他提供给我们的全部知识相比，则是微不足道的。他把一生的研究成果综合为三卷著作，它们是这个领域中内容最丰富的书籍，而包含在第一卷第二至第四部分的思想则具有永久的活力。

瓦尔拉从库尔诺①的经济理论出发，很快就有了发现，所以

---

① 库尔诺（Antoine Augustin Cournot 1801—1877） 法国经济学家、数学家、数理经济学的创始人。最先把微积分应用于经济学，并将均衡理论与数理方法相结合；首先导入边际概念与连续概念，发现需求弹性及价格与需求的函数关系；最早展开垄断理论，并用边际原理说明垄断价格。主要著作有《关于财富理论之数学原理的研究》。——编辑注

他告诉我们：库尔诺的需求曲线反映的是需求量与价格间的函数关系，只能严格地用于两种商品之间的交易，而对于两种以上商品的交易则只能提供一个近似值。他首先把自己的研究限定在前一种情况下，并且以一种精确的方法由一种商品的需求曲线求得了另一种商品的供应曲线，然后，在两条曲线的交点处，得出了这两种商品的均衡价格。从这些根据调查绘制的市场商品总量的曲线中，他得出了每一个个别的经济单位的需求量和边际效用曲线，并由此奠定了他的理论结构的基石——边际效用概念。这一阶段的理论于 1873 年发表了，在以后几年中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瓦尔拉的这一理论成果与门格尔和杰文斯[①]的理论成果的一致性引起了世人的瞩目，而他们的出发点和论证方法的相异性同样引起了世人的瞩目。这是一种包含在简明定理中的根本的重要成就。

在不能分割的推理过程中，随着第一个问题的提出，又进一步引出了其他问题。首先就是两种以上商品的交换问题，用科学的公式来反映这个问题所遇到的困难远非一般人所能想象。其次，瓦尔拉通过把数量已知的生活资料放在市场中考察而引出了生产问题。为此，他曾孤立地把这个市场看作一个设想中的模拟性的生产要素市场。一方面，这些生产要素通过企业家不赚不赔的经营而互相联系着；另一方面，在完全竞争和均衡的情况下，生产资料销售总收入等于生活资料销售总收入。进行

① 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 1835—1882) 英国逻辑学家、经济学家。属于布尔学派的符号逻辑论者，对数理逻辑的发展有一定贡献，与门格尔、瓦尔拉大致同时提出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快乐和痛苦的微积分学"，运用数学方法解释政治经济学上的主要概念。提出关于经济危机的太阳黑点说。主要著作有《逻辑基础教程》、《政治经济学理论》、《科学原理》。——编辑注

核算时，一方面，每一个参加商品交易的人要把边际效用扩大到最大限度；另一方面，所谓的生产协作因素则以各种特定的方式在变动着。在这种情况下，“成本”与“边际效用”相互作用的理论以及两者在整个经济过程中共同发挥作用的基本原则，使问题得到了非常简明的解决。

瓦尔拉介绍了资本化问题。他假定：一些生产性劳务的销售者节省了劳动并将其投资于“新资本货物”，因为这些商品在市场上有着一定的需求量。这些“新资本货物”的价格按照它们的劳务情况而定。于是这种价格又为“旧产品”的资本价值提供了基础。这样就解决了资本化问题，即解决了求得所有商品资本价值的问题。这种观点也有其缺点。但我们重视它的惟一原因，是因为今天我们可以把这种观点与庞巴维克的成就相比较。如果它在某些方面有错误，就像许多其他的早期利息理论也存在错误一样，那么它的错误要比其他理论的错误少得多。瓦尔拉的利息理论也许是能与李嘉图的利息理论相提并论的最好的理论，但它们的相互关系则像是大厦与基础的关系。

在瓦尔拉的理论体系中，其货币理论自产生至今，褒贬不一，历经反复，现在被认为是这个领域中最成熟的理论。瓦尔拉在 1876—1899 年间致力于货币理论研究。他在《纯粹经济学要义》第一版中从“必要的流通”展开论述，以后他在“对支付手段的个别需求”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货币理论。这种区别是十分重要的。人们不可能把“经济对交换媒介的需求”这种说法等同于“人类对面包的需求”，然而“对支付手段的个别需求”的说法却完全与“人类对面包的需求”的说法相类似。正是这一点可能会被纳入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中。于是这个原则被高明地运用了，而且一个卓越的货币价格形成理论就从“流通方程式”中发展而成了。但是由于我不能在这里详细引申，因此只能说，瓦尔

拉对复本位制问题的论述完全是经典的，而且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具有权威性。

瓦尔拉的整个纯粹经济学理论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每一个经济单位要最大限度地扩大其边际效用；第二，每种商品的需求和供应是相等的。他的全部理论基于这两个假定。埃奇沃思、巴罗内及其他学者可能已经补充了他的著作；帕累托[1]及其他学者也可能在个别几个论点上超出了这个范围。然而，瓦尔拉著作的意义都未被涉及。凡是知道真正的自然科学的起源和作品的人，也会知道这些著作在方法上和本质上的伟大成就，瓦尔拉的著作就是这样的著作。自然科学家要做的工作就是发现各种相互依存现象的正确的形式，由此及彼。瓦尔拉做的正是这项工作，而且他是在新的领域中从事这项工作的。这项工作可说是前无古人，一切都得从零做起，而瓦尔拉却很快取得了很好的结果。他是在重重困难之中，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开展研究的，他没有得到任何鼓励，他的力量来自于内心深处。是他的坚定信念帮助他走向成功，创造出了他的纯粹经济学理论。他知道，他不能期望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和数学家认可他的成就，便在没有获得实践家和科学家惯于接受的道义上的支持的情况下孤军奋战。因此，他的形象显示了他的全部品质，这种品质把真正的创造性思维与既有的思想明确地区分开了。对瓦尔拉，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他的著作迟早会得到重视的。

---

① 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　意大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洛桑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运用立体几何方法研究经济变量间的相互关系，发展了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的代数体系。在社会学上，他属于“机械学派”，认为阶级在任何社会制度中都是永恒存在的，因而反对平等、自由和自治。主要著作有《政治经济学讲义》、《政治经济学提要》、《普通社会学》。——编辑注

卡尔·门格尔
（1840—1921）

这是一次举足轻重的辩论，这次辩论的结果不仅关系到辩论本身的权威性，同时也是对一个人的毕生事业的总结。其目的是通过一个人从事的毕生事业来体现他的工作意义所在。门格尔是能够通过工作中所获得的决定性成就来创造科学史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名字将与引起整个经济理论界革命的权威性理论联系在一起。无论人们如何描绘他与众不同或令人尊敬的特性，无论人们引证什么样的科学成就，无论人们如何评价他的诲人不倦和著名学术成就，其最终目的都是向人们展示他在学术领域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当然，门格尔的传记将把所有这些材料集中在一起，绘出一幅个性强烈而富有吸引力的图画。这幅图画的意义来自于他的一项伟大成就，不需再借助其他细节来为它增光添彩。

在度过了20年辛勤的退休生活之后，门格尔离开了我们。在这段时间里，他不断探索自己感兴趣的事业，并以此为乐。这样，我们就有了足够的时间来探讨他毕生从事的作为我们科学史的组成部分的事业。这的确是非常重要的，门格尔献身科学的品格从中能够淋漓尽致地得以体现。出于对实践的困惑，也出于对实际政策的需要，自16世纪起，一个小规模的研究经济

问题的基金会发展起来了。至此，货币及经济政策问题超越了领地的界限，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讨论。在个体经济及自由贸易的影响下，各种小册子及书籍相继问世。作者们不是为了探讨基本的问题，而是更愿解决当时的实际经济问题。在18世纪，出现了一种统一科学，它具有自己的学校、成果、争论、教科书梗概及学术专家。这是经济学的最初时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亚当·斯密[①]为代表人物的时代。紧随其后的便是分析及专业化的时代，英国古典经济学主宰着本文涉及的领域，门格尔的成就也正体现在这一领域中。李嘉图将自己的名字印在了这个时代，在这一过程中，一种紧凑的学说体系得以发展，它广泛强调科学的准确性，纯粹经济理论已经产生。

人们永远也不会清楚，为什么巨大的成功后面紧接着会是如此彻底的失败。一些新规则的决策者们不停地从事着他们的工作，但他们还无法超越基础阶段。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经济学界的停滞不前及在此领域之外的不信任、敌意与冷淡。这一错误部分归因于所从事的研究本身的缺陷，也就是一些方法在应用上的原始性、对理论的肤浅理解和研究结果的明显不足。然而，这些都不是致命的，因为它们是能够改进的。但没有人开始进行这种改进，没有人对这个新的理论“大厦”的内在结构产生真正的兴趣。因为，除了以上原因导致失败之外，还有另一原因，即公众舆论及专家们不同的反对理由。为了寻求科学上的有效性，这一新理论过于仓促地试图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引起政治及社会团体的争论。因此，经济自由主义的失败意味着新理

---

①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 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创建人。1776年出版《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其中心思想是经济自由主义，在经济理论的众多方面都有自己的创见，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编辑注

论的失败。结果,在一些国家,尤其是德国,产生了忠于哲学和历史传统的趋势和与社会理论的对抗。以经济和社会政策为幌子的传统理论使得新理论又面临了另一次对抗,通向这一理论的内在结构的道路被封死了,年轻人几乎意识不到它究竟有什么科学依据及可行性。因此,看起来新理论只不过是模糊历史的一段插曲,或只是为特定时期的经济政策所作的尝试。

当然,新理论是不可能受到专家们的一致拥护的。孤立地看,它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总的来说这一领域还没有被开拓。在德国,屠能[①]和赫尔曼的名字也无法改变这一局面。只有建立在传统的方法论基础上的社会理论才是不会丧失活力的。

由于科学成就是不受外力牵制的,卡尔·门格尔以毕生的精力鲜明地反对陈旧的理论观点。不受任何外界刺激,当然也没有外界的帮助,他向摇摇欲坠的经济理论大厦发起了进攻。激励他从事这一工作的既不是对经济政策的兴趣或思想史,也不是想为原有理论添枝加叶,而主要是天生的理论学家探求新知识、新方法的欲望。门格尔属于不断追求新思想的开拓型的经济学家,他总是在试图废除现存的科学体系而去尝试创立全新的理论。旧理论既不是被忽略这一理论的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所征服,也不是被反对其实践结论的经济及社会政策的设计者所征服,而是被一位认识到此理论的内在缺陷的人所征服,后者对它加以完善,使它有立足之地。

在更大的范围内系统地阐述一种新理论的基本原理是很困

---

① 屠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 1783—1850) 德国经济学家,边际生产率说的前驱。系统地分析农业分布,论证级差地租。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增加投资,不仅能增加资本收入,也可提高工资。主要著作有《孤立国》。——编辑注

难的。因为对一种基本原理的透彻阐述往往是很难做到的，一般的阐述总是会显得平淡乏味。分析者的个人成就并不包含表述基本原理的内容，而在于他知道如何使这一观点更加充实，如何从中推断出科学所要涉及的问题。譬如，你向某人解释机器结构的基本原理，告诉他如果此结构不向任何方向移动，则该结构处于平衡状态。作为外行，是很难理解这一理论的用途及这一解释本身的成就的。因此，当我们说门格尔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商品的价值取决于人们对其效用的评价时，我们必须明白这将不会引起外行的注意——甚至大部分经济学家在理论问题上都可算是外行。门格尔理论的评论家们坚持主张"没有人会意识不到主观评价的事实"，没有什么能比将这种陈腐观念作为反对古典经济学著作的理由更不公平的事了。但答案非常简单，可以证明，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家都试图以此来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后来都因无法取得进展而放弃努力，因为他们相信，在资本主义经济机制下，主观评价也失去了其类似发动机的功能。正像主观评价本身一样，将需求所依据的事实与成本所依据的客观事实作比较是毫无用处的。甚至在现在，门格尔学派的反对者还会时时声称这种价值理论最好用来解释固定量消费品的价格而非其他事物。

因此，重要的不是去发现人们以效用为出发点会去购买、出售或生产什么，而应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找出这一简单的事例及其在人类的需求规律中的来源，就足以解释现代商品经济的所有复杂现象的基本事实。在鲁滨逊时代或云没有交换的情况下，人类的需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导致这一结论的命题是以"对价值结构的认识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有经济特征"——区别于其他社会、历史、技术特征——为前提的。这个命题的另一个前提是：所有特定的经济事件都可在价值结构原

则的范围内被理解。从纯经济的立场看，经济制度只是一个从属价值的制度。所有特殊的问题，无论如何称呼，都只是特例和不断重复的过程而不是其他问题。所有特定的经济规律都是由价值结构的规律演绎而来的。在门格尔著作的前言中，我们已发现了他对这种观点的认可。他的主要目的是发现价值结构的规律。当门格尔从“需求”及“供给”两方面成功地找到了价值问题的解决方法、成功地分析了人类的需求及维塞尔①所称的“边际效用”理论之后，整个经济生活的复杂机制立刻变得简单了，简单得出乎意料。剩下的就只是对不断增加的复杂细节的详尽阐述了。

门格尔的主要作品，其中包括基本问题的解决方法、对未来发展的预见，与几乎同时代的杰文斯和瓦尔拉的有独到见解的作品都应被视为现代经济理论的基础。在著作中，门格尔沉着、坚定、清晰地阐述了他的论点，精心地组织每一个词句，向人们展示了价值理论的伟大改革。门格尔的崇拜者常常将他的成就与哥白尼作比较，而他的反对者则常常对此比较加以嘲笑。现在，人们对这种争议已可能作出结论。与哥白尼的新理论基础相比，门格尔在科学方面的改革无论是在精确性方面还是在严谨性方面都不及后者。因此，哥白尼的科学成就显得尤为伟大，也更有深度。在这个特定领域中，外行无法对其研究成果作出评价，使得这种研究常带有神秘色彩，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但就文章自身的质量而言，门格尔的作品完全能与哥白尼的作品相媲美。正如一位领导小部队作战并赢得了不太为人关注的战

---

① 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 1851—1926） 奥地利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首先提出“边际效用”一词，与庞巴维克共同发展边际效用价值论。主要著作有《经济价值的起源和主要规律》、《自然价值论》、《社会经济的理论》。——编辑注

斗的胜利的部队指挥官，也许在个人成就上能与拿破仑和亚历山大大帝平起平坐一样。也许这样比较会引起外行的惊讶。这种对比常常会造成种种假象，从而导致无用的争论，但既然它们是确立一个人的地位的一种手段，对在一些特定领域不能被称为专家的人们来说，尤其如此，我们不得不冒险将门格尔与其他经济学家作一比较。假如我们拿门格尔与亚当·斯密比较，我们立刻会感觉到门格尔的个人成就与这位苏格兰教授相比要有限得多。亚当·斯密对他所处的时代的现实需求作出了解释，他的名字与那个时代的经济政策是紧密相联的。门格尔的成就是纯科学方面的，作为科学成就，它们又是纯分析的。他的作品远不及亚当·斯密的作品那样博大精深。与门格尔相比，斯密的有些作品谈不上有什么独创性，更精确地说，在基本的科学问题上，他是非常肤浅的。门格尔深入钻研，凭自己的努力发现了对斯密来说无法理解的真理。

李嘉图可说是一位能与门格尔匹敌的人，他们两位都是理论天才，尽管他们的理论观点完全不同。李嘉图的丰富思想及敏锐目光来自于实践的结论及深刻的洞察力，他尽量使他的结论与洞察力源于基本理论。门格尔的伟大在于其理论的精确性。从纯科学的角度看，门格尔的地位应更高一些。对门格尔来说，李嘉图是一位先驱。这是门格尔无法替代的。但同时，门格尔又是李嘉图理论的征服者。

既然门格尔及他的学派被人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惟一竞争者，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将他的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作一比较。在此，我们不去考虑马克思作为社会学家及预言家的事实，而只限于了解一下马克思作品的理论框架。我们只能将门格尔的作品同马克思著作的相关部分对比。门格尔的作品在独创性及成就上都大大超过了马克思。在纯理论方面，马克思是

李嘉图甚至李嘉图的一些追随者的学生，19 世纪 20 年代在英国创立社会主义及准社会主义价值理论的理论家们都可称得上是马克思的老师。门格尔却谈不上是什么人的学生，他的理论有自己的特点。门格尔在价值理论方面的伟大贡献是无人能够超越的。

我们前面谈过，门格尔不是任何人的学生，事实上，在他之前，有一位先驱已深刻认识到了门格尔的基本思想，这个人就是高森。门格尔的成功使人们对这位默默无闻的思想家的作品产生了兴趣。除此之外，从 19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起，经院哲学学派以及稍后出现的一些德国理论家的理论，甚至价值理论都是以此为基础的。从另一方面说，任何科学成就都是老树上的"花朵"，然而人们往往不知如何去维护它们，因此"花朵"就会悄悄凋谢。在科学及人类生活的范围内，人们会有很多创见。门格尔的理论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是属于他和杰文斯、瓦尔拉的。

凭借自己的独特理论，门格尔的才能获得了人们的认可。在他生命中的第三个十年里，他的努力结出了累累硕果。那个少有的思想丰富的阶段，对每一位思想家来说，都是出成果的最佳时期。门格尔出生于 1840 年 2 月 23 日，他的著作发表于 31 岁那年，以"维也纳"为笔名。在此，门格尔向人们展示了他做教师的天赋，从而也使人们认识到他个人的巨大成就。他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在荒漠中种下一棵树，而那里长期以来，在戒律的束缚下，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为了能找到一部像样的作品，人们不得不退回到 1848 年，桑尼佛次的作品是第一本正式的教科书。有点像样的作品都是从德国引进的。刚上大学时，与门格尔有接触的人几乎没人能够理解他的观点或他那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他们对他的研究工作反应冷淡，然而最终他向人们证实了自己的成就，并成为一名教授。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获得了

作为科学家的荣耀，但他永远忘不了他最初的努力。他的理论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主要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制度使得经济研究领域处于极度孤立的状态，从而使门格尔的思想没有任何传播机会。门格尔发现自己面临的是完全缺乏理解的困境，人们对他的敌意日益加深。

任何一个理解科学进步的内涵的人都会意识到：要让人们接受一种新思想，必须首先使这种思想在该研究领域内居于主导地位。门格尔却不知道如何对待这种事情，即使知道，他也缺少实施此策略的技巧。然而最终他的理论还是为对他抱有敌意的对手们所接受，这当然应首先归功于门格尔本人。在人的灵魂深处都有美好、亲切的一面，但并不总是能被人们认识到，它能使人们从传统的观念中摆脱出来，认识事物的内涵。作为一个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有着非凡的魅力，并吸引和征服了未来的思想家。门格尔对工作的专注导致了人们对他的研究成果的称颂。尽管他没有再对自己的价值理论作任何阐述，却以自己的理论原则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使它深入人心。在这之后，他正确地认识到，在德国遭到反对的不仅仅是他的理论，还有所有其他的理论。他与反对者展开了较量，为的是为社会问题的理论分析争取应有的地位。门格尔通过十分细致的工作及系统的阐述，澄清了方法论领域的疑问。这一贡献同样具有永恒的价值，即使知识理论的进步使我们在许多方面超越了门格尔，也不会使门格尔的理论失色。将门格尔以后的工作与门格尔的重要贡献相提并论是不公正的。门格尔的思想在教育方面对他那个时代所产生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门格尔的理论在德国以外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在德国以外，他的理论大部分已被人们广泛接受。门格尔的理论是德国科学发展的里程碑。

门格尔随后受到了命运之神的青睐。这种难得的幸运曾一

度降临到门格尔学派的许多人身上。他与两位有能力继承他的事业的同事——庞巴维克[1]及维塞尔联手。这两位同事努力地工作,为的是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但在创立奥地利学派时,他们又不得不求助于门格尔,最终这一学派的基本思想终于征服了本领域。成功最终来临了。但每一次成功都是来之不易的,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冷嘲与热讽。这种情形在科学史上是司空见惯的。即使人们最终会接受某种思想,这种思想开始总会遭到反对,也会引起种种争议。意大利就曾经发生过这类事件,英国的理论家们同样也不能逃脱这种命运。而在美国以及最终在法国,人们对新理论的态度要真诚宽厚得多,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及荷兰的情形也大致如此。直到此时,这种新理论才在德国得到了认可。在这之后,门格尔亲眼目睹了他的学说在科学界引起的争论,迎来了他的理论的全盛时期,看到他的基本思想逐步地度过了争论阶段,成为没有争议的科学常识。他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切,尽管有时他也会因为一些小刺激及他的同事对他的干涉而恼怒,他仍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创造了科学的历史及自己在科学史上享有的威望。

众所周知,古往今来没有一项科学成就能够长盛不衰,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学科都会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完善。门格尔的追随者们,以及在其他领域追随瓦尔拉的研究者们已经发展了门格尔的理论,毫无疑问,这种发展还将继续下去。但门格尔的成就是永恒的。他的著作将有别于那些昙花一现的出版物,它将流传千古。

---

[1] 庞巴维克(Eugen Böhm-Bawerk, 1851—1914) 奥地利学派的全面发展者。与维塞尔共同发展了边际效用价值论。批判利息的忍欲说、生产力说、劳动力论和榨取说等,提出利息的时差说。提出迂回生产理论。主要著作有《经济财物价值理论纲要》、《资本与利息》。——编辑注

门格尔的有些观点也许并不引人注目，但有一点却是值得一提的，那就是他的货币理论以及他在资本理论和货币流通问题上作出的贡献。他从事的是导师的工作，他的思想深入人心，其影响面远远超出了专家及对他的理论感兴趣的人们的狭窄范围。而与他的价值理论相比，这些都不值一提，只有价值理论才真正体现了他的个性。

我们纪念的不仅仅是一位思想家，而且是一个值得人们爱戴的人，了解他的人们将永远怀念他。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
（1842—1924）

一

大约在 15 年前，我在伦敦经济学院作过一次系列讲座，其间借机表达了我对马歇尔的伟大灵魂的尊重。听众中有人以提问的方式写了一封信，大意是：马歇尔的思想像穆勒[1]或亚当·斯密的思想一样，总要过时的。我将以对这个问题作回答的方式阐明我的观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歇尔的经济学已经过时了。他对经济运行的观察力、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早已不再为我们所用。我们可能喜爱并崇拜他的理论结构的强大，它尽管受到一些批判主义理论及新思想的强烈抨击，字里行间的神奇力量仍然渗透在我们自身的工作经历之中。

我们可能喜爱、仰慕佩鲁吉诺画笔下的一位妇人，因为我们认识到她完美地体现了她那个时代的思想和情感，然而我们也

① 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19 世纪中叶英国经济学家，代表作是 1848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在价值论方面，他糅合了相对概念论、供求论、劳动论、“节欲论”和生产费用论；在分配论方面，则综合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西尼尔的节欲论等。——编辑注

同样意识到我们与她的距离已是多么遥远。

这当然只是这50年工作的必然结果,若不是我们可以用“古典”这个模糊的词语来界定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这些年的工作就只能是一无所获。这是各个领域所有古典学派的共同命运。“只要有可能,小人物会写出大作品。”在当代经济学理论同《经济学原理》理论的关系与当代物理学同19世纪90年代物理学的关系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在1894年时,H.A.洛伦兹[1]说,他感到理论物理学已达到完美境界,因此人们不再对此感兴趣。现在他这种确信无疑的感觉已经不存在了,那些非常简洁而清晰的轮廓线也不复存在了。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片混乱的战场,要在这样的废墟上重建掩体和工事简直是天方夜谭。极其相似的事情发生在经济学领域中。我不是指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衰以及与其相关的道德和政治态度的转变。我无意说马歇尔对实际问题、社会问题及其他类似问题的看法非常过时。也许马歇尔的观点是过时了,但过时与否同本文没有多大关系。重要的是,他的分析方法过于陈旧,即使没有任何事情改变我们的政治态度,他的分析方法仍会显得过时。即使历史停滞不前,分析对象以外的一切事物均不再向前发展,也改变不了上面的结论。

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马歇尔的启迪永远不会过时,它的影响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不仅因为这种广泛而强大的启迪力量已为后世所继承,而且因为在它身上有一种独特的品质,能有效地抵御腐蚀。马歇尔生活在充斥着“发展变化”口号的气

① H.A.洛伦兹(Hendrik Antoon Lorentz,1853—1928) 一译罗伦兹。荷兰物理学家。创立经典电子论,对经典电磁理论有重要贡献。因研究磁性对辐射现象的影响,1902年与塞曼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编辑注

氛中，他首先认识到经济学是一门发展的科学(然而，那些反对他的批评家们不但忽视了他思想中的这一因素，而且有时实际上指责他的经济学忽视了发展这一方面)，尤其是认识到他要研究的人类本性是可以培养和改变的，并具有改变环境的功能。但这对我们来说，仍然无关紧要。关键是，他把他的发展思想贯彻到了理论研究中，毫无终止的意思。他不像穆勒，永远不会说某个问题从此解决了，再不需要他或任何其他作者来对其加以进一步的解释。正相反，他充分认识到自己正在建造一个临时的结构。他的目标总是指向力所不能及的本不该由他涉足的领域。新的问题、新的观念以及新的方法对别人的研究而言都是敌人，他在研究中却将其引为盟友。在他所建造的庞大而坚固的阵营里，有容纳所有这些"盟友"的空间——事实上是预先为它们准备好的栖身之所。过去和现在虽然还有许多人在反对他的做法，但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些比较狭隘的人。有时这些反对者会发现(或是别人替他们发现)，马歇尔提前实现了他们的目标，而使他们的反对变得毫无意义。

二

《经济学原理》是长达二十多年的研究成果。当它于 1890 年出版时，立刻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原因很简单。这本书是个非常伟大的成就。这个成就以最富吸引力的外表展示在人们面前，完全适应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心理，适应当时的经济学领域的状况——事实上这既归功于作者的判断力，又归功于作者的天赋。

然而，很难给这一成就的性质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如果直接从《经济学原理》提出的分析手段的核心入手，则很难给予它

完全公正的评价。因为在这个核心的前前后后以及周围各个角落，存在着一种以感染力和凝聚力为历史基础的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学的气氛。虽然马歇尔可能算不上什么历史专家，但他确实是个一流的经济史学家。而他对史实的掌握以及他头脑中所具备的分析习惯，并不停留在一些支离破碎的成分上，而是形成一个非常严密的整体，即将活生生的事实归纳成原理，再将原理运用到纯粹的历史研究中。当然，这一特点在《产业与贸易》中比在《经济学原理》中要明显得多。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即使是在历史介绍部分，史实也被大量删减，以致几乎失去了追随者和评论家。然而不管怎样，它没有消失，马歇尔对同时代的商业活动孜孜不倦、颇能引起共鸣的研究成果也依然存在。几乎没有哪个学院派的经济学家像他那样了解这种商业生活。正因为有这种性质，后来的成就暗示着相当多的局限性。马歇尔时代的中等规模的英国企业的实践无疑要比众多的概念解释更能吸引分析家们的注意力。但就在那些限制范围内，产生了一种唯实论，远远胜过斯密的唯实论这一惟一可比之例。这大概也是他没有遭到英国学院派反对的原因之一。

诚然，这类反对行为在这个国家出现过。这也不难理解。一个不顾历史背景的简化了的马歇尔主义渗透在整个大学教育阶段中，直到很多比较活跃的智者完全对其感到厌烦为止。这是很自然的事。在与传统的马歇尔决裂之前，他们本应想到他们是在与现实的马歇尔决裂。而在切断通往经济现实的道路时，他们一定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曾经有个“马歇尔路标”指引着他们实现他们的计划。

《经济学原理》的分析核心当然在于一个经济静学理论。在判断事物的是非曲直方面，它的独创性不够突出。因为它只是一个在那个时代已经成熟或正在成长的家族的成员之一。另

外，那个家族的其他成员无疑是独立于马歇尔的，而马歇尔的研究习惯以及发表成果的方式不可能让一个经济思想史学家对他的理论有同样的把握。希望读者不要对此产生误解。在我看来，在为老师写的传记中，凯恩斯①为马歇尔的主观创造力提供的证据和证言很有说服力。马歇尔对此事保持着威严的沉默，而他的感情只表现为：对古典学派尤其是李嘉图和穆勒采取谨慎而公平的态度，对门格尔、杰文斯以及最伟大的理论家瓦尔拉等采取中立的态度。接下来的描述不会与真实情况有多少出入。

我们从凯恩斯的作品中得知，把马歇尔引入经济学家阵营的并不是知识分子的好奇心，是一种强大的动力把他从对伦理道德的思索中推向了这个阵营，他的伟大使命就是减轻他所看到的英国贫困阶层的苦难。他的想法遭到了一个充满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智慧的朋友的批驳，而正因为这一点才使他转向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寻求启发。马歇尔的著作中另有其他迹象表明：他是从阅读《政治经济学原理》开始学习经济学的。1867年，他又吸收了李嘉图的观点。即使我们不知道这一点，也可以很容易地推断出来，因为当时的情形是一个完全受数学教育的大脑求助于两个充满热情和活力的创造者：首先，它震惊于两个创造者——尤其是穆勒——对于有说服力的事实证据和明确的结果显出漫不经心、迷惑不解的样子；然后，它会立即开始摆脱束缚、归纳命题。把穆勒的结构转换成马歇尔的结构

①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 英国经济学家。对当代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最有影响。早期从事货币理论和政策的研究，提出用通货管理来稳定物价和生产水平。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从经济自由主义转向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主要著作有《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其经济思想被称为凯恩斯主义。——编辑注

所要做的不比这少。

当然，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成就。许多成就小得多的理论物理学家，却也获得了不朽的声望，就是明证。马歇尔本人很感谢库尔诺和屠能的帮助，而两者的深远影响也的确是显而易见的。用于局部均衡或部分均衡分析的供求曲线是库尔诺的曲线（当然也不能忘记弗莱明·詹金），而这个数学天才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自然而然地想起的边际分析法是屠能的分析法。尤其是在关于边际效用的分析方法方面，杰文斯著有《政治经济学通用数学理论》，这是1862年在剑桥召开的英国学会的会议上宣读的论文。这篇论文包括“效用系数”这个概念。瓦尔拉的《纯粹经济学要义》中的两个部分在1874年和1877年分别发表，其中包括的静态模型的理论框架比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还要完整。但是假使这位经济学家有读书习惯的话，事情不见得会是这样，所有其他具有技术优先权的作者就都只能有些不完整的贡献。

这似乎能解释马歇尔想把事实上属于经济理论改革者们的所有看法都归于穆勒和李嘉图的倾向。尽管一个瓦尔拉的崇拜者可能会为曾经不满《经济学原理》、对他缺乏重视而辩解，而一个马歇尔的崇拜者可能为曾痛惜对他不够宽宏大量而辩解，但结果是马歇尔对每个人的感谢不会引起多大的反对。这反对只是因为他口头和书面上对他的朋友——数学的评价，它对他的帮助太大了。

如果上述判断正确，那么关键不仅在于他的数学天才有益于他在经济理论方面取得成就，并且在于上述成就产生于对数学分析方法的实际运用中。而假如没有这个成就的话，很难完成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研究方法的转变。当然，也可能有人说，任何一个结果，甚至是对一个经济因素相互依存的体系的总的看法都可以通过非数学的方法来获得，正像我们步

行也能走到火车能带我们去的任何地方一样。尽管对一些简单的案例的分析不需要采用数学形式，然而不以数学为基础是无法提供有力证据的。即使我们不考虑这个事实，另一个事实依然存在，即：马歇尔式的分析正是以数学手段为先决条件的。而马歇尔总是拒绝承认这一点。他从来没有给这位忠实的朋友——数学以足够的称赞，他隐藏了这个完成伟大使命的工具。

当然，他有充分的理由。他不希望吓倒外行们。他有着奇怪的野心，想“让商人读懂”，这很正常。他担心，那样做会使受数学教育的人认为一个经济学家所需要的仅仅是数学这种工具。然而，有人可能会希望他更多地鼓励那些在某种程度上受他的成就鼓舞正开始信奉严谨的经济学事业的人。他似乎没有认识到“被数学左右”的危险不仅存在于经济学领域，只不过在其他领域尚无证据表明其危险性有这么大。没有信奉者，就没有科学的进步。且不说人类知识的所有分支学科，仅经济学一门学科就永远无法让外行明白。事实上，就连马歇尔自己也无法被那些一点数学知识也没有的读者读懂，让那些读者认为他能被读懂毫无意义。假使马歇尔坚定地支持他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的进步事业——这种努力是任何人都无法超越的，本应获得更大的益处。

三

任何一个学派的成员都有其特点，但我们无法确切地将马歇尔的学说归入哪一个学派之中。

首先，理论家们所能看到的特点是它结构的简明。如果我们将马歇尔的文章与瓦尔拉的文章相比较，成功所必需的优秀品质将尤为突出地呈现出来。后者的文章显得冗长乏味，而前

者的文章则文笔流畅、风格典雅。优美的外表使人看不到艰苦努力的痕迹。原理论述精辟，论证简洁——至少是在梗概、附录中。马歇尔所受的数学教育甚至使他的文字表述也极有条理。正因为如此，他的简明图表也极具魅力。

经济论证的几何图示以前也有人使用过，库尔诺就曾使用过。但现在，我们许多人已经不再使用这种方法了，因为使用这种简单的二维的图示不可避免地会让人感到过于简化。然而，它们仍不失为极珍贵的——虽然是很基本的——命题工具。它们成功地消除了许多难点，它们为无数的教室带来了方便。而实际上，我们应该把那些最有用的图示都归功于马歇尔。

其次，《经济学原理》的正文和附录都证明了马歇尔充分掌握了一般均衡的概念，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哥白尼体系，依赖这个体系，经济宇宙中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各就各位、相互抵消、相互影响”。但是，为了展示这个体系的运转，他仿造并广泛使用另外一个模型，这个模型要容易操纵得多，然而它的运用范围也更有限。在多数情况下，尤其是在马歇尔著作的第五卷里，他主要考虑“工业领域”的中等规模的公司，就其重要性而言，这些公司还不足以明显地影响其他经济部门的事态发展，并且还考虑到那些只能吸引买主全部支出中很小的一部分的单个商品。这个“部分”或“局部”分析存在着不足。马歇尔没有充分说明——可能他自己没有充分意识到——很多现象都被排除掉，人们看不到，对粗心大意的人来说这更危险：对他的信徒来说，我敢说，庇古①教授对“小型”工业的过分强调会使他们感到意外；而

① 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 英国经济学家、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依据功利主义和边际效用原理，提出了福利经济学的学说，是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倡言“自愿失业”的论点，并主张降低货币工资以增加就业。主要著作有《福利经济学》、《失业理论》、《就业与均衡》。——编辑注

其他信徒随便地将马歇尔的供求曲线运用到劳动力这样的商品上。但是，如果我们坦率地承认这种方法基本上是一种近似法——并且如果我们不坚持目前对一个工业概念的反对——那么，我们就可以尽情地享用它结出的丰硕的成果。而正是为了上述目的，马歇尔的理论缺乏严格意义上的精确性，提出了一种实际上比他的论述方法大胆、新颖得多的方法。

第三，为了获得这个成果，他发明了那些人人都知道的方便的工具，例如：替代、弹性系数、消费者剩余、准地租、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代表公司、主要成本和补充成本、长期和短期。它们是我们的老朋友，并且成为我们分析库中的常客，以至我们几乎不再能意识到，应该把哪些成就归功于它们。当然它们或它们所代表的事物并不都是全新的。但即使是那些旧工具，在当时也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并且首次成为真正有用的工具。然而，像老朋友一样，它们偶尔也不可靠。代表公司、外部经济等工具在我们出现于静态领域或个体工业领域时，它们掩盖而不是纠正我们所必然遇到的困难。那些工具也无法完整地运用斜率为负的成本和供应曲线。曾经有人试图运用上述曲线，结果所费的精力足以重建一条曲线。

第四，当我们重新回顾马歇尔可能用过的局部均衡方面的前提且分析那些便利的工具时，我们一定会被他的理论中的现实主义特征所打动。局部均衡分析法使个别产业和企业中的实际问题得以显现。当然，它的内容远不止这些，但它也是商业经济学的一个科学基础。其中一些工具直接产生于商业实践，例如主要成本和补充成本；而其他工具如准地租、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等，则非常适用于把握商业形势、阐述商业问题。在这方面，马歇尔的同行们没有作过任何类似的尝试；而在其他方面，他们不仅有所尝试，而且有所收获，在有些方面他们的尝试和收

获比马歇尔更全面。因此，一般均衡理论的详尽阐述只能是对瓦尔拉研究成果的复制，仅仅对局部均衡法的概念进行阐述又是老调重弹。由一种理论发展出另一种理论，并以后者补充前者，这就完全是马歇尔自己的成就了。

最后，尽管这基本上是马歇尔研究出来的静态理论，他的目光总是更长远。一有机会他就会补充动态因素，而不总是与他仍然保持着的静态逻辑相一致。在他研究路线的某些部分存在着障碍，尤其是在碰到由对"时间因素"的论述而产生的现象时，这种障碍就从静态逻辑上产生出来。他的某些曲线具有混合特性，后来的分析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他虽然没有攻克这个堡垒，却成功地将他的部队带到了近前。这也不是全部。如果我们从静学与动学的区别得出静态与动态的区别，我们将看到更有意义的一点。

马歇尔似乎有些遗憾地容忍着他的分析工具的静态特性，但他不喜欢那种静态的前提，以至于出于某种目的忽略了它的作用。他从发展变化的角度进行思考——从有机的、不可逆转的角度考虑问题。马歇尔思想中的某些特点体现在他的定理和概念中，也体现在论述这些定理和概念时所依据的实际观察资料中。我认为，这些定理和概念背后的发展理论不能令人满意，所有的纲要都不应仅仅限于市场扩张——不是别的因素，而是人口的增加和储蓄这两种因素刺激导致的扩张——这种扩张会引发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而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又导致进一步的扩张。但它仍然是一个发展的理论，是亚当·斯密理论的重要发展，远远超过李嘉图和穆勒就这个问题所提出的理论。

四

然而，尽管他的成就很辉煌，如果不是它的外表正好符合当时的潮流，他就不会获得这么大的成功。从根本上说，马歇尔创造了一种"分析工具……一种普遍适用于揭示真理的机械……不是一个具体的真理本身，而是用来揭示具体真理的工具。"人们发现，有一种东西被当作经济分析的一般方法。或者换句话说，就分析过程中的推理方法而言，经济学家们，无论是研究国际贸易的，还是研究失业的，或是研究利润、货币的，他们对于手中掌握的某种材料，总是大量运用同一种方法——这不是马歇尔的发现，也不是使他显得出众的那群经济学家的发现。

为了使我们自己相信至少从重农主义时期起，所有胜任的经济学家都已经知晓这个真理，我们只需看看李嘉图的著作：第一章显然是那种"揭示具体真理的工具"的蓝图；第二章是对第一章的补充；其他章节仅仅是一系列实现这个蓝图的实验。但在马歇尔以前，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能如此完整地掌握其涵义，极力地宣扬它，并且如此一贯地遵循它。

而今，从一个对经济理论的性质和作用持相同观点的人身上，人们期待的可能是与《经济学原理》完全不同的论著，它可能永远不会受到如此普遍的欢迎。我们已经发现了《经济学原理》比其他论著更幸运的原因：几乎每一页文字都能展现出马歇尔的历史哲学修养——他的分析"嵌"在一种能够博得外行人好感的华丽的形式中，使人感到舒服。这种分析结构不会龇牙咧嘴地展露在人们面前，它被覆盖在肌肉和皮肤下，马歇尔对商业事实的观察很容易将其"装配"起来。所有这些不仅意味着简单、合口味，而且意味着这个理论是受大众欢迎的，而其他类似的有

关经济理论方面的论文没有一篇能做到这一点。

然而还不止于此。在更幸运的人类知识领域里，这位分析家可以自由地工作，不必经常地考虑、指出它的实用价值；他甚至可以泰然地忽略任何一种实际应用的可能性——这也是他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经济学家不仅要为那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奋斗，还会不断地为立即获得“有用”结果的迫切需要所扰。与物理学家不同的是，为了对付当前的麻烦，也为了人类处境的改善，他不允许别人说所有成功的生产都是迂回生产，也不允许别人说即使是实用结果也是通过不以它为直接目标而获得的。但是马歇尔对引起那些需求的信条没有任何抵触情绪，他完全赞同这点，为艺术而艺术在他的优秀的盎格鲁-撒克逊心灵中是毫无地位的。为他的国家和时代服务，教给人们立即就能用得上的东西，那是他本人最希望做的事。他不反对那些人类价值中的平凡事物，也喜欢宣扬英国贵族生活的准则。

此外，他对贵族生活的看法，对社会问题的观点，对公众和个人领域的见解，恰巧与他对国家和时代的看法、观点、见解相吻合。更准确地说，他的理想和信念不是1890年普通英国人的理想和信念，而是1890年有知识的普通英国人的信念。他接受周围的风俗、私有公司、尤其是家庭，毫不怀疑它们的生命力以及在他周围发展起来的文化的生命力，他接受当时流行的功利化的、否神学化的基督教。他得意地高举着正义的大旗，不怀疑曾经受过打击的折衷主义的效力，依靠“白人义务”，生活在功利主义正义的信条和莫卧儿大帝的遗产之间。他出于热心，欣然地对社会主义理想表示同情，头脑冷静地同社会主义者对话。因此，他能够给予读者他们渴望的东西——他的话既高尚又令人鼓舞——而同时满足了他良心的需求。

我们可能对一部科学论著中的“职业道德”规范表示怀

疑——然而，马歇尔毕竟在那方面和牛顿是同一条船上的人。拿我来说，我就有疑问。还不止这些。我们可能都不赞赏其中的特殊信息。我承认我只反感那种维多利亚中期的道德说教，它带有边沁功利主义[①]色彩，是没有魅力、没有感情的中产阶级价值观。但它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绝大多数马歇尔的读者有不同的感觉，他们喜欢那种充满了他们认为是惟一正确、体面的精神的分析方法。

五

但是，在马歇尔的著作中，有一种比他实际完成的任何研究更伟大的东西。它蕴涵着不朽，或者说具有任何一个特定成果所不可比拟的生命力。出自于他的天赋的那些作品都传给了我们，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便利，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会在我们手中用尽。而除此之外，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微妙地暗示了或指引着继续前进的方向，体现了领袖的素质。这一点我在一开始就竭力说明过。列举马歇尔为后人提供的便利是很容易的；而要说明《经济学原理》所体现的领袖素质则是很难的。

第一点，如此重要的研究成果指引了受它教育的一代人的研究工作，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因此，1890 年以后的 30 年中，经济学作品中充满了对马歇尔的主张和方法的重申、发展和推论。

---

① 18 世纪末由英国的耶利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所创立的理论体系。边沁从区别好与坏的立法实际问题出发，提出功利应为道德最高准则的原理。主张个人的利益是惟一现实的利益，社会利益只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而个人利益的满足乃是保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手段。认为避苦求乐是个人行为的基础和准则，也是政府活动的原则。——编辑注

马歇尔的学生和接班人庇古教授的作品，罗伯逊、拉文顿、肖夫以及很多其他人的作品提供了无数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实例。甚至埃奇沃思的部分文稿也属于这个范畴。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定理，另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方法。

马歇尔首先证明了完全竞争并不总能达到最大产出。这是我所了解的古老城墙上的第一个裂口，他得出的主张是：通过限制利润递减的行业和扩大利润递增的行业，产量可能会超过竞争的最大极限。庇古、卡恩和其他人遵循这个主张，开创出最终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的领域。

还有，需求弹性的概念不一定像人们赞扬的那样有价值。由此产生了一种让我们感到很方便的、用弹性概念来推理的方式。目前使用的弹性概念差不多有十几个，其中，替代弹性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尽管它确实只在极为有限的假定中行得通且并不实用，但可以极大地消除那些曾经引起极不必要的争议的问题——例如把机器引入生产过程是否会损害劳动者利益这样的问题。替代概念是马歇尔理论结构的基础，对“替代原理”的强调，几乎可能被看作是马歇尔的结构和瓦尔拉的结构之间的主要的纯理论区别。因此，新的分析工具完全由《经济学原理》中能够找到的材料构成，只需将这些材料“组装”起来即可。

第二点，尽管马歇尔对长期、短期概念的区分并没有很好地表达出马歇尔原来打算靠它表达的意思，但是这种区分极大地推动了清晰、现实的思维的发展，并且完全有资格获得它已经并应该获得的重视。马歇尔本人广泛地运用过它，并通过它给我们上了一课，我们曾经并且还在渴望从这一课中受益：一个完整的经济学分支以缓慢增长的方式发展起来了，这就是短期分析法。

第三点，马歇尔显然是另一个比较新的经济思想体系——

不完全竞争之父。这一点我想不会有什么争议，但是这一点在英文版上尤其明显。皮埃罗·斯拉法1926年在他的著名文章中展现在英国读者面前的思想，是从同马歇尔成本递减曲线的逻辑难题的斗争中体现出来的。这在《生产成本的降低与产品数量》中更为明显。此外，在《经济学原理》中，我们能发现积极的建议，尤其是对个体企业的特殊市场的评论。通过构造我们所钦佩的理论结构，哈罗德先生和罗滨逊夫人几乎证明了他们自己是最优秀的马歇尔主义者以及极富创造力的经济学家。

我承认，有一点不是绝对不可辩驳的，那就是我将要以马歇尔的名义提出的第四点主张。我曾说过，虽然他掌握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但他把它放到了不突出的地位上，而把使用起来比较方便的部分分析法或局部分析法放到了突出位置上。然而，尤其是在第六卷中，他着手将经济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广泛的概括。假如它们不是局部分析、也不是一般分析的话，那么它们是什么呢？我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到另一种理论——在我的研究室里它被叫做“综合法”。当然，他没有将他对这种总量的论述与货币联系起来。他在这一点上的失败可能是我要向他提出的惟一的重要批评。诚然，他在货币理论方面是有很多很重要的发现的——由于本文是对《经济学原理》的评论，故在这里对此无需赘述。确实，如果一个人从部分分析入手，随后又希望对经济过程整体作一些论述，在对不便于使用的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失去信心时，就应该去求助于综合法理论。这不是很自然吗？那么，用罗滨逊夫人的话来说，难道货币理论不能像总产出理论和就业理论那样自动发挥作用吗？

第五点，我曾经指出过，马歇尔明确地坚持一个经济发展理论，尽管按照他的习惯，他并没有强迫读者注意他的理论，但这个理论是他的核心思想。不要怀疑我多么赞同这个理论，但是

我确实要指出，它——不是作为一种哲学，而是作为一个研究工具——所产生的影响比我们大多数人能够意识到的要大得多。H.L. 穆尔的趋势价值只有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才能近似于均衡价值。W.M. 珀森斯在其中发现了论述趋势的理论，类似于他在《哈佛—晴雨表丛书》中所做的有关趋势的论述。然而这显然引出了最重要的部分。

接下来是第六点，马歇尔的理论是对现代计量经济学的诞生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尽管在很多观点上，《经济学原理》与《国富论》有很多相似之处，然而如果不考虑时间因素，并将两者归入主观的、受时间限制的成就中，按同一标准来衡量的话，前者是绝对超过后者的。亚当·斯密聪明地汇集并发展了他本人的思想和前人的思想中所有他认为最有价值的内容。他没有做任何努力去发展他身边的一个最伟大的成就——17 世纪的“政治算术”；然而，马歇尔坚决地把研究引向不仅是量的而且是数的经济科学，并为其准备了条件。在这一方面，对其重要性的评价是不会过高的。经济学在得出结果之前永远不会获得也不应获得声望。

马歇尔对这一点的认识程度可以从《老一辈经济学家与新一代经济学家》(1897 年)中看出。我们要归功于他的是一个明确的方法论。要使自己相信这一点，我们惟一需要做的就是再看一眼我所描述的他的“方便的工具”。它们是名副其实的方便工具，从统计学意义上说极具操作性。我们只需要尝试利用统计资料构造公司模型、家庭模型、市场模型，就能发现，在此过程中会意外地遇到这些工具所要解决的问题。不管它们是什么，可以肯定地说，它们是第一批计量工具——**用于数字计量的工具**——也是一般统计计量的一部分。确切地说，直至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喜欢这些工具而不考虑其他工具，它们都是有

用的工具。它们可能不是最好的工具，也不是惟一的工具，但它们在同类工具中是最先出现的，而经济学方面的努力几乎无法从其他工具入手。

例如，那些研究首先大规模地指向统计需求曲线的衍生物，而马歇尔的需求理论提供了可接受的基础。这显然不是巧合。如果他不曾希望研究出一种至少在很多情况下可以用在统计上的近似方法，那么强加上那些使我们能解释点弹性或那种需求曲线本身的限定，可能毫无意义。事实上，我们只有站在这个立场上看问题，那些招致很多反对意见的限定才会变得可以理解。拿消费者租金概念为例，这个概念与上述限定确实没有联系。但除非把它用在一个定量福利的统计评估上，为什么马歇尔不愿意提及"盈余"这个多变量函数的存在，而一定要像此前迪皮特所做的那样，坚持把自变量的数量削减到两个呢？当然，同样的推理适用于他的成本与供给函数，另外还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坚持那些在理论家看来不可取的长期工业供给曲线，并揭示出了相当一部分对更恰当的、更普遍的模型来说是未知的可能性。

马歇尔在货币理论领域里的收获可用来解释这样一个现象：在他的著作中到处可以找到能够有效掌握统计资料的理论工具，而这实际上也是其著作中最突出的特点。庞巴维克的推理无疑是定量的，但他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统计计量的可能性，他的理论也从来没向这方面努力过。瓦尔拉的体系，虽然不像我们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毫无希望，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只有马歇尔的学说极力向前推进。不必担心，它也是谨慎前进，它仍然可以为我们所用。不管是极力推进还是谨慎前进，马歇尔都是我们的伟大导师。

我们大家正站在深谷边缘，妄想从中找到高速公路。而每当我们回过头来，总看见他威严、安详、安然地站在他的信仰的

城堡中，仍然告诫着我们许多值得听取的话语——然而最值得深思的就是："我越研究经济学，越觉得对它的了解太少，……在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比在开始的时候更能感觉到自己对它的无知。"的确，他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
(1848—1923)

布斯凯教授在一本研究帕累托生平和著作的书中①,引用了社会主义者的《前进日报》上的一篇悼念文章中的词句,把帕累托描绘为"资产阶级的卡尔·马克思"。我不知道把他这样的人称为"资产阶级"是否恰当,因为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任何对无知与懦弱的资产阶级表示蔑视的机会。至于其他方面,这种类比恰当地表达了帕累托给他的同胞们所留下的印象:他们实际

---

* 转载自《经济学季刊》第63卷第二期,1949年5月。1948年版权属于哈佛大学。

① 参见G.H.布斯凯:《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的生平和著作》(载《现代史研究、史料与考证汇编》,巴黎,1928年)。除了有关帕累托著作的数学部分的内容外,我们特别推荐这本书。此书是由一位怀着极大热情的作者写成的,他本身就是一位当之无愧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同时,作者又尽量避免了门生或传记撰写人的那种专门反映光荣事迹的心情。布斯凯还著有《帕累托以来的社会学概论》,并为帕累托的《社会主义体系》和《政治经济学手册》两书撰写了序言,1928年用英文写了一篇题为《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的著作》的短篇评论。此外,在《论经济思想的发展》一文中,布斯凯也为帕累托保留了光荣的地位。在其他的纪念评论文章中,只要提到所谓的官方评论就够了,它们是:阿方索·德·彼得里-托内里教授在意大利科学进步协会经济组的演讲(发表于1934年11月、12月及1935年1月的《政治经济学评论》上),以及卢吉·阿莫罗索教授于1938年1月在《计量经济学》上发表的文章。

上已经把他摆在了凌驾于同时代的其他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之上的显著位置上。没有别的国家为他建立类似的塑像台。而在英美世界，直到今天，人们对这位名人和思想家仍然是陌生的。诚然，在他的社会学著作被翻译出来后，这里曾出现过短暂的帕累托热，[①] 但它很快就在一种冷淡的气氛中消失了。然而就纯理论家的小圈子而言，帕累托对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英美经济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那是在鲍利教授的《经济学的数学基础》一书出版之后。但在英国和美国，在帕氏具有优势的方面，马歇尔主义和后马歇尔主义的经济学家做了足够多的工作，甚至抢在其他思潮夺走帕累托已经占领的阵地之前，阻止他占领更多的阵地。

理论经济学的若干重要发展现在看来起源于帕累托，这一事实可能令人感到惊异。但解释起来并不困难。帕累托是法意文明的产物，这种文明远离英美思潮。即使在法意文明范围内，他的突出形象几乎也是无与伦比的。帕累托不能归入哪一学派。他不追求什么“主义”。没有什么宗派或政党声称帕氏是自己这一派的，虽然有许多宗派和政党从帕氏所掌握的广博的知识领域中盗取了一些碎片。他似乎以与占主导地位的情绪与口号背道而驰为乐。极端放任主义的信徒们可能从他的著作中寻章摘句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但是没有什么东西像自由主义的“财阀民主”或“财阀宣传”那样受到他的强烈藐视。社会主义者应该感谢他，

① 在哈佛，这种帕累托热以著名的生理学家、已故的 L.J. 亨德森教授为代表。请参阅他发表于 1935 年的《帕累托的普通社会学》一文。一些哈佛人仍然会记得亨德森教授的非正式的帕累托“讨论会”，实际上，“讨论会”是由这位教授的一系列独白组成的。在那里，对帕累托思想的同情、理解以及对帕累托思想的非凡伟大的深刻认识正在与一些不可避免的专业上的障碍进行坚决的斗争。

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他对社会主义学说作出了一项十分重要的贡献。他还抗议意大利政府在1898年所采取的反社会主义措施。可是他不仅是一位反社会主义者，而且是出于藐视而进行讽刺批评的人。法国的天主教徒可以因为帕累托攻击了对法国教士们的迫害——这种迫害是非常不光彩的德雷福斯案[①]的后续——而感谢他。他还反对孔贝部长的"政权还俗主义"政策，因为他是一位绅士，而不是因为他相信天主教会的教义。

帕累托就是这样一位独立性和好斗性强的绅士，他习惯于在辩论当中给予对手强有力的抨击，可能在这一派或那一派人中得到赞同，但很难有机会受到普遍欢迎。此刻他已成为过去的人物。但是即使在他事业的全盛时期，我们所熟悉的政治和社会口号统治着官方语言、报纸、政党纲领以及一般文献，其中也包括经济文献，帕累托表达其严谨的科学成果的材料也不比现在更为流行。一个人只要感染上充斥于美国教科书中的精神，当他翻开帕累托的《政治经济学讲义》时，就会认识到下面这句话的涵义："现代社会主义信仰和口号的天真爱好者，一定会感到自己被棍棒赶出帕累托的家门；爱好者所阅读的是自己永远不肯承认其真实性的东西，他同时也阅读了大量的令人为难的实例。"因此，现在的问题似乎不在于解释为什么帕累托没有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而在于解释帕累托是如何产生这么大影响的。

如果我们能把自己的视线控制在帕累托对纯粹理论的贡献范围内，就不需要对这位人物、他的社会背景及地位进行回顾

---

① 1894年，法国军事当局诬告犹太血统的法国军官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1859—1935）出卖国防机密给德国的事件。德雷福斯被判终身苦役。当事实证明为诬告后，当局拒绝重审，导致民主力量（德雷福斯派）与反动势力（反德雷福斯派）之间的尖锐政治斗争。在舆论压力下，1899年德雷福斯被政府宣告无罪，1906年复职。——编辑注

了。但是完整的帕累托以及制约他的一切力量，都明白无误地与不属于经济学纯粹逻辑原理的任何事情有关，因此有关其人及那些制约力量的评价比科学成就评价中的类似内容更重要、有益。我将首先试图表达这种意见，然后简略地评述一下他在纯粹理论方面的工作，最后，我将看一下他在《普通社会学》一书中作了不充分表述的关于社会的概念。[①]

一、生　　平

帕累托的父亲、热那亚人马尔凯塞·拉斐尔·帕累托似乎是19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复兴运动的典型产物、马志尼[②]的热情拥护者——或许较多地由于国家原因而不是由于社会原因——他是"阻碍意大利走向全国统一的一切政府"的毫不妥协的敌人，而且是在这一意义上而不是在其他意义上的一位革命家。因此

---

① 由罗科与斯皮内迪两位先生在1924年的《经济学家杂志》上提供的书目大体上较为完整，但是我们必须提出下列各种参考资料：《关于纯粹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洛桑大学政治经济学讲义》；《巴黎高级社会研究学院讲义概要》；《社会主义体系》；《政治经济学手册》(1906年)；《政治经济学手册》(1909年)，这是前一本书的法文译本，但我们必须把它单独列出来，因为其中的数学附录完全是重新编写而成的；《普通社会学》(1916年)，法文译本(1919年)，英文译本名为《心灵与社会》(1935年)；法文版《数学科学百科全书》中的《数理经济学》(1911年)，该书原来德文版中的相应论文并不重要。另外还有一些书和不计其数的论文，但据我所知(帕累托在日报上发表了许多论文，其中大多数我不知道)，它们所包含的具有科学性质的内容，都已包括在前面所提到的出版物里了。

② 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复兴运动)中民主共和派的领袖。曾加入烧炭党，后被捕，被驱逐出国。1831年在法国马赛创立青年意大利党。参加1848年意大利革命，为1849年罗马共和国三头政治的领导人之一。1860年支持加里波第对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远征，提出建立共和国的主张，未果。19世纪60年代，宣传在"劳资合作"和"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解决工人问题。——编辑注

他流亡国外，逃到巴黎，娶了一位法国妻子。本文的主人公在那里出生了。如果加雷尼将军曾经把自己描述为“法国人但也是意大利人”，那么维尔弗雷多·帕累托也可以把自己说成是“意大利人但也是法国人”。他于1858年被带回意大利受学校教育，1869年获得了工程学博士学位。他立即从事工程学和工业管理工作，并在几次调换工作以后升任意大利钢铁公司的总经理——应该是“董事长”——直到1893年，他才到洛桑大学，并被任命为瓦尔拉的继承人，虽然几年前他就已经可以算得上是专职的经济学家了。这样，他主要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时间大约是1892—1912年，后来他的全部工作实际上都是社会学性质的。1906年，他辞去教授职务，退休回到位于日内瓦湖畔的乡村的家里。在充满旺盛精力和富有成果的老年阶段，他成为“塞利尼的孤独思想家”。

上述情况基本上已满足了我们的需要。我们必须强调这些事实中的若干部分，而不是添加其他事实。首先，理论家们会注意到，由于他受过工程学的训练——而且他似乎形成了理论观点——他早年所掌握的数学知识已达到专家水平①。其次，值得注意的是，他已是一位非同寻常的经济学家，他完全熟悉工业实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学院经济学家、公务员和政治家靠所能利用的方法获得的熟悉、精通程度是十分不同的。但是，第三，正因为他对当时的经济政策和一般政策表现出了强烈兴趣，才使得他在开始创造性工作之前，差不多就已是一位经济学家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将马上在另一处加以评述。弗朗西斯科·费

① 我不能准确地说明这水平有多高。帕累托需要沃尔泰拉告诉他，$Xdx+Ydy$ 表达式经常有无限多的积分因子，而当它有两个以上变数时就不需要这样的因子存在。我不知道一位真正的专家能否忽略这一点。

拉拉当时仍然声名卓著，而自由主义者不加批判地赞美的那种理论结构仍然没有遭到冷遇。费拉拉的著作，特别是发表于《经济学家文库》中为古典经济学著作而写的著名序言使帕累托深受教益，其影响不亚于甚至超过了帕氏学生时代的大学课程。帕累托对瓦尔拉著作的研究则源于马费奥·潘塔莱奥尼的建议。

上述事实没有一样能全面地说明帕累托的社会和政治观点，或者说明他对那个时代和意大利的实际问题的态度。我绝不相信他的个性能像极易被抽干的池塘一样轻易地被人了解。但是，贵族出身对他的影响多于对一般人的影响，我相信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会同意这一点，特别是这一背景使他不能与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在精神上成为兄弟，不能成为在各种团体中完全被接受的成员。它也阻碍了他同那些资产阶级思想的产物建立感情联系，例如被称作"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孪生兄弟。这一背景的作用是，使他有足够维持生活的经济收入——起初勉强够用，后来变得相当富裕了[①] ——使得他更加离群索居，因为这为帕累托提供了把自己孤立起来的条件。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的古典学识按同样的方式起着作用。我所说的不是他与同时代受过教育的每个人共享的那部分古典学识，而是他通过不懈地研究希腊与罗马的古典作品，经历许多不眠之夜后形成的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古典理论。古代世界是一座博物馆，而不是一间应用科学的实验室。他太相信那里面所积累的智慧，结果必然会远离生活于 1890 年或 1920 年的任何人群。参加本国的政策和政治辩论使得他完全孤立，以至于在接受洛桑大学邀请之前，他就已决定移居瑞士。孤立对他的暴躁脾气有影响——只是在晚年，第二次结婚所带来的家庭和睦

① 这是由于继承了一份遗产，而不是由于早年担任总经理所致。

才使他脾气好些——而暴躁脾气实质上是不能容忍孤独的。

但他为什么怀着极其愤怒的心情离开了自己的祖国？他从内心深处热爱她，祖国的新生不但是他所渴望的，而且是他亲眼看见了的。公正的观察家很可能提出这一问题，因为在这样的观察家看来，似乎在帕氏离开祖国以前的30年里，这个新的民族国家的情形不算太糟。除了以相当快的速度促进经济增长和从财政混乱中解脱出来以外——得向我们的凯恩斯主义者们表示歉意——这个国家首先采取的措施是进行社会立法，并成功地把意大利建成当时所谓的列强之一。从这一角度来看问题，我们的观察家们将会对阿戈斯蒂诺·德普雷蒂这样的政权表示极大的尊敬。而且考虑到新的民族国家在初创阶段容易遇到的困难，观察家们会原谅那些不太令人高兴的情景。但是帕累托没有任何原谅的表示。他所看到的只是无能与腐败。他怀着公正的愤怒与走马灯似的政府进行战斗，于是那时他就成了公认的极端自由主义者——在19世纪其涵义就是自由放任主义的毫不妥协的鼓吹者——而且在那个时期的德国新政者们中间，他帮助造成这样的印象，即边际效用只是被用来反对改革者的邪恶诡计。[①] 关于帕累托对经济政策问题的态度以及1900年以前他在科学著作中所留下的深刻痕迹，这可能就是全部的内容了。但是即使在那时，在他的那种极端自由主义的思想中仍然有些东西是直接反对官方自由主义的教条和口号的。他确实是一位反国家干预主义者，但这是出于政治理由，而不是出于纯粹经济的理由：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不同，他不反对政府活动本

① 因此，德国的批评家接受了他的《政治经济学讲义》。事实上书中很少含有可作不同解释的内容。但是它包含有这样的观点：在这里所断言的纯粹的竞争的优点对实际经济过程不起任何作用，因为纯粹的竞争实际上没有普遍盛行。

身，但是反对议会民主制的政府，反对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热烈拥护的那种议会民主制的政府。从这一点来看，他这种类型的自由放任主义有了引申意义，与英国式的自由放任主义完全不同。只要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其他的就容易理解了。

在19世纪末和本世纪前20年中，越来越多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开始表示不满，从单纯地表示失望，发展到对议会民主不断更迭的方式及其在法国和意大利所产生的后果表示强烈厌恶。有这类情绪的人有很多，如E. 法盖和G. 索雷尔，而他们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党派。分析这些情绪不是本文的目的所在，更不用说去评判它们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存在着这些情绪，而且，晚年的帕累托之所以在这种思想潮流中显得突出，是因为他在同时代的人们中更为突出，还因为他写了一部社会学方面的著作——还有索雷尔和莫斯卡的著作——使这些情绪合理化了。

英国人和美国人忘记了特殊的和历史上独特的情况，这些情况使他们在心目中产生了同样特殊和独特的对议会民主制的态度，他们怀疑帕累托对法西斯主义的态度的可能意义。不过他的这种态度一点也不成问题，不需要用什么理论去加以解释。1914—1922年的事件已经把他召回了政治辩论的舞台。他发表的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凡尔赛和约的失策以及国际联盟的无能等的精辟分析都是最强有力的论述，虽然这些文章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没有引起反响。但是他毕竟目击了带有某种恐怖色彩的意大利社会的解体，这是只有亲眼看到才会相信的。

他把这些年间的一切动乱都归因于颓废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软弱性。这位罗马史学者可能想到罗马共和国元老院使用过的一个方案，即：为了应付紧急局面，元老院常常命令执政官们任命一位实际上具有无限权力——虽然是临时权力——的官员，即独裁者。执政官应该注意不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害。但是

在意大利宪法里没有这一条款，而且即使有了这一条款，也不会有任何好处。因此，独裁者必须自己任命自己。帕累托决不曾超越这一界限，也不曾超越只赞成墨索里尼恢复秩序所取得的成就这一界限。墨索里尼为了标榜自己，向这位始终宣传温和主义、始终主张新闻自由和学术自由的人授予参议员职位。[①]但直到去世前，帕累托都拒绝信奉这种“主义”，就像他拒绝信奉任何其他主义一样。从英美世界的传统观点来看，没有任何必要去裁判他的行为——他的任何行为或情绪。

其他任何事情都沉在“池塘”的底部。

二、理　论　家

在对帕累托在经济学上的贡献作出任何评价时，首先必须充分称赞他的领导才能。他从来没有在意大利教过书，洛桑大学法律系也没有成为智力征服运动的非常好的司令部。他在塞利尼的乡村住宅看起来像是一个很好的休养所。但是他完成了瓦尔拉没能做到的事情：他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学派。1900年以后不久就出现了由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组成的内部圈子、由一些不甚著名的经济学家的追随者组成的广泛圈子，此外还有一大批比较固定的外围支持者。他们合作完成了建设性的工作。他们培养了个人间的接触。他们在争论中相互支持。他们承认一位导师和一种学说。

这一学派是专门属于意大利的。像已经指出的那样，它很少有外国支持者，尽管帕累托学说的个别论点在英国和美国最终获得了承认。帕累托学派从来也没有统治过意大利经济学

① 参阅《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的生平和著作》第182～194页相关叙述。

界。从来也没有一个学派曾经统治过自己的国家。与此相反的印象，例如李嘉图学派曾经在英国经济学界居于主导地位这一印象，只是由于不实事求是的历史编纂工作而造成的。有一些意大利学者如爱因奥迪等，完全坚持自己的立场；而另外一些人，如德尔·韦基奥等，尽管承认帕累托的盛名，采纳他的某些学说，但也思考和写出了许多东西，正如世界上未出现帕累托时他们所做的一样。然而事实是，一个学派确实在这种理论结构基础上出现了，这种理论结构不仅一般读者不容易接近，而且其中某些最具有独创性的内容，连研究经济学的人也难以接近，特别是从来没有听过帕累托的课或见过这位导师的经济学研究者。

但是一旦我们充分认识到并抛开他的领导才能，我们就能看到，他是一位继续瓦尔拉的工作的理论家。当然没有人曾经否认这一点，甚至帕累托的忠实信徒，至少是帕累托本人都未加以否认。在这一点上的意见分歧显然局限于以下问题：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帕累托超过了伟大的先驱者瓦尔拉，以及两人在智力发展方面谁高谁低。有若干理由使得他的弟子们没有在这方面取得一致意见，不论是同外界还是在他们自己中间。其中有一个理由我们要马上指出来。瓦尔拉在政治哲学的外衣下提出他的不朽理论，其本质是超科学的，因而不会合乎每个人的口味。恐怕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表达它是什么哲学，倒不如把它称为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哲学。瓦尔拉感到被迫去宣传一种“社会理想”，它来自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准社会主义作家们，或者我们可以同样有根据地说它来自功利主义。他把土地国有化看成他学说中的主要内容，他是一位货币改革家，其计划有着惊人的现代气息。这些都是帕累托最厌恶的东西。这些只是形而上学的思考，而且是一种非常无情的形而上学的思考。他们的共同基础只限于纯粹理论方面，特别是瓦尔拉的均衡方

程式方面。但在任何其他方面，他们是截然不同的。即使是两人为数理经济学而共同战斗，以及帕氏接受瓦尔拉推荐任教于洛桑大学这两件事，都未能阻止他们间根深蒂固的相互敌视，这种敌视甚至在他们同第三者谈话时都有所表露。他们的纯粹理论由同一模子铸成，但从整体上说，他们各自的思想体系以及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看法却是不同的。所有无意忽视一个人的基本理论及其实际特长的经济学家，也就是说大多数的经济学家，仅仅因为这一理由，就可以认为帕累托的结构和瓦尔拉的结构完全不同。

无论如何——我们暂时忽略一下社会学——他只在纯粹理论方面写下了科学史的一页，但有一个例外。让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一例外。在《政治经济学讲义》里以及在 1896 年发表的一篇单独的论文里，帕累托发表了计量经济学中一项具有高度创造性的先进成果，因而首次树立了他的国际声誉。在帕累托定律的名目下产生了可以公正地称为关于它的批评性讨论的全部文献。设 N 为收入高过 x 的人数，A 和 m 为两个常数，那么，帕累托定律认为：

$$\lg N = \lg A + m \lg x$$

《政治经济学手册》第七章中有帕氏对这一概括最成熟的解释。我们必须把自己限定在注意它所提出的两类问题的范围内。首先是适当性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有的完全反驳这一定律，有的提出另一些较好的方法来描述收入的不平等现象。读者会发现，中心问题取决于 m 值的近似不变。然而总的说来，帕累托定律经得起批评，因为直到现在，有时还有称职的统计学家应用它，这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但

是，第二是如何解释的问题。假定到最近的某个时期，按照等级分类的收入分配情况已经十分稳定，我们能从中推导出什么呢？人们尚未对这一问题作过有成效的研究。大多数讨论的参加者，其中包括庇古，都只局限于批评帕氏本人的解释——这一解释，至少可以说，最初确实容易遭到反对——而且，像我们的许多论战一样，这一争论逐渐消失而没有产生具体结果。认识到这类公式在将来的经济学中仍然会有保留下来的可能性的经济学家很少。① 从这一点看，帕累托的定律实在是开路先锋，虽然它最终没有留下任何特殊形式。

我利用这一机会来讨论另一件事。帕累托在《政治经济学手册》有关人口的一章中讨论了收入分配定律。就这一标题下通常所要讨论的问题而言，这一章并没有多少值得注意的地方。但是这一章却包含了许多其他内容，它们像这一定律一样，通常并不应包括在人口理论中。而正是这些内容使这一章变得生动活泼，赋予它新颖性和创造性。帕氏的精英循环论就是一个例子(参阅本文第三部分)。其中大部分内容本质上是社会学的，而不是经济学方面的，有些部分尖锐地、诚然几乎是天真地显示出一些偏见，这些偏见不适当地压在这位分析人类偏见的伟大分析家身上。②

在真正被称为纯粹理论的领域内，帕累托的思想发展缓慢，而且实际上始终保留着某些前帕累托的特点。除了费拉拉和

---

① 特别是，似乎没有人认识到，寻求和解释这一类型的公式可能为一种全新的理论奠定基础。

② 例如，不管我们对于他对女权主义现象的解释有何想法，当我们读到以下这个句子时，就会忍俊不禁："女权主义是一种弊端……"这种说法不能表示什么客观性或不能表明其不偏不倚。关于帕累托的严格意义的人口理论和那些社会学方面的补充，请读者参阅 J.J. 斯彭格勒教授的《帕累托论人口》一文，载《经济学季刊》1944 年 8 月号和 11 月号。

英、法"古典时期"经济学家的早期影响外，他以瓦尔拉的静态均衡方程式作为起点——这是在他认识到这些方程式事实上是通向其他一切事物的钥匙以后的事，虽然起初对这些方程式还是有相当的抵触情绪的。他又从1885—1895年这十年间所有有才能的经济学家都不能不接受的一切建议中得到进一步的鼓励。[①] 最后他深刻地了解他的那些前任们的技术缺陷及其他局限性。这样，他自己的理论工作适合由他自己来做——诚然，其中大部分由瓦尔拉本人做了。[②] 但是，帕氏的早期著作如《关于纯粹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研究》从来没有超越瓦尔拉学说的"边界"。他的《政治经济学讲义》也显然如此。有些尊敬帕累托、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帕累托追随者的经济学家对他说了些含糊的恭维话，说《政治经济学讲义》是他的杰作。诚然，《政治经济学讲义》是一项显著的成就，它从头到尾充满了强烈的激情，这种激情甚至使一些平常的段落也充满活力。但帕累托是正确的，他拒绝将该书重印或再版。因为就纯粹理论而言，书中并没有什么帕氏所特有的东西。直到1897年后，他的水平才达到一定的高度。证明他获得进展的首批主要出版物是《纯粹经

① 诚然，对其中的若干建议，帕累托的反应即使不是敌对的，也是否定的。他从来没有充分重视马歇尔——主要是因为他在原则上反对局部分析——而且他似乎从来也没有看到奥地利人原始技术后面所有的一切。但是他的确重视埃奇沃思，也重视威克斯蒂德，而毫不理会那些站不住脚的反对意见。比我们通常所知道的更多的是，他重视欧文·费雪。他不仅重视费雪的《价值与价格理论之数学的研究》，后来也重视《资本和收入的本质》和《利息率》。在我听到他高度评价《资本和收入的本质》时，颇感意外。

② 瓦尔拉完全知道，他不得不走捷径，以便完成他自己所认识到的暂定的结构。他从来不相信那些假设，如生产的恒定系数、生产的不定期性、间接费用的不存在以及同等规模的企业能够或应该永远存在等等。我们无法确定，帕累托在这一方面对他是公正的。瓦尔拉的成就不仅是先驱者的成就，而且也指出了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济学新论的若干章节概要》和他在巴黎的讲课概要。[1]《政治经济学手册》(意文版)的法文译本(1909年)由于有了附录,标志着帕累托的学术生涯达到了顶峰。

他在这一位置所竖立的塔的结构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有许多在综合性著作中很重要的内容在这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不只是说,就任何一本教科书里都能找到的东西而言,帕氏著作不及马歇尔的著作,更为重要的是,他对理论原则的许多重要部分没有周密考虑。例如,帕累托的货币理论总的说来略逊于瓦尔拉的货币理论。他的资本与利息理论吸取了瓦尔拉理论中的全部优点。至于利息,他似乎已满足于依靠这样的解释:各种有形资本以及它们的服务都不是免税品。他的垄断理论,我相信即使是最宽容的解释也不能使之摆脱窘境。[2] 尽管如此,某些批评家提出的非难也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种批评不仅忽视了他的许多独特的、强有力的论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忽视了他的理论成就的精华部分。这些强有力的论点中的最重要部分,就是价值理论和生产理论,下面我们将要加以讨论。但是,首先我们必须要界定他的成就本身,价值理论和生产理论仅仅是其成就的应用。

从纯粹理论的观点来看,任何一位已掌握瓦尔拉体系的人必然产生的第一个想法是,如何使这一体系的概括性上升到更高的水平。当我们跟随着瓦尔拉而且也跟随着所有边际效用理论家

---

① 见本书第95页注①。

② 但是,帕氏把垄断理论纳入他的一般理论体系中的做法并非毫无益处。同时他的国际贸易理论绝对不应像大多数情况下那样,被贬低为只是对比较成本的批评。虽然他没有详细论述,却简要叙述了他自己的理论,这一理论第一次把一般均衡工具运用于国际贸易。参阅V.哈伯勒:《国际贸易理论》1936年版,第123页。

前进时，通过交换、生产以及其他现象，我们发现，他们试图解决的问题，按最终逻辑都只归结为一个问题：他们的一切问题——不仅是生产问题——都是经济数量的变换问题，而且形式上相似；各种问题之间的差别仅仅体现在，经济活动在不同领域中所受到的限制不同。假定我们决定去做在一切科学领域里我们都要做的工作，即分离出所有经济问题的共同核心，并一劳永逸地建立这种共同核心理论，思维经济的观点（见 E. 马赫[①]的《思维经济学》）将说明功利主义者的这种努力是正确的。这种理论将采用十分普通的指标，例如“偏好”和“阻碍”等等来展开分析，不需要停留在我们赋予这些词的特定涵义上。我们可以超越经济学把它们提高到未定义的、只是受到一些限制的诸“事物”系统的概念上，然后试图发展一种绝对普遍的数理逻辑体系。这一过程对经济学家来说应该是十分熟悉的，多年以来，他们使用原始工具来展示经济逻辑的一些特点，就像我们可敬的朋友鲁滨逊那样。帕累托只是在更高的水平和更加广阔的战线上做了同样的工作。但在这样的高度上难以生存，而且更难以取得进展。像已故的 A.A. 扬格那样有能力的批评家们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帕累托只是获得了“枯燥无味的概括”。但是，只有未来才能告诉我们这是否恰当。同时，我们应该承认这种尝试是伟大的。

举一个例子就能表明，这样“急于求成”（寻求普遍性）不仅产生了逻辑上的困难，而且也产生了经济学上的好处，虽然它仍然在相对较低的概括水平上发展，这种好处从《政治经济学讲义》出版时起就存在。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著作是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

---

① E. 马赫（Ernst Mach，1838—1916） 奥地利物理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在力学、声学和光学上有一定成就，“马赫数”是其研究成果之一。主要著作：在哲学方面有《感觉的分析》、《认识和谬误》，在物理学方面有《力学发展史》、《热学》、《光学》等。——编辑注

的分析，毫无疑问，其目的在于表明这一过程将产生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完全没有勾画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学的轮廓。而对后一问题，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和新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则只能被称为完全失败的论述。现在大家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为社会主义学说提供的服务已经由 E.巴罗内提供了。现代作者只是在次要的细节方面超过巴罗内关于这一主题的著名论文——《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者》。但是巴罗内理论的基本思想已清楚地体现在帕累托的《政治经济学讲义》第二卷（第 94 页）和《政治经济学手册》（第 362 页）中。就是说，这一思想好像把经济过程的逻辑核心抬高到便于观察的制度外衣基础之上。读者将发现，作为特例，一旦我们站在帕氏关于偏好和阻碍的一般理论的立场上，这种思想就很容易闪现出来，虽然它也在维塞尔脑海中出现过。

在这一特例中，帕累托几乎丧失了对优先权的要求权——至少在英美经济学家中是这样——虽然他不仅提出了这一问题，而且也指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其他情况下他完全丧失了要求权，因为他把自己局限于仅提出建议的范围内。因此借助于事后分析，我们可以在《政治经济学手册》中看出关于动态经济学的许多线索。但是，所有的线索，例如他所指出的和追踪曲线相似的适应形式（狗与主人问题，参阅该书第 289 页）以及连续振动的存在（参阅该书第 528 页）等，都没有起任何作用。它们只是消极地表明：经济制度向独特和稳定的“取值”（即一组能满足其条件的值）靠拢的趋势，比包括瓦尔拉在内的那一时期的经济学家们所料想的更为令人可疑。①他没有积极地利用这些建议，②也没有指

① 参阅他在《数学科学百科全书》的一篇文章中关于不稳定均衡的讨论。

② 关于危机的空洞的理论（《政治经济学讲义》第 528～538 页）肯定不够条件作为特例。

出研究这些问题的方法。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把帕累托的著作说成是静态理论；如果我们补充说，他比别人更理解静态理论的局限性以及这些问题的要求，那么对于他就相当公正了。[1]

现在我们开始简要讨论帕累托在价值与生产领域里的理论。我们要记住，从上述观点出发，这些理论已真正融合成了一个理论。

大多数的现代理论家（虽然不是全部）将会同意，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的效用与边际效用理论的历史重要性在于：这种理论好像一部梯子，帮助这些经济学家达到了一般均衡概念的高度，虽然瓦尔拉比奥地利人或杰文斯更清楚地理解并充分地发展了这一概念。[2] 换句话说，效用和边际效用理论是通向重要事物的几种可能途径之一，它除了提供优良的方法，用易于理

---

① 帕累托本人把纯粹经济学的主题分为经济静学、研究连续均衡的经济动学——对我来说似乎是指比较静学——以及另一种经济动学。后者研究经济现象的运动，而且似乎是把真正的经济动学与发展的问题结合起来了。这种结合方式在这两方面都十分不完善，将会是极不方便的。我知道门生们对这一情况的看法是不同的，虽然后者的态度有一定的道理，但这里不能采用。

② 像凯恩斯阁下在他关于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传记文章中指出的那样，马歇尔也完全“占有”了这一概念。我们根据凯恩斯的话以及其他的证据，可以相信马歇尔独立地得出这一概念的时间比瓦尔拉要早。但是这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他在《经济学原理》的有关内容（第四版的注释 14 和注释 21）问世之前，关于这一概念并没有发表过什么东西，而且根据承认优先权的一般规则，这些内容只能被认为是这一概念的隐约闪现。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瓦尔拉的优先权是无可争议的，但是奥地利学派特别是维塞尔的优先权也是无可争议的。十分清楚的是，只是由于缺乏数学技巧，特别是由于不能掌握联立方程式的体系，才使得门格尔不能得出和瓦尔拉的体系基本上相似的准确体系。有些历史学家说，库尔诺已经有了一般均衡概念，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关于财富理论之数学原理的研究》第十一章除了承认经济数量的一般相互依存关系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内容。而且不论在这里或其他任何地方，库尔诺都没有为使得这一概念明确和富有成果而提供指导。《关于财富理论之数学原理的研究》里的一切实际工作或者是局部分析，或者就某种程度上说是综合分析。

解的方式来显示经济体系间的各种关系,实际上还使容易被归入各门类的大量经济现象变成了一个统一体系之外,本身并不十分重要。或者换一种说法,效用理论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启发或假说,而不是其他。[①] 但无论是瓦尔拉还是奥地利人都不这么认为。与此相反,对他们来说,效用理论是终极真理,它发现了揭示纯粹经济学一切秘密的钥匙。因此他们特别强调这一点,反过来导致帕累托及其学派不适当地声称放弃这一点。英语世界的作者们,特别是艾伦教授和希克斯教授,也仿效别人,非常慷慨大方地祝贺帕累托找到了在他们看来似乎也是头等重要的新起点。事实上,广泛流传的意见是,这一新起点构成了帕氏的主要贡献。

在《政治经济学讲义》中有迹象表明,起初帕累托对瓦尔拉的价值理论并不十分满意。但是他所作的修改或者是不重要的,或者是非创新的,都仍然保留在这一理论原则本身的范围内。关于那些不重要的修改,我们只要叙述一下以下事实,即他引用了"满足度"一词以代替名词"效用"(用"基本满足度"代替"边际效用"或瓦尔拉的"比率"),其理由是"效用"一词含有太多的可能引起误解的联想,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关于帕氏的那些非创新的修改我举出一例:效用与边际效用是消费单位在一定时间内拥有或消费的全部商品之函数,并以此概念取代瓦尔拉的每一商品的总效用和边际效用是该商品数量之函数的概念。这一明显的改进是埃奇沃思作出的,但是我承认我有些怀疑埃奇沃思是否完全了解这一改进所造成的理论上的困难,因为它

---

① 然而我要说清楚的是,第一,我认为它的启发价值仍然没有枯竭;第二,正文的叙述中必须加上附带条件:"假如与建立静态均衡的确定性和稳定性的目的有关的话……"它可能还有别的用途,很难相信,为了这些用途,它不会再随时出现。

把只是杰文斯、瓦尔拉还有马歇尔的常微分系数的最后一级效用变成了偏微分系数的最后一级效用，这样就极大地增加了我们所遇到的数学困难，即使我们只是试图证明最简单形式经济体系的确定性。[①]

然而不久——但肯定是在1900年以前，即帕累托在巴黎的讲课中使他的立场改变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情的那一年之前——他认识到至少为了他的目的，必须放弃可度量效用（基本效用）的概念，[②] 或者无论如何它也必须被放弃，其理由在欧文·费雪的《价值与价格理论之数学的研究》（1892年）一书第二部分中已经首次加以精确论述了。为了挽回局面，他求助于由埃奇沃思首先采用的无差异曲线与偏好曲线。但是埃奇沃思仍然从可度量的总效用出发来推导出这些曲线的定义，帕累托却将这一过程颠倒过来。他从这些作为给定条件的无差异曲线出发，证明由此能够确定纯粹竞争中的经济均衡，并且得到与可能

① 更确切地说，当我们试图证明有且只有一组数值能够满足一般均衡的方程式时，据我看来，一切事情都会很顺利，只要我们坚持这样的假定：每一商品的边际效用只取决于该商品的数量，而且在流通中我们只使用"硬币"。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为了证实确定性而必须有的限制，对我来说从经济上来看是可以接受的。正是那些偏微分系数的闯入产生了真正的困难。

② 古斯塔夫·卡塞尔于1899年得出同一结论。他甚至比帕累托走得更远，声称根本不需要任何效用概念。在这里不可能解释为什么这一主张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从他简单地假定的市场需求曲线出发的方法是不能接受的。但是为了评价经济思想史上的这一插曲，我们必须记住，在那时，不仅效用理论本身遇到了阻力，而且根据效用理论而来的一切成本和分配理论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特别是在德国和意大利，但在其他地方也一样。这种阻力有时是由反对运用不可度量的与不能证实的心理量度而引起的。因此，帕累托和其他一些人反对边际效用理论的意见就和一些作者所再三重复强调的普遍论点汇合在一起（或者至少为后者增添了新的活力），但帕累托本人不愿意将自己和他们联系在一起。

存在的效用等同的某些函数。无论如何,由此可得到(序数)效用指数或者帕累托所称的指数函数(《政治经济学手册》第540页,注释1)。

我想十分清楚地说明两点。第一点是,虽然帕累托可能已改变埃奇沃思的发明为己所用,但他也赋予无差异曲线簇一种新的意义,这一意义是埃奇沃思的《数学心理学》一书中所没有的。这种无差异曲线簇已完全失去了任何效用涵义,而效用概念为经济均衡理论所做的一切,现在则由关于这些无差异曲线形式的一些假设来做了。新的思想是用有关可观察到的行为的假设来取代效用假设,因而将经济理论置于帕氏觉得更为牢固的基础上。当然,可能有人强调说,尽管人们有过几次尝试,可是仍然没有人成功地实现这些观察,因此人们很难沉迷于这样的一种希望: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根据客观资料作出这些曲线,以便推导出一张完全由经验得出的无差异图。因此让我们把这些曲线叫作潜在经验的、或者错用康德的术语"属于可能经验的"曲线。无论如何,把这些曲线应用到对埃奇沃思来说是完全陌生的目的上,可算是一项真正的新成就了,但是帕累托自己也承认,这一成就在费雪的上述著作中已有预兆,所以不能算是新成就。

第二点是,帕累托自己的论证显示出他经历过的、将自己完全从旧效用理论中解脱出来的困难。他总是在注意着可能涉及效用甚至基本效用的那些情况,这些情况的存在——从而可积分性的问题——继续使他产生极大的兴趣。他的指数函数毕竟和旧概念有极其相似之处。实际上,正如艾伦和希克斯所指出的那样,帕累托从来没有十分成功地使自己完全摆脱旧的概念,他仍然继续使用埃奇沃思关于竞争和互补性的定义一类的概念,这些概念和他的基本概念并不协调。让我们再补充一下,这一基本概念早在1902年就由P.博宁塞尼加以发展和捍

上了。[1] 到1908年,巴罗内在前面已提及的那篇论文里无疑已超越了帕累托的理论。巴罗内在价值理论方面把他的基本假设局限于以下他所谓的**事实**:每个人根据他所面对的产品和生产性劳务的既定价格,把他由出售劳务而获得的收入按照某种特定的方式在消费品支出和储蓄之间分配。"关于这种方式,我们将不去分析它的动机。"正如巴罗内所指出的,这就剔除了效用或无差异函数的任何概念。关于这一学说的其他事情大家都非常熟悉,无需赘述。我将只提及以下著作:约翰逊和斯卢茨基的论文,它们实际上还没有为大家所注意;鲍利在他的《经济学的数学基础》里具有更大影响的重要的重新阐述以及艾伦与希克斯、乔治斯库-罗根、萨缪尔森和H.沃尔德等人的著作。如果我们承认现在的情况是"暂时最后的"情况,我们的确必须把费雪或帕累托当作现代价值理论的守护神而向他们致敬。

但是比现代价值理论的守护神更为确切的称谓是,帕累托是"新福利经济学"的守护神。他完全是——或者可能是——出于同情心而再一次为这一事业效劳,这一故事也是很幽默的。从经济学产生时起,定义不大明确的公共福利一词在经济学著作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人们熟悉的功利主义口号对这一概念的理论解释作了贡献,而效用价值理论似乎能很好地用于补充这一概念:事实上它很快就被用到征税等工作上。费雪、帕累托关于无差异曲线簇的理论,实际上摧毁了以基本效用甚至人际间效用(满足)比较为基础的那些理论的基础,因此我们乍一想来,它似乎应当抛弃这一切。但是帕累托没有作出这一结论——尽管他蔑视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人道主义——他立刻重新去研究**集体**满足的极大值问题。最后的系统阐述由巴罗内去完

[1] 《纯粹经济学的基础》,载《经济学家杂志》1902年2月号。

成[①],但主要的观念仍然是帕累托的。

首先,帕累托观察到,任何已知的经济模式的一切变化可以说成是用来在其完全客观意义上的增进福利或集体满足,假如按照"硬币"(标准财货)计算获利的那些人能够补偿按照"硬币"计算受到损失的那些人并有剩余的话。这一原则实际上会解救一些但不是全部经济学家通常忽略的关于福利的看法。[②] 第二,帕累托指出,用这种方式不能解救的关于福利的意见,必须明确地是以超经济的、例如"伦理学"的考虑为依据。第三,他表明,为了证实集体主义国家能够增进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实际上可以达到的福利水平,可以使用这一原则。[③] 但是除了有一些发展以外,这些观点大多是新福利经济学的观点。

帕累托的福利经济学中研究生产逻辑的那一部分为向他对纯粹理论的第二大贡献——生产理论过渡提供了便利。[④] 他从

---

① 参阅《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者》第276页。

② 按严格的逻辑意义来说,这种原则和补偿是否实际进行没有关系。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只是把这种改变分成两部分:符合这种原则的、改善集体满足度的那种改变和不符合这种原则的、从损失者到获利者的转移。即使如此,我不愿意以福利意见拥护者的身份出现,说这种原则不会因为人们反对使用基本效用或反对使用人际间满足度情况的比较而无效。还有其他的与更重要的反对意见,特别是这样的反对意见:这些"客观的"福利意见除了当前的影响外,忽视了一切其他的影响。

③ 《政治经济学手册》第363页的最后一句话在我看来似乎表明:他大体上预见到了霍特林教授1938年在《计量经济学》第六卷里发表的《一般福利与赋税问题及铁路、公共事业费用问题的关系》一文中的论据。将下面这一原则实际运用于铁路是个老问题:即使在成本递减的产业中,收取能够补偿边际成本的价格并用其他一些方式支付固定成本(如帕累托所说),可以使福利达到最大。据我所知,这应归功于劳恩哈特,他根据这一原则推论说,铁路投资"永远"不应当交给私营工业(参阅《政治经济学的数学基础》1885年版第294页,以及更早的著作)。

④ 参阅《政治经济学手册》第三章第74~82段、第100~105段、第五章以及附录第77~107段。

选择理论方面来研究这一问题，并将无差异曲线与导数概念的一般工具(最大利润曲线、完全变换曲线和不完全变换曲线等等)运用到生产者中，描绘出了一个完整结构，其中只有一部分曾明确地出现在当时的文献中。[①] 这一完整结构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生产的数学理论的基础，无论如何也是静态理论的基础。特别是这一结构的真正概括性给一切特殊情况留下了余地，我们在处理时不需要额外强调其中任何一种例外情况：这些"阻碍"起先可能是任何事情，然后又能够采取实际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任何一种形式——不管产量多少，需要量总是固定不变的因素；由工艺决定其单位产量耗用量的因素；"补偿的"因素等等。所有此类因素都在理论上完整的可能性图表中占有位置。在评价这一成就时，我们必须记住，帕累托主要关心概括和改善他的伟大前任的工作。此外，帕氏的著作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政治经济学讲义》为顶点，第二部分以《政治经济学手册》为顶点，虽然在《数学科学百科全书》里的论文也补充了一些次要的论点。

瓦尔拉已为他的基于固定生产系数——每单位产出量的固定(平均)投入量——这一假定的生产理论作出了辩解，这并不是因为他相信这是惟一的甚至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而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所采用的简化法是正确的。[②] 他对于涌向他的各种私人批评的回答是："所有愿意跟随我的经济学家都可以随意地把他们所乐意提出的复杂情况一个接一个地加进来。我想我和他

---

① 但是如果我们去掉"明确地"这个词，那么帕累托的图表应该归功于与他同时代的人，特别是应归功于马歇尔，甚至他的前辈们。

② 奇怪的是，这位最伟大的理论家也会持有这种观点。因为：第一，这一简化产生了分析上的困难，这可能使我们怀疑这种简化到底是不是简化；第二，它产生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这道鸿沟如此之大，以致使人们怀疑用它所得到的结果是否有任何用处。

们将会完成我们有责任去做的一切事情。"到此为止,我们不能说帕累托除采纳了瓦尔拉的建议外还多做了什么。此外,当《政治经济学讲义》问世时,瓦尔拉根据1894年从巴罗内那里得到的提示,已经采用可变系数,① 虽然没有更改论述生产的基本部分的论点。同年(1894年),威克斯蒂德的《分配定律的同位论》出版了。最后,生产的可变系数在任何情况下都已不再是新奇的事物了,杰文斯、门格尔与马歇尔对此都已作了论述。帕累托的《政治经济学讲义》只是增添了极好的系统阐述和不能把补偿系数看作是惟一的或基本的问题的若干理由——并不是所有的理由都令人信服。

当然,无论我们是否把"边际生产力理论"这一词语局限于这种情况,这都只是名词术语的偏好问题。② 帕累托曾经把它限定在这种情况上,但在《政治经济学讲义》发表以后的若干年里,他对此的敌意不断增加,宣布其为绝对"错误"。他显然觉得,他已经驳倒或者无论如何已不再需要边际生产力理论,就像他觉得他已经驳倒或已不再需要边际效用理论一样。他的杰出

---

① 这是在1896年出版的《札记》中作出的。此文重印于《纯粹经济学要义》一书第三版。在第四版的第36讲中,一个羽翼丰满的边际生产力理论以由于各种理由而容易受到批评的形式出现了,其后经过修订,在他去世之后,于1926年发表于最终版。关于这一点以及关于帕累托晚年理论的有益说明,参阅舒尔茨:《边际生产力和一般价格形成过程》,载《政治经济学杂志》1929年10月号。

② 这样做的主要理由是,这是教科书的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只考虑这样的一些生产函数,在这些函数中,产品数量只取决于"替代的因素",并有如下定理:在纯粹竞争的完全均衡情况下,每一单位生产要素所获得的补偿等于物质边际生产力乘以产品的价格。但是,如果我们承认存在可能产生和这一定理不相符的结论的"限制性因素",或者更一般地说,承认有对生产函数的各种限制,那么我们就没有离开边际生产力论的范围。参阅A.史密塞斯:《生产函数与效用函数的界限》,载《经济学方面的探索,为祝贺F.W.陶雪格教授而作的论文集》1936年版。

的成本理论——这一理论把极好的理论从它们所处的危险境地中拉了出来，这些理论认为，在纯粹竞争的完全均衡情况下，价格应当等于边际成本，同时总收益应当等于总成本——使我们能够检验这一主张。① 只要生产的合并依赖于经济的考虑——而且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要说明经济的考虑——他的理论与纯粹的边际生产力理论相比较，差别是不大的。但是帕累托教会我们如何处理工艺的和社会的限制所造成的一些偏差，并且和在其他各处一样，他还在这里做了一些别的事情：他永远想取得更大的成就。

三、社 会 学 家

经济学家习惯于涉足社会学领域，这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他们工作的一大部分——实际上他们所论述的规章制度和形成经济行为的力量的全部内容——显然与社会学家的研究领域重叠。由此开发出了一块无人过问或人人都过问的领域，我们可以方便地称之为经济社会学。实际上在每种经济学著作或教科书里，都可以找到来自这一领域的或多或少的重要成分。但除此之外，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那些给经济学下过相当严格的定义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做了社会学的工作。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维塞尔的《权力的法则》都是非常显著的例子。

在伟大的经济学家的名单中很少有人像帕累托那样，把他的

---

① 我们利用这一机会来谈谈帕累托的地租概念。这一概念产生于这样两个条件——总成本 = 总收益；价格 = 边际成本——不相容的情况下，而且特别是产生于储蓄转化为某种资本货物过程中遇到困难的情况下。这一地租理论在今天已经复活了。它可能帮助我们走向一种改进的摩擦理论，但它很难再产生其他的作用。

大部分精力用在那种初看起来似乎是"课外活动"的工作上，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由于在这一领域内所做的工作而享有国际声誉。但是描述他的成就的特点并加以评论是不容易的。一些人对他的热烈称赞和另一些人的敌视态度都是可以理解的，对此我们不必十分认真，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两方面意见的非科学的来源都是非常明显的。虽然为了绘出一幅令人满意的"图画"，有必要考虑帕氏的一些不重要的著作和大量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但我们并不需要超出《社会主义体系》、《政治经济学手册》(特别是其中的第二章和第七章)与《普通社会学》三本书的范围。

让我们从帕累托社会学十分明显的和不难叙述其特点的两个方面开始。第一，虽然帕累托这位经济学家在漫长的一生中接触到大量的非常具体和实际的问题，但他的纯粹科学贡献却是在最抽象的经济逻辑领域里作出的。因此完全可以理解，他一定已怀有一种愿望——实际上是需要——在他的纯粹理论旁边建造另一座建筑物，以容纳不同种类的事实和论证，这些事实和论证能够有助于回答这样的问题：由他的经济理论来处理的因素如何能在实际生活中实现？第二，我们看到，在他的早年，至少是在意大利生活的时候，帕累托已经对辩论经济政策和一般政策问题产生了强烈兴趣。作为天生的思想家，他一定被理性论证的软弱无力所触动，而且一定会产生这样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东西决定着政治行动以及国家和文明的命运？此外，完全可以理解的是，一旦他专心致志于思想生活，这一问题就会从一些容易和肤浅的答案中摆脱出来。所有埋头于日常工作的人都很容易给出这类答案，帕累托则试图把这一问题提高到科学分析水平上来。换句话说，从根本上说，他的社会学是有关政治进程的社会学。当然，考虑到那一政治进程后来成为特例，人们所做的、所想的或感觉到的每件事情、他们的文化创造以及对文化

创造的态度就都是必然的了。但是，正是这个特例使帕累托着了迷，他为此建造和装饰了一个更大的结构。

其次，仍然在相对容易考察的范围内，我们将考虑他的方法。他再三强调，自己只是将曾用于经济理论方面的"逻辑—实验的"方法用于分析"实验上"可以检验的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这一现实使得他能够在这里像在别处一样遵循着自然科学的范例。当然这完全是一种幻想。例如，人们很容易看到，他大量地和不完全恰当地使用心理学的解释，这与自然科学毫无相同之处；而且他的资料原来是观察的产物而不是实验的结果——就方法而言两者根本不同。我看当他试图阐述他的程序规则时，他真正所要强调的只是哲学家的不偏不倚——不把自己置于任何党派利害关系或信仰中去。这种可能的不偏不倚态度当然会引起一种众所周知的基本困难，而且帕累托不可能去克服这种困难，因为他没有看到它。实际上他使用了两种不同的分析图式：一种可以叫做社会形态学，它确实引用了许多事实，这些事实至少潜在地经得起观察的检验，类似解剖学和生物学中的事实一样；而另一种则属于社会心理学。两种图式都可用历史的和当代的事例加以**说明**，或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证实**，但是这两种图式都不是用"逻辑—实验的"方法从这些事例中**推导**出来的。两者都是社会进程的高度个人想象的反映，这种想象多归因于帕累托的出身背景、实际经验——还有愤怒情绪。形态学图式与达尔文的物竞天择学说相类似，社会心理学图式与塔尔德[①]、涂尔干、累维—布律尔和雷布托的部分理论相类似，这

---

① 塔尔德(Gabriel Tarde，1843—1904) 法国社会学家和法学家，心理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对早期社会心理学作出过重要贡献，并借助模仿的方法为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的理论提供了基础。主要著作有《比较犯罪论》、《模仿规律》、《社会规律》等。——编辑注

些都是很明显的。两种图式同本文第一部分中提到的思潮的关系更是如此。上述思潮对议会民主的所作所为提出了贬义的批评——这种思潮是反理智主义的、反功利主义的、反平等主义的，而且按照这些术语所确定的特定涵义，是反自由主义的。[①]但是帕累托凭自己的力量从这些材料中创造出一些仍然为他自己所特有的东西。[②]

形态学图式的中心主张是，一切社会都包含大量成分不同的成员——个人或家族——而且是按照这些成员的才能所起的相应社会作用而组成的。在小偷社会中，假定的变化无穷的偷窃才能将决定社会等级，从而影响到这个社会的政府。帕累托似乎认为，这些能力可以增进或衰退，但本质上是天生的，虽然帕累托很少尽力去证实这一点。然而，虽然这些能力持续地分布在全部人口中，但它导致阶级的形成，"较高的"阶层拥有和使用能巩固自己地位、并把自己从较低阶层中分离出来的手段。因此，在最低阶层中有一种集聚被阻止上升的优秀才能的趋势；而在最高阶层里，在贵族们或精英中，能力由于不使用而产生减退的趋势。结果造成紧张局势，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被另一批占据统治地位的少数人最终取代，而后者则是从下层社会的优秀分子中涌现出来的。然而，这种精英循环并不影响统治者总

---

① 这一附带条件是非常必要的。"自由主义的"一词还有其他各种涵义，其中一种涵义比其他任何词语更能说明帕累托的立场。同样地，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他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但这不是他运用于"智力与薄弱意志方面堕落的个人"身上的那个涵义(《政治经济学手册》第130页)。

② 非常有教益的是，我们观察到，不同的人不但从相同的事实出发，而且从同样的直觉出发，却得出极不相同的结论。格雷厄姆·沃拉斯是一位正统的英国激进主义者和费边主义者，但他在《政治中的人性》一书中所描绘的画面一点也不比帕累托的画面更讨好政治民主的口号。

是少数人的原则，也不能使任何特定社会更接近于平等的理想，虽然在斗争过程中也产生过平等主义的哲学或口号。帕累托使用的措词使人想起了《共产党宣言》中的第一句话，他宣称人类历史基本上是上层阶级接替上层阶级的历史(《政治经济学手册》，第425页)。但他这一部分论断的表述非常简略，而给他的读者留下太多的篡改的机会，因此我竟然不敢相信，我是否正确地论述了他的思想。然而我不得不作这种尝试，因为某些这样的论证是必要的，以便正确理解他的社会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图式的中心是非逻辑的(并不一定是不合逻辑的)行动的概念。这一概念承认众所周知的事实——特别是经济学家所周知的事实——我们日常的大量行动并不是对合理完成的观察进行合理推理的结果，而只是习惯、冲动、责任心、模仿等等所导致的结果，虽然其中许多行动可以被观察者或行动者令人满意地合理化。到此为止，帕累托的心理社会学中还没有什么东西是人们所不熟悉的。然而人们所不熟悉的是他特别强调的许多另外的事实，即：大量的行动——我们还得马上加上信仰——被行动者和观察者合理化了，但经不起科学分析；而且更重要的是，有些行动和信仰根本不可能用任何方法加以合理化。如果我们再深入一步，那么上面所说的第二点对于政治进程社会学的重要性就很明显了：帕累托认为，形成这一进程的一切行动和信仰大多数属于最后提到的这一类型。现在以社会契约观念作为我们大家都同意的例子，或者以卢梭的共同意志理论作为我们大多数人同意的例子。按照帕氏的说法，只有实际上在选民集体意志中占主导地位的行动、原则、信仰等等，才属于这一范畴。而《普通社会学》的大部分篇幅都用于阐明此点，其内容常常是很有趣的，有时是有启发性的。

特别强调说明这一点，比帕氏强调得更多，这正符合我们的

宗旨。形成社会的——特别是政治进程的——意识表层的大量思想和概念结构没有任何经验上的正确性。与它们相关的概念如自由、民主、平等等都是想象中的事物，就像《伊利亚特》史诗中分别帮助和反对希腊人和特洛伊人的众男神和众女神是想象中的事物一样；而且它们被通常违反逻辑规则的推理联系在一起。换言之，从逻辑学的观点来看，它们纯属无稽之谈。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与边沁的政治哲学完全相反的政治哲学。

然而必须看到，这种关于政治神话的判断并没有导致帕氏忽视这种逻辑上的无稽之谈在国家生活中可能起的作用。在完成了本质上严格的实证主义分析后，他却拒绝作出对实证主义者而言似乎是明显的结论。当政治信仰和社会宗教——对帕氏来说两者间区别甚少——促成正在解体的文明的瓦解时，它们也在充满活力的文明中对其有效组织与活动作出贡献。这是一位实证主义者所持的奇怪态度，它或许在将来某一时间被当作一个时代意识的范例来引用，这种意识破坏了一种类型的形而上学信念而引进了另一类型的形而上学信念。这使我想起了我所听到的某些心理分析专家对某些病人的忠告，即为了获得可能的医疗效果，要他们培养对神的某种虚假的信仰。当然，认为社会的和政治的信条没有经验上的意义，和承认其中有些可能有利于社会团结和效率，这两者之间并没有矛盾。但社会哲学家要是因此而劝告人们采取后一种态度，将会像我们的心理分析专家一样陷入困境：只要他的分析被接受，他的忠告必然无效，因为任何虚构的神都不能帮助人；只要他的忠告被采纳，他的分析就必须被抛弃。

帕累托把我们想象力的一组创造物称作衍生物。前面的论证充分说明，它们在历史进程的形成中并非是不重要的因素。然而帕氏的意见是，这种重要性相对来说很小，而实质上这些衍

生物只是表明一些更基本的东西，这些东西更接近于决定实际政治行为与全部非逻辑活动的因素。现在如果我们从集团利益的角度来给这种更基本的东西下定义，又假如我们接下去用社会生产组织内各集团的社会地位来给这种集团利益下定义，那么至少可以说，我们应该非常接近于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而且在这一点上有一种很强的亲和力。我认为这是必须强调的。事实上，如果我们采取这样的推理方式，那么，在马克思与帕累托的政治社会学之间只存在两大分歧。

一方面，帕累托所明确引用的一个要素只是含蓄地表现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即：解释一段实际的历史进程的重要性，解释一个给定社会表现出的或多或少的社会灵活性的重要性。或者换句话说，解释存在着最佳的或绝顶的变动性及其阻力的重要性，这种阻力将更好地保证可以被称为政治变动的稳定性的东西。

另一方面，在帕累托看来，历史进程不是社会各阶级全面冲突的结果，而是统治集团冲突的结果。为了认识这一点，我们只要回想一下上面对帕氏社会形态学的概述就行了。

一般认为，尽管这两个分歧点是帕氏社会学值得称赞的地方，它们只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图式的订正罢了。我可以补充这样的事实：财产关系本身在帕氏的分析中远不如在马克思的分析中那么显著，而且这一点也构成了帕氏分析法的优越性。但是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一点实际上也包含在前面两点之中。

然而，实际上帕累托并没有将这种分析方法继续下去。在他看来，一组幻想（他称之为衍生物）与实际行为的客观决定因素之间的联系是由被他称为剩余物的东西提供的。为简明起见，我把这些剩余物定义为以不甚引人注目的方式恢复旧的“本能”心理学的那些人常有的冲动，我觉得我可能有态度不公正的

危险。我们不需要讨论帕氏所拟订的清单——它包含一些条目，如结合的本能、性冲动等等——特别是因为帕氏本人对它似乎也不太满意。我们只要指出对于任何这类程序明显的方法论上的反对意见就足够了。即使对帕氏的剩余物和它们的联系及持久性之规律进行更为令人满意的分析，它们仍然只是标签符号，而不是问题的答案，而且要求进行专门研究。帕累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完全可以理解，帕氏的研究工作对专业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影响很小，而专业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对他的整个结构极少有伟大的感觉。①

但是这些缺点和其他的缺点都不是决定性的。他的工作不仅是一个研究纲领，也不仅仅是分析。个人、集团和国家实际上所做的一切，必须在比用来表现行动的信条和口号更深层的东西中找到解释。这一基本原理为现代人——尤其是我们经济学家——上了最有益的一课。我们在讨论政策问题时习惯于按表面价值接受我们这个时代乃至过去时代的口号。我们精确地论证，似乎 18 世纪边沁功利主义者的信条曾经是正确的。我们拒绝认识到政策就是政治，并且不承认政治的本质。我们培育了低下的东西，并尽力去压制一切有力量、有生气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论帕氏的见解如何片面，它仍然是一种有益的解毒剂。这不像他的经济学，不是一流的技术成就。它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是一种布道的尝试。

---

① 塔尔科特·帕森教授对帕累托社会学的分析在英美社会学文献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欧根·冯·庞巴维克*

（1851—1914）

如今，这位杰出的大师已经离开了我们。在个人关系上和学术上同他交往甚密的人，恐怕没有谁能够描述我们大家那种极为沉痛的感受。没有言辞可以表达他对我们有多么重要，而我们之中几乎没有人能接受以下事实：从今以后，这个地方将有一座难以穿透的屏障横在我们与他之间，横在我们与他的意见、他的勇气、他的批判性指导之间；而前面的道路也只能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去穿过。

我担心自己将会发现：在完成描述他毕生的事业这一任务方面，我能够做到的恐怕远不如我希望做到的。也许，做这项工作的时刻尚未到来。这座思想的大山仍然离我们太近，众说纷纭的争辩的尘雾至今依然十分浓重。因为他不仅具有创造性的头脑，而且是一个斗士——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是我们学科中一股生气勃勃的、卓有成效的力量。他的工作不属于一代人，也不属于一个国家，而属于全人类。只有当我们大家都离

---

* 本文最初以《欧根·冯·庞巴维克一生的重要著作》为题发表于《国民经济、社会福利政策与管理杂志》第23卷（1914年）第454－528页。现由赫伯特·K·查森豪斯博士节译，他曾在波恩师从熊彼特教授，后在哈佛大学任熊彼特的科研助手，现为科尔盖特大学经济学教授。

开这个领域很久之后，经济学家们才会意识到他的才华的真正分量以及他的影响的全部力量。

也许，从某个方面来说，一个真诚地亲身研究他的学说的人，是最不适宜担当这项任务的。如果我在回顾他的毕生事业时难以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或者，如果读者在下面的叙述中发现任何出于真挚热爱的溢美之辞和出于哀悼的追思，我将深感抱歉。作为一个拥有无限思想财富的人，一个由于贡献巨大而得到生活的丰厚回报的人，也作为一个思想家，庞巴维克不需要任何称颂与悼念——他是一个独自挺立的伟人，经得起一切批评。但是对我们来说，采取任何别的态度都是不可能的。

不过，从如此接近的距离作一次粗略的素描也有其长处。其理由是，许多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目前尚无定论，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而这些东西对于将来面对半明半暗的往事的经济史学家来说，可能是不会引起注意的。而我们熟悉这个人，熟悉他工作的具体环境，熟悉他写作的领域，熟悉他所阐述的问题在他的著作中展开的特有方式，以及他所使用的材料。对于这一切，他身边的人是最了解的。一切顶峰都是人迹罕至的，而那个分隔任何一门学科的现在与过去(即使只是刚刚过去)的空间，它的扩展却是相当迅速的，用不了多久，范围更广的学科上的同行们就将无法清楚地了解许多细节，而这些细节对于更深刻地理解这位学者是必不可少的。

我要谈的仅限于一位科学家的情况。但是一个人的轮廓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相同的——在他那范围广阔的生活所包容的一切领域中，他那有力的脉搏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我们在所有这些领域里的会聚，都是由于同样一位卓越的人物、同样伟岸的形象——一尊仿佛由一种金属一次浇铸而成的塑像，无论我们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样的。

众所周知，他不仅是他那个时代的科学生活中最卓越的人物之一，而且也是当时凤毛麟角般的卓越政治家的榜样，是一位杰出的财政部长。他的名字同富有成效的立法工作、同奥地利财政管理的最优良传统密不可分地连在一起，同奥地利财政政策的最出色成绩和最令人高兴的时期密不可分地连在一起。他在政治上的成就同他的科研工作具有同样的特征。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在最困难的境况下选择了最困难的任务，不考虑是否能获得赞扬或取得成功。作为一个公务员，他始终面对最艰难的、吃力不讨好的政治任务，即捍卫明智而稳妥的财政原则——这一任务在任何地方都是艰难的、吃力不讨好的，即使是在明达的舆论能保护一位政治家的地方，即使是在他能得到某个强有力的党派组织支持的地方，即使是在公众的理想是全民性的，因而"这是国家的需要"的口号成为常胜不败的同盟军的地方——无论如何，这在奥地利终究是一项需要超凡能力的任务。通过他在政治上的胜利来理解他及通过他在科学研究上的成功来理解他，都需要很高的才能；都需要创造力和建设性的魄力；都需要清楚地观察实际存在的东西和可能存在的东西；都需要坚持不懈地付出努力，达到能承担任何工作任务、克服当代的各种障碍的程度，心甘情愿，确信不疑，全力以赴；都需要沉着冷静，使用同样锋利的解剖刀——一个伟大的争论者需要一个受到许多敌手赞扬的厉害的论敌，以便双方进行旗鼓相当的论战，不致有人因畏缩不前而认输。

在政治上，在科研工作中，这个人物的气质都得到了验证：同样的自我克制和深入细致，同样的对本质工作的高标准——这些都令他的部属和学术上的追随者们深深铭记；同样的不带悲观主义者那种冷漠超然的姿态而洞察各种人和事的本领，不感到苦涩艰辛而进行奋斗的能耐，敢于自我否定而毫不示弱的

能力——坚持一项既简单又宏伟的有关国计民生的计划的才能。因此，他的一生是个完满的整体，是对一个人物的完全一致的毫无损伤的自我表达，在任何地方都能依靠其自身的分量来检验它的优势，无需装模作样。它是一件艺术品，它身上的不同线条由于一种无穷的、柔和的、含蓄的、非常有个性的魅力而光彩照人。

二

庞巴维克毕生的科研事业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如同在优秀的戏剧中每段台词都促进着情节的发展一样，庞巴维克著作中的每个句子都是活的有机体中的一个细胞，是根据头脑中已清楚勾画出轮廓的目标写出来的。这里没有徒劳无益的尝试，没有模棱两可，没有左右摇摆，而只有冷静地放弃那些次要的、仅仅是短暂的成功，关于那些在原作者的一生中占有很大比重的仓促写成的片断——对于那些由于外界的刺激而产生的作品，在这里实际上几乎是只字未提——仅在某些地方摘引了一些日报刊用的短文。就连这些为报纸写的短文也颇为独特。它们都是为特定的用途而写的，目的明确；它们决不是文学的或者科学的消遣之作。在此，一个为伟大的任务而奋斗的、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人的优势就展现在了我们眼前。这是一种有着清晰而冷静的头脑的智者的优势，出于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他曾放弃了许多临时性的教学工作。而这一整体性的规划则已完满地实现了。他的毕生事业就摆在我们面前，浑然一体，完美无缺。它的启发性是完全不容置疑的。

他知道，他打算做的工作很少有人问津，正因为如此，这些东西才能被如此毫无拘束地恰当地表达出来。他是一位理论

家，天生就是要观察事物的广泛联系并加以阐释的；就是要在千头万绪中本能地用坚强有力的手抓住各种逻辑必然性；就是要去体验各种分析工作给内心深处带来的欢欣。同时，他又是一位创造者，一位思想设计师，类似给任何人讲授有关科学生活的课程的普通任务，即使是有着千差万别的系列任务，也从来没有使他满足过。的确，他是我们学科曾经拥有的最伟大的批评家。然而他的评论工作——尽管它的辉煌、它的影响范围、它的细致入微都是极为显著的——的作用仅在于清除他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支持他的实际工作；这种评论工作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一项次要任务。

当这位才华横溢的人物开始关注社会经济过程时——这时他大约是 24 岁——他很快就当机立断地选定了自己的起点：卡尔·门格尔。他始终认为自己应当是门格尔的同盟军，而且从未企图去建立一个不同的学派。在研究之初，他遵循门格尔创立的结构并继续探索这一结构，涉及的是经济学中没有解决的一些最重大的问题，以攀登新的高峰——在这个领域，他终于将自己的新思想同门格尔的学说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紧凑的结构，形成了有关经济过程的综合理论。为了精心完成、详尽阐明这一结构，他付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为这一结构，他奉献了自己全部的卓越的才华和伟大的活力。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使他成为整个时代中五位或六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

他给了我们一个兼收并蓄、包容一切的经济理论——用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的尺度对经济生活进行卓越分析的理论——以门格尔的理论为基础孕育构想，再由对一个他认为一直未得到解决的问题的看法展开。这就是关于利息、关于利润的问题，是经济学最困难、最重要的问题。对如此常见的现象进行解释是一项错综复杂的工作，尽管这一点很不容易让更广泛

的读者明白。不过，它的困难已经由这样一个事实证明了：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人们并未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它的重要性源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性质与涵义的几乎全部的认识，以及我们对此的总的态度，都取决于我们对利息和利润的涵义与作用的看法。在庞巴维克之前，只有马克思充分理解这一点。就马克思的学说体系而言，其核心除了关于利息和利润的理论之外，再没有任何东西——其他的一切最终都或多或少由此而来。

那种庞巴维克的命运注定要在其中寻找自我的学术环境，是继个人气质之后，理解庞巴维克的主观成就和这一成就的客观形式的第二个要素。这种环境对于一个视野广阔的科学家，对于一个属于李嘉图式的理智类型的人，最主要地对于一个具有严谨理论家的天生气质的人，并不是有利环境。门格尔的坚毅形象使他从一群对手中鹤立鸡群般地凸现出来。但人们对分析研究工作的目的完全缺乏理解。为了弄清这一点，有的人提醒人们说，经济学是个非常年轻的学科，很难从幼稚的状态一下子成长起来；经济学只经历了一次真正的繁荣，而那并非是在德国；庞巴维克天生具有的进行思考分析的爱好从未在德国得到过坚定的支持，从未在国外停止过流露，因而是不受欢迎的，而且实际上由于力不从心而从未被人真正理解。有一点必须记住：德国的经济学家们关心的是社会改革，关心的完全是实际问题以及行政管理方法问题，而那种纯粹学术性的爱好在他们看来只同经济史有关。对于一个理论家来说，这里是绝无用武之地的。而许多经济学专家缺乏理论上的训练，而且是抱着偏见与轻蔑来看待一位善于分析的人，因此，他们不仅不能评价他所获得的成就，甚至无法明确提出有关某个原理的逻辑连贯性的独立见解，更不用说去理解这个原理的重要性或者去评价作者

在主观上的智力成就了。

只有记住这一切，只有熟悉在进行抽象思维的每一次尝试中都会碰到的所有贴切的用语，人们才可能理解那些有头脑的理论家的处境和许多行为——有些东西对研究精密科学的人来说，常常显得有点奇怪，而对其他人来说却并非如此。这就足以说明为什么新的理论观点能引起那么大的争论；为什么在任何分析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障碍；为什么每当论点有新的变化时，一开始总是需要掌握大量的关于问题最基本方面的素材——否则很难有几个读者能够领会——同时这也说明为什么要不惜代价地对每个细节精雕细刻。在那时——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是现在——每个理论家的工作都是单枪匹马进行的，时时都有被曲解的危险；他必须亲自烧制他的结构中的每一块砖，他从读者那里只能得到含有相当大的危险性的误解，而且这种误解时常发生。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将会使他很快忘掉这一切。也许，一位从事精密科学研究的学者，比如一位数学家，完全不可能想象到：他在向不定积分问题进军之前，必须首先经受读者对有关算术的“元”的曲解。写下这一点，使它从今往后永远铭刻在民众的头脑中，这是与这个时期相距很近、足以理解它的同时代人的任务。这是对经济学中一切伟大的斗士与改革者进行历史评价的一个基本要素，也是理解他们的必要条件。有的人在评价科学阵地上的先驱者时，经常忘记这样的事实：先驱者是打头阵的，而评价者是站在他们肩头上说话的。

庞巴维克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的成就不如他的同事们，他们的成就同他相比，更多地不在于观察事物方法上的优越性，而在于更加显而易见。实际上，他在给出自己所研究的主要问题的答案之前，首先是向学术界指明这一问题的性质是什么——实际上，对许多人来说，这的确是问题；他

曾在长时间的论战中为他的体系的基本原则辩护；他发现自己面对着一群反对派，他们认为对一堆孤立的事实进行抽象的调查研究在方法论上是行不通的。当时，在这方面既没有一批志趣相投的学生，很长时间内在他周围也没有可能吸引一群科学家或者培养一批他个人的追随者。这就使他的研究成果更加引人瞩目。这些成果是他通过所发表的论文中的论点的说服力孤军奋战取得的，没有卖弄辞藻，没有哗众取宠，没有利用新闻媒介造舆论，没有依靠学术界的关系——总之，没有任何这类意义上的东西，它们在特定的场合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情有可原的，但不符合科学事业的最高理想——同时，也没有招致讽刺挖苦或陷入个人争论。

对他来说，作为研究院的领导人从事平静的、富有成效的教学活动的时间只有十余年——1904—1914年，在他三次担任奥地利财政部长之后。1880—1889年在茵斯勃鲁克大学时的学术环境，对于培养一批愿意把理论经济学中一个特殊的领域作为毕生事业的追随者的目标来说，显得太狭窄了。在法律学院，在一群基本上是从事法理学习的大学生中，情况就更特殊了。而在维也纳大学担任名誉教授的那段时间，是他从事实践活动的时期，尽管这些活动并未占据他的全部学术思维，却消耗了他大量的精力。直到1904年之后，他才开始了我们大家永志不忘的那种工作和那一系列夏季学期的研究班课堂讨论。

二

我曾撰文谈庞巴维克的科研目标，并将它作为对社会经济过程的综合形态的分析加以描述。现在，在详述他各方面的成就之前，让我们简短地回顾一下他在完成任务时所使用的方法，

其中，将鲜明而突出地介绍其计划的统一性和实现计划时令人瞩目的一致性。

浮现在他眼前的社会经济过程的全景停留在一些像物理学基本原理一样简单朴素的原理上。它们也像后者一样，可以扩展成几页的文字叙述，如果需要也可以变成一页，但是没有谁为这样的说明做很多工作，因为它们的丰富成果，甚至它们的真正涵义，只是在像灌木丛一样密集的经验世界的琐事中获得的。在庞巴维克那个时代的经济学中缺少一种"共同的主张"，他发现自己面对这样一个局面：他提出的每项假设，使用的每种方法，他在论战中的一系列论点的每个环节，为了建立他的体系结构而清扫前进道路的每一步骤，都必须公布于众。而且，这一体系包含着许多难以弄清的、有争议的思想，特别是那些与他的主要研究对象——利息和利润问题——有关的思想。除了巩固他从门格尔那儿继承的基本原理之外，他为利息理论进行了许多尝试，这么做不仅因为这项工作是为自己赢得读者所必需的，而且因为验证这些尝试——其中的许多成绩得到了承认——的不足之处，乃是建立他自己的实证理论的前提。

即使是最简单的基本概念也颇具难点。对于一个有创造力的科学家来说，各种定义是次要的东西。各种新见解的产生最初总是简单的，它们突然出现，谁也不知道它们何时来临或者如何来临。只有在运用这些见解时才需要给它们下定义，再就是，在描述这些见解时当然需要定义。庞巴维克本人在专心致志地从事后一项工作时，陷入了历时已久的关于有价物品概念的争论。他第一次公开出版的著作《从国民经济商品学的观点看法律与经济的关系》就触及了这个问题。他以特有的小心谨慎和明晰的思路解决这一问题时，勇敢地面对了两项最重要的任务，它们先于他的体系的实际构造。任何经济学体系的基本解释性

原理始终是关于价值的理论。经济理论涉及的事实是以价值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价值不仅是经济宇宙的原动力，也是使这个宇宙中的各种现象具有可比性和可度量性的形式。一个理论家对于经济世界的看法取决于他对价值现象的看法——这方面的牢固基础是最本质的。第二项准备工作是关于利息和利润的理论：需要去掉多余的枝蔓，同时需要向人们指明，这里存在一个没有解决的大问题。

关于这两项工作中的第一项，问题在于要详述门格尔的学说并为其辩护。于是，1886年，他发表了两篇这方面的论文，对价值理论作了精当的说明（《经济财物价值理论纲要》），这一成果必将同我们的学科共存亡。借助于这一工作，他铺设了通往他的实证理论的道路，并在理论经济学的新奠基者中赢得了应有的席位。从那时起，他的名字就同边际效用理论密不可分地连在一起，就连他的反对者们也像他的追随者一样，开始谈论"庞巴维克的价值理论"了。像维塞尔一样，在上述论文中，他实际上已使这一理论成了他的特色理论，因为任何门徒都不能写出这样的理论来。他的有独创性的贡献很多，我只提及两点。他给了价格理论一个特有的奥地利形式——其中的一部分与世界其他地区采用的门格尔学说的形式截然不同。此外，对外界的责难，他采取了独特的解决方法，既不同于门格尔的，也不同于维塞尔的，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谈。

庞巴维克始终是主观价值论的警惕而有权威的保护者，多次进行过关于它的争辩。这一事实也是他毕生事业的一部分，否则，这一理论的基础不会牢固，它的各个细节部分也不会完整。而这只是他的个性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因为他不容许任何的故步自封，因为他不得不借助不断更新的研究来减少任何可能产生的理论上的怀疑。没有哪个有创造性的科学家乐于

反复讨论那些已经稳操胜券的问题。不过,如果我们不掌握有关这一论战成就的资料,我们将显得捉襟见肘,因为它在经济学文献中是无可比拟的,它是名副其实的分析工具的"兵器库"。

当著作问世时,树立作者的名望就成了第二项准备工作。庞巴维克出版了他的杰作——《资本利息理论的历史与批判》第一卷(《资本与利息》第一卷),这是经济学著作中最伟大的批评性论著。它立即受到了重视,不过,最明显的赞扬与钦佩来自他的专业方面的同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无言的敬重之外,越来越多的是无足轻重的好评。对于前者,这本书的深远影响就是证明。这本书是创造性分析的不朽之作,是我们学科前进道路上的里程碑,它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利息理论的批评,每个部分都是理论精华,每个部分都是无与伦比的精雕细刻的艺术品。该书没有描述每一理论产生的社会与历史背景,书中也没有任何哲学上的修饰或者使用笼统的代称进行解释。在中心论题的范围内,思想史也处于次要地位。作者只从多项可以进行的工作中选取了一项:他集中地探讨了一个又一个利息理论,讨论每个事例时只注意其实质内容。他以炉火纯青的极其高明的手法对每一个内容进行重新阐述,坚定地评价它的实质,而且只使用几个简单但具有决定作用的论据。他以最小的代价,尽可能沿着一条最直的路线,并且用一种最精致的形式,迅速解决一个又一个理论问题;接着——在细心地揭示出失败的原因之后——他继续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不多费唇舌,或者更确切说,言简意赅。这不是那种可以从中学习如何更好地紧紧抓住本质的东西、忽略题外的东西的教科书。

再者,每件事都安排得有条不紊、谨慎小心。《资本与利息》第二卷——《资本实证论》(序言日期为 1888 年 11 月,1889 年出版,最早的英译本为 1891 年斯马特的译本)的出版就有这种特

点。正如我们已经谈到的，这是对经济过程的综合分析——尽管从书名看其内容范围较狭窄——是他一生的劳动成果，是他的努力的最富于个人特色的成果。无论将来一代又一代人对他的思维之链中各个单独的环节持什么观点，他们都会赞赏那宏伟的构思，赞赏整部著作表现出来的锐气。以下评价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是毫无疑问的：这是攀登经济学所容许的最伟大的高峰的尝试，而且其成就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前面的高峰已经屈指可数了。这时常迫使我们将庞巴维克同马克思相比。

这看起来也许有点奇怪，但之所以如此，仅仅是因为马克思的名字总是被高涨的政治热情所包围，因为他的理论体系由于一种非常与众不同的气质而显得生气勃勃。他的名字离不开社会运动和它的各种用语，这些用语使他的名字显赫起来，并在十分广泛的群众中变得意味深长，然而这些用语也淡化了他实际的科学成就。这一切是庞巴维克所缺少的。他只想成为一个科学家。他的花园里没有一片叶子能被政治风暴摇动。他的著作中没有任何词语有损于他的科学思想的流动。再者，他避开社会学的背景，因为，就我们学科的状况而言，它很可能使许多对此有兴趣的人安于那种艰辛的脑力劳动。他的著作提供的不是一个可以向公众演讲的通俗论坛，不是一件装饰品，而是线条和内部结构完美无缺的古典形式——它是抛弃了问题表面任何可能把人引入歧途的东西之后所获得的成果，而对这一问题，他的目光是最早触及并始终坚定不移地注视着的。

不论马克思和庞巴维克之间有多少差别——他们的生平、他们的信念以及由此而来的他们的著作的许多方面——作为理论家，他们之间的相似是不容置疑的。首先，他们两人作为科学家，有着相同的研究对象。其次，他们在时机和学科状况上也颇为相似。例如：对利息和利润问题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的相似

信念，促使他们明确地将这一问题作为分析社会经济过程的方向。他们都借用其他学说的基本思想作为分析的内容——庞巴维克借用门格尔，而马克思借用李嘉图。他们在研究中运用了类似的方法，并且是在类似的过程中开展工作的。而且，他们都创建了一座大厦，其宏伟通过这样的观察可以清楚表明：任何批评，无论它们是如何有效地反对其具体的研究对象，都无法从整体上贬低其重要性。

不过，该书的关键部分给学术界留下的第一印象并不深，《资本实证论》渐渐地在经济思想的园地里扎下根来。这部分是由于问题的性质。像庞巴维克的《实证论》[①]这样一个强大的有机体，对它的内部结构只有经过较长时间的研究才能充分理解；它对非理论家来说，无异于对牛弹琴，对行家里手，则促使其深入到一个全新的思想领域，尤其是在 1889 年。由于这个原因，它最初一直不为人所理解。时至今日，很多崇拜者仍然把它放在次于其著作的其他部分的位置上，尤其是次于《历史与批判》[②]；而许多同行的评价抓住的也是比较次要的细节。无论如何，尽管此书的伟大之处至今仍然未被充分认识，它已经成了一部权威著作，是任何打算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士的必读之书。它是每位理论工作者的工具箱，而且，它是我们时代有独创性贡献的著作中最成功的一部。

本书的第二版（1902 年版）未对第一版进行任何修订。然而，1904—1909 年，庞巴维克全力以赴地对全书进行了“从头至尾的修订更新”。经过“五年的艰辛工作”——这一工作是他的体系的未经检验的“未完结”部分（参阅第三版序言），他再次将

① 即《资本实证论》，下同。——译者注

② 即《资本利息理论的历史与批判》，下同。——译者注

此书呈献给广大读者，而对其基本原理则未作变动。然而，这一版乃是一本新书：只有很少几篇完全未作修订，几乎所有各篇都增加了内容，而且有许多重要的增补。再者，几年的自我批评使他想更透彻地讨论许多问题，甚至比在正文中能作的改动还要多。因而，在对两个附录进行增补时，他加上了 12 个“补论”。尽管那些增补是对正文和评论性的注释的有独到见解的补充，但其中许多都可以独立成章。它们使本书成了经济理论的大纲，而且也许可以这样说：他正是以这种方式去完成其毕生的事业的。

不过，有一个终结部分没有补入该书，尽管他曾对此作了长时间的计划。他在他的最后一篇论文《是权力还是经济规律?》中让我们看到了这个部分。他经常遇到这样的口号：经济过程，特别是社会产品的分配，不是根据纯粹的经济价值、而是按照各阶级的社会力量来进行的。它虽然只是一个口号，却得到了广泛支持，而在我们的领域内，我们对各种口号是不能低估的。加之，这里谈到的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对这类问题，庞巴维克只要坚信他自己的体系的稳固性，就会提出他的见解。他这样做了，而且，与此同时，还分析了有关工资理论的重要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这篇文章具有重要意义还因为它包含了许多关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的提示，包含了对数不胜数的各种细节问题的许多提示，这种细节的轮廓到目前为止已经在有关遥远将来的朦胧憧憬中展现出来了。

还有一篇文章也属于这一整体的工作计划之内，除此之外只有很少几种出版物，下面将要提及。这篇文章的涵义在于庞巴维克的学术成就可以同马克思的学术成就媲美。这就是他在《资本论》第三卷问世之后以《马克思体系的终结》为题发表的对

马克思的批评，收录在为纪念卡尔·克尼斯[①]而出版的纪念文集中。马克思有无数的批评者与辩护者——几乎比其他任何一位理论家都要多。如今，庞巴维克的批评者与辩护者也许在数量上与之相当，但其中大多数人都只是因一两点不足之处而感到困惑。他们的任何一种主要兴趣都不在于马克思著作的科学核心，而且他们总是躲到那些与对这一核心的观点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中去——历史问题、政治问题、哲学问题，等等——也许他们并不完全胜任评论这位作者及其著作的工作。这正是庞巴维克的评论显得重要的原因：它抓住了问题的核心，而且只谈核心，字里行间处处体现着一位大师的匠心；从被批评的对象的伟大可以衡量出批评家的伟大。这就是这篇评论在庞巴维克的全部著作中居于突出地位的原因；这就是在同马克思体系的理论内容有关的问题上，这篇文章永远都可以称得上是对马克思的批评的原因。不过，我不能对此作进一步的详述了。

三

如果我们遵循奥斯特瓦尔德[②]的分类法，庞巴维克将被称为典型的"古典作家"。这符合他的写作风格——直截了当，朴实无华，审慎含蓄。作者让他论述的对象说话，而不让他本人的激情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作品在文学形式上的不容置疑的强大

---

① 卡尔·克尼斯(Karl Knies，1821—1898) 德国经济学家，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认为国民经济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经济理论是受时间和空间制约的，因而提倡所谓历史实证的研究法，主张"理论的相对性"，并把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称为"理论的绝对主义"而加以反对。主要著作有《历史方法论的政治经济学》、《货币和信用》。——编辑注

② 奥斯特瓦尔德(Friedrich Wilhem Ostwald，1853—1932) 德国化学家，曾获1909年诺贝尔化学奖。——译者注

的美学感染力正在于此——它突出了基本思想的逻辑表现形式，准确而毫不夸张。而他的风格是很有个人特色的，由于他的句法的规律性，他的每句话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组合之中都可以被识别出来。他的语句——它们就像是一块块切割得十分精美的大理石——往往是较长的，但有条不紊。官方的、行政的语言影响有轻微的流露，在文风和表达方式上甚至还有点司法文书的特点，但这无伤大雅；而且正相反，它表明官方语言在风格上有其自身的特点，只要运用得当，还是颇有效果的。他说明问题的表达方式和"火候"永远是按需要"剪裁"的：在展开论点时周密、冷静、充满活力，在决定性的段落和概述部分语言尖刻。作者不愿使其评论在结构上含混不清，各段落间的界限都被明显地标示出来。没有文字游戏。他在与人交谈时那种富有魅力的愉快神情，在文中只有轻微的点滴流露——以我所知的措辞，大体可以把那种神情称作"风趣"——他在与人交往时，在这方面是相当有特色的。而在最严格的范围内，他所使用的表达方式屡屡收到了修辞上的效果，他善于避免使用某种老生常谈的惯用语，创造出一个令人难忘的字眼儿或者一组词语来。

四

只需几句话就足以说明他的方法论主张的特点。他的工作方法——一种在他得心应手的使用中显示出超凡力量的方法——是根据他所研究的问题的性质以及他个人的意向来确定的。他研究的问题是用来阐明最普遍的规律的，这些规律出现在任何一种经济制度中，无论是什么时代、什么民族。这类无时无处不在的规律是随着经济活动的本质以及决定这种活动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因此，这个问题提出的任务主要是分析性的。

也就是说:这里提出的已经不再是搜集材料的专门任务——经济生活方面有关的基本事实,我们可以从日常熟悉的实践经验中轻而易举地获得,而且它们会在各种场合重复出现,尽管往往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任何情况下,搜集材料的工作在动脑筋消化这些材料并揭示其所包含的意义之前总是要相应减少的。由于我们感兴趣的经验的各组成部分在心理上的孤立性,由于许多不相关的问题的抽象性,这项工作不能完全被取消。的确,最终的理论是抽象的,由于许多假设同直接的现实脱节而显得不连贯,如同任何理论一样;但它像物理学上的理论一样,是唯实的、经验式的。自然,当问题涉及到这一理论的应用或者具体、详细的调查研究时,系统搜集的新的真实材料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鉴于庞巴维克所研究的问题已经勾画出了经济过程内部逻辑的大致轮廓,鉴于他既不关注应用问题也不关心详细的经验式的调查研究,因此,他的方法就是理论分析的方法,就是精确推测的方法。而他个人的意向也在同样的方面表现出来。

他的兴趣在于问题及其答案,而不在于探讨方法。作为一位天生的科学家,在对待每一个实例中的每一组问题时,那种出于方法论上的需要而写的专题论文自然是不合他的口味的。因此,他只是偶尔地写一点儿这方面的东西。他的见解的精华是在主题上,正如他在头两次任职时所表明的那样,在那里他可以充分地论述方法论问题。① 毫无疑问,他"对方法问题写一点儿或者毫不提及,取而代之的是以更多的精力去运用一切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实证论》第三版中,他针对一批法国社会学家——国际社会学研究院的成员们——发表了一番有关方法论

---

① 参阅:(a)《实证论》第一版序言;(b)《谈政治经济学与社会学文学史》。

的告诫(当时正值他被推选为这个研究院的院长)。这番话以“对一个老问题的几点并不新鲜的看法”为题,刊登在《国际社会学杂志》上。他写得冷静而诚恳,语言优美。这篇文章在其他方面也值得注意,尤其是它的很有分量的、极为恰当的警句——如果社会学不能很快找到自己的李嘉图,那它必然会产生自己的傅立叶[①]。最后,还有一段是谈方法论的,题为“价值理论的任务”,它增补在《实证论》第三版上,在文中,他同那些否定一般价值理论可能性的德国理论家展开了争论。

所有这些文字都有一个明确的、防御性的意向,它们不是为写作而写作,同时,庞巴维克并不打算使其成为认识论的调查研究,主要关心结果的人是没有时间进行这种调查研究的。附带说一句,他没有尝试去精心设计这样的表达方式与表现形式——对其他一些学者来说,这是一桩乐事——这可以由他对我们学科的历史的态度得到解释。他是这一领域的先驱者之一,他关心的只是与本学科有关的问题的实质,他能够而且必须把那种“精雕细刻的工作”留给后继者。他是一位建筑设计师,不是内部装潢师;他是一位开拓者,不是沙龙里的科学家。因此,他并不十分关心人们是否能真正说出原因与结果,或者只能说出函数关系。因此,他使用“边际效用系数”这一术语来指微分系数及该系数与数量要素的作用结果。因此,他未能详细透彻地解释效用函数的形式特征,从而使他的边际效用理论缺乏

① 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幻想建立一种以“法伦斯泰尔”为其基层组织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其中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一致的。他已有关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以及城乡对立的思想萌芽,还首次提出妇女解放的程度是人民是否解放的准绳。在教育上,主张对儿童从小实施劳动教育和科学教育。主要著作有《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普遍统一论》、《新的工业世界和协作的世界》等。——编辑注

足够的说服力。也正因如此，在将他的价值理论同洛桑学派的价值理论作比较时，如同将一个古老的条顿人与一个路易十五时代的廷臣作比较一样。对于这些函数的形式的设想，他是通过列表以数字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但所有这一切并非关键所在，将来要作必要的润饰。对他来说，生死攸关的问题乃是那些基本原则，在他个人走过的道路上，他对这些原则的论述、发挥，比他在其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更出色、更有成效。他的价值理论至今仍是我们所掌握的最好的理论，它最恰当地解决了一切根本性问题和所有的基本困难。

在这方面，他对社会学的态度更具特色。当时，由于耕耘这片新开垦的土地的需要，也由于想走一条阻力最小的道路，经济学家们纷纷进入这一领域，而这种科学界的“抽血”现象说明了德国经济学中的许多问题。庞巴维克没有卷入这一潮流，他只想做个经济学家，其他事都无足轻重。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当他评论某些兄弟学科的情况时，担心的是自己学科的进展。那些学科按其方法与内容既够不上被称为经济学，从而也必然够不上被列入自然科学——因为它们抽掉了经济学中的人力，采用了充斥于所有这些学科的新闻记者式的文风，却缺少科班出身的训练有素的骨干。他过于认真了，以至理解不了在上述情况的刺激下能获得的充分补偿，因为这些刺激能影响的同样也只是经济学领域。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对于他那个时代的形形色色的社会学学派来说，他始终是个局外人。他清醒地意识到，任何一个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取得真正成就的人都必须将自己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并且由于是专家，还要忍受公众的指责，而不能意志薄弱地、神经质地由一个研究主题轻易地跳到另一个主题上去。

写到此处，正好提及这样一个事实：他几乎从不参与讨论当

代的问题。他总是避开任何政治立场，他的工作不属于任何党派。实际上，他抓住了许多现时的问题，处理过一个又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但作为一位科学家，就我所知，有关“现实”问题的文章（分三次刊载于 1914 年 1 月 6 日、8 日、9 日出版的《新自由报》上，题为《我们的贸易逆差》），他只写过一次。通过这一论文，他表明了自己是进行这种论辩的大师。“货币流动的威胁在多数情况下是有影响的，这种影响（即使是影响甚微）是现实的货币流动所必然产生的。”“要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就必须做到贸易收支平衡，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途径。”“据说——也许这是真实的——在这个国家有许多平民入不敷出。不过这是必然的，因为在某些时候，我们有相当多的公共部门也入不敷出。”“金融政策连同我们在内都是政治的替罪羊。”……没有人能否认，作者如果不是对此十分关心或者了如指掌，那就是从事这项工作的最伟大的天才。然而，他又始终置身于当代问题的讨论之外。为什么？这些讨论是受实践中有争议的问题支配的，而且要受读者水平的限制，无法坚持较长时间的争论，无法进行较深入的研究，无法运用较精确的方法。它们使科学降低到科普性讨论的水平，即类似近两百年来一直在进行的那种讨论的水平。这种讨论针对的是“瞬时生产”，一种类似于不使用机器的经济生产，在它们大量涌来又转瞬离去时，理论家根本无暇去开始真正的工作——他们最多只能运用自己现有的知识。然而，它们是那样具有诱惑力，经常由于政治热情的高温而闪闪发光，因而产生了这样的现象：许多经济学家为此花费了他们的全部时间，多数人则用去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这就是在我们这个学科的领域中事情进展得如此缓慢的原因之一。庞巴维克是为了未来的若干世纪工作的——某些目前看来仿佛是“玩智力游戏”的工作，也许有希望产生实际的成果——而且他懂得，这就

是他的职责，从而不为一切诱惑所动，随遇而安，任人评说。

五

从我们对他的工作的概略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经济学的结构以及他的全部成就和主张可以通过对《实证论》一书的比较仔细的考察最好地展现出来。下面我就作一番尝试。

按照理论经济学这一术语的本来意义，在这部著作中只有少数几个理论经济学问题未被纳入。依我看来，被略去的问题如下：

(1) 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过程可以通过一个孤立的经济的模型表示出来。尽管存在这样一项包含数种经济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但它无助于我们对社会经济过程本质的认识。自从庞巴维克开始关注这一本质，他一直是以一种孤立的经济为工作对象的；在他的著作的主体部分中找不到有关国际价值的理论。不过，在上面提到的 1914 年发表的三篇文章中，包含了这方面的内容。

(2) 这几篇文章中还有他对于货币问题的几个短评中的一个，即关于数量理论中存在一个"破坏不了的"真理的"核心"的评论。可是，他并没有向我们提出一个货币理论。在击败了早期的金银通货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的观点之后，经济学界在几乎没有任何反对派的情况下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货币——经济的核算手段——只是一层面纱，它掩盖了各种由来已久的经济过程而不影响其基本性质。庞巴维克表示同意。

(3)《实证论》没有专门探究那些在理论上仅仅应用了价格理论和分配理论（征税的影响范围，垄断理论，分配过程中的政治干预理论等等）的问题。但是另一篇文章，《是权力还是经济

规律?》——包含了对什么样的罢工能够持续地提高实际工资水平的调查研究——则是这种类型的探究。同时,应当指出:这篇文章作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尝试,代表了奥地利学派最初的成就之一,是进行此类研究的一个范例。

(4) 此外,《实证论》不包含有关经济周期问题的内容。如果我们考虑到庞巴维克单独提到这个问题的情况(在一篇评论冯·伯格曼的《国民经济危机理论史》的文章中,该文载于1896年的《国民经济杂志》),就能找到原因。他好像持这样一种观点:经济危机既不是内部生成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经济现象,确切点说,它原则上是经济过程意外失调的后果。

(5) 经济理论的主体中有一个舶来品,它从重农主义时期以来一直在流传,这就是被称作"人口问题"的内容。当然,在《实证论》中或者庞巴维克的其他任何一部著作中,没有它的栖身之处。不过,有一点也许是值得注意的:在《是权力还是经济规律?》一文中附带提到这个问题时,庞巴维克不言而喻地将自己摆进了马尔萨斯主义者的行列。

无论如何,除了这些情况之外,《实证论》如上面已经指出的那样,是对整个经济理论领域的评注。价值、价格和分配是三个高峰,它们起着航标的作用;其他的一切都围绕着它们来分类,其中包括资本理论。

社会学的框架仅仅是一种示意。庞巴维克一再重申,他只对经济过程的内在逻辑进行调查研究。但他相信,他涉及的那些基本要素是如此重要而有力,以至于在任何现实场合中都可以被感知。关于这些要素的确切范围的问题——诸如阶级构成及其经济作用的问题、种族差别的影响、在现代经济中深深扎根的推理演算的起源、市场现象的起源及其社会心理学——所有这些在他的研究中都未涉及,因为他认为,研究这些问题将会偏

离自己的主要课题。因而我们发现，某一经济的各种要素都被简单地分类，列入工人、地主、资本家及企业家的范畴之中，分类的依据是它们的经济作用，而且仅仅是依据这一点。由于忽略了这些人的各种超经济关系，对于这一调查研究来说，人的实体意义仅仅在于他们是工人、资本家、地主和企业家——他们的重要性仅是由于(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其各自身份的逻辑关系的典型代表。

工人与地主首先是以所占有的生产要素为特征的——这从他们的名称中就能看出来；同时也以他们的经济作用为特征。这一点，如果不想让分配理论遭到误解，则需要加以强调：归根到底，在分配过程中将收入装进自己腰包的，并不是工人，同样地——相当重要地——也不是地主，而是劳动和土地本身。借用庞巴维克在其最后一部著作中以赞许的口吻提到的美国说法，这是"功能的"而非"个人的"分配，这个问题尚在争论之中；如果想在他的著作中寻找任何类似为收入分配进行"辩护"的倾向，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工人和地主依靠由他们的生产资料生产出的产品生活。然而，他们并不是靠任何特定时间生产的物品维持生活——他们当前的产出自然还不能马上用于消费——而是靠此前某个时间生产的物品维持生活。供应生活资料是资本家的功能——于是，可以说工人和地主时时处处靠资本家预付给他们的产品维持生活。无论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的工人和地主，还是对原始时代掘树根的人和猎人，都是如此。企业家的形象在庞巴维克的理论性讨论中并不突出。他作为经理人员和投机商的作用的确曾被提到过，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出现乃是由于他经常具有但并非必然具有的那些特征，即以自己的资本来经营的资本家、企业家的特征。

社会经济过程的主要特征,正如庞巴维克所设想的那样,现在可以详细地勾画出来了,但资本的作用需要更密切的注意。

庞巴维克的《实证论》正是以此为开端的。他最先告诉我们的事——在导论中——就是要对这个问题的两个根本不同的方面加以辨别,这方面的混乱状态是大多数普及性讨论和科学讨论中经常出现的错误之一:资本作为生产资料的问题,以及资本作为纯收益来源的问题。没有比这样的做法——把两者之间的毋庸置疑的联系看作利息理论本身,并简单地说:资本在生产中是必不可少的,它能"生出"净收益,恰如作为生产资料的"樱桃树""生出"产品"樱桃"一样——更容易的了。而这就是那些基本错误之一。庞巴维克在孜孜不倦的毕生的奋斗中、在科学讨论中成功地消灭了这些错误,从而使这种幼稚的形式从为数众多的、尊敬的经济学家的论述中消失。庞巴维克在其著作的开头部分反复强调了这一点,然后就转向关于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的理论。要克制那种详细描述他的论点在逻辑上的妙处的诱惑是很困难的,不过在这里只要说一点就足够了:庞巴维克是从调查研究生产过程的性质开始的,而这第一篇的魅力——它在其他方面乃是处理某些问题的方法,这些问题目前有小小的争论,不会引起太大的兴趣——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它向人们暗示了下面要谈到的指导性主题。

生产是对物质形态的改变,目的是使生产出来的东西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这个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来说并不陌生的概念,是他在论证过程中的第一个基点。这一目的可以更好地实现,如果劳动不是直接消耗在"形态变化"即某些被立即消费掉的物品上,而是首先消耗在非消费品上——借助它们,最终产品可以以更高的效率生产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投入同样多的原始要素可以生产出数量更多的产品。这就是说,生产是以迂

回方式进行的。这是关于工具的经济哲学——这里是该著作的第二个基点——或者一般地说是关于“生产出的生产资料”及其生产功能的定义的经济哲学。虽然这一思想本身既不真正具有独创性，也不复杂难懂，但只有庞巴维克用公式把它恰当地表达出来了。他独自一个人充分地发掘出了它的理论意义，特别是在有关时间要素的论述中——困扰经济过程分析结构的基本难题十之八九皆起因于这一要素。

由此产生了最重要的副产品——关于“资本主义”的性质的概念。我们在使用这一术语时所思考的现实自然是有着五花八门解释的主体，不仅仅有科学的、政治的和伦理学的解释，而且甚至有来自科学领域内部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分析、历史学的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是对于纯粹经济学，从而也是对于庞巴维克来说，要思考的问题只有一个：资本主义的纯经济特征。他的回答是：资本主义生产是“迂回的”生产，与此相反的是直接的生产——无需使用生产出的生产资料即可完成的生产，例如原始狩猎。相应地，资本“不是别的，而只是在使用迂回生产方法的不同阶段产出的中间产品的总和”。这实际上是一个理论，而不仅仅是个定义，懂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当然，它并不否认这样一个事实：现代经济同过去的经济体系有重大差异。它也不否认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根据这一定义，那里的生产如今同样也会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过程会是迥然不同的。但是应当说，所有这些科学的和社会的批评加在资本主义现象上的特征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经济本质没有什么关系，尤其是，生产资料和固定资产中的私有财产、雇佣劳动制度、商品生产等等，都同构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事物的本质不相干。这一观点最重要的涵义是，资本的净收益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同样会形成，不过，它在这里当然不会

对私人自然增殖——从功能分配的观点看，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次要的事。因此，几乎每一个生产过程都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只在于多少而已。

在这一点上，庞巴维克暂时停止了“就资本的概念进行争论”。就他本人给资本下的定义而论，他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看法是很明确的，尽管从同一个概念出发，他可以把别的什么东西称为资本，即：消费资料的供给，这是对迂回生产方法的必要补充，由于这种迂回方法的生产能力而显示了其对于利息问题的重要意义。

在《实证论》第二卷中，关于“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我们看到了在第一卷第一章中已经得出的答案，即土地和劳动是生产的基本的、原始的要素，因此，在经济意义上，由这两者构成的资本不可能是一个独立的要素。其次，命题本身是简单的，其正确性是不言自明的。再者，此前它已经以其最含蓄的形式由威廉·配第[①]爵士介绍过了。不过，没有人认真地对待它，没有人认识到应该进行艰苦的分析，以便让它起到一种有用工具的作用。简而言之，没有人认识到它在理论上的用处，或者系统地开发它、借助它获得重要的认识并使分析工作简化的可能性。经济思想史倒是指明了偏离它的三个主要命题：重农主义的主张，它认为所有的有价物品最终都是从自然界产生的；古典学派学者关于排他的劳动生产率的命题；最后则是宣称资本是第三个独

①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之一和统计学之父。他首先把经济学研究对象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并运用统计和数学的方法分析经济现象，力求找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他认识到“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认为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费劳动决定的，第一次分析了劳动生产率同价值量之间的关系。还提出了有科学意义的工资、地租理论。——编辑注

立的生产力的主张——部分来自古典经济学家,更多地来自他们的后继者。诸如此类的偏离没有什么“错误”——从它们各自的角度看,它们都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它们导致了毫无价值的或者幼稚的结论。

一个理论家的价值在于,他能从同样无可非议的、探索性的若干主张的对象中有效地选定一项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庞巴维克的功绩就是理顺了这些东西的条理,使其具体化,对其进行选择,并发展了那个假设。那个假设能使我们顺利地超越一切浅薄的认识,在深入观察和拓宽视野两方面都取得最好的收成,尤其是分配理论,它通过土地与劳动的完全对应及它们同资本的并列展示了自己的特征。

下一步在于果断地运用迂回生产的概念来论述时间要素。迂回生产所产出的最终产品的数量大于直接生产的产出数量,但是只有在更远些的将来才是“耗时”生产。庞巴维克对这两个要素所采用的结合方式、对时间要素的特殊引入以及对不变资本特征的观念完全是独创性的。要想公正地评判这种观念所代表的分析上的进展,就得认真地、简明扼要地重温一下李嘉图和马克思的观点。像马克思一样,李嘉图在他的劳动价值论中,把问题集中在不同产业中生产周期长度的差别所造成的影响上。两者都试图根据问题出现的不同形式,利用其他不同的方法来揭示这种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并尽可能压制那种随后会变得对两者都有致命影响的东西。这两个要素的绝妙合成,时间与增加的利润的这种结合与分离,独一无二地使关于时间在生产中的作用的一系列理论成为可能,不用再干“力气活儿”,也阐明了它特有的双重作用。这引导人们深入理解经济过程,同时更加接近资本净收益的问题。

按照庞巴维克的观点,这一净收益一方面应该是增殖的迂

回生产的技术生产率影响价值构成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这种结果必然的延期。接下来的惟一问题是：净收益是如何产生的？因此，需要研究价值的来源，两者都必须符合这一来源。

这实际上是下一步的事。不过首先要解决一些其他的问题。作为这一迂回方法的增产效果原理的最直接的发展，庞巴维克提出了一个命题：生产周期的进一步延长将使最终产品进一步增加，但其增幅是递减的。就那些在生产中使用的劳动量递增的商品而言，为使对一定的生产周期的讨论成为可能，庞巴维克创立了一个“平均生产周期”的概念。这里可以提到许多令人感兴趣的暗示，如：对迂回生产概念的重要概括，以及起源于此的许多争论——不过我们必须放弃这些内容，正如略去“资本形成的理论”一样，或者更确切地说，略去已经在《实证论》第二卷最后一节里论述过的比较外在的部分。我们只强调它的核心：一个人节省消费品，就是节省生产资料，从而生产了资本货物——这是一种使节约过程中的资本形成最终固定下来，而决不由此出发对利息理论作任何推断的理论观点。



六

现在，让我们转向支撑庞巴维克结构的两个柱石中的第二个——价值与价格理论（《实证论》第三卷），像我们刚刚谈过的那一点一样，它代表一条思维链条的完成。我们将在后面谈到处于两者之上的上层结构。

商品同满足需要的总的关系——这种关系被称为效用，这一称呼有被误解的危险——可以还原为对我们的经济行为有重要意义的东西，当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符合公认的满足条件时，我们称之为有价值（使用价值），否则就没有价值。在总效用的

关系已知的情况下，能否产生价值取决于与我们的需要有关的那个"一定数量"的大小：为了形成价值，相对不足被加在效用上。庞巴维克借助需要的种类（或者需要的方向）与需要的强烈程度之间的差别，并经过对可替代性的仔细思考，得出了（按门格尔的方向，并运用了类似维塞尔的方法）伴随着每类需要中各种需要的"满足程度"的不断增加——即伴随着个人所占有的商品数量的不断增加——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并且得到了对于旧的价值矛盾即"经济矛盾"的解答。庞巴维克对这一命题作如下表述："一种商品的价值的大小取决于有关的具体需要（或部分需要）程度，而需要并且能得到的商品的总量都是最不重要的因素。"

接着，庞巴维克转向这一总命题的若干详尽说明，即包括主观价值量问题在内的若干特殊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运用了一项基本原则（称之为解决价值理论问题一切难点的"万能钥匙"）："我们应该从两个角度去看那个按其观点为商品估价的个人的经济状况。首先，设想该商品被加进了该个人所占有的各种商品的库存中，这时我们观察在具体需要的级次表中满足程度能下降多少。其次，我们设想该商品被从该个人的商品库存中拿走，并再次测量满足的级次还能下降多少。然后就可以明显看出：现在某些层次的需要，即最低层次的需要，很可能仍然没有满足。这个最低层次指明了决定商品价值的边际效用。"庞巴维克在把这一命题加以发展以适应若干特殊情况之后，承担了研究可任意增加的商品的价值这一重要问题的工作。根据"万能钥匙"，我们在为这类商品估价时也是按由于该商品的减少而造成的满足程度降低的比率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一降低是作为放弃购买某一数量商品而造成的满足程度的损失给定的（如果商品没有减少，当初完全可以购买）。这些被放

弃购买的商品不一定就有那一类损失，然而商品通常总是不同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依据"替代效用"来进行估价——这就揭示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理。

这一原理首先用于可以任意再生产的商品，从把经济视为一个整体的角度来看，它也适用于几乎所有商品。这种情形被以一种绝妙的逻辑同用途可能不止一种的商品结合起来。由此，我们就必然被引向对"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别这一问题的解答。

这就为研究"互补品"（门格尔语，即只有同其他商品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满足感的商品）的价值清理出了场地。一批互补品的价值是由它们共同形成的边际效用决定的，问题就在于要由此分离出这批商品中每一件商品的价值。对此，庞巴维克的规则如下："……关于整批商品的总价值——它是由同时使用的商品的边际效用决定的——可相互替代的各单项商品的价值是事先给定的[①]；而剩余的部分——它根据边际效用的总额而变化——则作为不可替代的各单项商品的个别价值而归入这些商品中。"这一陈述宣告了现代经济理论的一项基本的原则，它在各个方面得到大量的应用，特别是以马歇尔所称的"替代原则"的名称被应用。

这一理论的另一项应用则是攀登高峰的第二步，从这个高峰可以视野开阔地洞察最深层的经济活动。生产资料也是互补品。不过它们的价值不是直接确定的：我们为它们估价，只是因为它们以某种方式与消费品相联系，而它们的价值也因此——从主观价值论的观点看——只能从这些消费品的价值中获得。然而许多生产要素总是渗入单个消费品的生产中，而它们在生

① 根据它们的替代效用来决定。

产方面的贡献从表面上看是无法分清的。实际上，在门格尔之前，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无法表明最终产品的价值中生产资料的可区别份额，并得出结论说：看来，沿着这个思路是不可能取得新进展的，主观价值论显得毫无用处。互补品价值理论解决了这个表面上看来没有希望的问题，它使我们能够说出这类生产资料的明确的“生产贡献”（维塞尔语），为其中的每一类从其生产应用的各种可能性中找到惟一明确的边际效用——这种边际效用在边际生产力的名义下成为最终生产力——这是现代分配理论的基本概念，是我们用以解释经济群体收入的性质与大小的基本原则。

我们在运用这一“归与理论”（维塞尔语）时——其最精彩的阐述之一应归功于庞巴维克——找到了作为边际效用理论特例的生产成本原理。作为归与理论的结果，成本现象成为主观价值的反映，而同等成本和某项产品的价值则由价值理论而来——在这方面，我们的学科里从来没有比这更出色的封闭的逻辑链。

但是，所有这些迄今为止仅仅涉及到价值领域。在市场经济机制中，它自身的一切表现形式同样只能由相应的价格理论显示出来。因此，庞巴维克转向价格理论，拓展价值规律的内涵，使之适应买方行为和卖方行为，他的研究在受到交口称赞的命题中（就双边竞争而言）达到了顶点，而这一命题则成为经济思想史的著名命题：“价格水平决定于两个边际对偶的主观估价水平并受其限制”——即一方面取决于和受制于“最后一个”获准购买的买主和已被排除在交易之外的人中“最可能进行交易”的卖主的估价，另一方面取决于和受制于那些一直被排除在交易之外的人中“最不可能进行交易”的卖主和“第一个”被排除的买主的估价。

所有这些首先被用来研究有一定数量可交换商品的情况，其结论是：鉴于价值对供给方和需求方产生的作用是相同的，因此，旧的供求规律仅仅是边际效用理论的必然结果。这一原理后来被扩展应用到某些商品的价格形成上，这些商品的供应数量可以根据生产来改变。面对此处出现的各种难题——正像在任何地方，当一个人试图在现实的迷宫中运用基本原理一样——庞巴维克即使在个别论点上也没有置读者于不顾。他一个接一个地清除了前进道路上所有的主要障碍，他提供的一系列解答将在很长时期内构成更深层次的理论研究的基础。

在得出价值理论同价格理论的对应，同时指出这一步骤的逻辑一致性结论时，庞巴维克提出了生产成本规律，这一次它是以价格的面貌出现的。他接着指出，所有由主观估价确定的价格将——均衡地并伴随着自由竞争——接近于单位成本。这不再是一个假设，而是关于边际效用规律的推论，结果是，同古典作品一起扮演重要角色的生产成本原理获得了它的真正意义，而且首先是在主观价值理论的框架中得到了严格的检验。这也表明，那种宣称主观估价决定价格的波动，并且其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的看法是多么肤浅：主观估价既决定价格的波动又决定其影响时间的长短，尽管后者的特征还可以进一步描述（它也表明了生产成本原理的有效性）——不过，生产成本原理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原理了。庞巴维克最后指出：生产成本可以充当特殊情况下的价格变动的"中间目标"的那种限度，可以用边际效用理论来阐明。《实证论》结尾部分展示了经济过程的全景，其中，在主观估价的压力下，生产资料可以有不同的用途。

用于理解工资、地租和利润的各项基本原理现在全部都自动跳到我们的研究领域里了。最基本的、原始的生产资料是土

地与劳动。所有的商品，包括生活资料和资本货物，最终都还原为这两者。产品价值必然直接地或迂回地——后者通过资本货物——还原为土地和劳动，土地和劳动也因此获得了自己的价值，并在市场上经过自由竞争形成了相应的价格，即地租和工资。因此，依照庞巴维克的观点，工资——以将来要增加为附带条件——是以"劳动的边际生产价格"这一术语来表述的；劳动则按其"生产上的贡献"——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是对社会经济过程的边际重要性——得到补偿。地租也可以这样表述，虽然庞巴维克在此处只谈到了劳动。根据既定的假设，国民生产总值本身要分解为工资与地租。在一次近乎戏剧性的意外中，我们终究得到了这些老问题的答案，就其正确性、简明易懂和富有成效而言，它远远胜过此前的所有成就。

比方说，这一答案是那个建筑物的第二根支柱的顶板[1]（同我以前的比喻合并使用）。但是为了让其他要素起作用，这里既没有谈到利润，也无意谈及。在此我们应当设想一下本文引用过的《历史与批判》中的论述，该论述意在指明过去想使利润与利息符合这一描绘的一切尝试都是不恰当的。不过我不得不放弃这一点，而且只要说明庞巴维克指出了两个同收入与成本之间的均衡有抵触的事实就足够了。

其中之一他以"摩擦"为标题作了概述。停工发生在生产资料的流动中，造成生活资料价格暂时地、有时是长时间地偏离根据生产成本原理确定的价格标准；对于企业家来说，这是利润的来源，但也是亏损的来源。庞巴维克采用了不完善的市场机制条件下企业家利润的获得模型。根据这些不完善的模型，企业家能算出明确的收益，该模型在使用过程中能获得完善。

---

① 柱顶的构件，用于支撑框缘。——英文版编辑注

其二是时间的推移，那是一个"山谷"，按照庞巴维克的观点，我们要在其中寻找关于利息现象的解释。于是，我们进入那个上层建筑——地基上的构造此前已经描述过了，这是他最具个人特色的成就，这一成就使他与众不同，使他同那些在其他方面与他最为接近的人从根本上区别开来——这一上层建筑包含着他对理论经济学中最困难和最深奥的问题的解答，而它那雄伟的外观给朋友和敌手双方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给他的整个体系烙下了一个特别的印记，就我们对资本的净收益的观点而言，如上文所述，它改变了我们对几乎所有其他问题的看法，并扩展到经济学讨论的一切方面，甚至远及社会视野的广阔领域。

七

利息理论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兑换与贴水的理论。它的基础是这样一种论点：对现在商品的评价要高于对未来商品的评价，尽管那些商品除此之外在一切方面都与前者相同，也是用于满足同样种类、同样强烈程度的需求的。这里有争议的是引进了一个新的事实，一个正在拓宽的现实的经济基础。然而这个事实并未超出价值原理的范围；更确切地说，这是对我们的评价的一个特殊性质的发现——它偶然地"先于"庞巴维克出现，而且只被杰文斯有意识地强调过。由于庞巴维克，价值理论有机地吸收了这一论点，使自身适应于它，而从不破坏理论的连续性或基本结构的一贯性。相反地，因为它，利息理论也由边际效用理论产生出来。这一利息理论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如庞巴维克本人所说的那样（参阅《历史与批判》），是资本投资利润率的所有较间接的决定因素的效果，通过现在商品与未来商品之间的价

值差别这一共同媒介传输。利息只不过是这一价值差别的价格表现，是通过主观价值理论和价格从价值差别中产生的；而找出价值差别的原因则是第二个问题。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庞巴维克理论其余的基本特征。它属于庞巴维克在其巨著第一卷的概要中描述的三组利息理论中的第三组。第一组——“生产力理论”——由于那个从庞巴维克以来一直被称作“物质”生产力的概念同“价值”生产力混淆不清而遭到失败；第二组——“剥削理论”——无法表明为什么竞争的力量不能消除“剥削”的收益；第三组理论则在价值本身的领域中寻找利息的来源，认为既然利息率是一种价格现象，则价值的领域中必定有利息的来源，贴水理论就属于这一组，这是利息价值论。只有时间流逝对主观评价的影响才能产生那种能够以下述方式将商品流量的一部分带到资本家手中的力量。

为满足我们需求的一切供应，严格地说，考虑的都是将来；从而所有的经济活动——而且，按照庞巴维克关于资本主义属性的概念，这种活动愈多就愈是“资本主义的”——也都是在需求影响下进行的，这种需求我们只有在将来才能体验到，不过我们现在就能想象得到。另一方面，经济活动是在客观需要的影响下进行的，这种需要我们只有在将来才能满足，但是现在我们就能预知。因此，未来商品是我们的经济行为和我们的评价的对象——实际上是最重要的对象。很明显，这类评价借助同样的边际效用原理可以被人理解。对此还应加上下列事实（不过它们原则上没有更多的利息）：同我们有关系的是想象的而不是感知的需要（记住，前者与后者是对应的）；与我们有关的不是需要与供应需要之间的现在的关系，而是处于未来时点上的关系；再者，未来的需要总是由于某些协同因素而增加，这些因素显示出所期望的效用（一项“风险保险费”）的可能性。

庞巴维克在引入一个对价值分析十分重要的事实时，认为现在的商品具有比同样数量和同样种类的未来商品更高的主观价值。

首先，人们或者是希望更充分地为将来的需要作准备，或者是(当情况并非如此时)拥有现在商品既可以为现在的需要提供替代物，又可以为将来的需要作准备(特别是在货币经济中，因为那里总是可以不用怎么破费就实现这种“节约”)。因而，现在商品的价值至少同未来商品的价值相等，而现在商品的一般的“价值贴水”超过未来商品，是经济中的常见现象。

其次，我们一般总是低估未来的需要。未来的需要很难被我们充分感知：想象的需要不具有与那种实际感觉到的需要相同的迫切性；而最终，一点也不能担保超过一定期间的供应能被典型的个人接受。这些心理上的因素彼此相互加强，其结果就是“预期的对未来享受的低估”——这是存在有利于现在商品的一项价值贴水的第二个理由。

第三，“耗时”的迂回生产效率更高，即：如果一定数量的原始生产资料先用于生产中间产品(如工具)，然后用于生产消费品，有形产品就会比全部用于直接生产消费品时多。生产资料原先的数量(即先用于迂回生产的数量)因此将处处显示出强于新的生产资料(即后来使用的生产资料)的技术优越性——除非在此期间有新的发明或类似的东西使使用“老的”生产资料的方法变得过时。

这里出现了在贴水的前两个原因中没有出现的问题：这第三个要素在“耗时”的迂回中，是否不仅引起了数量更大的产出，而且引起了价值更大的产出？庞巴维克的回答是肯定的。根据迂回生产原理，一定数量的现在的生产资料如果用于这种迂回生产，则在未来的一切时点上，其产出的产品数量要大于同样多

的生产资料在这些时点上用于直接生产的产出。同时，它的产出也将多于后来用于较短生产周期的相等数量生产资料的产出，因为生产资料在使用中迂回性越大，其生产能力也越大。再有，同一商品的两种数量可以在同一时间归一个个人享有，数量多的价值较大；在时间上可以早些使用的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其价值生产力（而且不仅是物质生产力）必然——根据我们的假设和庞巴维克的说法——总是大于在时间上晚些使用的同一数量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无论这两种生产资料是否在同一时点上被生产出来。进一步说，采用耗时的迂回方法意味着人们可以等待他们预期的价值更大、数量更多的产品，也就是说，那部分足以供任何迂回生产参与者使用的生活资料，实际上现在就可以使用。因此，迂回生产的"剩余价值"的获得取决于这一现在生活资料的存在，同时，根据归与理论的一般原则，这个"剩余价值"也转移到现在生活资料中。因而，这是价值贴水的另一个——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这种贴水有利于现在生活资料而不利于未来生活资料。

有关迂回生产的物质剩余生产力的论点，正如认为这种生产提供了独立于另外两个原因之外的、用于说明现在商品对未来商品的贴水的第三个原因的论点一样，经历了很多争论，并由此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有关第三个原因的文献"（对它的反映可以在第三版和补论中找到）。我们没有参与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仅仅是依据庞巴维克的论述指出第三个原因（在庞巴维克看来，它原则上是独立的）是如何同其他两个原因相联系的。当然，有一点很清楚：生产资料的社会储备将最显著地集中到那些可以达到最大边际效用的行业，可运用这个一般原理在未来的不同时点上形成的生产成果中进行选择。第三个原因可以说明迂回生产过程是无限长的。根据我们的假设，任何生产周期的进一

步延长必须与增加(尽管增幅不断减小)产品的数量和价值相联系。根据第一和第二个原因,这些不断增加的价值量无论如何必须同一项递增的预期贴水一起评价——而前两个原因同第三个原因之间的这个相互作用将决定能产生最高的(现时的)价值的生产周期的长度。因而,三个原因所产生的结果对任何个人都不是多余的,头两个原因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抵消第三个原因。

所有这些"原因"是在许多不同的级次上、不同的个人身上产生效果的——价值贴水,尽管是一切个人共有的心理事实,但就不同的个人而言,它们所起的作用是不相同的。但是确切地说,这一事实通过在评价中产生必要的差异,使个人之间以现在商品交换未来商品成为可能。一个用于交换现在商品和未来商品的市场产生了,而交换"边际对偶"的理论为它们确定了一个统一的客观的价格贴水,这就是利息率的来源。在庞巴维克的美妙的模型中,上述价格贴水就是现在商品与未来商品交换中的贴水。像每种价格一样,这种贴水有双重调节作用。首先,即使是那些在其他方面对未来商品的估价有可能低于市场贴水指标的人,也会使其估价向市场贴水靠拢。其次——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转变——"现在商品在远近不同的未来时点上对未来商品的贴水的大小,与各个单独的时间间隔的长度将是成比例的。"尽管个人对未来的低估很可能会不连续、不规则地发生,现在的享受同一年以后的享受之间差别可能非常之大,然而一年之后的享受同两年之后的享受之间的差别却是很不显著的。

这是著名的庞巴维克利息理论的精华。不过他并不满足于概述,他在资本主义机体的最深处和最广阔范围内追寻自己的理念。让我们极为简略地跟随他的思路前进。这里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证实凭经验可以弄清的资本利息来源的确

是从前面描述过的“支柱”中产生的;二是如何从这一理论基础上推导出利息率运动的水平与规律。

要说明贷款的利息率是不难的。贷款,犹如以现在商品交换未来商品一样,可以提供我们想要的每一种东西。而且,很清楚,任何一个寻求消费贷款的人对现在商品的评价必然高于未来商品,以至于即使贷方并不低估未来商品,利息率也会产生。进一步说,同样清楚的是:对于任何寻求生产贷款的人来说,对未来的净利润的预期也会确定这样的贴水,因而其结果是相同的。但是,有关资本收益率这个重大的社会事实的问题,以及有关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上等阶层赖以存在的基础的问题——实际上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问题——恰好在于对这样一种纯利润的解释及对它在经济流动中定期出现的解释。而这个源于企业家的资本净收益,现在是根据它同基本图示的关系来解释的。

庞巴维克杰出技巧的另一成果是——也是用于这一情况的——解释的原则可以很容易地用同样不言自明的公式表示出来:企业家购买的生产资料一部分由劳动与土地的服务组成,一部分可以还原为这两者。土地与劳动的服务是潜在的生活资料,由于这一特性,它们才具有价值。不过它们仅仅是未来生活资料,其价值必然低于同等数量的现在生活资料的价值。土地与劳动的服务将按照它们现在的价值从它们的所有者那儿购得,它们的未来产品则将在此后按它们在销售当天的价值卖出。这样,当现在的生产资料在企业家经营下开始向生活资料转变时,价值增殖就出现了——而这一价值增殖是企业家的资本净收益的基础。将这一结果用于个人经验并不总是容易的。这方面的许多问题——特别是由于同一生产资料在生产周期不同的生产过程中具有多种使用价值而产生的困难——都被庞巴维克

解决了，他那种无限关注的态度会使他的著作成为即使在我们学科的最遥远的将来也依然闪耀着光芒的无价的指南。

下一步是说明这些价值关系总是导致价格贴水。这一价格贴水作为原始生产资料的全部未来边际产品的货币价值的贴现额，一方面会出现在劳动者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交易中，另一方面会出现在工人和拥有资本的企业家之间的交易中。或者，如果我们将资本家的功能从企业家功能中分离出来，而把企业家看作是纯粹的介于原始生产资料所有者和资本家之间的中间人，则它将出现在资本家同工人以及——打个比方说——由企业家代表的土地所有者之间的交易中，作为由前者预支的对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贴水，换句话说，以利息率的直接形式出现。这里我们看到的资本家是以其作为现在商品商人的本质角色出现的——也许乍看起来这是个陌生的观点，但它渗透到了特殊的深度，是经济过程的本质。这两种形式掩盖了同样的核心，都表明贴水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我们要说明它在第二种形式中的必然性，这一形式很可能还原为第一种形式。

在这个"生活资料市场"上，资本家面对的是工人和地主。生活资料、劳动与土地的可使用数量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是给定的，后文将进一步论述这一假定的前半部分。对于资本家，这些生活资料的使用价值无关紧要——在任何情况下，他们只能消费其中的一小部分。因此，对他们低估未来商品价值这一点，我们可以忽略；如果存在这种低估，我们的贴水就更有理由产生。对工人和土地所有者来说，对其劳动和土地的服务的评价产生于他们在直接生产中的潜在效用（在他们本身对资本主义生产能够接受的范围内，他们承担了资本家的可分割功能），严格地说，这种评价是交易的下限——低于此界限，他们就不会交易了；但在现代，这一界限是相当模糊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贴

水非常小，甚至接近于零，资本家也愿意进行买卖。对工人和土地所有者来说，根据迂回生产原理，高于直接生产报酬的任何超额收入都依他们可得的生活资料而定，因此，只要他们能得到这个剩余报酬，哪怕是只得到其中很小的、接近于零的部分，他们也会愿意进行买卖。最终的结果将依照工人和土地所有者在给定的生活资料所允许的生产周期延长限度内对这种生活资料需求的强烈程度而定。同时，这里有一个相当普遍的真实情况——不论上述生活资料规模有多大，它总是有限的。不过，以下情况出现的可能性也是相当大的：在给定的生活资料所允许的生产周期延长限度内，可获得更多的剩余报酬。因而，在设定一个可行的生活资料规模时，如果此处没有贴水，则仍然会有对更多的生活资料的迫切需求，而这一需求是无法满足的。随之而来的是，现货的价格总是高于期货价格，因而一笔贴水——即利息率——必然经常出现，这一点已经被证实了。

相反，可以同时看到，如果没有利息，生产周期的无限制延长会变得有利可图。很明显，随之而来的就是现在商品供不应求，它反过来会导致直接生产，并由此导致利息的重现。这样，利息在经济中的真正功能也就水落石出了。打个比方说，这是个制动器，或者调速器，它可以防止个人突破在经济上可以接受的生产周期的延长限度，并加强对现在需求的供应——即期需求给企业家施加了压力。而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反映即期需求的相对强度——在每一种经济中未来的和现在的利息就是通过现在需求的相对强度而被人们感知的。因而，这也是人民的智慧和道德力量，强度越大，则利息率越低。这就是为什么利息率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这一水平越高，可用的生活资料的储量就越大，生产周期越长；根据迂回原理，生产周期进一步延长所产生的剩余报酬就会产生，利息率从而也就越低。这样，我

们得出了庞巴维克的利息递减规律，这是他对这一古老问题的解答。

我们的论证进一步表明：由于使现在和未来的有关需要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的只有对现在商品的贴现，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现在商品和未来商品也不能处于同等地位；由于价值现象是利息率的基础，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可缺少，因此需要一个中央计划委员会来关注这一现象。由此而来的是，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工人们也不能简单地得到他们的产品，因为生产现在商品的工人生产的产品少于那些生产未来商品的工人的产品。因此，无论社会决定怎样对待同那个价值贴水数量对等的商品，即使在工人中平均分配，对工人而言，它也决不会自然增长为工资（而只是作为一种利润）。无论什么时候，这很可能产生实际的结果。例如，社会有机会自觉意识到其各个成员对它自身的经济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工人的价值只能是对他的生产能力的贴现价值，同时，所有具有相同的工作能力的工人都应获得同等评价，而即便在这种场合也必然产生“剩余价值”，它是作为特殊收入出现的。不过在理论上更为重要的是结论，即——这里使用一个在这一命题的论述中已经被采用的术语——利息率是个纯经济的、而不是历史的或法律的概念。这里对有关剥削的概念的两处修改正合时宜：其一，把“剥削”说成是利润的起因，只能是在这个意义上，即这种剥削也会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其二，剥削不仅是对劳动的，而且也是对土地的剥削。对道德的和政治的评价而言，这样说自然是不切题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会以不同的方式利用其“剥削所得”。不过这对于我们洞悉事情的本质更为重要。[1]

[1] 这里的分析中，对“剥削”的理解是错误的，请读者加以鉴别。——编辑注

这样，一条关于庞巴维克的有重要价值的理论成果的完整的逻辑链落到我们手中，而且再增加几个环节也不难。我要指出的只是：在通往关于工资和地租的完整理论的道路上，我们的论证也将我们推向了第二阶段。在价值理论和价格理论中，我们设想工资和地租是两个原始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的成果。现在我们可以加上一个命题——在这里，庞巴维克的工资和地租理论同那些在其他方面最接近他的经济学家的工资和地租理论分道扬镳——这个命题用公式表示即为：工资和地租是劳动与土地的边际产品与工资、劳动数量之积在对现在商品贴现之后的价格表现。[①] 这个命题远不是对边际生产力思想的偏离，而相当明显地是在一个颇为重要的方向上对它的加强。

在这一点上，我要提及一个更为精彩的发展，它来自同一个基本思想，它使我们能够设想出处于其他事物之中的地租现象是一般原理的一个特例，并加深了我们对此现象的理解——这就是来自耐用商品的利息和资本化理论。拥有一种以上用途的商品可提供各种服务。满足我们需要的是商品的服务，它们被直接估价，而商品本身的价值只是这些价值的总和。因此，在任何一个时点上，这个价值都是尚未从商品身上"拿走"的那些服务的价值的总和。当这些服务变成只能定期地、分时段地使用时，对这些服务在更远的将来的评价是依据低估未来商品的原理作出的，而且它必然是通过对现在商品贴现的过程得出的。这样，一个在经济实践中为人们所熟悉的过程，以极其简单的方式被纳入一个大原则的框架之中，并且由此引出了对这类商品的价值与价格的形成——即资本化——的解释，以及对能产生

---

① 这种工资理论已由陶雪格——庞巴维克最杰出的战友——进一步发展了。

无数服务的商品(例如农用土地)为什么只有有限价值的解释。

只有这样的分析才产生了对"地租是净收益"的精确论证。我们直接评述的仅仅是土地的物质收益,它同总收入是同样的东西。传统的地租理论,从重农主义时期以来,论述的仅仅是问题的这一方面。因此,庞巴维克可以说,经济分析完全没有深入到问题的本质——纯收入。举例来说,如果一个采石场在100年的生产里每年有1000克朗的收益,而此后就变得毫无价值了,那么,即使它的价值没有被低估,它的所有者也不能花费这个收入总数中的任何一部分,否则他就会耗尽他的"资本"。只有从此处概述的理论观点出发,才能认识到地租是作为纯收入出现的。我们几乎用不着详细地阐明,这一整体结构——就其阐释问题的价值以及深度而言——同李嘉图的论述相比是多么地非凡、卓越;同时,它不仅在批判性方面,而且在结构方面,大大超过了李嘉图的论述。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恰当的位置,可以清楚地观察利息现象是如何盖住其他所有的关于纯收入的枝蔓,穿透一切评价,向一切经济过程伸展的。这一现象是无所不在的。我们认识到,资本的净收益不是单纯同工资与地租平行的收人,而是——可以这么说——同后者对立的。这个见解在当时是全新的,代表了前进中关键的一步,后来在多方面被详尽发挥,并在欧文·费雪和F.A.斐尔特的著作中得到了系统的发展。

现在我们来探讨通往庞巴维克大厦顶端的那个楼梯的最后一级。他是第一个从生产周期长度的两个方面——生产力方面和时间流逝方面——彻底认清其重要意义的人。他阐明了这两个方面的准确内容及它们在边际效用分析体系的基础中的地位。他进一步使生产周期的长度成为经济均衡的一个决定因

素,从而使“生产力”、“经济周期”、“商品流动”等概念有了截然不同的涵义。同时,他把经济生活中的大量关系纳入了分析范围,这些关系至今还远未得到详尽无遗的论述。但是,他的同事中几乎没有谁跟随他在这些曲折的小径上走得那么远,而有关其毕生事业的卷帙浩繁的讨论主要是集中在他的研究历程的最初几个阶段,以至于那些一贯受到边际效用理论反对者非难、被认为是徒劳无功——比如,同马克思的体系相比较时——但恰恰具有丰富成果的部分,至今还未能成为可以被更广泛的读者接受的东西。而且,正是在这一点上,很少有人认识到他的特殊成就,尽管其基本思想是非常朴素的。

介绍和确切论述影响生产周期长度的因素,是通过它同生活必需品数量的联系——不久以前我们对此还未予重视——进行的。当我们认识到资本家提供的生活必需品完全等于经济财富的总额时,这个数量就确定了——当然,劳动与土地的服务除外,在意外情况下,由于经济上的浪费而消耗掉的那一小部分也除外。这一总量一向是有明确的规模的——在旧的“工资基金”中则没有——这一点在关于资本形成的理论中有单独的阐述,并可以被视为分配理论的一个论据。因此,既然工人的人数和土地的数量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数据,我们就有了建立客观数量关系的新的根据——它大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理论。但是,在明显存在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情况下,一种经济的财富总量怎么能够完全由“生活资料”构成呢?生活资料的流动当然是持续不断的,一定的生产周期所需的全部生活资料,在该周期开始时并非必须全部可用,而是储存在某个地方。在后一种情况下,问题是很清楚的。但是,如果为数众多的正在进行的生产过程不是在同一时间、同一生产阶段进行,而是根据其产品“准备就绪”的程度交错地进行,那么,整个生产周期的生活资料在任

何一个时点上都有一部分已被消费——同各种中间产品如原料、机器等等一起被消费，并准备“各就各位”——同时，另一部分则是将要投入生产，就不会有任何重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这一生产周期的生活资料总量等于现存的全部商品的储量，而这仅仅是同原始生产资料对比。还有一点也很清楚，即：按这种解释确定的生活资料的数量越大，距我们视线所能及的生产目标就越远。最后，既然商品的流动是持续不断的，而生产过程的所有阶段是同时运作的——严格地说，这一假设并不总是正确，但在此有助于行文简洁，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它对所包含的原则并不重要——很明显，这个总量只能满足半个生产周期的需要。

现在，两个重要数据——生活资料规模和土地与劳动的可使用量之间的关系已经通过“生产周期”这个环节确立了。这个环节目前已经不再像古典经济学著作中所说的那样严格，它是灵活的。同时，我们也掌握了它的“灵活性”规律：生产周期最终的长度，首先取决于上述两个数据的取值，其次取决于资本家（企业家）的选择，而他们必然会力图去获取可能得到的最大利润。客观数量关系和主观力量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确定生产周期的长度、利息率、工资和租金，并且使其相互联系。

庞巴维克没有在一般情况下描述这一结论，而是——忽略租金——仅仅谈到工资和利息。[①] 其原因在于由这个问题引起的技术上的复杂情况，即不运用高等数学几乎难以应付的情况。但是这并未改变问题的性质，因而我们对这种简单的情况也感到满意。

---

① 一般问题后来由威克塞尔进行了论述。

结论可以不费力地表述出来：要确定的工资率乃是能够使生产周期最有利于企业家（资本家）的那种工资率，而这一生产周期要恰好能够按照上面提到的工资率耗尽该经济中可使用的劳动力总量，并能补偿为此而支出的生活资料总额。

实际上，如果一个随机的工资率在市场上暂时地确定下来，其结果会是：给出一个有不同迂回层次的生产力规模比例表，其中一个（而且只有一个）生产周期对企业家（资本家）是最有利可图的。然后它将被选中，根据它，一个明确的利息率将被确定下来。按照这一约定，如果劳动和土地服务的总量与生活资料的总额恰好能一对一地进行交换，就能达到均衡，前面阐明的有关条件就能满足；反之，没有使用的那部分土地和劳动服务的数量以及没有使用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将会使工资率或利息率降低，或同时使两者降低，因而造成一个有利可图的生产周期，直到均衡条件得到满足。

在这种情况下，利息规律被揭示出来：利息率必须等于上述一切条件下可采纳的生产周期最后的延长部分的剩余报酬率。假设这个可能的最后的延长是集中在单个的企业里，我们就可以认为，它的所有者们是生活资料市场上的“边际买主”，并将利息水平规律看作一般价格规律的特例。

此外，利息和工资（以及租金）之间的确切关系，还有它们相互决定的方式，也被确定下来，于是，可以将其大量地运用于实践中。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观点的丰富成果。首先，我们深刻认识到生活资料和劳动数量变化的影响，以及不同层次迂回生产的生产力规模变化的影响——这些变化自然会作为技术进步的成果而不断发生。其次，我们得到了“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如何影响利息与工资”这一问题的答案。再者，我们了解到：工资的提高先是引起利息率的降低，然后引起生产周期的延长，

最后引起利息率的反弹，不过达不到它最初的水平；与此类似，工资的降低会缩短生产周期、提高利息率、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从而会增加工资，但同样低于它原先的水平。此外，这里的结论是，生活资料在资本家之间的分配对利息率水平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而且，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的区别具有了不同于古典经济学著作的涵义，其重要性也小得多。

这样，庞巴维克以最简单的方式取得了最伟大的胜利。在庞巴维克的书中，第一次阐明了作为主观评价和"客观"事实的有机统一体的社会经济过程理论。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其著作最后一节中如此清晰地勾勒出来的大师的高大形象。他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如此清楚地让人们看到理论在他的笔下可以取得多么丰硕的成果。他在运用基本上是数学方式的思维方式时，那种准确性和正确性是惊人的，然而他并没有使用一个符号或者采用数学技巧，因为这些技巧对他来说是陌生的，这种思维方式他也从来没有学过。他是以一个天生的科学家对其所研究的材料的逻辑必然性和逻辑对称性的准确感知，完全无意识地发现了这一切。

除了逻辑上的严谨和精彩之外，他对具体事物和有重要实践意义的东西具有同样强烈的直觉。他在自己的道路上从未失足，他知道如何使自己的探索指向那些有具体问题等待解决的地方，而他的著作就是一幅利用他的方法去打捞珍宝的巨大的航海图。通过把适当的经验数据引入自己的理论框架，他把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进行具体的数量描述的前景带入了即使没有现实可能性、至少也为人们所热切盼望的领域。我不知道他本人究竟想没想过这种可能性。就我所知，他本人从未说过自己能取得这样的效果。但是这个可能性总有一天会变成现实，而他的著作将最先引导我们到达这个现实。

如果把他的著作说成是不朽的，未免显得太平庸了。在未来的很长时间里，对这位伟大斗士的回忆将被“争辩的各方”——敌视的和赞同的——染上各种色彩。但是，在我们学科引为骄傲的伟大成就中，他的成就是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无论未来将怎样评说它或对待它，其著作的影响永远不会消失。

弗兰克·威廉·陶雪格
（1859—1940）

一、早期（1859—1880）

对杰出人物的形成，无论我们认为是先天造就还是后天教育的结果，或更进一步说，是遗传方面的原因还是环境的影响更为重要，对于陶雪格来说，两者无疑是完美结合的。为此，我们必须从多方面来描述陶雪格这个集一般公民、学者、教师、公仆等多种头衔于一身的人物。首先，让我们从家庭的角度，介绍一下他的家庭背景以及造就他的杰出父母。

弗兰克·威廉·陶雪格的父亲——威廉·陶雪格，1826年生于布拉格。他聪明、精力充沛，受过良好教育。那时，捷克和德国的上空因两国的冲突已开始笼罩上阴云，且越来越浓厚。他厌恶这种环境，于1846年移民美国。他首先去了纽约，然后来到圣路易斯，并且在药品批发行业找到了工作。虽然这是一份简单而地位较低的工作，但这是当时美国人都喜欢的职业，而且是他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几年后，他放弃了这份工作，进入圣路易斯医学院学习。在那儿，他学到了更多的医学知识，并获得了学位。之后，他在卡隆迪莱特——现名南圣路易斯——开办了一家诊所。那时，他常常骑在马背上，带着手枪和药品去看望病人。他在社会上声

望日高，曾经担任市长、县级法庭的法官、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等职务。诊所的生意也非常兴隆。

但是，南北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战火燃烧到该州。作为一个坚定的分裂主义和奴隶制度的反对者，1865年，威廉接受了联邦政府税务官的职位。按照1862年和1864年的收益法，税务官为联邦政府所管辖的地区征税，税务官的收入以其所征的税金为基础，按一定比例提成。因此，只要税务官有耐心，不怕辛苦，就可以从联邦政府那儿获得较高的收入。威廉确实做得很好，他的财富日益增加，凭着这份津贴，他开始了他的第四份职业，进入银行业。

威廉在圣路易斯国有商人银行任副总经理，但他在该银行的业绩平平。然而，在银行的客户中，有一家桥梁公司，该公司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建造一座横跨密西西比河的大桥。威廉参与了该项风险工程，继而成为该公司的财务主管和总经理，从而开始了他一生中的第五项职业，一项给他带来荣誉和声望的职业。

这家公司的经营一开始就很成功，最后发展成为圣路易斯铁路总协会。该协会为所有经过圣路易斯的铁路建造了联合车站，并用其自有的机车承担起从圣路易斯东部往西直至终点站的全部运输业务。威廉正是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充沛的精力，扫除了工商巨头和城市铁路委员会设置在他面前的种种障碍。在克服了重重困难、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后，他顺理成章地当选为董事长，这是一个清闲而又荣耀的职位，他一直担任到1896年，在70岁时退休。退休后，他仍然忙于各种社交活动，并赢得了人们广泛的爱戴、崇拜和尊敬，直到1913年去世。

弗兰克·威廉·陶雪格的母亲——阿蒂丽·沃帕尔——是莱茵河上一个小村庄里一位信仰新教的教师之女，这名教师在1848年大革命期间被解雇，因此举家移居国外。威廉与阿蒂丽于1857年

结婚。阿蒂丽是位迷人的女子，能干又温柔，美丽又善良，性格开朗，感情丰富。她在逆境中给人以安慰，也是成功道路上令人愉快的伴侣。她有一副动听的女中音歌喉，与丈夫共享着对音乐的热爱。她的慈爱像温暖的港湾，在她长期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家庭中从未发生过任何问题。很容易想象这个家的样子，她为丈夫和孩子创造了有序而又宽松的环境，三个孩子——本篇传记的主人公、比他先去世的弟弟和比他长寿的妹妹，都无限热爱她。家庭中所有成员都热爱这个家。毫无疑问，出自这个家庭的弗兰克·威廉·陶雪格也是一个极其重视家庭的人，对他来说，家庭生活和对家庭的责任是安排任何事情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正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弗兰克·威廉·陶雪格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童年。他的妹妹这样描述他：

> 毫无疑问，他在学习上名列前茅，而且他很早就展现出良好的身体素质。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大男孩，手中总是拿着一本书，或是为了学习，或是为了消遣。他读书时全神贯注，什么也不能使他分心，除非那本书根本吸引不了他。他习惯于在家中的客厅里读书……至于他就读的学校，那是一所公立学校，他一直上到大约 11 岁。后来，他去了史密斯中等学校……那时我们家中总是回荡着音乐旋律，我们都可以看到像鲁宾斯坦①和温尼威斯

---

① 安东·格里戈里耶维奇·鲁宾斯坦(1829—1894)　俄国钢琴家、作曲家。毕生不断往返于俄国及欧洲各国，从事演出和创作。1858 年在彼得堡创设"俄罗斯音乐协会"，1862 年建立俄国第一所音乐学院——彼得堡音乐学院。其演奏富于表现力，强调表演者的再创造，对俄罗斯和西方钢琴表演艺术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主要作品有歌剧《恶魔》、《第四(a 小调)钢琴协奏曲》、声乐套曲集《波斯恋歌》等。其弟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鲁宾斯坦(1835—1881)为钢琴家、指挥家，常在莫斯科、彼得堡举办音乐会，1859 年创办"俄罗斯音乐协会莫斯科分会"，1866 年建立莫斯科音乐学院，自任院长，并从事钢琴教学。——编辑注

基那样的艺术家。还有西奥多·托马斯，只要他到圣路易斯来，就会来到我们家。弗兰克很早就开始学小提琴，他的老师是当时圣路易斯最有名的小提琴家，也是我们家的一位亲密朋友。弗兰克上大学时，小提琴演奏水平已经很高，在大学时，他定期在一个弦乐四重奏小组里表演，他还是彼尔瑞乐队的成员之一。音乐是他生命中欢乐的源泉……除了在夏季作短期的游览外，平时他很少外出旅游。

陶雪格和查尔斯·C·伯林格姆先生之间的终生友谊始于1871年，他们后来一起进入华盛顿大学，1876年又一起转到哈佛。系主任查尔斯·F·邓巴的直觉是对的，因为他允许这两位学生免考直接升入二年级，尽管按规定他们必须参加新生入学考试。陶雪格租住在牛津大街一座在伯林格姆看来是富丽堂皇的房子里，这说明他是个优秀的学生。他努力学习经济学的每一门课程，如政治经济学，同时还学习大量的历史知识，1879年他毕业时以历史学的"最高荣誉"获得者身份参加了毕业典礼。他的毕业论文题目为《德国中的新帝国》。他还被选入"联谊会"，这是美国全国性的优秀大学生的荣誉组织。在大学图书馆的记录里还可以查询到，1878—1879年，他借阅了大量关于历史和哲学的图书。但他绝不是个默默无闻的书呆子，他参加了班级棒球队，作为六桨船的一员参加划船比赛，他还加入了六个俱乐部和学生团体。他兴趣广泛，当然这其中肯定少不了他的至爱——小提琴。

陶雪格在获得学士学位后，于1879年9月在另一位终生挚友E.C.费尔顿先生的陪同下去欧洲旅游。"在伦敦共度了几周后，我们分别了"，陶雪格不久之后写道，"我来到德国，在那儿

待了一个冬天，从这年的10月到次年的3月，我在柏林大学研究罗马法及政治经济学。3月离开德国。在意大利，我们又一起待了两个月，然后一起经由日内瓦到达巴黎。5月，在巴黎，我们又一次分别，费尔顿从英格兰回家，而我依然在欧洲各地旅行，主要是在奥地利和瑞士。"在欧洲旅行期间，他在纽约《民族》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文章，这些文章充分反映了这位年轻人严谨的治学态度。

为了能进入法学院学习，1880年9月，陶雪格回到了哈佛。当时他还没有选定经济学作为他的研究方向，因为此时他更钟爱法律。后来，他接受了艾略特校长的校长秘书职位。虽然工作繁重，而且不是专职工作，但他被引入了大学行政管理和大学政治的神秘领域。于是，他开始担任这项服务工作，并且在以后60年的生活中，一直以此为中心。

二、事业上升期(1881—1900)

陶雪格打算学习法律，这一决定使他的秘书工作耽搁了，却使他有了更多的精力去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陶雪格选择美国关税立法史作为他的研究课题，这一选择说明了历史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当时像陶雪格这样对科学具有强烈兴趣的人都认为，经济政策等重大问题属于历史学的研究范畴，历史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至关重要。在这里有必要强调，而且下文也将说明，陶雪格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理论家，而且是一位十分伟大的理论知识的传授者。后来出现的那些崇尚制度学说的他的理论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制度问题是陶雪格研究的重要部分。他们不仅十分尊重他，而且认为，与其说陶雪格是一位对手，倒不如说他是一位制度学说的先驱。陶雪格认为，经济学永远是指政

治经济学。他所接受的早期教育和后来的研究对象不仅仅局限于历史理论，而且还涉及重要的历史事件。总之，他的研究兴趣很广泛，包括历史、法律、政治制度等多方面，而且每个认识他的人都不得不佩服他：对任何问题，他都能一眼看出它们的社会背景，预测其发展趋势。

他选择的国际贸易课题，也说明了他彻底的历史主义精神。1882年的获奖论文《美国对幼稚工业的保护》是他的博士论文，并在1883年出版。这本书很成功，1884年又出版了第二版。这本成功的书涉及到的理论不多，却运用了他擅长的以事实为基础分析问题的方法。这一成就带来的另一方面的后果是，它预示了陶雪格日后在关税政策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这是陶雪格杰出成就的重要方面。他的判断全面而成熟，这正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所必需的重要才能。陶雪格的这部著作正反映了他令人惊讶的过人天分。由于美国的政治背景和经济措施，陶雪格对美国的关税立法持怀疑的态度。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也不是一位自由贸易者。他坦率地承认，贸易保护的理论并不是没有缺陷，但在一定程度上是站得住脚的，特别是对幼稚工业有着保护作用，然而，自由贸易对经济也有促进作用。因此，像对其他问题一样，陶雪格对这个问题持现实而公正的态度。

在以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他在该领域的研究一帆风顺。继《美国对幼稚工业的保护》一书之后，1885年，他又出版了《现代关税史(1860—1883年)》一书。这两本书发展了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1888年出版的《美国关税史》一书，到1931年连续再版了七次。这本书使他一举成名，并且成为美国在该领域的第一位学术权威。事实上，作为一位政治、经济分析家，在任何领域都难以找到像他那样的成功者。那时他的大部分论文都是关于

关税问题的，但是，他还关注其他方面的问题，并在其中两个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政治、经济两方面，关于银的问题的研究深深吸引了他。由于他对政治、经济知识的全面彻底的掌握，从1890年开始，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1891年出版了《美国银的现状》一书，该书成为反银学派的经典著作，并对文明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影响。1891年，他在《经济学季刊》杂志上发表了《对铁路普及率理论的贡献》一文，与他在1893年前发表的所有文章不同的是，该文采用了纯理论的论证方法。即便如此，他论述的仍是实际问题，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完全掌握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但是直到30岁以后，他才对这种分析方法表现出特别浓厚的兴趣。

1884年，他为埃米尔·德·拉维莱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一书的译本撰写了序言[①]，从而也表明了他对传记的相当大的兴趣。该序言可能是当时陶雪格方法论观点的惟一反映，也从其他渠道增加了我们对陶雪格在经济政策方面的主要观点的认识。作为伟人，陶雪格具有鲜明的个性。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写诸如此类的序言时，要么运用恭贺赞美之辞，要么干脆完全拒绝。陶雪格不是这样的。他除了用简洁、朴实的文字表示赞美外，还用极其礼貌的措辞表示他的异议和批评，并且指出了他认为错误的地方。他真诚地指出，拉维莱的一些观点“缺乏可信度”，他赞扬拉维莱，因为后者与其他人相比，“没有完全摆脱古典理论的束缚”。陶雪格有保留地同意该书作者对放任主义的批评和对政府干预的拥护。虽然陶雪格认为拉维莱的人道主义

① 他还写了一篇补论，这篇文章非常重要，是专门探讨实际问题的。它的题目是《美国的经济问题》，以14页的篇幅专门论述了关税、国内税、货币、银（在这里，他对拉维莱书中的复本位主义观点持不同意见，并尽可能强烈地与之展开了辩论）、美国航运和航海法的问题。

色彩过浓，但赞扬他“以事实为依据”的做法，指出该书总的内容是正确的，但有一章缺乏“深刻的论证”。

从陶雪格发表的著作来看，作为理论家，他对理论的兴趣最早出现在他1893年在《美国经济协会会刊》上发表的两篇论文——《李嘉图的解释》和《马歇尔教授对价值和分配问题的探讨》——中，这两篇文章以足够多的证据来证明他的结论。从第一篇论文我们得知，对于陶雪格来说，李嘉图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从这个杰出的理论家所写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推断出，在陶雪格生活的年代，为什么李嘉图的惟一竞争对手是庞巴维克。陶雪格欣赏并吸收了这两位伟人的观点，因此，在理论风格上，这三位伟人的思维方式存在着基本相似之处。他的第二篇论文清晰地阐述了他和马歇尔主义者的相似之处，陶雪格采纳了马歇尔的理论，并以此作为他的研究内容之一。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论。

1894年，陶雪格在《美国经济协会会刊》上又发表了两篇论文，这两篇论文在陶雪格创造性的理论著作中占统治地位。这两篇论文是：《利息与利润的关系》和《德国经济学家手中的工资基金》。这两篇文章是他后来研究的课题“工资与资本”的一部分，并为他1896年出版《工资与资本》一书奠定了基础。1897年，他的《货币数量理论》一文，由美国经济协会发表，这为日后“陶雪格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现在，让我们回到陶雪格的大学生涯。很明显，对陶雪格来说，1881—1896年是一段比较艰苦的岁月，因为他给自己增加了更为严格的专业活动。他是《公共服务档案》编委会的成员，他在《波士顿先驱》、《广告人》、《民族》等杂志发表文章，还参加科布顿俱乐部和马萨诸塞改革俱乐部等社团的一系列活动。这对一个强壮有力的人来说都已经超出了体力所能承受的范围，但

他却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尽管他尽量挤出时间来维持对音乐方面的兴趣,但对他来说,这种时间少得可怜。

与此同时,在1882年3月,他很偶然地被任命为1882—1883年度政治经济学讲师,这次委任的重要原因是这个学术年度惟一正式的经济学教授查尔斯·F·邓巴的缺席,这意味着基础课程,即现在的经济学A课程,被委任给了这位年轻人。

现在我们已经第二次遇到了任何有关陶雪格的传记都不得不谈及的优秀人物邓巴。邓巴不仅是第一位介绍陶雪格到科学领域——日后陶雪格成为这个领域中的杰出的领导人——的老师。如果我们拿他的一些论文跟陶雪格早期的作品相比,不难发现,无论是在格调、文风,还是写作方法上,两者都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是邓巴教授预见了陶雪格的未来并选择了他。邓巴曾经是《波士顿每日广告》的编辑,在校长艾略特的再三邀请下担任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授,那时政治经济学已经被弗朗西斯·鲍恩教授作为道德哲学课的一个部分来讲解。由于陶雪格曾在邓巴的一门课程中担任助手,因此,可以这样说,陶雪格被任命为讲师,与邓巴的推荐有很大的关系。

邓巴回校后,由于论资排辈现象,陶雪格的前景明显地显得黯淡了。当时,任何处在哈佛最底层却真正有能力、有抱负的年轻人都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是把无限多的时间花费在一个不太满意的职位上,还是去从事更具吸引力的其他职业?陶雪格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1883年6月,他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同年9月接受兼职讲师的职位,讲授关于关税立法的部分课程。同时,他打算花三年的时间进入哈佛法学院学习法律,然后再进行实习。1886年6月,他获得法学学士学位,此前(几个月前),他拒绝了哈佛大学任命他为专职讲师的邀请,而接受了为期五

年的政治经济学助理教授[1]的工作。

从世俗的眼光来看，陶雪格涉足法学是一种损失，因为他最终的研究领域是经济学。但是，不可否认，这种选择对陶雪格日后的事业不无裨益。首先，法学训练对陶雪格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对于现代经济学家必须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才能在其研究的领域内有所建树，目前尚无定论，但培养各方面的能力却是一个可能实现的目标和合理的理想。其次，法学训练也许是提高经济学家逻辑思维能力的最好方法。最后，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法学所讲授的内容，肯定与经济学的内容有一定联系，特别是罗马法被列入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后，法学研究对探讨经济学制度、法规等方面的问题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帮助。陶雪格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用法学的思维方式来分析经济问题，从而受益无穷。事实上，在他的工作中，在授课和研究两个方面，任何一个善于观察的人都能体会到，他的知识涉及到了经济与法律两个领域。

1886 年秋天，陶雪格开始朝专职教授方向努力。他继续讲授已教了一半的关税法课程，那些一般的基础性课程也都由他讲授。他开始讲授著名的以后被称为"经济学Ⅱ"的课程。另外，其他的课程也不时地加入他的授课内容中。

1892 年，陶雪格被正式提升为专职教授，1901 年，新成立的亨利·李教授职位机构也授予他教授的职位。当时他写道："我很希望在剑桥生活，为哈佛工作一生。"实际上，1886 年的任命对他的一生起着决定性作用，陶雪格自己也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从此以后，他安顿下来，在 1890 年的课堂报告中，他用总结性的语气说，从 1886 年开始，他"过着大学教师的平静生

---

① 与中国不同的是，助理教授的级别高于讲师、低于副教授。——编辑注

活”，这反映出他对当时的生活比较满意。有一次，他在学校的校庆会上这样说：“我非常幸运地被及时选定参加本校建校 250 周年的庆祝会。作为全校最年轻的高级教师，看来我比其他人更有机会参加学校 300 周年的庆典。”这些话，反映了他对哈佛怀有深厚的感情。

1888 年 6 月 29 日，陶雪格在纽黑文的埃克赛特结婚了，新娘是波士顿的伊迪丝·托马斯·吉尔德。他们的儿子名叫威廉·吉尔德·陶雪格，生于 1889 年。那年夏天，陶雪格在后来被称为诺顿住宅区的地方建了一座房子，希望“在这里长期过着和平与宁静的生活”。他的大女儿玛丽·吉尔德出生于 1892 年，后来和杰拉尔德·C·亨德森结婚；二女儿凯瑟琳·克劳生于 1896 年，与莱德弗·奥比博士结婚；三女儿海伦·布鲁克斯生于 1898 年，后来成为医学博士，曾在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当儿科医生。

除了教书和搞科研，他还不停地参加各种活动。他常写一些文章反对银的自由兑换。1893—1894 年，他成为剑桥学派委员会的成员、马萨诸塞州政府税收法令委员会的委员、波士顿商会印第安纳波利斯货币公约组织的代表等等，他还在大学里从事他并不感兴趣的行政工作。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888 年，他当选为美国文学与科学研究院院士，1895 年担任了英国皇家经济协会驻美记者。这些，或许在一个小人物的一生里是很重要的，但在这里叙述仅仅是为了让为数众多的对陶雪格感兴趣的朋友和学生了解他的整个经历。对他们，我还要补充的是：1894—1895 年，他休假一年去了国外。在此期间，他通过大量阅读意大利的有关书籍，进一步强化了专业知识。

许多工作等着他回来做，他所在的系发展很快，上基础课的学生超过了 500 人。他觉得给这 500 名学生上课是一个很重的

负担，但是他也从中获得了很大的满足，因为这给了他一个“接触大量的大学本科生的令人振奋的机会”。而更令他满意、使他大受鼓舞的是1896年被任命为《经济学季刊》的编辑。这个职位他在1889—1890年邓巴不在的那段时间里曾临时担任过，他从1896年一直担任到1935年。最后，我们借助于从他1895年的课堂报告中摘录的一段话，给他这个阶段的工作作一个恰当的总结：

> 在大学从事行政工作时，我坚决支持将大学课程缩短为三年。我主张修改各国进入国际市场的条件，使之实行公平竞争，取消希腊的任何优先权……从各任课教师候选人提出的课程中选择将开设的课程……在政治方面，我是一名令人头痛的无党派者。我期待着出现这样的一个党派，它能坚定地贯彻适当的税收政策，执行健全的货币政策。要做到这一切，首要的是进行文职部门改革，组建正直、诚实的政府。

三、中年(1901—1919)

尽管已经42岁了，陶雪格并未感到衰老。在他的生活中，也从来没有出现过急躁或狂热情绪。他的声誉依然极佳，而且劲头十足。尽管如此，他却突然发现自己无法像以前那样工作，他得了神经衰弱症，这种疾病在教授或以学术研究为职业的人中发生的概率较高。为了彻底放松自己，陶雪格离开哈佛，去国外游历了两年。他先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麓的梅兰度过了一个冬天，接着来到意大利风光秀丽的度假地里维埃拉，又在瑞士度

过了1902年的夏天。这样，他恢复了体力，避免了一场灾难。1903年秋季起，他回到哈佛大学重拾教鞭，并且继续从事《经济学季刊》的编辑工作。此后，他在1904年与1905年连续当选为美国经济协会主席，但这些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1901—1905年，他在学术成就方面是一个空白。

到1905年末，他又恢复到从前的样子，重新成为一名教师兼学者了，但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注意自己的健康。正是在那个时期，他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他的讲授艺术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成为举世闻名的教师。在学术领域，他继续从事他一生中最初的选择——国际贸易的研究。这些年中他的大部分论著都集中在这个领域。他的努力没有白费，收获颇丰，1915年他的《关税问题面面观》一书首次出版，这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杰作，运用了大量产业界的事实进行分析，1931年出版了该书的第三版。

同时，在1915年，陶雪格把他在布朗大学所作的一系列讲座的讲稿以"发明家与会赚钱的人"为题出版。此书是他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的研究成果的汇总，而且他也是最有资格写此书的人。我们把他研究的整个领域称为经济社会学，或者称为经济活动社会学，其中包括他对制度问题的研究，也包括他对个人或集体在制度约束下的种种行为的研究成果。在这个广阔的研究领域，有必要对不同的企业家及其不同的行为作现实的分析。随着时间的流逝，陶雪格在这个问题上倾注了越来越多的心血。

但是在1905—1911年这段时间里，他将大部分精力用来撰写《经济学原理》一书，这是他"多年教学与思考的结晶"。这部两卷本的著作于1911年出版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本书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使用最广泛的经济学教科书之一。这部杰作反

映了一位优秀教师的业绩及智慧，无论用什么言辞都不足以形容它的成功。另外，陶雪格的教学内容不仅仅局限于讲授经济事实和分析问题的方法，他还讲授态度与精神。他承认经济学家的权利与职责是判断公共政策、引导公众舆论、确定合理的经济目标。有关这个问题，虽然有人持怀疑态度，但他始终抱着坚定的信念，并且以他生来固有的强烈责任感来履行这一职责。像马歇尔一样，他讲授的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真理，并且要揭示它们之间的关系。他的讲授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像亚当·斯密那样，他坚信传授经济学就是传授人类的美德。为此，他进入了世界伟大的经济学家的行列。

但是，这还不是他的全部成就。人们总认为，无论对错，教科书起着知识的传播者的作用，如果想对某学科有一个系统的了解，就必须阅读一本教科书。在陶雪格的著作中，相当多的资料是他自己探索的结果，他通过自己的思考，使其理论自成体系。这一点在他写的第四本关于国际贸易的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货币银行学》、《劳动》、《经济组织的有关问题，如铁路、实业联合体、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以及《税收》等著作，都集中反映了他的很多个人观点。

他的第一本书《生产的组织：财富与劳动、劳动分工、大规模生产等》，除了用传统的方式全面介绍经济学学科外，还在《资本》这一章里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观点。这一观点以后又体现在他的第二本书《价值和交换》和第五本书《分配》中。这些专著反映了陶雪格对我们现在所称的古典经济学派的独到见解，这也标志着经济学的教学从旧的古典时期（斯密—李嘉图—穆勒）向现代的理论研究的过渡。他的学术体系建立在《工资与资本》一书的基础上，而他最为重要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思想体现在1908年发表于《经济学季刊》的《资本、利息与收益递减》和1910

年发表于《美国经济协会会刊》的《工资理论概要》这两篇文章中,其中的许多观点甚至可以说是现代思想家都无法接受的。具有现实意义的是,这些成果使他在马歇尔和威克塞尔等一流的著名经济学家中争得了一席之地。

他的伟大著作《经济学原理》一书的最终定稿工作是在一片悲哀的气氛中完成的。陶雪格夫人的健康状况一度让人担忧,1909—1910年,陶雪格休了一年的假。他们在纽约州的萨拉纳克度过了这一年,1910年4月15日,她在那儿溘然辞世。

然而,陶雪格仍坚定地继续他的教学研究活动。他常引用的一段话,也是他在1914年学位授予典礼上所作的报告中的一段名言,可以准确地勾勒出他在1917年以前工作与生活的画面:

> 过去七年,我的生活非常平静。冬天在剑桥工作,夏天在科都伊特的家中度过。我仍旧讲授与前几年差不多的课程,并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经济学Ⅰ",即第一门经济学课程中,这也是如今学院中选修人数最多的一门课。我们系有一项政策,这也是学院的一项总的原则:不要把一般基础性课程压在青年教师们的肩上,而要让年纪稍大、经验丰富的教师来承担这些课程。

1912年,作为波士顿商会的代表,他出席了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商会代表大会,在欧洲作简短的访问时,表达了他的这一思想。同年9月,他以计划委员会代表大会主席的身份出席了在波士顿举行的国际商会代表大会。

1917年初,他短暂而出色地担任了一个新的职务:关税委

员会主席。这个职务他共担任了两年半。他的天性决定了他乐于为社会服务，而且他一生都是一个优秀的公仆。

建立一个新的公共机构，制定其宗旨和工作程序，创设一套新的惯例，是公共行政学中难度最大的一项工作。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而在美国这样一个任何新设的机构都难以排除顽固的官僚主义工作作风的国家尤甚。在美国当时的行政管理条件下成功地完成这样一项工作，无疑证明了陶雪格不同寻常、强有力的个人魅力，而且既懂科学、又懂法律的陶雪格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这项工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认为，委员会必须以调查研究为基础，然后再采取谨慎的步骤。他还认为，对一些不法事件，必须采取法律手段，而不是仅仅以片面的报告来敷衍。在他的领导下，关税委员会承担起了对《关税法案》中所列大宗商品的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工作，从而为国会随时修改《关税法案》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依据。

另外，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修改《海关管理法》的计划，这在当时简直是一件难以置信的麻烦事，因为这个法规是从1799年一直沿袭下来的。事实上，委员会的计划很快就被全都采纳了。

他还提出了设立自由港、自由区的报告及国与国之间提供互惠条件、签订贸易协定的报告。这两个报告不仅仅是委员会杰出工作的一部分，而且对国家政策的形成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两个报告也是他私人工作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他的个人观点。由于他思维开阔，广泛吸收各种合理的意见，因此，他并不是靠其行政上的职务成为杰出的权威人士，成为他所研究的领域的领导人。对此，在他辞职后不久，关税委员会在其制定的《第三个年度报告》中这样说：

陶雪格博士的辞呈于1919年8月1日正式生效，

委员会因此蒙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失。许多年来，他在美国关税史和关税政策方面的知识超过了任何一个当代的美国人。他在这方面的著作和大量论文对广大学生和立法者起着长期的指导作用。同时，他在其他领域的造诣、对商务的了解及与商界人士的广泛接触，使他的著作和观点克服了专家们通常犯的知识面狭窄的毛病，使他能够正确预见关税政策及其实施细则的意义。他既有学者和理论家的眼光，又有实际工作的知识及判断力。他把理论与实际高度地结合在一起，再加上他强有力的个性和不竭的精力，因此，他被总统指定为关税委员会的主席，得到了人们普遍的认可，对委员会正确、公平和有效地开展工作起着积极的作用。在以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以其智慧不遗余力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对委员会的组织、工作计划与实施、调查研究、收集意见和提供指导等工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帮助。

国家卷入战争后，陶雪格的职责很快超越了关税委员会本身的工作。他成了战时工业局的定价委员会委员，并且曾有一段时间任职于食品管理局的谷物部及其下属的一个肉类包装工业委员会。很快，他就变得不堪重负，因此他不得不减少工作量。然而，在威尔逊总统的要求下，他保留了定价委员会的委员资格和关税委员会的主席身份。

威尔逊总统充分意识到与这样一位才华出众、热心公益事业且大公无私的顾问合作的价值。因此，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关系。1918 年 1 月，陶雪格就一些超出自己职责范围的问题向总统提出建议，特别是关于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目的问题。

因此，他被邀请加入和约咨询委员会。当然，他义不容辞地参加关税委员会及商业协议小组委员会的工作，他还作为发起人，参加了经济条例委员会。总之，他在国内或国外事务的很多方面都提供帮助，提出建议。

他曾怀着一种不怕任何报复与困扰的心情，坚定地代表正义和公正一方，远赴巴黎，参加巴黎和会。毫无疑问，他的许多个人观点来自于他的官方经历，他真正做到了坚决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机智地抑制许多不合理的要求。他的工作产生的影响究竟有多深远，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我们也永远无法精确地得知他对和约的不合理条款的想法与感受，仅能从他在波士顿拥护政治统一团体发表的《巴黎和会经历记》一文中略知一二。他在那愉快而近乎闲聊的家信中写道，他每天忙于日常事务和对周围事物的观察。也许他所做的与所想的部分来源于他平时的闲谈，但他从不谈及自己所担忧的工作。针对别人对他的批评，他总是保持沉默。我们中的一些人也许会对此感到遗憾，认为他应该有权利进行反驳，可他却没有，但是这正是一个人的高尚之处。无论他说什么或做什么，他都被一种深深的责任感激励着，从不使他的合作者失望。

1919 年 6 月，他递交了从关税委员会辞职的辞呈，8 月，辞呈生效。1919—1920 年，他为总统工业协会工作，并在糖平均委员会工作到 1926 年。

四、元老(1920—1940)

陶雪格在他 60 岁时回到了哈佛，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他的声望和权威性日益提高。他怀着年轻人般的热情，继续完成他早年"在剑桥生活，为哈佛工作一生"的誓言。

他的生活又一次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他整天愉快地工作着，有时进行轻松的、短时间的散步，夏天他会去科都伊特进行长时间的游泳，晒日光浴，晚上偶尔也会欣赏一场音乐会。他仍然有很多应酬，他的大多数应酬往往是关于学术方面的。在他强烈的个性及优秀的品质影响下，他的聚会总能被安排得恰到好处，他总爱告诉餐桌上的朋友们教学中的趣事，高尚而含蓄的外表遮不住他愉快而慷慨的天性，这一切使他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导师。他那闪光的美德、活泼的风格和他本人的形象，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1918 年，他与劳拉·费雪小姐结婚，他的慈祥和她的爱笼罩着他的家庭，而且使那些对这位伟大的学者充满了敬佩之情的年轻人感到无比欢欣。

在他的整个职业活动中，《经济学季刊》的编辑工作占据了重要位置，该刊物已成为他生命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也是《经济学季刊》的顶梁柱。《经济学季刊》的编辑工作，给了他一个向世人展现他的服务与成功的机会。1896—1936 年，在 40 年的时间里，除了一次为期两年的停顿和几次短期的中断外，为了《经济学季刊》的发展，他怀着极大的热情投身于阅读和批改手稿、约稿、向作者提出修改建议等事务中。除了秘书所提供的有限帮助外，他一直都在孤军奋战，直到 1929 年 A.E.门罗教授到来后，这种情形才得以改变。他取得的巨大成功，无疑归功于他保证《经济学季刊》稿件的高质量的努力，可以说，《经济学季刊》为全世界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像陶雪格这样的成就当属罕见，事实上也很难想象在编辑这个领域还有人能达到他那样的成功境界。要寻找陶雪格在此领域成功的秘诀，首先要了解他那有力与宽宏大量完美结合的个性。他严格管理着《经济学季刊》，并坚持使自己不被委员会所左右，虽然他有时也会听取他人意见，但总能独立地作出决

定。在一般情况下，如果一个人有上述行为或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往往会变得狭隘而武断，而陶雪格却是个例外。他往往一眼就能看透来稿质量的高低，根据来稿的质量决定是否采用，至于作者论述的方式或结论是否符合他的口味，对他来说倒无关紧要。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他对含有大量数学知识的经济类稿件的态度。虽然称不上不喜欢，但陶雪格对用数学模型来反映经济理论的方法持怀疑态度，可是，他仍然欢迎此类高质量的论文，尤其喜欢 H.L. 穆尔的投稿。在他编辑生涯的最后几年里，他还十分乐意地接受了一本在数学方面技术性很强的经济类专著。由于精选作品的苛刻习惯，他发现自己面对一个所有科学期刊的编辑都面临的问题，即：如何缩小刊选作品与大众口味的差距？一方面，他希望《经济学季刊》的讨论内容符合当时的经济形势；另一方面，他更乐于致力于讨论按照一般原则来处理与解决的问题，他试图寻找——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找到了——人们拥有永久兴趣的话题。除此之外，他还选择一些时事评论文章，从而解决了困扰编辑们的难题。

就是这样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编辑，后来成了一名职业教师。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他在哈佛大学当教师时人们对他的评价。我们一直强调他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在他的工作领域内没有人可以与他相比。不可否认，他不仅仅是他自己的对手，还是国际贸易学术领域的先驱。他在该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且他关于经济问题的总体看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这样，在教学方面，他那具有大师风范的教学艺术在国内外都是其他人难以企及的。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教学方法。

我们已经知道，他那激动人心的讲演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教师，他举世闻名的声誉来自于他从 1928 年就开始

进行的教学理论的研究，特别是他喜爱的研究生“经济学Ⅱ”课程的开设。这是一门介绍美国学者的经济思想的课程，后来美国许多高校广泛开设了此课程。他的成功还在于，他采用的课堂讨论的教学方法，都是先根据当时的经济形势科学地提出讨论题目，然后再决定讨论方式。

他首先认识到，经济理论和其他学科的理论一样，不仅仅是一个方法论与哲理的宝库，也是分析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的工具。因此，陶雪格认为，老师也应向学生传授对待事物的方法、思考问题的习惯和针对事实发现问题的艺术。但是学生仅仅知道这些还不够，还必须学会运用。陶雪格通过“苏格拉底对话法”达到这个目标，也就是说，在每一次班级讨论会上，他总是针对某一特定问题要求学生展开讨论。令人佩服的是，他总是知道如何使讨论变得生动有趣，让他的学生们争辩个明白。在陶雪格的指导下，每次讨论都获得了圆满成功。有一次，他在结束讨论课后对一位朋友说：“我对我今天的表现不很满意，因为今天我自己说得太多了。”

在选择授课内容时，陶雪格总是选择介于过去和未来学说之间的中间课程，在他那个时代，被称为古典经济学的学说——1776—1848年间英国一流经济学家的观点和方法——已渐渐过时，但当他传授马歇尔主义等较新的理论时，总是考虑介绍古典经济学的背景。同时，在他所处的时代，各种经济学说层出不穷，他密切注视着这些理论的发展动向，只要该理论的基础是站得住脚的，就介绍给学生。这种做法对他日后成为一名成功的教师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抛弃那些仅仅是少数人感兴趣的改进方法，同时也唾弃逐渐过时的东西。

学生们深深地爱戴他。他除了用丰富的智慧与经验来讲课外，还表达属于自己精神世界的东西，从而反映了他的高度的责

任感。他最后十年的研究成果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从他1920—1934年发表的近六十篇科研成果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国际贸易的。这些科研成果中包括他在关税委员会任职时的作品，以及有关战争和战后阶段暴露出来的问题的研究成果。这些理论发展了古典学派理论，因此，他比那些贬低古典学派的人更成功。1920年，他发表了文集《自由贸易、关税和互惠贸易》。1927年，为《国际贸易》这部巨著的出版，他暂时中止了他很感兴趣的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活动。

这部论著的新颖独到之处在此暂不介绍，但是，总的来说，它反映了陶雪格无与伦比的清晰思路，包含了陶雪格在这一领域所做的大量工作和教学的成果。这部结构严谨的著作的真正价值在于创立了国际贸易的理论体系，从而为以后的理论学家排除了很多障碍。就其内容来说，它扫除了现代理论家面临的障碍。他采用多种方法，提出条件假设，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进行研究。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国际贸易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果脱离大量的附加假设条件，该书中的论点将难以站稳脚跟。他的这种分析方法，使得许多人认为陶雪格是古典学派的代表之一。他用科学的眼光，以李嘉图学派的理论为武器，来证明他伟大的原材料的国际分配方案。在真正吸引他的实践工作方面，他所取得的成就也着实令人吃惊。名家们不愿舍弃过时的方法往往不足为奇，但利用过时的方法巧妙地创造奇迹却不能不使人叹服，陶雪格正是这样做的。

然而，这一理论并非陶雪格的全部成就，甚至也不是他的主要成就。撇开其渊博的知识、无穷的智慧和敏锐的政治见解不谈，仅仅限于科研领域，我们也不得不由衷地钦佩陶雪格本人使用并传授给学生的按照计量经济学的思路研究问题的方法、理

论联系实际并用实际事例来验证理论的方法和当时流行的按照时间顺序分析问题的方法。另外，他用经济史作为工具来分析问题的方法也产生了深远的意义，从而使经济史学家懂得经济理论，使理论家了解历史。

第二，1932年他与C.S.乔斯林博士合作完成的著作《美国商业巨头的兴起》，树立了他工作史上的又一块里程碑。我们已经知道陶雪格在经济社会学方面的浓厚兴趣。首先吸引他的是个人行为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从此，他研究的方向有了改变。少数经济学家认为，应由社会选择其领袖，他是其中之一。这些领袖的组织及其活动对社会起着重要作用，例如，封建社会的武士对社会的发展与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个问题，他作了大胆而又富有创造性的尝试。他还通过调查表了解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及其后代对美国工业所起的作用，从而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无论我们如何判断陶雪格通过搜集原始资料来作出结论的方法的价值，我们都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通过从各个方面观察问题，还事物以本来面目，这种研究本身就是一种天才的创造。

第三，在他出版发行的理论文章中，我们还必须提及他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的两篇论文。一篇是1923年发表的《成本曲线研究的贡献》一文，该文值得一提，因为这个论题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这篇文章是他在关税委员会的工作成果。他在文章中提出了总成本曲线理论，这一理论虽然并不完善，但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另一篇是在1921年发表于《经济学季刊》的《市场价格明确吗？》一文，该文是对科学思想的又一促进。正如我们所知，陶雪格是第一个面对以下事实的经济学家：如果在经济学中运用定量分析，那么经济学理论迟早将由静学向动学发展，由研究一般均衡向纵深发展。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这

种领先的方法还未正式运用，但这一天一定会来到。

时光流逝，阴暗的日子也悄悄向他逼近。从 1932 年开始，陶雪格就没有什么大成就了。在教室里，他仍然从事着他的卓越的工作，但慢慢地，他开始感到力不从心。这对像他那样视工作为生命的人来说，无疑是极大的痛苦，他于 1935 年辞去了杂志主编的职务，1936 年辞去了编辑职务。后来，他在辞职报告里说：

> 我的同事和朋友们说他们对我的辞呈表示遗憾，他们的善言使我感到我已成功地达到了我长久期待的目的，这就是，当我退休时，人们会由衷地说"这是一个遗憾"，而不是说"是该退休的时候了"。

令人欣慰的是，当他辞去杂志社的工作后，他又全身心地投入了另一项工作。《经济学原理》一书长期以来都是他十分关注的问题，由于该书第三版的校订比较仓促，不能令他满意，又鉴于 1914 年以后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化，该书已难以适应实际形势，因此像其他学科一样，其内容有待充实与完善。于是，他集中全部精力，投入到对该书进行修订的艰难的工作中，他对此书的部分内容进行了重新编写。另外，他还彻底修改了《货币银行学》和《分配》两书。在合作者的有力配合下，他完成了《经济学原理》的最后修订工作，1939 年 3 月，完成了该书序言，从而结束了该书的修订工作。新修订的著作的总体结构、写作角度、写作方法没有变化，其理论上的基本结构、基本原则也未改变。

像陶雪格本人那样，他的作品也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即使是一个强烈的折衷主义者也不能抹杀其作品的特点。结合美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从他的作品中，我们更能深刻地认识美

国经济发展的特征。首先是汉密尔顿及其他像他那样充满着智慧、具有实践知识的专家，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不仅仅对经济学进行哲学的探讨，还对其他有关的问题进行研究。但这在美国仅仅是开始，还未形成气候。接着出现了像丹尼尔·雷蒙德这样的追随斯密理论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后来出现了亨利·凯里等有创造性的、不受任何理论束缚的思想家。在南北战争及战后，情况开始向好的方面发展，尽管起初发展较慢，但后来发展很快。陶雪格对这种变化发挥了更多的促进作用。但是，在陶雪格性格形成期间，像其他习惯于进行严肃思考的人一样，他从穆勒那里学到了一些基本理论。要学好穆勒的理论，必须首先了解李嘉图的理论特征，因为陶雪格认为，这两人的理论实质上有相似之处，而且具有指导意义、值得借鉴，但不能全盘照搬，而应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但要做到这一点，任何以李嘉图理论体系为基础研究问题的人，包括马克思在内，都遇到了困难。当陶雪格努力研究李嘉图名著的第一章第四部分时，他接触到了庞巴维克的理论，这对他详细地阐述资本与工资理论产生了很大帮助。陶雪格与马歇尔的研究途径基本相似，都充满了障碍。他们基本不作或很少进行效用分析。陶雪格认为，用“边际劳动生产率递减”这个概念就能毫无困难地描述他的工资理论，他达到了这个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和马歇尔都采用了适于19世纪90年代理论体系的古典学派分析法，即：尽管有一些技术上的限制，他们仍采用简单的曲线来分析问题，都采用推理法来研究历史问题，而且强烈希望解决当时的热点经济问题。双方互相尊重，但理论上绝不苟同。

最新版本的《经济学原理》完成后，使不断进取的陶雪格产生了一种空虚感，而且这种空虚感是很难填补的。但他并不虚度光阴，他始终想到，还有很多工作等着他去完成。然而，由于

健康原因，很快他就无法继续做费劲的工作了，他惟一能做的是开始描述他父亲的一生。尽管这对他来说很费劲，但他一直努力着，他是一个一直工作到最后时刻的人，事实上，很少有人的遗作像他留下的那样值得保存。

虽然生命快到了尽头，但他的身体并没有由于年龄的增长而产生那些老年人常有的不便，而是保持了非常好的状态。他拥有良好的视力与听力，有充沛的精力去散步与游泳。他没有任何思想包袱，与往常一样，在科都伊特的家中过暑假，新学年开始再回到剑桥。1940 年夏天，他在剑桥患病，昏迷了一个多星期，从此再也没有苏醒过来。1940 年 11 月 11 日，陶雪格平静地、毫无痛苦地离开了人世。

欧文·费雪*
(1867—1947)

一

这位已离开我们的伟大的美国人绝不仅仅是一位经济学家。他所支配和深深影响的广阔领域和其思想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的学术气氛在《计量经济学》中有了极好的反映。因此,我在这里仅谈一下费雪在我们这个领域中的纯粹的科学工作。这也许会限制我的主题,但至少不会削弱它,除非由于我自身的过失,才会造成这种结果。费雪有可能扮演其他角色,如社会哲学家、经济师,还有他本人坚信对人类福利事业不可或缺的改革运动者、教师、发明家、商人,但我敢说,他将主要以这个国家最伟大的科学经济学家的身份,在历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我愿意进一步限制我的主题。萨苏里先生——费雪的亲密合作者对他的统计工作作了一个生动而又准确的描述,尤其是指出了《指数的编制》一书和他对统计方法"分布的级差"的最独特贡献的历史意义。我不想重复他写了些什么,只研究他作为

* 原标题为《欧文·费雪的计量经济学》,载计量经济学会《计量经济学》杂志第16卷第3期,1948年7月。

纯理论家而非统计学家的方面。不过，统计学家也不可能完全被排除在和费雪有关的范围之外，我建议应涉及这些内容，因为从头至尾，费雪始终以建立一个统计上可操作的理论为目标，换句话说，这种理论不仅有数量的结果，而且有数值的结果。他的理论总体上来说完全符合"经济理论与统计、数学的关系"的纲要，也符合"纯理论数量的方法和经验数量的方法的统一性"的纲要。根据他的第一部作品问世的时间，我们一定会把他当作自威廉·配第以来计量经济学家中最重要的先驱者，如果让我回答为什么用"伟大"来形容他的工作，我将用这一点来回答。这项工作基本分布于六部著作中，它们是：《价值与价格理论之数学的研究》、《增值与利息》、《资本与收入》、《利息理论》、《货币的购买力》以及《繁荣与衰败》。

二

在美国统计学会为纪念欧文·费雪而举行的宴会上，雷格纳·弗里希[①]把《价值与价格理论之数学的研究》描述成一部不朽的著作，我相信他的话一定是语惊四座。因为尽管1926年的再版和其他因素阻碍了把这部著作逐出伟大成果之列，但基本上经济学同行们也没能给它一个完全公正的地位。通常情况是，权威的理论家也认为费雪的主要功绩只在于：早在1892年

① 雷格纳·弗里希(Ragnar Frisch，1895—1973) 挪威经济学家，经济计量学的首创者之一。1969年与荷兰的廷伯根一起，获得首次颁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于经济计量学的方法论有重要贡献。首创试图描述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数学模型，最先把导致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区分为自发的冲击因素和引致的、起扩大作用的因素两大类。主要著作有《边际效用的新测定法》、《景气循环原理》。——编辑注

就对瓦尔拉关于价值与价格的理论作出了简明扼要而又优美的叙述，并通过巧妙的模型对此进行了说明。因此，有必要提醒读者注意这本书的真正贡献在哪里。

在尝试说明这项理论成果之前，我们必须注意到我们的另一项责任，这就是说，还费雪本人以公正。为此，我们不能把自己局限在其著作中**客观上**新奇的观点上，而应该同时考虑里面**主观上**新奇的所有观点。那就是，要考虑到他本人并不了解先于他的理论。换了其他人，例如对于李嘉图和马歇尔，我们也是这样做的，也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才可能对科学领域中最伟大、最杰出的人们作出真实的评价。以此来看费雪的《价值与价格理论之数学的研究》，我们会发现通常的评价是不充分的，甚至与事实相去甚远。在分析经济学的历史上，提到一般均衡方程式，除了瓦尔拉，我们不会想到别的名字，但我认为，费雪所说的他"发现了均衡等式"(第四章第十节)是合乎情理的。虽然他没能给出瓦尔拉理论体系的全部内容，但给出了它的核心内容。而这时，即 1890 年，除了杰文斯外，他"还没有接触过任何其他数理经济学家的理论"。另外，"在完成第二部分三天后"，他"第一次收到并看了埃奇沃思教授的《数学心理学》"。虽然各种无差异变量、偏好方向还是会优先归于埃奇沃思名下而非别人，当我们试图对这位已逝的朋友的思想力量作一个评价时，我们也不该忘了费雪的这个说明。他从杰文斯、奥斯匹兹和里本的成果开始研究，并以此作为辅助工具，但主观上他决不仅仅是简单地沿袭、简化和证明瓦尔拉的理论。

然而，他在一个特定研究领域中的业绩是他自己的成果。为了表达得更清楚，我称这个领域为效用理论，除非读者同意我使用自己的术语——"经济潜力"。我发现要对这项成果作出自己的评价真是异常困难，这不仅仅是因为篇幅不够。目前在这

个领域中的见解完全不能为我提供陈述自己的见解以消除误会的机会，而且费雪的成果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他使我们想起帕累托。后者拒绝承认效用是一种心理因素（更不是数量上的），至少八年前，费雪在《价值与价格理论之数学的研究》第二部分里，就大体上预见到了异议的迹象。从帕累托、巴罗内、约翰逊、斯卢茨基、艾伦、希克斯、乔治森直至萨缪尔森，这种异议始终存在。杰文斯的最终效用和埃奇沃思的理论都是盲目接受边沁的满足和痛苦的计算方法的产物。埃奇沃思不仅臣服于功利主义，而且还通过介绍费希纳[①]的“可察觉的满足度的增加”的理论，重点强调了这一理论体系。费雪认为，效用论必须有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应“能将效用与真实的或客观的商品关系联系在一起”（序言）。但在第二部分里，他偏离了这一思想。如此快地揭示出每种商品的效用是所有商品数量的函数之后，他最后得到的结论完全倾向于根本不需要任何效用论的主张。剩下的仅是一个缺乏心理内涵的概念，意味着一系列理论的萌芽。这套理论在帕累托之后就出现了。虽然费雪没有使用这一术语，但他实际上是选择逻辑的真正先驱，甚至一些将在以后的讨论中起重要作用的细节问题，如综合性的问题，也可在这一部分里找到。

但是另一方面，费雪也使我们想起弗里希。在以萨缪尔森的假定为基础、以效用论这种既不能承认又多余的证据为逻辑

---

① 费希纳（Gustav Theodor Fechner，1801—1887） 德国心理学家、美学家与哲学家。心理物理学创始人之一，并在韦伯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确定感觉强度与刺激强度间函数关系的韦伯—费希纳定律。在美学上，是实验美学的创始人，开心理学美学的先河。在哲学上，持心物二元论观点，认为上帝是宇宙的灵魂，宇宙是上帝的躯体。主要著作有《心理物理学原理》、《论实验美学》、《美学导论》、《南娜之死或论植物灵魂生活》等。——编辑注

终点之前，费雪凭借他无与伦比的朴素和才智，为这种理论提供了测量这种不存在且多余的东西的方法。他是通过一个特定的限制来阐述效用的基本单位的，即：任何一种或至少一种商品的效用仅仅取决于它自己的数量，而与其他商品的数量无关。这种限制也许得不到承认，像将哥伦布的旗舰与现代班轮比较时一样，这种方法的缺点和哥伦布的旗舰的缺点一样多，不过，它仍算得上是新生的经济学中最杰出的成果之一。我希望计量经济学的读者能够熟悉那些主要与弗里希有关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但我仍要回到那个问题，即：一个能够写出《价值与价格理论之数学的研究》第二部分的人，怎么会把对边际效用的测量当作计量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正当的目标呢？难道证明这个观点仅仅是为了不引起怀疑？答案似乎就是这样。实际上，虽然他像帕累托一样保留了与此相抵触的说法，而充分证明了心理效用（第一部分），没有引起人们的怀疑，但是，不同于帕累托的是，他认识到测量方法的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也会在选择逻辑上发生，或者说，基本效用和心理效用并不像我们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测量热力而不需要也不能测出热的感觉。当然，我很清楚，对整个观点，现在人们是怀疑的，并且几乎没有人对此感兴趣，但它会再度流行。

三

瓦尔拉体系提出了体现选择逻辑定理的行为方程式或最大化方程式。这些选择受制于一些限制，其中一部分限制包含在行为方程式中，而另一部分则包含在体系的均衡方程式中。这个体系很全面而且承认不同的解释，换句话说，它可以根据我们由作为一种模型的现象抽象出概念的方式而产生不同的“理

论”。为使这个体系具有独特的意义，必须给它增补一些东西。从严格的逻辑意义上来说，这些东西仅仅是语义的代码，但对经济学家来说，却涉及他对自己所分析研究的经济世界的结构的全部想象力，并且在未获充分证据时，其分析的许多结果会产生许多偏见。但是概念中包含着关系，并且既然理论的核心在于建立合理的纲要，那么理论就该成为经济计算方法的理论。我们可以说瓦尔拉体系预先假定了一个经济计算的纲要，而不是说它预先假定了概念化问题的解决方法。过去和现在，我们凭经验知道，这种概念或计算纲要集中在资本价值和收入价值中，这就是瓦尔拉在他的《纯粹经济学要义》中加入一些可被称作会计学的基本原理的内容的原因，同样也是欧文·费雪在《价值与价格理论之数学的研究》中增加了《资本和收入的本质》这一卷的原因。根据我的理解，这一卷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成功了。大多数人看到它都感到厌倦，除了对两个概念的经久不息的讨论，已看不到什么东西。然而有一些人，包括帕累托，却对它大加赞赏。

首先，费雪成功地完成了一项过时但没被完成的任务。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也像我一样，对一个历史事实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经济学家通常会忽略那些明显的机会和路线。贝努里博士的能引起联想的短文(小册子)的命运就是一个例子，经济学家不能与工程师联手是另一个例子，但是没有什么能比19世纪的经济学家对那些机会的忽略更能证明那种态度。这些机会来自于会计和保险统计实践，并且反过来试图从经济理论中得到解释。两方面的尝试起步较晚，但两者中较重要的方面——虽然毫无疑问是潜意识的——就是以费雪为榜样的。会计师的反应仅仅是一部分，坎宁教授的著作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其他人持批评态度。但没关系，最重要的是费雪打破了坚冰。

其次，可以说，费雪在这一领域中的功绩和他在指数理论领域的功绩有关，当他进入后一领域时，距卡里已有大约一个半世纪，距弗里特伍德已近两个世纪，前人为这个主题已做了大量的工作。费雪的贡献一方面是系统化，另一方面是合理化，即建立了许多指数必须满足的标准。同样，他着手研究资本和收入，从概念试图达到的目的着手，合理地推导出财富、财产、服务、资本、收入等一系列概念。这一系列概念由于要符合一个合理的纲要而显得新颖。这个结果并非人人喜欢，但它是一个重要的有示范性的理论，并且它对存量和流量的区别作了重点强调，同时它也推导出一个定义：净收入＝可实现收人－资本的贬值（或＋升值）。就费雪使用的每个术语来看，资本是和一个经过多次讨论的命题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命题认为：储蓄不是所得税的征税对象，或者说，征储蓄税会引起重复征税。

再次，费雪进一步阐明了利息理论的基础，这个原理当然包括庞巴维克或者杰文斯的原理。但要得出书中所阐明的收入价值和资本的关系的概念，人们只需要观察和分析，弄清楚贴现的过程就行了。这种关系反过来揭示出这样的观点，即：利息不是对拥有生产资料的特殊阶级的回报，而是贴现过程的结果。从逻辑原理上说，这种贴现过程普遍适用。例如："地租"不应当同"资本利息"混淆起来。这已经被认识到了，尽管这一点没有被马歇尔过多地阐明，但已经被他认识到了。但是，正是费雪阐明了它所有的涵义，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结构体系。

四

这样，正如《资本和收入的本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价值与价格理论之数学的研究》的姊妹篇一样，《利息率》是两者的产

物，同时也是《增值与利息》的产物，随后在 1930 年发表的《利息理论》中作了修改。《利息率》是一部非常精彩的作品，是成功的演绎，是利息理论的杰作。但更重要的是，第一，这部著作是一部教学法的杰作，它告诉我们——据我所知，没有其他作品能做到——怎样同时满足专家和一般读者两者的要求，而又不把数学放到注解或附录里去；怎样引导外行人通过简明的概要和细节的描述，从最基本的原理得出最重要的结论。第二，该作品具有鲜明的计量经济学的特性。这种差别可以通过将该书同其他关于利息理论的作品相比较而得出。第三，该作品几乎是一个完整的有关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展现出了利息率和经济体制中的其他因素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进一步说，众多因素相互影响，围绕着这种理论的论据得到了强有力的证实：不耐心(时间折扣)[①]和投资机会(边际收益超过成本率)。该作品是"为纪念约翰·雷和庞巴维克而写的。我在他们两个人的基础上努力而有了建树"，大致是这样的。但不是每个人都这样说，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从根本上否认自己的创造性。让我们中断一下，在将我们的尊敬之情放在费雪的人格上的同时，对他在这一基础上的建树也表示认同。

该作品的核心是第三部分，这一部分极其巧妙地阐明了他的理论的主要内容，即利息理论和整个价值与分配理论实际上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利息不是独立于工资、地租和利润之外的，而只是整个收入流的一个方面。第二部分为不懂数学的读者重复了同样的立场。第一部分连接起在《资本和收入的本质》中发展起来的概念工具。第四部分包含了重要的第十五章——同第

① 欧文·费雪认为，主观效用可以计量，利息产生于"人性不耐"、"时间偏好"，即：人们宁愿现在获得收入而不愿将来获得收入的不耐心或对现在财物的偏好，是利息产生的基础。——编辑注

二十一章比起来，这一章是全书讨论的真正的概要——和引人注目的独创的第十六章，在第十六章中，费雪开垦了一片天地；第十九章表述了同样具有创造性的统计工作的成果。这些都是精华，其中极少有糟粕。

各种可以选择的收入领域的收入选择原理，大体上成为经济分析的中心，在该种意义上，费雪的利息分析首先是收入分析。这种收入分析是用真正的实物来表达的，从总体上说，是将货币因素看作收入转移的工具而非流动资产。无论谁希望这样做，都能插入后者，对于其他的，如果我们选择费雪的著作作为我们自己的基础，我们将会走得更远，尽管这一点还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扩展。

五

完整的经济理论已在《利息率》一书中得到部分解释或部分描述，货币理论的所有要点都体现在了这本书中。像所有伟大体系的创造者一样，费雪感到了用这一中心主题来阐明货币问题的冲动，他在《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完成了这项工作。让我们仍然首先关注作品中的历史的重要性，这是费雪在计量经济学中另一次作为先驱者的冒险。这在他早期有关物价指数的作品中表达过。这些作品非常具有独创性，其中有他估算货币流通速度的天才方法，同时，也包含了对其结果进行统计检验的尝试。所有这一切都属于早期计量经济学的经典之作，然而，真正重要的是，作品的整个论证与统计运行这一标准相匹配，避免了任何与统计方法不适应的概念和假设，进一步说，不论好坏，费雪将他自己的旗帜缓缓升到了计量经济学的旗杆上。

说明这部作品是货币的古典理论和现代理论间的重要环节

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像他的一贯做法一样，费雪声称：自己没有新的创造，这部书是献给纽科姆和其他先驱者的作品。中心章节第四、五、六章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综合性。毫无疑问，费雪接受了在当时仍然很新颖的银行信用理论，指出了在银行信用周期中利息率的杠杆作用，明确地承认速率的变动。记住，关于速率不变的假定过去经常——甚至现在也经常——被当作是"旧"货币理论最主要的特征和缺点。他注意到了一些应预期到的主要因素（其中一些在"供求状况"的标签下结合在一起），这些因素有助于决定购买力。所有这些并不等于将货币理论与价格和分红理论完全合为一个整体，更别提与就业理论合二为一了，但它构成了货币和就业间的进身之阶。

如果真是那样，为什么《货币的购买力》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除了把它看成是受到赞扬的、最古老的旧数量理论的另一种表述外，别无所见，而且认为在很久之前，它就变得过时了呢？答案很简单，因为费雪在序言中就这样说过，以后在许多关键的地方也重复过。这还不是全部。他不遗余力地探求数量理论的结果，即：货币数量的增长带来的一般后果之一就是价格总水平按比例增长。为了这个定理，他放弃了对一个事实的承认——货币数量的改变可能（"暂时"）会对货币流通速度产生影响——并最终是基于把后者看作一个常量的假设来推理的。由于同样的理由，他提出法定货币应随着现金存量按比例变动的思想，所有在货币流通中相互影响的因素都作为"间接影响"而藏在那五个因素（基础货币和存款的数量、两者的速度及交易量）背后。对这些因素，价格水平保留了"直接影响"的调节作用，因此价格水平在其著名的方程式中变成了因变量。他用大量的例证进行阐述的正是这个理论。但他毫不吝惜地把他的所有真正有价值的见解放进了第四、五、六章，并且把它们仅仅当成发生在"过渡

期"中的干扰因素，随意地处置它们，这个"过渡期"就是当数量理论"不是严格地正确"时。要得到他成果的核心内容，首先要做的事是消除一种表面现象，即那些对他本人、对他的钦佩者和反对者来说都挺重要并且曾耗费了他大量精力的东西。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诋毁自己的作品呢？尽管他声称满足于自己的验证，但他不能证实他的表述是不变的、严格的（见修订本第307页）。在《利息理论》和他关于商业周期的几个作品中，他自己的论证与那些表述并不一致，我们并不强求他自己的数量理论和其他数量理论通过严格解释作为一个均衡问题而被利用，像马歇尔的长期标准那样有效。因为根据费雪自己的表述，这种均衡并没通过一种仅用他的五个因素就能完全理解的机制得出。由这些因素可以归纳出这种均衡，但均衡无法由这些因素得到"因果式的解释"。另外，他年复一年地在运用交易方程式，而且肯定用于不均衡的情况下了。我不能不认为这位学者是被改革者误导了。他对"补偿美元"寄予厚望。改革者的血液在沸腾，为了使反对他的人信服，他不得不简化其稳定购买力的计划，不得不简化其科学基础。这也就是他后来的想法："发行货币"和"美元"。在我看起来总像一团谜的东西，对解决问题已足够了。我不想进一步追寻经济学家奋斗的主题，但我还是要问一下读者：如果不是在其他情况下，而是至少在这样的情况下，费雪本人、经济学或这个国家甚至这个世界，究竟从这种奋斗中得到了什么？



六

货币改革者同样也破坏费雪对商业周期研究的贡献的科学价值和实践价值。但这些贡献本身要比我们大多数人所意识到

的重要得多。它们再次成为计量经济学研究的典范，并且影响着它的标准程序的发展。费雪的计量经济学有一个明显的动态性质：1925 年的著作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动态模型，比此类模型的大量提出早了几年。最后，凭着可钦佩的直觉，他列出了所有较重要的周期运动的"启动装置"，只要弄清其操作方法，就能产生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明纲要。

但要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再次进行一项"剔除虚假表象"的操作。"启动装置"并不在它们应该在的地方，荣誉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得到的，它们都被写进了第四章。或者换句话说，所有一切都被改变成一个机械所能控制的表面现象，结果是：费雪实际上对用于各种实际历史事件的术语——"周期"的使用持反对意见。伴随着价格水平的上升和下降，债务的膨胀和收缩也使我们在货币改革中再次陷入困境。这也正是费雪在其著作中真正感兴趣的主题。这时"补偿美元"虽然仍受欢迎，却得不到更多的重视。我们在《繁荣与衰败》第三部分找到了一个言辞朴素却受欢迎的关于货币控制方法的调查，在这个调查中，几乎没有经济学家持不赞成态度，而且调查中实际上包含了所有"通货膨胀"的政策。这些政策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或被采纳或被提到过。我并不会蔑视费雪写在书里的一切功绩，或者对他的才智提出质疑。相反，考虑到出版日期，我相信他应该被授予更多的荣誉，这是相对他已得到的荣誉而言的。不过我还是要强调一下，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本著作的功绩，而且因为在不完善的简略概述的后面，却有意义更大、更深的东西。

七

《价值与价格理论之数学的研究》、《增值与利息》、《资本和收入的本质》、《利息理论》、《货币的购买力》和《繁荣与衰败》好比是一座前所未有的寺庙的支柱。它们属于建筑师从未将其作为构造单位的壮丽的结构。坎提农、亚当·斯密、J.S. 穆勒和马歇尔等经济学的领袖人物通过系统化的论著给他们的时代及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费雪从未这样对他的思想详加解释，这个忙碌的战斗者没时间理会这些，虽然这是让他的美国经济学同行追随他的惟一方法。无论原因是什么，他没有创立学派，他有很多学生，但没有信徒。在他的奋斗过程中，他与许多团体和个人联合起来共同努力，而在他的科学著作中，则几乎一直是孤军奋战的。因此他必须在不具备学派创始人所拥有的一切有利条件的情况下奋斗，这些有利条件包括后人对学派创始人的每一句话的维护、解释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李嘉图主义者、马歇尔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而没有费雪主义者。也许这样的事会让人感到很奇怪：费雪具有如此纯正的意图，得到了社会如此广泛的认可，并且如此无条件地坚持那个时代的主导的口号——稳定。他一直站在潮流之外，总不能使与他同时代的人或当时正在成长的一代信服。但是这些起支柱作用的著作依然存在，并且在(历史的)尘埃掩盖了统治今日世界的思想的痕迹时，它们依然会长期闪光。

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
（1874—1948）

米切尔逝世于 1948 年 10 月 29 日。他一直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工作中死去。我们哀悼一个纯洁的人；一个具有坚定信念，同时又无比温柔的同事；一位全心全意忠于职守的师长；一个真理的忠实信徒，他抵制了各种诱惑，甚至包括那些由热情、高尚的社会同情心而产生的阴险的诱惑；一位身体力行、从不坚持自己的权威甚至任何个人要求的领袖。凡接触过他的人都能感受到这种人格魅力，却难以用语言来加以描述，就像很难用语言描述他广泛的兴趣爱好和他为所献身的事业而付出的努力一样。我们都热爱他，深知不会再遇到像他这样的人了。

有关他的人品就谈这些。本传记其余章节全部用于回顾他的研究工作，系统阐述他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经济学的意义，如果真能把他的研究工作与他本人区分开来的话。作为一位学者，他的最大贡献是在他的每一页著作的字里行间包含的道德启示。

一

一个人在连续“几代人”心目中的地位是由他在二十几岁时受到的影响决定的。这一理论是否有道理呢？如果有，那我们

就应该到米切尔1903年转学至加利福尼亚大学之前的十年中去寻找成因。在作为科学成熟期的这十年里，他在芝加哥大学从事研究，并于1899年获得博士学位。但是，他是橡树，而不是柳树：他自身的精神和道德特征也许太强烈，因而不会受到老师的很大影响——这一点可以归因于他的新英格兰背景和在他父亲的农场上所表现出的充满活力的青春气息——尽管英国经济史的优秀课程和J·劳伦斯·劳陵在货币和流通政策方面的指导的确给他留下了一些清晰的印象。凡勃伦[①]更受不循规蹈矩、才思敏捷的人喜爱，这种人最反对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更喜欢放牧的围场而不是马厩，绝对欣赏讽刺与反论。尽管米切尔很少讽刺挖苦、大唱反调，他不久也了解、认识了凡勃伦，如果他后来继续强调生产商品与挣钱之间的差异，他可能还会继续喜欢凡勃伦，但他很快就厌烦了凡勃伦本质中模棱两可的东西。然而，约翰·杜威[②]和雅克·洛比开辟了永远不会失去吸引力的新天地。他们开辟了社会科学的新途径，与米切尔愿意从事的专业经济学研究相比，前者更广阔。这对于了解米切尔的经济学和其个人贡献的本质非常重要。

---

① 凡勃伦(Thorstein Bunde Veblen, 1857—1929) 美国经济学家，制度学派创始人。反对当时流行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从庸俗进化论及"行为主义"出发，企图建立以研究"制度"的演进为中心的经济理论体系。采用制度分析的方法来说明社会经济现实及其发展趋势，强调制度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决定作用。主要著作有《有闲阶级论》、《企业论》、《工程师与价格体系》。——编辑注

② 约翰·杜威(John Deway, 1859—1952) 美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实用主义的著名代表。他称自己的哲学为"经验自然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经验主义"，认为"经验"是超出物质与精神对立之外的中性物，是主体与环境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在认识论上，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强调所有的概念、学说都是工具，是一种"工作假说"，提出工具主义认识论。主要著作有《哲学的改造》、《经验与自然》等。——编辑注

19世纪90年代是所谓的马歇尔时代的第一个十年。但是,因为并不是每一位读者、尤其并不是每一位美国读者都同意这一词语的涵义,所以我得先加以阐明。在这个时代,有三种趋势应运而生,并形成了1900年的新经济学。首先是对社会改革的关注以及对此所持的新观点,这一点在德国的《社会政治》中得到了有力的佐证。其次,经济史在惊涛骇浪中确立了自己在经济学中的地位。最后,经过25年的斗争,一种经济理论的新研究法诞生了。确实难以为此确定一个合适的名称,也许"边际主义"、"新古典主义"等最不容易引起误解。但是,也许得把英国排除在外,因为在英国,马歇尔凭其领导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把三者统一起来;而在任何其他地方,这三种趋势互相冲突,而且还与大部分行业所坚持的旧的观点、方法相抵触。尤其是在美国,经济过热增长,回顾过去,看到的惟有过时的教科书——虽然F.沃克等人的研究无疑改进了教科书,但它依然落后、过时——其他方面则混乱无序。这也许是一种丰富的无序,但仍旧是无序。我们并没有不尊重被遗忘的或是几乎被遗忘的杰出人物,但我们很容易理解下面的事实:1895年左右进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年轻人发现没有人能向他展示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的丰富思想和研究计划,而这是在无法去剑桥大学聆听马歇尔讲课的情况下,惟一能了解他的理论的途径。同时,需要一位具有卓越才能的老师以一种真正有效的方式来介绍J.B.克拉克[①]的学术思想。因此在《社会政治》中没有了竞争对手,经济史依然未受重视,"边际主义"或"新古典主义"等

---

① J.B.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1847—1938) 美国经济学家。倡导静态与动态两种经济分析方法,对现代经济学有广泛影响。应用边际原理于生产与分配领域,提出边际生产力论;倡言动态利润说。主要著作有《财富的哲学》、《财富的分配》、《经济学纲要》。——编辑注

新理论很容易被弃置一旁。乏味的教科书多少受到穆勒理论模式的影响,成功地促使更活跃的智者对制度惯例进行反抗。

米切尔自身所从事的研究工作的曲线图可以被解释为两个表面的相交:一个代表环境条件,另一个代表个人思想倾向。像他这样有才能的人是注定不会满足于他所见到的事物的现状的,具有他这类才能的人必定要到社会现实的浩瀚海洋中寻找补救办法。在他看来,经济学家似乎只吸收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他想在其中畅游,而不是浅尝辄止;他想在贫瘠的土地上探索,而不是徘徊。再有两点就可以结束这一描述:第一,他怀疑逻辑的严密性,就像马驹怀疑缰绳和马鞍一样。他仔细观察这块土地上的耕作者的研究工作,很快发现那不仅是出于方法论上的考虑可以任意抛弃的不现实的"假设",而且是一种"预想"(空想),它束缚了研究人员,而不是服务于他们。第二,除了这点之外,他的思维方式不是"游戏"假设: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的研究工作由于政治偏见和形而上学的观念而遭受破坏,变得无效,但是,即使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他似乎仍会认为它是无效的。

如果这确定了他的学院派的地位,那么米切尔以前是而且始终是学院主义者。我并不希望参与讨论这令人难以理解的概念的确切涵义。这种讨论会不时地突然爆发,而结果都是产生这样的论调:凡勃伦根本不是学院主义者,或者他是惟一的学院主义者。这样反而会更无益。因为凡参加上述"反抗"的人都用自身积极的计划填补了基本上是消极的批评留下的空白。但是,对米切尔的方法论的地位还必须再仔细研究,因为米切尔的研究极为重要,而且对其进行讨论的方法往往不能令人满意。我们必须考虑三个不同的问题:米切尔对科学经济学家关于"政策"的正确态度所持的观点;他对保护科学成果免受意识形态破坏的观点;他对"理论"的观点。他对三个问题的观点发生

了改变，但是在整个成年时期改变得很少。现在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审视这些。

二

关于第一点，他的做法给我们大家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像其他学院主义者一样，他憎恨自己的性格形成时期的经济学与放任自由主义之间的政治联盟。他是少数有充分理由这样做的人之一。有人认为，尽管放任自由主义计划在实践中不完善，却能得到社会的谅解。这也许促使他反对这种特殊联盟，但更重要的是，他觉得经济学家没有权利加入这种联盟。在米切尔看来，经济学是一个客观的学科，它把由大量事实中仔细确认的事实和推论提供给愿意使用它们的任何人去自由处理。这并没有诱使他把自己关在象牙塔中。相反，他始终准备为公众提供服务：1908 年他在移民委员会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务于劳工统计局和军事工业委员会，后来又于 1929 —1933 年担任胡佛总统的社会趋势委员会主席，1933 年还成为国家计划委员会成员、国家资源委员会成员、联邦市政工程紧急行政机构成员，1944 年又担任了生活费用委员会委员。所有这些足以证明这一点。米切尔工作的实质证明了我的观点：它始终与他的科学使命概念吻合，始终在于观察某一形势下的种种现实，在于客观描述实际发生的一切；在有可能想当然地作出决定时，通过广泛接受切实可行的建议，考虑各种可能情况，作出决定，但并非毫无保留。我认为，对他这样致力于分析工作的人来说，这样做是恰当的。他从不兜售诀窍，也从不宣扬“政策”。

关于第二点——意识形态（对科研成果）的危害，他的清醒认识是明显的优点。在这方面出现的惟一问题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是他是否轻易怀疑那些其研究方法和成果都不为他所赞成的作者的空想(“预想”);另一方面是他所采用的补救办法是否适当。因此,李嘉图的分析中存在许多缺陷;但是如果我们不考虑他的政策建议,而考虑其分析的抽象性程度,我们就找不到其理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很多缺陷——卡尔·马克思也乐意承认这一点。经过对各种事实的认真、客观的调查研究,米切尔的补救办法确实会消除许多预想,但并不是全部。但是,再小心也无法保护研究免遭调查人员灵魂深处恶魔的破坏干扰,而这些恶魔从不暴露自己。不用介意,这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米切尔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他能深入地看问题,他认识到,在我们这个领域,预想仅仅是一种政治偏见或只是为了保证某种特殊利益。

第三点,“米切尔与经济理论”这一主题所引起的难题比另外两点都要大得多。这些问题部分是由其模棱两可的涵义引起的。在关于商业周期的主要出版物中,米切尔列举了大量关于这一现象的理论,宣布他乐意利用可能传达给他的任何建议。他明确表示,他不打算与其中任何一个结盟或是为建立同样的模式而受其束缚,他显然用了“理论”这个词的“解释性假设”的意思。这种假设应该产生于详细的实证研究或是从中得到启发,而不是研究一开始就提出假设,这一无可争辩的观点表达了他的观点。公正地讲,这是站得住脚的观点,尤其不会受到“这种计划根本不可行”的观点的反对。因为,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首先确认要研究的现象,这样做就不可避免地会引入一些对实证研究产生指导性影响的因素。换言之,没有“理论”,就根本不存在实证研究或“测量”。这也是对的。但当我们这样说时,我们知道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用的是“理论”的另一层意思,即“理性工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米切尔当然不希望把“理论”从他自

身或任何其他人的研究工作中排除出去。

虽然米切尔从没有犯过根据原则反对使用理性工具的荒唐错误，但他的确反对在“古典”作品中使用的那些，这里面也包括了在他的(思想)形成期中能见到的后古典派作品。这有两个原因，一个与他作为经济思想领袖所取得的成就密切相关，另一个是妨碍他把自己的成就扩展到更广阔的领域的局限性。

无疑，他试图扩大经济学的范围，以便把“经济社会学”这一领域包容进去。经济社会学是指分析社会制度或分析“盛行的社会习惯”。“货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能作为数据被接受——尽管根据其他理论看是可改变的——但是应使之成为经济学家的研究材料的一部分。最根本的一点是，他没有把这种材料看成是对传统理论的补充，而是以它取代传统理论。经济过程理论本身仍然是一种理论，但它建立在仔细观察实际活动而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因为他并没有把反省或由内省激发的心理解释——动机排除在外。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一理论会使得米切尔把经济生活看成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为什么在他看来，对商业周期的分析是对整个经济过程进行现实分析的第一步。他强调在其思想中自始至终体现出的连续性，对此我们一点儿都不奇怪，相反会对他表示钦佩。我们拥立他——1913年前的米切尔——为现代动学①的先驱。但是在赞颂了他的前提之后，我们要对他据此得出的某一结论提出质疑，

---

① 近代西方经济学家寻求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把经济理论的研究分为经济静学和经济动学。这样的划分萌芽于洛桑学派创始人瓦尔拉，由熊彼特建立起较完整的体系。熊彼特把在消费者的一定欲望状态、技术、人口、资本等条件下进行竞争的状态称为静态。在这些条件中，由于资本和技术革新结合起来的增大，因而产生的经济变动状态是动态。前者的研究称为静学，处理一般均衡和经济循环问题；后者的研究称为动学，主要处理景气变动和经济发展问题。——编辑注

即他与别人持相同观点的经济逻辑(新古典理论)必须被抛弃。

我们在学习他有关经济思想史的著名课程"经济理论的种类"时,印象最深的是:他反对那些作者的"假设"不逊于反对他们的"预想"。在每一点上都表明他又是正确的。很显然,逻辑模式并不是他所讲的经济学或经济理论的全部。另外,这些模式建立的方式以及构成其基础的假设都存在许多有待商榷的地方。但是米切尔不反对独特的假设——或完全的模式——也不打算用其他假设取代这些假设。他反对把它们作为假设,并且对那些关注它们的确定性和一致性问题的人们不屑一顾。他认为:"祖辈的神学,柏拉图[①]和魁奈;康德[②]、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凯恩斯和杰文斯,甚至连马歇尔在内,都毫无不同。"现在,老是想着这方面存在的错误,或者明确指出基本正确的方法论的直觉在何处驱使他陷入错误的境地,是完全多余的。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的偏爱很容易导致在评判别人的研究时加以贬损,而事实上自己还从未认真地研究过他人的研究工作。然而,指出这种态度对米切尔的研究和影响范围的危害并不多余。他反对将自己的理论模式表达清楚,结果使得除了那些最热情的充满同情心的译者外,其他任何人都难以理解。1913 年问世的著

---

① 柏拉图(Plato,前 427—前 347) 古希腊哲学大师,曾受教于苏格拉底。创立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即"理念论"。提出具有先验论色彩的"灵魂回忆说",还设计了一个"理想国",主张国家由"哲学王"统治。主要著作有《斐多篇》、《蒂迈欧篇》、《理想国》等。——编辑注

②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创始人。他把世界划分为可认识的世界(现象界)和不可认识的世界(物自体)。认为物自体是不依人的意志而能独立存在的,它是感觉的源泉,但由于知性本身所固有的先天形式,因而人不能认识物自体本身。在伦理道德问题上,力图调和幸福主义和禁欲主义的矛盾,强调先验的道德律令和意志自由。主要著作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等。——编辑注

作的基本思想可以转化成动学纲要,具有"完整性"的特点。在这些段落中,他把静态均衡理论处理成"梦幻境界",这使得那些不那么富有同情心的批评家很容易拒绝承认他的领导地位,依据是他显然没有抓住该模式的本质。他永远不愿意听取这样的论点:合理的模式旨在"描述"某些行为方式的逻辑,这种行为方式在每一个经济领域都盛行。就其论证的梗概而言,当我试图向他说明 1913 年出版的伟大著作是对动态均衡理论的运用时,我永远忘不了他那无言的惊奇。我写这些话并不是贬损我热爱并钦佩的人的名誉。我只是想消除各方面的误解,从而使他拥有更多的追随者。

三

我们现在转向他的研究核心。给我们留下印象的第一件事是完整性。劳陵向他建议把"美钞"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这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巧合。但是,除了暗示这个固执的候选人接受建议外,似乎可以有把握地假定,无论他选择什么起点,都能到达目的地。为了研究这个课题,他开始研究经济过程及其对战时金融的反应。遵循劳陵的教导,他对数量理论评价很差,并很快对其进行了修改。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对由这篇论文而产生的两部著作,应注意到的真正重要方面是:认识到它们所反映出的货币(或"资本主义")经济。一方面,他把货币现象与其他现象统一在一起,因而预见到它们以后表现出的各种趋势;另一方面,他分析了各种关系,这使他很自然地研究商业周期,以此作为研究今天的货币经济一般理论的起点,这是他成年时期研究的真正主题。

1913 年出版的《商业周期》自 1905 年就开始酝酿,尽管他好

像到1908年才有意识地决定写一篇有关这一问题的论文。这是美国经济思想史上的里程碑——对美国以外的学者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给其再高的评价也不为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该书的新颖性及其魅力丝毫未减，反映出作者的分析水平和较高的造诣。这不仅是他的杰作、一部守旧的行家里手也认为是名作的作品，而且为以后的所有著作树立了典范。1927年又出版了该书的缩写本。作者全盛时期的作品，以及其精力未受损伤时期的作品，都是其代表作，他以此证明自己是这一领域的行家里手。这本书的基本内容再现于1927年的版本中。甚至连1946年出版的《商业周期的测量》一书也在更高层次上应用了其部分思想，这些思想在1913年首次公开发表。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大部分研究也深受此书影响。1913年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能经受住大量研究的检验，尽管米切尔一心追求真理，随时准备加以修改。

在确定了《商业周期》在米切尔个人发展中的地位之后，我现在必须确立其在科学中的地位。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我非常踌躇。首先，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米切尔所进行的创造性努力不单纯是研究周期现象本身，而是研究一种新的经济学，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一种新的经济理论，这种新理论是由研究"经济波动过程中产生的思想"激发出来的。这使他的研究工作成为大部分研究商业周期的专家无法比拟的。其次，与大多数创造性的研究人员一样，米切尔不会轻易地理解那些与其在研究态度和方法上相去甚远的人的研究工作。他博览群书。但是，由于长期满腔热忱地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他并不能轻而易举地渗透到非自身的结构中去。为了公正地评价他的精神境界，必须求助于主观和客观优先问题的界限。在我研究经济分析史时，这种必要性给了我深刻的印象。第三，人的思维在任何特定

时期都易于集中在一些相似的观点上，但由于方法问题，使得研究人员及其学生更清楚地看到相互间次要的差异而非本质的相似点。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例子中，研究人员的印象是不同“解释”的数量在不断增加。然而，事实是：他们对周期与“危机”问题等的概念、越来越多地借助统计材料的研究方法及其研究成果——如对我们称之为加速原理[①]的一般形式的强调——的相似性越来越明显。没有任何一位作者在这一运动中处于领先地位，而且没有人受其他人的重大影响。但是，米切尔的著作确保了其在这一运动史中的杰出地位。

在所有这些作者中，克雷蒙·朱格拉毫无疑问是先驱者，可以说是他创立了现代商业周期分析。对米切尔而言，朱格拉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研究方法方面都是其先导。他不但写了一本“事实充分的伟大的书”，这本书促使当代理论的形成，清楚地表明必须从“危机”过渡到“周期”，而且还指出了重要的理论原则：萧条的惟一原因是繁荣。如果我的理解正确的话，那么它是说：萧条是对繁荣中发生的情况的反应。我认为，这一论述尽管不完整，却是对该理论的最早的系统阐述，经济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产生下一个阶段，繁荣阶段在这一系统中集聚起来的压力导致经济衰退（而衰退又创造了下一轮的繁荣）。米切尔独自采用了一种类似的模式，他毫不犹豫地称之为“理论”。这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周期理论中的一种。有一种“理论”认为：经济过程是平稳的，对周期或其他波动的解释必须从特定的环境（货币的或其他的环境）中去寻找。这种特定环境扰乱了经济过程的平

---

① 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关于收入或消费量的变动如何导致投资量变动的理论。由法国阿夫达里昂首先提出，并经英国哈罗德加以发展。他们根据现代化机器大生产占用大量固定资本的特征，推论出：收入或消费的变动将会引起投资量即对生产资料需求量的更大变动。——编辑注

稳流动。在一大群代表这种“假设”的人中，米切尔独树一帜。还有一种“理论”认为：经济过程本身实际上是波动的。周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形式。米切尔特别重视这种理论。我认为，可以说他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假定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利润经济，在其中经济活动取决于影响目前或将来利润的因素——我认为这等同于凯恩斯的资本边际效率——他宣称利润是经济波动的“线索”。这似乎不但符合凯恩斯所著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二十二章中的“理论”，而且也符合一群商业周期专家的“理论”，尤其是，他没有继续说，利润明显地与投资过程有关，而且不管怎么说都与其密切相关。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眼前有一个明确的模式在支持米切尔的实证研究。如果这一模式在他的研究的最后阶段显得证据不足，这是因为结局使他进退维谷，也就是说，陷于研究工作的“实证”阶段，在他能够完全协调劳动成果之前。

与1927年的著作完全一样，1913年的著作首先简要地评述了现有的各种解释。两本书都简要地且不偏不倚地进行了表述。米切尔发觉这些解释似乎“都有道理”，但又都“令人困惑”。他对它们加以分类，但并未试图系统地加以批评。虽然他不时提出反对意见，但是读者获得的印象是：他把这些看成是对部分真理的陈述，它们难分伯仲，都有待于事实的检验。这也反映了上面所提到过的米切尔方法论偏好的特点之一：在他看来，解释性的假设与事实之间没有什么重要的区别，尤其是没有合乎逻辑的标准，这种标准可能会在理论接受事实检验之前将其排除。但是，由于米切尔不相信“新古典”经济学，这种不偏不倚还是具有其优点的。正如我们一直声明的那样，这为他在统计材料的海洋中航行提供了指南。

与1927年的著作一样，1913年的著作让人们了解了米切尔

对货币经济的看法。这些章节只是一般经济理论的初步论述，它们结构严谨、不加任何渲染，但是缺少有说服力的概念，所以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里仅举一个例子：有多少人知道现金流量理论？当然，我们有这样的被许多批评家忽视的“理论背景”，而这在1913年的著作的第三部分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毫无疑问，背景说明还须进一步扩充。

然而，1913年的著作的第二部分不需要任何编辑整理。那是了不起的成就。米切尔不但知道如何利用统计材料，而且知道如何阐述——如何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即使他想要的东西当时并不是现成的。洞察在全面观察后产生的需要，分析现有的方法去满足这种需要，解决所发现的问题——1908—1913年，所有这些都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接踵而来的。许多人有观察能力，许多人热衷于细节，但是，用观察能力服务于细节研究、以对细节的关注服务于观察能力的人却很少见，而他就是其中之一。

四

关于1927年著作无需赘述。1908—1913年间的辛勤工作使他认识到：他试图完成的艰巨任务，单凭个人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在此后的几年中，他积极工作，调查研究价格和生产指数问题。这些活动使他意识到，他富有天赋，足以担当学科领袖的重任。尽管他知道如何把握方向，但还是以一个普通研究人员的身份参与工作。所以，在1920年，他的工作很自然地转入国家经济研究局——他曾是该局的缔造者之一——直到去世前夕，他都在激励着自己的同事。这种“勇敢的实验”是一种自我实现，其巨大成功为米切尔的智力和道德素质树起了一块丰碑。

该局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以对国民收入的规模和分

配的著名研究为起点。这些成果从表面上看似乎远远超出了商业周期和与商业周期密切相关的问题，但是米切尔的现象概念涵盖了整个经济过程，因而使经济过程中的所有现象都与商业周期"理论"有关。方法与机会仅仅决定各个项目的时间顺序，所有因素在综合计划中都有其应有的位置。在评价彭斯和米切尔的《商业周期的测量》时必须牢记这一点。

这本书的作者并不承认写了一篇论述商业周期的论文，只承认自己提出了"测量商业周期的方案"，或确切地说是提出了"动态经济过程"的方案。这更适合前八章，而不太适合剩余四章(这四章讨论的是结果而非测量方法)。但是我更愿意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系统阐述其内容：其目的是让这种现象呈现在我们眼前，并借此让我们了解这本书要解释什么。"商业周期是各个国家总的经济活动中的波动形式。这些国家的经济活动主要在企业中进行。商业周期包括与经济活动同时发生的扩张、总的衰退、收缩、复苏，复苏后又进入下一周期的扩张阶段；这种变化经常发生，但不一定呈现周期性；周期的长度从一年到十年或十二年不等；它们不能划分为较短的周期。"除了预期会产生几个研究成果外，这当中还有许多"理论"。最后一个命题尤其大胆地采用了单循环假设，这就难以区分各种不同的波动，这些波动的存在不是作出假设的问题，而是直接观察的问题。然而，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个人的判断，我将不再深入讨论。

根据米切尔的观点，分析国家经济研究局能发现并处理的所有时间序列是正确的、恰当的。商业周期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形式，是相互联系的现象的积累与其发展过程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即使能想象出一种与周期无关的因素，仍然有必要调查其受周期活动影响的程度。尽管对涉及到的理论存有疑虑，但事实证明必须作出选择，这是对现有方法的局限性的让

步，而非原则问题。然而，米切尔清醒地认识到，即使是最完整的统计材料也无法使自己达到预期的目标。因此，为了检查和进一步阐明其统计材料及从中得出的推论，他突然想到收集他称之为“商业编年史”的材料，时间越久远越好，涉及的国家越多越好。W.L. 索普 1926 年出版的名作就是这样的材料。在一个统计年代，能认识到非统计历史材料的重要性，是个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方法论方面的优点。随着时间的推移，米切尔对信息来源的信任程度好像在降低。

现在大家都熟悉了被今人称作“国家局方法”的事物。然而，支撑对周期性行为的描述的创见还应该再次重申。一方面，每一个在季节性波动中得到修正的序列都由经济自动调节，在其自身的扩张和收缩过程中，一般规律是：每一个这样的周期通过识别出商业低谷和顶峰而被分为不同阶段，该序列的值以其在每个周期中的平均值的百分比来表示。另一方面，为了展示整个经济体系的周期性扩张和收缩的每一个独立序列的行为，可根据商业周期的共性和非数据信息推断低谷与顶峰的出现日期，然后研究每一个阶段或间隔中每一个序列的活动。这种“参考周期”被划分为九个阶段，参考周期的每一阶段的“时间”以整个参考周期的平均值的百分比来表示。典型的参考周期是通过对所有周期的每一阶段的时间加以平均而得出的。每一序列的具体周期与参考周期的比较可能最有启发性。每一统计材料的双重描述被设计得特别严谨，以便揭示出商业周期的真相。即便如此，还必须快刀斩乱麻。陈述事实的目的是使与其相关的理论有可能给人留下全面、深刻的印象。

当然，这本书仅仅是一个开端。如果米切尔能完成他未写完的手稿，这仍然只是一个开端。这种性质的研究没有自然的结局，而必然始终指向一个未知的世界。米切尔一生的工作也

是如此。正因为如此，他变得十分伟大，并由此确立了他在现代经济学中的独特地位。与众不同的是，他是这样一种人：他有勇气说自己并不知道所有的答案；他不知疲倦地从事他的工作；他并不喜欢走在旗帜和铜管乐队的队列中；他对人类命运充满同情，但是却脱离市场；他以实际的榜样而不是用空洞的语句告诉我们真正的专家学者应该是什么样的人。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1883—1946）

一

在那篇关于大维莱斯流派的才华横溢的文章[①]里，凯恩斯揭示了一种遗传能力的重要性——一个伟大的真理，用卡尔·皮尔逊的话说，那种能力大量积累——使得人们易于产生却错误地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许多人似乎已熟悉他的智慧世界。有关他的社会学方面的一个显而易见的推断在事实——在他的传记草稿中，他善于用超乎寻常的注意力去强调祖传的背景——中得到了强化。因为缺乏时间去深入探索凯恩斯学派的过去，他应该会理解我在这方面因无能而产生的遗憾。我们希望其他人会去做这些，让我们用敬佩的眼光去了解一下他的父母来聊以自慰吧。凯恩斯出生于 1883 年 6 月 5 日，他是弗洛伦斯·艾达·凯恩斯和约翰·内维尔·凯恩斯的长子。前者是列弗莱德·约翰·布朗的女儿，神学博士，后者是剑桥大学的注册主管。他的母亲

① 这篇文章是关于岗恩在 1926 年 3 月 27 日发表在《国家与文学》上的《遗传能力的研究》的一篇评论。该文在 1933 年重印于《精英的聚会》卷中。该卷比有关凯恩斯的其他任何出版物更突出他作为人和学者的形象，因而我不止一次地参考了这篇文章。

具有非凡的才能和魅力，曾经是剑桥的市长；父亲是众所周知的著名逻辑学家和作家，曾写过最好的经济学方法论论著①。

让我们注意这篇回忆录的主角出身于书香门第又有神职色彩的背景。这个背景的暗示——既包括英国上流社会，又包括其中上阶层成分——在我们提到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这两个名字时，会变得更明显。我们当中，大部分人是教师，教师倾向于夸大教育在成长中的影响，但没有人会把它贬得一钱不值。此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凯恩斯对每个领域的反应都不是积极的。他像是在享受着完全成功的学者生涯的乐趣。② 1905 年，他被选举为剑桥大学学生会主席。同年，他成为剑桥大学第十二位数学学位考试一等及格者。

理论家们会认识到，凯恩斯日后的盛名如果没有数学才能和勤奋努力是无法获得的——通过勤奋工作，使遵守这个信条的人易于去获取他想掌握的更为先进的技艺。他们将认识到：数学的思维能力隐藏在凯恩斯著作中的纯科学部分里，或许还隐藏在几乎被人遗忘的培养这种能力的轨迹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对他始终对数量经济学敬而远之的原因感到疑惑，因为在他初涉这一领域时，数量经济学正大行其道。尽管他从未明确地表示过对数量经济学的敌视态度——他甚至担任了经济计量学学会的主席职务——但他从未把他的精力悉数投入这个领域。从他那儿得到的暗示几乎全都是否定的。有时他的谈话中

---

① 《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1891 年)。事实证明，这本令人钦佩的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的第四版(1917 年)一直沿用到 1930 年。该书能在有关它的种种问题的半个世纪的争论中保持其中心地位，使得直到现今，学习方法论的学生还不得不选它为指导书。

② 伊顿公学对他总是发挥着极大的影响。在他后来所得到的荣誉中，没有比被教师们选为他们在伊顿公学校董会中的代表更令他高兴的了。

会流露出类似于厌恶的情绪。

解释这个问题并不困难。更高层次的数量经济学具有所有领域中所称的“纯科学”的性质。无论如何,其结果对于实际问题而言都毫无意义。而政策的问题几乎耗去了凯恩斯全部的杰出的才能。他富有教养,充满智慧,决不会忽视逻辑上的任何细节。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喜欢这些细节;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他对它们感到厌恶,如果超过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他就会失去耐心。为艺术而艺术并不是他科学信条的组成部分。在任何领域,他都能循序渐进,而在分析方法上他却不是这样做的。我们应当明白,在不需要运用高等数学知识的其他领域,凯恩斯也具有这样的特点。他甚至无所顾忌地使用与托马斯·芒爵士一样粗鲁的论据来证实其观点的正确性。

二

作为一个从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毕业、进入成年生活的英国人,凯恩斯对本国的政策抱有强烈的兴趣。他被选为剑桥大学学生会主席是在具有象征意义的1905年,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黎明的到来。这个英国人为什么没有从政呢? 为什么他却去了印度事务办公室? 许多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金钱是次要原因,而有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必须领会。所有与他谈过话的人都会发现,他属于那类对政治最无动于衷的人。他对政治游戏的兴趣不会超过赛马——或者说,不会超过纯理论本身。有着非凡的辩论才能和对战术价值的敏锐的洞察力,他似乎不为诱惑——这种诱惑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会比在英国更为强烈,即诱人的政治事务的光环——所动。党派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他会与任何为他的建议提供支持的人

合作，他也会忘却任何曾经有过的论战，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同其他类型的人合作，更不用说去接受别人的领导了。他的忠诚是对标准的忠诚，不是对个人或团体的忠诚。而他仍然对不同的信念、思想、旗帜一视同仁，正如他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一样。

那么，难道他不能胜任一个理想的公务员，成为一位对当今英国历史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名垂青史的大臣吗？而他偏不这样做。他对政治毫无兴趣，对需要耐心的日常工作更无兴趣，也绝对无意将自己训练成一个像难以驾驭的野兽一样的政客。这两种消极的倾向——对政治舞台的嫌恶和对文牍的反感——促使他去扮演真正由天性赋予他的角色，这角色使他能很快胜任并达到完美的境界。这是一个使他奋斗终生并且从未放弃的角色。不管我们如何猜测他将要形成的心理规律——我们无法形成这样的心理规律，但我们能够感觉得到——年龄还很小时，他就完全了解了自己。事实上这也是他成功的主要秘诀之一，同时也是他幸福的秘诀——要是我没弄错的话，他的生活自始至终都是幸福的。

在印度事务办公室待了两年以后（1906—1908 年），凯恩斯回到了剑桥大学，在国王学院获得了一个研究员的职位（1909 年），并很快在剑桥经济学家圈内外树立了威望。他以《经济学原理》的第五版作为中心教材，讲授正统的马歇尔原理，这原理除了他以外几乎无人精通，凯恩斯利用它在以后的 20 年内使自己与众不同。在我的记忆里，他给偶尔来剑桥访问的人留下的是年轻教师的印象：瘦小，禁欲似的外表，炯炯有神的眼睛，专心致志而极度严肃，在来访者看来仿佛被抑制的焦躁不安，一个令人生畏、无人会轻视的辩士，一个人人尊敬并被某些人欣赏的辩士[1]。他鹊

① 1927 年，我和凯恩斯才开始交往，他留给我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印象。

起的名声早在1911年接替《经济学杂志》第一任主编埃奇沃思时就得到了证实。凯恩斯毫不间断地以永不消退的热情投入到这个经济学界的关键职位上去，直至1945年的春天[①]。就他在这个职位上任期之长以及所投入的兴趣和精力而言，凯恩斯的编辑成就无疑是引人注目的，事实上，其成就几乎是难以置信的。这不仅仅因为他制定了《经济学杂志》和由他担任秘书的皇家经济协会的方针，他所做的远不止这些。许多论文均出自他的建议，从文章的观点到陈述的事实，直到最不容易招致批评的标点符号。[②]我们都明白其结果，我们之中每一个人对这些文章——毫无疑问地——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当我说这句话时，我可以充满信心地告诉大家，总的来说，对作为主编的凯恩斯来说，自杜·庞特·德·尼莫尔经管《历书》以来，没有任何人能比得上凯恩斯。

凯恩斯在印度事务办公室仅仅是一名学徒，对思想贫乏的人来说几乎不会留下任何印迹。而凯恩斯不仅充分显示出他的充沛活力，而且还展示了自身的才能。正因如此，凯恩斯才结出了硕果。他的第一部著作——即初次成功——是《印度的货币与财政》[③]。它出版于1913年，当时他被委任为印度财政与货币皇家委员会成员（1913—1914年）。我认为这本书理应被称为关于金本位制的最好的英文著作。然而我们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另外一个问题上，这个问题与该书本身所取得的成就联系

---

① 埃奇沃思在1918—1925年间出任副主编，后来由麦格里格接任（1925—1934年），其后又由罗滨逊接任（他在1933年曾被任命为助理编辑）。

② 有一次，他曾经向一位外国撰稿人解释说，可以把 *exempli gratia*（例如）缩写成 e.g.，但不能把 for instance（例如）简写为 f.i.——作者会认可这样的变更吗？

③ 1910—1911年他在伦敦经济学院作了有关印度财政的讲座。见 F.A. 哈耶克：《伦敦经济学院，1895—1945年》，《经济学家杂志》1946年2月号第17页。

不大：我们能从中发现与《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相近的观点吗？从序言到结尾，凯恩斯本人声称的不外乎是1936年的教学工作在他看来是“多年来一直追随着的思想路线的自然展开”。关于这一点，我会在后面提供一些看法。尽管1913年出版的这部著作没有包括1936年出版的著作中所具有的代表性主张——那本书被认为是具有“革命性”的——凯恩斯在1913年的著作中对于货币现象和货币政策的总体态度仍然清楚地暗示了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的观点。

显然，在那时，货币管理并不是什么新玩意——这恰好是此书在20年代和30年代没被当作新生事物的原因——而凯恩斯在印度问题上的偏见导致人们认识到了该书的特殊性、必要性和可能性。凯恩斯对货币管理的作用所作的生动评价不仅涉及价格、出口和进口，而且涉及生产和就业。尽管这是新东西，但如果得不到极好的解决，仍然受到其自身发展的制约。此外，我们必须记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的理论发展与特定的环境是紧密相联的。其间他提出了实用的建议，这是在1913年不管是他自己还是别人都始料未及的。把20年代英国经验的理论暗示融入到《印度的货币与财政》理论之中，你将能领会1930年凯恩斯主义的实质。这一陈述是保守的。我本可以更深入一些——如果不是害怕出错的话，而出错在传记作家中是非常普遍的。

三

1915年，这个穿着大学礼服的潜在的公务员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公务员。他进入了财政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财政素以“稳健”而著称，将道德上的成就作为首要的议程。

这可能使这位聪明的年轻官员在那时就对财政部的思想和观点产生反感，这在后来显得更为突出。然而他的工作受到了赏识，因为他被选为参加巴黎和会的英国财政部的首席代表——如果这事发生在劳埃德·乔治时代的政治圈内，这可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职位——同时也作为财政大臣的代表任职于最高经济委员会。从一个传记作家的立场来看，比这更重要的是他在 1919 年 6 月的突然辞职，这对于凯恩斯本人和他这种类型的公务员都是极具个性的。其他对于凡尔赛和约有同样顾虑的人决不会大胆地说出来，凯恩斯却与众不同，他辞去了职务并告诉世人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因而成了一位享誉世界的人物。

《和约的经济后果》(1919 年)被广泛接受，使得"成功"这个词听起来陈腐而乏味。那些不懂得如何将运气和功绩联系起来的人会毫不犹豫地说：凯恩斯仅仅道出了每个明智的人想说的心里话，他恰到好处地使他的抗议在全世界产生共鸣，仅仅是因为他的这种抗议而不是他的特殊论点使他赢得了成千上万人的尊敬。此书出版时，这种思潮正广为流传，而它正好迎合了这一思潮。所有这些都是实情，当然，还包括独一无二的机遇。但如果我们仅凭借这些理由去否定此书的伟大功绩，那么，我们最好去掉这些只言片语，因为没有一项丰功伟绩不是事先存在着伟大的机遇的。

总的来说，主要的功绩在于某种道德上的勇气。但这本书是一部杰作——包含着实际的智慧而不缺乏深度，无情地富有逻辑却不冷漠，真诚、人道但并不伤感，面对所有的事实，没有徒劳的遗憾也没有绝望：它是铿锵有力的分析加上响当当的建议。同时，这本书也是艺术的杰作。形式和内容达到了完美的结合。所有的内容都击中要害，没有一点不是紧扣题意的，没有造作的修饰去破坏其充满智慧的经济学意义。精练的评注——

他以后再也没有写过更好的评注——显示出此书的朴实。凯恩斯以剧中人的身份努力去解释导致凡尔赛和约悲剧性破产的原因，他的文章所达到的高度常人难以企及①。

此书的经济学意义，正如《凡尔赛和约的修订本》(1922年)所补充的那样——在某些方面补充了它的观点——是最简单的，不需要任何高深的技巧。尽管如此，其中某些东西仍值得我们注意。在进行说服活动的巨大冒险之前，凯恩斯对他所要考察的政治事件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作了一个概括。这篇文章可以用朴素的语言概括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那"非凡的插曲"，在1914年8月就走到了尽头。由于一系列食品和原材料来源的开发、人口快速增长以及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投资机会极大丰富，

① 参见《四人委员会，巴黎，1919年》。该文与一篇重要的补论《劳埃德·乔治先生：一个片断》一起，收录于《精英的聚会》之中。报道此事是令人痛苦的。在那时，有些反对凯恩斯观点的人在他胜利的逻辑面前全面失败，便去嘲笑他对某些事实所作的陈述和对动机所作的解释。因而他们断言，他根本不能对两者进行判断。因此，这项对凯恩斯的诚实的指控近来屡屡出现在一本美国杂志的随笔栏中。首先，必须让读者满足于以下事实：没有一项凯恩斯所分析的结论、没有一条他所提供的建议依赖于他对克雷孟梭、威尔逊和劳埃德·乔治的动机和态度所作描述的正确性。由于这篇回忆录的目的之一在于描绘、勾勒出他的个性，因此必须进一步证明对他的诽谤是绝对没有根据的。有谣言说，凯恩斯沉迷于"诗一般的幻想"之中，他假装非常了解"玄学"知识，而这是他不太可能了解的。这至多只能说明他有些虚荣，仅此而已。但令人生疑的证据并非难以提供。如果读者参阅上述杰作，我希望他会这样做，则一定会发现凯恩斯声称他与那三个人没有亲密的关系，仅与劳埃德·乔治有私交。他没介绍任何有关四人的私人会晤(第四位是奥兰多)，而仅仅描述了四人委员会的常规性会晤的场景。与所有其他主要专家一样，他仅在他的官阶范围内活动。另外，他对这条导致了灾难性后果的道路上的各步骤所作的个人方面的描述，在独立的证据中完全得到了证实。他的辉煌的事迹仅仅是对一系列作为常识的事件的合理解释。最后，评论家最好牢记这解释分明是宽宏大量的，没有任何憎恨的痕迹，不管凯恩斯是否感到正当。

企业家的英明领导能够保证一个又一个成功的情形已经迅速地成为历史。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毫不费力地吸收资产阶级的储蓄，这种储蓄就好像不停地"为了不吃蛋糕而烹制蛋糕"。但现在(1920年)，那种冲动已消失殆尽，私人企业的热情也在消退，投资机会不断消失，而资产阶级的储蓄习惯也因此而丧失了其社会功能，他们这种因循守旧的做法使境况变得比原来更糟。

因而我们在这里得到了现代滞胀理论的起源——这有别于李嘉图的滞胀。在这里我们也能获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雏形。社会经济实体的每个综合性"理论"都包括两个补充性的完全不同的组成部分。第一是理论家对社会实体的基本特征的看法，即在给定的时间内，为理解社会生活，哪些事物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让我们把它称为理论家的视野。第二是这位理论家的技巧，即通过一种工具去概括他的视野，然后把后者变为具体的主张或"理论"。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与《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有关的理论工具，但我们发现了与那个工具密切相关的社会经济的整个状况。《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长期奋斗的最终结果，使得我们这个时代的整个经济更易于分析。

四

对于"科学型"的经济学家们来说，凯恩斯当然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展现的凯恩斯。为了给从《和约的经济后果》到《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直线型发展过程一个公正的评价——在此过程中主要的阶段是以《货币改革论》和《货币论》为标志的——我不得不无情地略去许多本应记录下来的事情。然而，《和约的经济后果》的三个立足点将在脚注中

提及[1]，另外，必须提及他于 1921 年出版的《概率论》。我想概率原理对凯恩斯的作用不会是很突出的问题，尽管他对它有浓厚的兴趣，并且他的硕士论文就是关于这个主题的。我们感兴趣的话题是概率理论对凯恩斯的意义。主观地说，这似乎是他的思维能量的发泄口。因为他不可能对他投入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的公务和兴趣爱好感到百分之百的满意。他对纯理论的经济学概率没有什么高深的见解，当他想学习高深的概率论时，他不会求助于我们的纯理论。他具有哲学家和方法论专家的气质。他对数理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极感兴趣。凯恩斯是这个卓越的思想家的挚友，但维特根斯坦英年早逝——弗兰克·拉姆齐为了纪念他，立了一座富有魅力的纪念碑[2]。但是仅仅接受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不会使凯恩斯满足。他必须有一套自己的观点。他的思想构架深

---

① 这些立足点是：他与威廉·贝弗里奇爵士合著的关于人口及相关争论的文章（《经济学杂志》，1923 年）；他的小册子——《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1926 年）；他的《德国赔款问题》（《经济学杂志》1929 年 3 月号），该文最终驳回了俄林和鲁耶夫的批评。他运用马尔萨斯的灵魂去捍卫（在大量食物和原材料不能销售的时代的门槛上！）这个主题，因为大约从 1906 年起，自然对人类的努力开始不那么慷慨了，人口过剩成为严重的问题，或者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可能是他的所有尝试中最不恰当的，显示出他有些粗心，即使是最爱戴他的人也不能完全否定这一点。最应指出的是，在《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中我们找不到标题所暗示的相关内容。它根本不是韦伯斯在书中所写的同凯恩斯文中所对应的那些内容。关于德国赔偿问题的文章揭示了他性格的另一面。他确实具有最丰富的动机和准确的政治智慧。但它不是一个好的理论，俄林和鲁耶夫发现对付它很容易。很难理解凯恩斯怎么会对其论点中的弱点视而不见。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在情况紧急时他有时会不拘小节。熟读文集《预言与劝说》（1931 年）可能是研究他著作中的非专业部分推理的特征的最好方法。

② 见 1931 年 10 月 3 日的《新政治家与国家》，再版于《精英的聚会》。这篇文章是他写过的最热心的文章，收录于根据拉姆齐笔记整理的选集中。这些文字体现了拉姆齐的观点，当然，不是凯恩斯的观点，但在这种场合下，没有人会选择与自己意见相左的文章。因而，拉姆齐的言辞显示出凯恩斯的哲学。

刻地揭示了他选择概率论的目的——概率论包含着逻辑上的细节，但并不缺乏独到的内涵。他那坚忍不拔的意志毫无疑问将会创造出——正如我极力要去弄明白的——辉煌的成就。无论是什么样的专家——尤其是非剑桥的——都可能会这么认为。

让我们将目光从著作移向他本人，利用这个机会更仔细地观察他。他已回到了国王学院，并恢复了战前的生活方式。此时的生活方式得到了改进和扩展。他继续做一名活跃的教师和研究员，继续主编《经济学杂志》，继续使自己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然而，尽管他通过接受学院财务主管这个重要（且费力）的职位，同国王学院加强了联系，位于高登广场 46 号的伦敦住所不久还是成了他的第二个总部。他对《国家》杂志感兴趣并成为主席。《国家》——在 1921 年取代《发言人》，吞并了《科学》杂志，并在 1931 年与《新政治家》合并（更名为《新政治家与国家》）——在他的主持下组织了一大批论文。这些对其他人来说将会是专职工作。同时，他还成为国民互助人寿保险协会的主席（1921—1938 年），其间他花费大量的时间建立了一个投资公司，并从这种商业活动中获取了可观的收益。没人对他评头品足，特别是对他的商业活动和赚钱行为。他直率地享受正当职业带来的乐趣，也同样直率地（在 20 年代）声称他决不会接受任何教授的任命，因为这样做他承担不起。除此之外，他还积极参与经济顾问委员会和财政与工业委员会（麦克米伦委员会）的工作。1925 年，他与杰出的艺术家莉迪亚·洛波可娃结婚。事实证明，她是与凯恩斯志趣相投、忠于爱情的终生——“无论是在健康时还是在生病时”——伴侣。

集这些社会活动于一身也是司空见惯的事，但真正不寻常的、值得注意的一个奇迹是，凯恩斯对每种角色投入的精力就像他只扮演一种角色时一样。他高效工作的欲望和能力是难以置

信的。他专心致志于手头工作的能力是非常惊人的。无论他做什么，都能全神贯注，置其他一切于九霄云外。他明白这样做十分累人，但他似乎无法接受没有快乐的时光和摇摆不定的目标。

对于那些即使对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也倾注自己最后一点精力的人，大自然往往给予他们两种截然不同的惩罚。凯恩斯毫无疑问地遭受到了其中一种惩罚。他的文章质量随着数量的增加而下降，而且这种下降不仅仅表现在形式上：他的许多二流作品显示出种种粗糙的痕迹，而且，在一些最重要的作品中存在不少不连贯的中断，这些影响了作品的质量。谁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注意到他认为不可能完成、不可能坚持到最后一笔的文章——谁就无法公正地评价凯恩斯的能力。[①] 但是，另一种惩罚却赦免了他。

通常来说，精殚力竭的工作狂有些不人道。这种人几乎都待人冷漠、心事重重、难以共事。对他们来说，工作就是生命，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兴趣，哪怕是一丁点儿。而凯恩斯恰恰相反，他是你所能想象到的最快乐的人。他总是那样快乐、友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没有任何志向、以将自己所追求的目标付诸行动为一贯原则的那类人。他和蔼可亲，总是乐于把友善的热情融入到他人的观点、兴趣和烦恼中去。他慷慨大方，而且不仅仅是在金钱方面。他善于交际，乐于交谈。同当时广为流传的看法相反，他很有礼貌，甚至连费时的细节都不放过。例如，他的客人因英吉利海峡的大雾而迟到，尽管已在电报和电话中作了解释，凯恩斯仍拒绝吃午饭，直到

① 这方面最显而易见的例子是他的研究工作中最雄心勃勃的计划——《货币论》——仅是由几部分强有力但未完成的工作框架极不完善地拼凑在一起的东西。但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关于马歇尔的传记。他显然在上面倾注了大量的爱和关注。事实上，它是我读过的科学工作者的最辉煌的生活的写照。求助于该文的读者不仅能获得快感并受益，而且能理解我所说的话。它的开头是优美的，结尾也是优美的，但要达到完美，或许还需要多花费两个星期的时间来完善它。

下午四时客人出现时，他才开始吃饭。

他的特殊兴趣很多，他对每一项兴趣都相当投入。然而这并不是全部。普通人也专注于自己的爱好，但只是以消极的方式享受一些娱乐活动。凯恩斯的特点是，他的娱乐方式具有创造性。例如，他喜爱旧书，喜欢文献中论战部分的细微之处，醉心于有关前人的性格、生活和思想的各种细节。许多人都有这种爱好，但当他沉醉于其中时，就像工匠一样执着。有关文献史的几项极其重要的分类，还得归功于他的爱好。① 他也是个艺术爱好者，确切地说是一位绘画作品的出色鉴赏家。谨慎一点说，他还是位收藏家。他十分钟爱优秀的戏剧，建立并慷慨地资助了剑桥艺术剧院，所有去过那儿的人都不会忘记它。曾经有一次，他的一位熟人收到他的一张便条，上面匆忙地写着非常幽默的语句："如果你想知道此时此刻是什么完全占有了我的时间，请看函内附件。"② 附件是一份芭蕾舞剧《卡米格》的说明书。

五

我该言归正传了。如上文所述，我们把《货币改革论》(1923年)作为了解该理论的第一站。既然凯恩斯的实际建议就是我

---

① 最能吸引他的是哲学文献和经济学文献。在这种追求中，皮埃罗·斯拉法教授成为他志同道合的盟友。我能提供的最好的例子是，休谟的《人性论》的精简版本在1938年重印时，是由凯恩斯和斯拉法共同撰写序言的。这篇序言是语言学的热情而奇妙的里程碑。

② 这位熟人是最没有条理的人，没有留下凯恩斯的任何信件。凯恩斯便条的准确措辞因而不能得到证实。但我肯定便条包含一个简洁的句子，我也敢肯定，它的大意正是上文所陈述的。这已经有15年了，可能还不止——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那些艺术活动和爱好使他成为国家艺术展览馆的委托人和音乐与艺术促进理事会主席。真是老当益壮啊！

们的分析目标和指导，那么，我将让读者首先来了解他所倡导的

缘关系。

那么，这个英国的爱国者所注意的到底是什么呢？他注意的是概括。我们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一文中早已觉察到了。但是英国的情况比文中提到的情况更加独特。英国没有再像拿破仑时代那样从战争中崛起，而是陷入了贫困。那时英国失去了许多机会，其中有些是永远地失去了。不仅如此，她的社会结构也已被削弱，变得僵化了。她的税率和工资水平与勃勃生机是极不相容的。然而对于这些境况，英国却无能为力。凯恩斯不会去徒劳地遗憾，他并不习惯为那些无法改革的东西而悲伤。他也不是那种把全部精力倾注于个别问题上的人，例如煤炭、纺织、钢铁、造船等问题（尽管在最近的文章中，他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些建议）。他尤其不是那种宣传革新信念的人。他是英国式的知识分子，有点背井离乡，注意到了最不理想的形势。他没有子女，他的生活哲学基本上是一种短期哲学。因而，他完全依赖于似乎是留给他自身的惟一的“活动空间”——货币管理，既是英国人，又能保持自身的特色。他可能认为英国的问题可以解决，他确信问题能得到缓解，因为恢复到战前平价的金本位制是他的英国所不能承受的。

要是人们能被说服而认识到这一点的话，他们也就能认识到重实际的凯恩斯主义是一颗不能被移植到国外土壤中的种子，在国外它会夭折，并且临死前还会造成危害。但除此之外，人们也会认识到，在英国本土，这颗种子会健康成长，一定能结出果实并且形成树荫。我永远可以这么说，所有这些都运用了凯恩斯所提供的每一点建议。另外，在《货币改革论》中倡导货币管理绝对是革命性的，其中还把货币管理强调为一种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治疗方法，而且对储蓄—投资机制的关注已显示在序言的开头几行

里，并贯穿于第一章中。① 因而尽管作者面临的直接任务阻碍了他对这些事情的更深入的研究，但此书显然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迈出了一大步。

从分析来看，凯恩斯接受了货币数量论，它是"基础性的，它与实际的联系并不是针对具体问题的"。我们更应认识到这种接受——由于陷于货币数量论和外汇平衡理论之间的很普遍的混乱之中——的实际意义要比看起来的意义小得多，正如凯恩斯后来承认货币数量论比其表面上的意义要小一样。他试图接受的是外汇平衡方程式——以其剑桥形式——不管是作为它本身，还是作为平衡的条件，该方程式在严格意义上没有任何主张带有货币数量论的典型特征。因而，他可自由设定速率或剑桥方程式中对应的"K"——一个货币问题的变量，恰如其分地给予马歇尔这样的评价："对该问题传统方法的发展。"这就是流动性偏好的雏形。而凯恩斯忽视了这个理论至少可以追溯到坎提农，而且忽视了这个理论是由凯默勒发展而来的②，尽管只是很粗略的。凯默勒说过："大量的钱可以不断地被贮藏起来"；"可以贮藏的流通媒介的规模……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能深入研究《货币改革论》中许多精彩的东

① 参见《货币改革论》第10页很典型的段落，还有第8页对"投资制度"的描述，这预示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分析的某些不完整性。甚至那时，凯恩斯仍然自始至终令人惊奇地不情愿去认识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事实，不情愿用一个再简单明了不过的语句去表述它，那就是：工业是由银行来资助的。

② 见凯默勒的《货币与信用工具》第20页。但在《货币改革论》第193页，凯恩斯作了一个站不住脚的陈述："内部价格水平主要由银行创造的信用规模来决定。"他永远也没有改变这个观点。直到最后，在一定的经济过程中，这个信用规模对他来说仍是一个自变量，尽管是人为决定的，但不像过去那样由黄金产量决定，而是由银行或是"货币当局"（中央银行或政府）决定。然而——考虑到货币数量是"给定"的——从严格意义上说，这正是货币数量论的一个典型特征。因此，我在本文中的观点是，他永远也没有像他所期望的那样完全放弃了货币数量论。

西，例如远期外汇市场（第三章第四节）的精彩片断和大英帝国（第五章第一节）。这两部分真是令人拍案叫绝。我们必须赶快来到通往《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第二站"，即《货币论》（1930年）。

除了《概率论》外，凯恩斯再也没写过一本比《货币论》的劝诫目的更为明显的书。在他的所有著作中，而且并不仅限于最后一部（第七部），我们发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所有本质的东西——真是个非凡的成就。然而，这两卷毫无疑问是凯恩斯最费劲的研究。该研究如此杰出且如此严密，在完全成熟前过早地收获真是千古遗憾啊！要是他从马歇尔的渴望"可望而不可及的完美"中得到启发，而不是只听他的授课就好了！[①] 另外，麦德教授对"那个盎格鲁-撒克逊人无用的独创性"的友善的讥笑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②] 然而，此书是该研究领域和该时代的杰作。而我所要做的，是去收集指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最重要的路标。[③]

首先，正如经济过程理论一样，货币理论的概念作为整体已

① 在《货币论》的序言中，那带有半道歉意味的段落显示，他已经意识到他写了一本没有完全成熟的作品。

② 见冈纳·麦德《货币平衡》（英文版由布莱斯和史托帕在1939年译自德文版，瑞典文原版1931年刊于《经济浪潮》杂志）第8页。麦德当然不是为自己而反对凯恩斯，而是代表威克塞尔及其学派的利益。但是，类似的反对本来也会付诸实施，代表庞巴维克及其追随者的利益，特别是代表麦西斯和哈耶克。后者的作品已经出版，是在1929年问世的。而庞巴维克的著作用英文写成，陶雪格的《工资与资本》问世于1896年。尽管如此，凯恩斯的第六部著作却全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但在该书中并没有闪烁其辞，他是真的不了解。他善意的信任就是他给予他所认识的所有作家的盛誉。庇古和罗伯逊也在其列。

③ 这当然包括整体上对其著作的不公正，特别是对开头两本书：很普通但无论如何都很辉煌的开场白（《货币的本质》，第一本书）和关于价格水平的几乎是独辟蹊径的论文（《货币的价值》，第二本书）——其中充满有启发性的主张。必须记住的是——这恰恰是《货币论》与《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最本质的区别——《货币的价值》宣扬的是对价格水平变动的分析："价格水平的波动方式事实上发生了变化。"尽管事实上并不止于此。

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完全形成了。第二，这个概念根植于当时经济过程的环境或诊治之中，而经济过程自《和约的经济后果》问世以来从未改变过。第三，储蓄与投资的决定就像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说的那样，已完全分离，私人节俭也就成了反面教员。在这方面，进一步认识《J.A.霍布森先生和其他人》(第一卷，第179页)也就极为重要了。我们会理解节俭运动并不能降低利率(第二卷，第207页)。概括的差异——有时仅仅是在术语上的不同——会使文章面目全非，但这并不会掩盖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的本质。因而，第四，争论大都集中于威克塞尔的“自然”利率与“货币”利率的偏差。必须明确，后者不是指利率，而前者或利润都不能转化为“资本边际效率”。但这一争论反映在这两方面。第五，对预期的强调、对“熊市”的并非由投机动机引起的流动性偏好的强调以及那种认为在萧条时期，如果通过减少产业循环资金的需求量来作用于利率(银行利率)，货币工资水平的回落会重新确立平衡的理论——所有这些及许多其他东西(如香蕉、寡妇的坛子、达那厄的罐子)读起来并不完美，也使第一次陈述《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便感到左右为难。

六

《货币论》从任何一般意义上讲都是成功的。每位读者都看到了它的闪光之处，而且无论采取何种标准，都会对凯恩斯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肃然起敬。即使是诋毁性的批评，例如汉森教授对基本方程式的批评[1]，或哈耶克教授对于基本理论结构

---

[1] 见阿尔文·汉森：《凯恩斯〈货币论〉的一个基本错误》，《美国经济评论》，1930年；汉森和陶特：《商业周期理论中的投资与储蓄》，《计量经济学》，1933年。

的批评[1],通常也是与应有的歌颂相结合的。但是,从凯恩斯自己的立场来看,《货币论》是失败的,而且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受欢迎程度没有达到他的成功标准。从某种程度上说,《货币论》失败了——它从未真正成功过。原因不难找出:凯恩斯不能表达出其中心思想。过去他曾写过一篇论文,为了体系的完整性,使得文章为大量的材料所累,这些材料包括价格指数、银行利率的制订、存款创造及黄金,所有这些东西,不管价值如何,与流行的学说都是一脉相承的,但对于凯恩斯来说,显然不够有特色。他已使自己陷入分析工具的密网之中,每次当他试图把自己的思想像机器一样制造出来时,这些工具就会出问题。因此,再去从细节方面改进这部著作已没有什么意义,而且与批评作斗争也已毫无意义,对许多批评他不得不接受。此时,除了破釜沉舟,放弃对原理论的忠诚,以图东山再起外,他已别无选择。他能够很快地吸取教训。

凯恩斯果断割舍与已被弃置的理论的关系,鼓起勇气,尽了又一次——也是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努力。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抓住了自己思想的主旨,并尽可能把精力放到创造一种能解释其思想主旨的概念性工具的任务中去,而不是做其他工作。他终于如愿以偿。1935 年 12 月,他刚刚达到这一目标就又披挂上阵,拔出利剑,重新开战,宣称他将领导经济学家们摆脱持续了 150 年的错误,进入真理的殿堂。

凯恩斯周围的人被他迷住了。他一边改写他的著作,一边广泛地宣讲他的著作,在讲座中,在谈话间,在以他在国王学院的家作为会晤地的"凯恩斯俱乐部"里。妥协的方式是积极

---

① 见哈耶克:《对凯恩斯纯货币理论的思考》,《经济学》1931 年和 1932 年各期。哈耶克甚至谈到了"巨大的进步"。虽然如此,凯恩斯答复时仍不免愤怒,像他自己在另一场合说的那样,取悦于作家们是很困难的。

的。他"一直参考 R.F. 卡恩先生的不断的忠告和富有建设性的批评。本书中许多内容如果不是采纳了他的建议，是不可能成形的"。鉴于卡恩 1931 年 6 月初在《经济学杂志》上刊出的《国内投资与失业的关系》一文的所有暗示，我们肯定不再怀疑那两句夸张的叙述。同样，罗宾逊夫人、霍特里和哈罗德也受到了赞扬。① 还有其他人——包括一些剑桥最有前途的年轻学者，所有的人都在谈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新曙光引起了英国和美国的广泛关注。广大学生为之激动，一股盼望已久的热情浪潮席卷了整个经济学界。当《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最终问世时，哈佛的学生已迫不及待地等着新书的上架：他们为加快进程，安排了第一批图书的直运。

七

社会分析首次出现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中，而有关投资机会衰退和储蓄习惯仍然维持的经济过程分析，理论上贯穿于《就

---

① 霍特里对于《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而言，只能是一位颖悟的——并且，简而言之，是一位——有同情心的批评家。当然，他从来不是凯恩斯主义者。从《货币改革论》到《货币论》，凯恩斯是一名霍特里主义者。哈罗德或许一直在独立地向离凯恩斯的目标不远的目标迈进，尽管他在霍特里主义的地位提高后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但不是出于私心。对于这种议论，说句公道话，崇尚凯恩斯主义和不完全竞争的杰出经济学家们，正面临着丧失其在经济学界应有的地位的危险。这里完全有必要谈一下罗宾逊夫人的学术思想，她被上面所提到的研究小组拒之门外（至少在我说这句话时她还未受到邀请）。学术思想界对女性的态度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她确也涉足其中。这样说的证据在于：她的《储蓄和投资的寓言》一文，使她成为最熟练的后卫，掩护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撤退。她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发展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通过其在 1933 年 10 月初发表于《经济研究评论》上的《货币理论与产出分析》。

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始终，借助于三个固定术语：消费函数、资本效率函数和流动性偏好函数。[①] 这些因素，同给定的单位工资和相应的货币数量一起“决定”了收入，事实上也就决定了就业（如果后者由前者惟一决定的话）以及有待于“解释”的重要的有关变量。这无异于用贫乏的材料制造出绝好的调料，应获得优异奖。[②] 让我们来看一下凯恩斯是如何完成的。

（1）模型简化的首要条件，当推分析方法的简化。对于分析方法的简化，部分靠创造，部分则是愿意为各种不得不从陈述中省略掉的因素而付出代价。但如果我们置身于凯恩斯主义正统学说的角度，选择接受他关于经济过程的分析，将其作为天才的礼物，那么，这位天才的洞察力则能透过杂乱无章的表面现

---

① 具有特色的术语有助于读者正确理解作者希望阐明并引起读者注意的观点。用这种方法而不是临时界定概念，凯恩斯为他对欧文·费雪的“边际收益超过成本率”所作的重新命名——凯恩斯很清楚他的优先权——以及“流动性偏好”的使用，进行了辩护。就凯恩斯的用意而言，“消费函数”无疑是优于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的一个框架。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也使用过“有效需求”的概念，但只是为了避免由于使用“需求”和“供给”的概念而产生混淆，影响具有严密、明确意义的领域（局部分析）。凯恩斯把消费和流动性偏好函数的假定称为心理定律，这是一种强调的说法，当然，也是一种强调的方法。但没有站得住脚的观点能与它相联系，甚至还不如与过度需求定律相联系的多。这一点，就像在其他方面一样，凯恩斯显然是过时了。

② 把凯恩斯的成就减至只剩下逻辑结构的基本内容，然后对其评头品足，的确有些不公平。然而，把他的理论体系转化为准确形式的尝试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此外，笔者尤其要提到以下文章：雷德韦 1936 年发表在《经济记录》上的观点；哈罗德的《凯恩斯与传统理论》；米德的《凯恩斯体系的一个简化模型》；希克斯的《凯恩斯与古典学派》；兰格的《利息率和最佳消费偏好》；萨缪尔森的《均衡的稳定性》（利用动态方程）；史密斯的《过程分析与均衡分析》（也是对凯恩斯主义概要的动态分析）。在各位作者的笔下，对凯恩斯经济学的赞同很少，有些可能已成为尖锐的批评。1944 年 1 月，《计量经济学》刊登的莫德格列尼的《流动性偏好和货币利息理论》尤其如此。

象,进人隐藏其中的本质中去。此时,再面对他证明其结论的综合分析,可能也就没有多少反对意见了。

由于排除了就业,这里选用的变量集合是货币数量或表现,我们也可称其为货币分析,又由于国民收入是中心变量,故亦称收入分析。我认为,理查德·坎提农是第一个针对综合分析、货币分析和收入分析提出成熟的设计的人。这一分析后来由弗朗西斯·魁奈在他的《经济表》一书中完成。魁奈是地道的凯恩斯的前辈。有趣的是,他的有关储蓄的观点与凯恩斯的观点如出一辙:读者通过查阅《箴言集》可以很容易地证明这一点。然而还应补充说明的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综合分析方法,在现代著作中并不是孤立的,它也是迅速发展的大家族中的一员。①

(2) 凯恩斯进一步简化他的理论结构,尽可能避免分析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复杂情况。凯恩斯理论体系的确切框架运用了雷格纳·弗里希提出的一些术语,属于宏观静学,而非宏观动学。这种限制部分应归因于那些表达他的教义的人,而非他的教义本身,因为它包括了几个动态部分,尤其是在预测方面。但凯恩斯本人不喜欢"时期"一词,把注意力集中到对静态均衡的考虑上的确是事实。这样就为走向成功扫清了障碍——到现在为止一直像美杜莎的脸一样影响着经济学家的差分方程。

(3) 此外,凯恩斯把他的模型——尽管不总是他的论据——限制为短期现象。尽管以上两点经常被强调,但远不足以使人充分认识他的模型在短期上的要求是多么严格,以及这一事实对于《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整体结构和所有结论是何等重要。关键性的限制条件在于:不仅生产函数、生产方式,

① 了解《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之前的综合分析进展的最快捷方式是阅读延伯根的调查报告,载《计量经济学》1935 年 7 月号。

而且工厂和设备的数量和质量都不允许变化。对这一限制，凯恩斯不厌其烦地在他论证的关键点加以提醒（见《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 114 页和第 295 页）。[1]

模型中也允许了一些在其他情况下不被采纳的简化。如：将就业看成与收入（产出）成一大概的比率，目的在于说明只要能确定其中之一，另一个也就能被确定。但这种方法限制了分析的适用性，使它至多只能适用几年——大约 40 个月——就现象而言，仅限于那些在工业设备不变的条件下，能够决定其利用率高低的因素。在这些设备上所有现象都在意料之中发生和变化，也就是说，支配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现象都被排除在外。

作为现实的写照，在危机时期这一模型最接近于正确，此时流动性偏好几乎也发挥了自己最有效的作用。因此，希克斯教授称凯恩斯的经济学为危机经济学也不无道理。但凯恩斯自己认为，他的模型得益于现实中的萧条。尽管他存在着用短期模型去分析本质上属于长期现象的问题，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有权对静态过程，或者无论如何对停留在以静态的充分就业的均衡为上限的水平上或以此为中心摆动的过程进行特有的推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必定走向灭亡。穆勒认为，资本主义将发展到一种没有障碍的静止状态。凯恩斯则认为，资本主义将发展到不断有衰退危险的静止状态。尽管凯恩斯理论迥异于马克思理论，但与后者有重要的共同之处：两种理论中，衰退都是由与经济运行有关的原因引起的，而不是外部力量的影响。这一特征自然使凯恩斯理论有资格担当反资本主义意志的“辩护者”的角色。

(4) 凯恩斯非常注意不超出直接决定收入（和就业）的因素

---

① 严格地讲，必须承认机器设备数量上的变化，但在既定的时点上，这种变化可视为很小，从而可以忽略其对现存工业结构和产业的影响。

的范围。他自己也坦率地认为，这些"有时"被看作"最根本的独立变量"的直接决定因素"有待于进一步分析，由此说来，也就不是最根本的独立因素"。这段话看上去仅仅是建议经济变量从组成部分"原子"中获得各自的涵义，但实际上不止如此。当然，我们可以把现实的经济生活大大简化，得出很简单的定理，如果我们满足于以下形式的论证的话："假定 A、B、C……那么 D 将决定于 E。如果 A、B、C 是研究范围之外的因素，那就无话可说。但如果它们属于有待解释的现象，那么，就能轻而易举地得出什么决定什么的结论，并且不用太丰富的涵义即可取得新奇的效果。"列昂惕夫教授称之为含蓄的理论化。① 对凯恩斯来说，如同李嘉图一样，这种论证不过是用来强调的手段②：它们被挑选出来强调一种特殊关系。李嘉图并未说："在当今英国条件下，在我看来，考虑到各种因素，粮食和原材料方面的自由贸易将会提高利润率。"而是说："利润率决定于小麦的价格。"

(5) 对于为数不多的在凯恩斯看来既重要又不足以作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主旨的观点，我们会发现，除了刚刚提到的方法之外，还有其他的强调方式。其中两个已提到过。③另一个是批评家们倾向于称作夸大其辞的方式——而且因为诸多结论恰恰依赖于高估，这类夸大不可能降至可以控制的水平。但必须记住，站在凯恩斯的立场看，这些夸大的言辞不仅比从非要点中抽象出来的方法稍逊一筹，而且部分应归咎于我们自己：除非有来自一方的力量使我们对观点进行推敲，否则不会轻易

---

① 参见列昂惕夫同名文章，《经济学季刊》第 51 期，第 337～351 页。

② 凯恩斯与李嘉图理论上的相似值得注意。他们的推理方法极其相似，是凯恩斯对马尔萨斯的反储蓄观点的崇尚和对李嘉图教义的抵触，使这一事实变得不明显了。

③ 见第 248 页注①。

听取忠告。为了便于讨论问题，假定问题中的观点实际上都很重要、值得推敲，并且记住夸大其辞的话不会出现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而会出现在凯恩斯门徒的作品中，我们就会很欣赏这种为我所说的调料添色的方法。

三个例子足以说明问题。第一，每一位经济学家都知道——即使他过去不知道，也会从与商人的交谈中得知——发生在货币工资率上的任何充分的普遍变化，都会影响价格向相同方向变化。然而，在工资理论中谈论这一点不是经济学家们的事。第二，每位经济学家都应该清楚，托格得、斯密、穆勒的储蓄和投资机制的理论是不充分的，尤其是储蓄和投资决策紧密相联这一点。而且如果凯恩斯已经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了恰如其分的描述，就会向我们作出回答，而不是对结果含糊其辞："的确……是这样……在特定的循环状态下很重要……究竟什么重要呢?"第三，任何一位读者翻阅《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165页和第166页——第十三章的开头两页，即《利息通论》，他会看到什么？他会发现，按这一理论，对储蓄的投资需求和受时间偏好(我所称的消费倾向)影响的储蓄的供给，会因利率的"失控"而达到平衡，因为"仅凭对这两个因素的了解而推断利率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原因在于，储蓄的决策不一定意味着投资的决策，还必须考虑到后者不随前者或不迅速随前者的变化而变化的可能性。我会考虑到下一种可能性，即如果凯恩斯让分析脱离以上的任何一点，那么对于现行教义要旨的极其合理的发展是不会深深打动我们的。接下来摆在面前的就是流动性偏好——和仅仅是作为与货币脱离的报酬的利息(在他自己的文章中不可能如此陈述)——等等，为引起我们的注意而以众所周知的顺序排列出来。我们为了某一目的而警觉起来。因为现在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比35年前更乐于听取利息是一个纯货币现象的论断。

但在书中仍有一个词无法得到上述方式的支持和辩护，即“一般”一词。以上那些强调方式，尽管在其他方面无可非议，但除了能说明几个特殊事例之外，再无用武之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这些特例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实例，可除此之外，他们也别无建树。①

(6) 显然，正如无视从不完全竞争中获得的帮助一样②，凯恩斯希望不借助于刚性成分就能得出结论。然而，对某些观点的论述，他不能够那样做，尤其是“由于货币流动性偏好的需求弹性无穷大，利率在下降过程中呈现刚性”的观点。在其他情况下，刚性分析作为备用方法，仅在正在用的方法不能说明问题时启用。当然，当经济体系中足够多的合适机构瘫痪时，该体系停止运行完全是可能的。与其他理论家一样，凯恩斯主义者也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此种希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古典实例即是不充分就业的均衡。③

(7) 最后，还必须谈到凯恩斯在创造自己的分析工具方面的杰出成就。比如，对卡恩的乘数的娴熟运用，或者在使用成本概念时适当的创造，这对界定他的收入概念大有帮助，而且有理

---

① 这一论述首先由兰格提出。书中提到，他也只信奉惟一一本真正的通论——瓦尔拉的理论。他巧妙地指出，后者是作为一个特例来说明《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

② 然而后者(不完全竞争 ——译者注)被哈罗德采纳了。

③ 我有时想知道，为什么凯恩斯把重点放在证明有可能——在他的假设下通常会——在完全竞争的完全均衡条件下出现的不充分就业。由于无论何时我们都能看到，有足够的可以证实并解释问题的理由去说明现实的失业，因此，只有理论家的雄心才能鼓励我们期望更多的结果。在完全竞争下的完全均衡状态出现非自愿失业的问题，是一种即使连被凯恩斯称为“古典经济学家”的稻草人(容易击败的假想对象——译者注)也不会信以为真的状态，无疑会在理论上引起巨大的兴趣。但实际上，凯恩斯应该曾遇到在长期的非均衡状态中存在的失业。实际情况是，他没能清楚地证明他的例子。但是工资在下降过程中的刚性会助他一臂之力。理论问题本身是讨论的主题，参加讨论者在区分涉及到的不同理论观点时遭到了失败。但我们不可能深入地讨论这一问题。

由作为一种重要的新鲜事物。在诸如此类的以及其他的概念性安排中，我最佩服的是它们的度：它们能达到他的目的，正如一件裁好的大衣正适合顾客的身材一样。当然，正因为如此，若不考虑凯恩斯的特定目的，这些概念只获得了有限的用途。用来削梨，水果刀是一把不错的工具，但如果用它剔牛排而未果，就只能怪自己了。

八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成功是顷刻间的事，而且如我们所知也是持久的。其中不能令人满意的观点也有许多，它们仅仅是对读者有帮助而已。凯恩斯的学派自发形成了，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史学家以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对话的学派，而是一个真正的属于社会实体的学派，即一个声称忠实于"一个主子、一个教义"，有着自己的内部圈子，拥有自己的宣传人员和口号，拥有自己的秘密的、公开的教义的社会团体。这还不是全部。在正统凯恩斯主义领域之外，有着广泛的赞同者，在赞同者之外，又有一批以各种方式自愿地或勉强地吸收凯恩斯的分析的某种精神或个别术语的追随者。整个经济思想史中类似的例子只有两个——重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

赢得来自朋友和敌人的积极的认可，尤其是从每位自己在课上聆听并接受其生动影响的教师那儿得到认可，对《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本身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毋庸置疑，令人遗憾的是，除非冷冰冰的分析从分析家真实或假定的政治暗示中获得一点温度——这温度当然不会来自它本身——否则在经济学界，如此的狂热和随之而来的强烈反对决不会爆发。因此，让我们来领略一下这本书的思想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多

正宗嫡传的凯恩斯主义者都是"激进"的,但不管怎么说,凯恩斯本人并非如此。是什么取悦那些人,使他们变得激进呢?在《美国经济评论》刊登的一篇优秀文章中,赖特教授清楚地说:"只要大量引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言论,一位保守党候选人也能引起一场政治运动。"① 这是正确的,但只有当这位候选人知道如何运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插入语和限制条件时,才会如此。而凯恩斯无疑是位能干的倡导者,这是显而易见的。在一定程度上,也许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他的成功正是基于下面的事实:即使在大胆的向前探索中,他也从不使两翼轻易受敌——一些粗心的他的政策或理论的批评家们常会付出这样的代价。② 凯恩斯的信徒们不考虑种种限制条件,他们仅留意对个人节俭的控诉,以及这些控诉涉及的有关管制的经济和收入不平等的涵义。

为了理解这一点,有必要回忆一下,作为长期学说发展的结

---

① 赖特:《凯恩斯经济学的未来》,《美国经济评论》第35卷第3册,第287页。尽管在观点上有些不同,但赖特有益地补充了许多自己的观点,进入到空间因素不允许我进入的领域。

② 这就是为什么凯恩斯的著作中给经常变化的措辞留有很大余地的原因,如"凯恩斯未明确地这样说过",或"凯恩斯没有明确地否定"。综观《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大多数含糊的说法出现在第十八章和第十九章。但对所有含蓄说法的可能参考随处可见。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古典体系的逻辑并未真正受到指责(第278页)。即使是萨伊定律也没有完全被抛弃;甚至未彻底否认趋于平衡储蓄和投资决策的机制的存在及在此机制中利率的作用;货币工资的下降刺激产出的可能性等也未被彻底否定。诚然,只有在很特殊的情况下,第一点的效力和另外两者的存在才会偶尔被认可。因此,批评家们一直处于被判为作"粗鄙不实报道"的危险之中,就像针对马尔萨斯的第一篇文章的粗心的批评家,不可避免地在第二版中遇到一系列引用一样——在那里面,其实马尔萨斯对解释马尔萨斯主义有着相当的贡献。但本文不可能深入探讨此问题。在引述的文章中,赖特教授提供了许多有教益的例子。

果，储蓄已成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最终支柱。实际上，老亚当·斯密已把其他因素处理得差不多了。如果我们严密分析他的论据——当然，我说的只是他的体系的思想方面——会归结出直接针对“懒惰”的土地所有者和贪婪的商人或“工头”的劈头盖脸的叱责，再加上对其吝啬的著名颂辞。到凯恩斯为止，这一套一直是大多数非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体系的要旨。马歇尔和庇古亦如此。他们两个——尤其是庇古——想当然地认为，不平等或不平等的程度是“不受人欢迎的”。但除了向最终支柱的攻击外，他们便停滞不前了。

许多在二三十年代涉足于教学或研究领域的人，已经放弃了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忠诚。许多人开始嘲笑利益动机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个人功绩。但是只要他们不直接信奉社会主义，就仍旧不得不崇尚储蓄——在他们看来，这是在遭受失去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并且与凯恩斯所谓的经济学家的“下流社会”为伍的惩罚。但凯恩斯打碎了他们的枷锁。最后，理论学说不仅消除了个人的成分，如果学说自身不是机械的，也至少可以机械化，而且将最终支柱分析打得粉碎；此学说是一种不能精确地说明，但可用于解释以下两句话的学说：“竭力储蓄的人摧毁了实际资本”，而且经过储蓄，“收入的不平等成了失业的主要原因。”[①] 凯恩斯革命即归结于此，如果这种措辞合适的话。**这一点**，也只有这一点解释了并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凯恩斯对马歇尔态度的变化，这种态度不是从任何科学根据上可以理解和无可非议的。

---

① 毕竟，任何人翻到《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第372－373页和第376页，都会确信，凯恩斯实际上离认可这两种说法已非常接近了。一个人为了说明自己实际上没有那么做，就必须像赖特教授那样小心谨慎、事事留心。

但是，尽管漂亮的包装使得凯恩斯对经济科学的献礼更易被接受，它并不能把注意力从礼物本身转移开去。《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问世以前，经济学正变得日益复杂，日益不能对简单的问题作出简单的答复。《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看上去再一次使问题简化，使经济学家能对问题作出人人能懂的简单答复。然而，正如李嘉图的经济学一样，凯恩斯的经济学有足够多的复杂的东西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足以鼓舞人心。事实证明，与幼稚的思想观念联系很紧的同样的体系，能令正在崛起的一代经济学家的智囊团满意。他们中的一些人曾感到——据我所知现在依旧认为——所有其他的"理论"上的工作都应该放弃。他们尊崇的人是提供给他们定义明确的模型去处理、去批判、去改进的人——是那些尽管其著作不能具体化，但至少应以他们所希望见到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人。

甚至那些在此之前已确立了他们的态度、《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他们的成长期不会对他们造成冲击的人，也被和风轻拂着。一位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过去有、现在仍有一些东西，为不然将成为另一种样子的我们的思想和分析方法作补充。它不会使我们变成凯恩斯主义者，只会使我们成为更优秀的经济学家。"不管我们同意与否，这句话都相当准确地概括了凯恩斯成就的实质。它尤其解释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恶意的批评，尽管在攻击个别主张或假定时是成功的，却仍无法对整体结构进行致命打击？马克思也可能在这一点上敬佩凯恩斯，尽管他可能认为：凯恩斯的社会分析是错误的，他的每一个主张都会将人引入歧途。

我不想把《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当作学生的试卷来给它评分。而且我不认为有级别的经济学家——那些人们能拿他们的名字来比较的、与众不同的、无与伦比的人，不管学说的命运

如何，人们对他们的记忆是永存的——会比凯恩斯主义以及人们对它的褒贬更“长寿”。

至此，我不想再写什么了。每个人都了解这位勇敢的战士为他的最后一部巨著[①] 进行的伟大的抗争。众所周知，凯恩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一次进入财政部（1940 年），在那里，他的影响随着丘吉尔的影响而增加，直到无人能与之匹敌。人人皆知授予他的上议院议员的荣誉。当然，还有“凯恩斯计划”、“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英国贷款”。但这些事件将不得不求助于一位有可供任意使用的各种资料的专业传记作家了。

---

①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凯恩斯的最后一部巨著。此后，直到他逝世前，他仅写了一些篇幅较短的作品。

附　　录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克·克纳普
（1842—1926）

1926年2月20日，德国第三政治经济学时代的杰出人物之一克纳普教授永远地离开了德国科学界——第一时代为“理财学”时代，杰出的代表人物是塞更多夫和加斯蒂；第二时代对应于英国古典时期，在屠能和赫尔曼的著作中把它推向高峰，屠能和赫尔曼是“社会政治学”和“历史方法”的优秀代表人物。尽管克纳普和施穆勒、瓦格纳、布赫、布伦坦诺[①]等人在许多方面不尽相同，但是只要谈到这个时代的全部优点和部分缺点，人们就会不仅谈论上述伟人，而且也将克纳普教授的名字与其联系在一起。

只言片语足以勾勒出他平淡无奇的一生。1842年3月7日，他出生于吉森。他的父亲是一位教授，曾撰写过科技教科书。克纳普曾经在慕尼黑、柏林、哥廷根等地求学，成为一名统

---

① 布伦坦诺（Franz Brentano，1838—1917） 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1864年接受天主教神职。1873年因不接受“教皇无谬论”而辞去神职与教职。胡塞尔与迈农均为其学生。在哲学上，提倡“回到亚里士多德去”，认为有非物质的个人灵魂存在。在心理学上，强调精神过程就是动作，并认为动作随情感而发生。主要著作有《亚里士多德和他的世界观》、《从经验角度看心理学》、《心理现象的分类》等。——编辑注

计学家，在数学方面造诣很深。1867 年，他成为莱比锡市统计局局长。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因为卓有成效地管理本职工作，他得到了应有的赞誉，同时，在他领导之下的统计局刊物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也证明他当之无愧。1869 年，在莱比锡大学他获得“特别”教授的称号——这个头衔相当于助理教授。1874 年，他来到斯特拉斯堡，被提升为正教授。以后他一直在那里工作，直至退休。时间真是很长，直到 1919 年他不得不离开那儿，因为战争使那儿已沦陷于别国之手。

因为他无论干什么，总是一心一意、不屈不挠、坚定不移，所以，回顾他一生的工作的概况要比回忆那些像他一样具有思想活力的人容易得多。如果我们对他的两篇论文——一篇是关于屠能的博士论文，另一篇是关于税收问题的——采取忽视的态度，那么到 1874 年，他仅是一位统计专家而已。除了在这个领域中的实践之外，他还写了很多关于这个课题的理论文章，也值得细细研读。正因为他在其他方面为自己所树立的标准，使得我们无法想到他的显耀的地位——如果不是一流的话，起码也接近于一流。

作为研究经济生活的历史学家，作为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的经济学家，他是卓越的。1887 年，他发表了两部著作，论述了在普鲁士旧版图上的农民的解放与农业工人的起源。这两本书是他的杰作，也是研究这类问题的典范之作。这些书有助于塑造许多追随者的思想，近乎创立了科学领域中很特殊的一个分支，其理由并不在于运用任何新的历史方法，也不在于掌握了解决特殊问题的材料。在这些方面，克纳普并不等同于梅尔泽或者汉森等人。但他拥有其他更高尚、更罕见的品质，这又是其他人所不能比拟的。他有清晰的、应该说是充满激情的、能够抓住一切事物本质的洞察力，能够穿透事物表面，直达其核心。他看

到了历史的进程以及历史问题，其他人只抓住了外围的事实，他则更加牢固地抓住了历史进程及历史问题。他把他的历史分析法建立在易于理解的当今事实上。他出版于 1891 年和 1897 年的两部著作的框架仅仅部分源于历史；另一部分则源于对德国地主及佃农的研究，他们的思想、生活方式至今仍适用。我在努力给他的特征下个定义，但这个定义超越了他作为历史学家的范畴；对于不是寻求一种浪漫与传奇、而是寻找历史问题的他来说，这个特征就是一切。

像农民轮作以保持土地肥力一样，1895 年，克纳普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告一段落；大约在 1895 年，他再一次发现了一组完全不同的问题。在某些方面，那时他已取得巨大成功。他的《货币国定说》——最近在皇家经济协会的资助下，被翻译成英语——于 1905 年第一次出版发行，毫无疑问，这使他饮誉全球。他的一群信徒聚在这本书周围，他的崇拜者与对手——后者的攻击与前者的褒扬旗鼓相当——都使这本书获得了极大成功。这本书还有许多地方值得称道：思维的拓宽，独树一帜的立意，风格的清新。要想否认它在处理什么是经济学理论的重要问题时起过反作用，是不可能的；它给德国货币金融学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无法否认的。但是它告诉人们：不管他的经济学理论有什么缺点，都不能被无端地嘲讽。这本书再次显示了这位伟人的力量：他确信有许多东西他难以证实，却常常被那些他不能证实的东西所吸引。

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
（1851—1926）

奥地利学派的三位奠基人中的最后一位——维塞尔刚刚过完75岁生日没几天，便于1926年7月23日去世，去世前，头脑和身体依旧充满活力。

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男爵出生于1851年7月10日，父亲是枢密院官员利奥波德·冯·维塞尔男爵。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在维也纳求学，于1872年取得学位。到此时，他最喜欢研究的是史学。但在1872年，他偶尔拜读了门格尔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转而对经济学理论产生兴趣。他先后在海德堡、耶拿、莱比锡大学学习，并沿着这条路继续向前走。在成为维也纳大学讲师（1883年）之前，他曾在行政部门短暂工作过。1884年，维塞尔被召到布拉格大学任职，1903年又返回维也纳接替卡尔·门格尔，最终进入了经济学的广阔领域，成绩卓著。撇去他事业中的细小事件不谈，我所要提及的是1917年他进入上议院成为终生议员、同年担任政府内阁的商业部长一事。辞职后，维塞尔重返原职，继续从事科研工作。

要给那些不了解他的人留下恰如其分的印象是不容易的，因为他的魅力折服了他到过的任何地方。儒雅的外表，非同寻常的魅力，威严、一丝不苟的处世风格，艺术家的风范，渊博的学

识，这些使他在广阔的天地里一言一行都挥洒自如、游刃有余，给他的文笔增色不少。这一切是不足以形容他的。也许我惟一能做的便是作如下描述：在祝贺他 70 寿辰的时候，三位发言者（包括我在内）都不约而同地把他比作歌德。他总是积极主动、不慌不忙，对一切事物都表现出兴趣。例如：他是一位杰出的艺术鉴赏家，同时也是一位勤勉不辍的艺术赞助商，无论何事都不会使他感到心烦意乱。公开与隐蔽的不幸不会触及他的灵魂深处；每个荣耀和成功自然而然地来到他面前，一一降临在他身上，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无需费力——然而对于他来说，这一切都是过眼烟云。他从来不为什么而战，也不向任何人宣战——但是每个困难险阻都好像自动为他让路。衰老使其他人感到岁月对他们的摧残，而对他来说，只是创作油画时的最后几笔：力求尽善尽美，使之总能给人以美的享受。

在有限的篇幅内给他的科研工作的特征下一个定义依然很困难，尤其是对英语国家的读者来说，因为他丝毫不按英语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恐怕就连善于笔译和口译的斯马特教授的部分作品，也不能把维塞尔的真正重要的观点展现在英美公众面前。他的写作技巧不是很高明，是为数寥寥的不能用简洁的笔法来表现他清晰的思想的人中的一位。目前纪念他去世的最好的书评（作者是哈耶克）列举了一大串他的作品，共计 62 项。我们应该约束自己，力争简明地表明他的思想的总趋势。

首先，他是一位理论家。门格尔给他的发展自己的思想的冲动要比思想多得多。很少有人深深思考价值理论的原理，很少有人具有像他那样清晰的对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洞察力。在精力处于鼎盛时期时，他耐心地创立了自己的观点和方法，这些观点和方法在名为《自然价值论》（1889 年）的书中有所总结，此书以他出版于 1884 年的著作为基础写成，第一次全面阐述了他的

边际效用理论，用“间接效用”来解释生产成本理论（被潘塔莱奥尼称为维塞尔定理），也阐述了“估算”原理。这些都是我们所熟知的。但是我所要强调的不是他的任何简单工具或定理的重要性，而是他从整体来构想经济生活的丰富成果与伟大之处，这些成绩的产生得益于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推理。他在价格均衡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近来突然出现的问题迫使我们去重温那些基本思想，在我们中的许多人看来，它们已经过时了。

《自然价值论》一书出版后，他将这个问题搁置了 20 年。1909 年，他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1914 年在百科全书上发表了他的《社会经济的理论》，这是他的最后一篇、也是最成熟的关于纯理论的文章。由于战争，我们直到现在才开始感到它的影响力。

与瓦尔拉和其他人一样，与此同时，他转向货币理论的研究。他另辟蹊径，从不参阅别人所写的文章，从自己的角度慢慢构筑自己的理论。在我们这个时代，在这个领域内，他是最为出色的一位理论家。他对这个问题所发表的最早的言论是在 1903 年，在接替门格尔的职位时的就职演说中。最后一篇文章是关于货币的，完成后不久，维塞尔便去世了。他采用了调查的方法来研究货币购买力的历史变迁，旨在像利用价值理论创造成本法则一样，创造量化定理。真正能了解货币理论的人不是很多。他们在很多方面都愉快地达成共识，其不同点与审美标准和技巧方面的不同点相比，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在对待这个问题时，在很大程度上，维塞尔与其他人是不分伯仲的。但是在其他一些方面（后来被 F.X. 维斯和 L.V. 米塞斯发展完善），在我看来，维塞尔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深刻得多。

他在晚年的工作主要集中于社会学研究方面，从某种意义

上说，社会学可被定义为历史分析，或者定义为他用非常特别的字眼组合成的词——“无名的历史”。历史社会学或社会历史学是他起初的兴趣所在，也是他生命中最后的兴趣所在。年轻时，他为此辛勤研究，付出过很多心血，他在74岁高龄时，出版了社会学专著《权力法则》，完成了他求学期间立下的宏愿。

他的一生可谓诚实、正直、品行端正、没有污点。他的生命中的每个元素组成了和谐统一体的一部分，慢慢展现、有机地成长，达到了一个惊人的高度和广度。

拉迪斯劳斯·冯·博特基威茨
（1868—1931）

博特基威茨是继柳居士之后又一位优秀的德国统计学家，在一些重要方面，柳居士称得上是他的老师。但博特基威茨却没有德国血统。他属于波兰的一个家族，那些波兰家族与波兰的俄罗斯贵族重归于好，和睦相处。他出生于圣彼得堡，并在那儿长大，曾在那儿求学、执教。在德国，他延长了他的停留期间，却与德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德国，他于1895年成为斯特拉斯堡大学的讲师，使他于1901年在柏林被提升为助理教授。按惯例，这位杰出的外国人是不可能被考虑进柏林大学或其他大学的一些重要职位的候选人名单的。直到1920年，根据一项促使全体教师"大众化"的措施，全体助理教授成为正教授，他也随之被提升为正教授，不再完全孤立。

这一点有几个理由可以佐证。他是一个外国人。虽然他不是一位拙劣的演说家或作家，但他授课的业绩平平。据说，他授课时，没有多少学生去听，因为他把自己的东西巨细无遗地加进授课中去。他那近乎苛求的敏锐使人敬畏，这也使人很难喜欢上他。就连本该推荐他进入教育部的同仁们都很难理解他的著作。他似乎并不在意，但他在令人敬畏的谨慎中保持着冷漠，享受着人们给予他的尊敬——人们带着尊敬的心情去仰视这位巨

人。但他出乎意料的去世缩短了他的科学生命，此时，他正精力充沛、体力旺盛。关于他的所有出版物的书目（就目前我能看到的而言）由奥斯卡·安德森教授完成总结并出版。是天性而并非幸运女神经常垂青于他，使他成为一名非同寻常的评论家，以至于他最初的作品也被冠以评论的名称。他的评论使他充满生机与活力。这种具有判断力的天赋，更确切地说是激情，在作为经济学家的他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也使他在含有数字的例子中犯一些小错误。这里需要提及的是，他不是一位发明者，我相信，如果他不放弃全方位地运用数学工具，则会得到更多，这也使他很难在他的鼎盛期和埃奇沃思、巴罗内等人平分秋色。但是他高举经济学理论这面大旗，尤其是在一个没有几个人听过经济学理论的国度和时代，他信仰马歇尔主义的信条，利用自己手中的利器，解决了许多有争议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他最了不起的成就便是对马克思体系理论结构的研究与分析，在他关于这个论题的所有文章中，这一篇是最棒的，同时在其他评论中也是最棒的。另一篇代表作是关于洛贝尔图斯和马克思的地租理论的论文。

正如瓦尔拉、帕累托和庞巴维克一样，他的理论存在错误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的基本原理得到了传播。这位严谨的评论家是没有多少优势的。作为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方面的学者，他在德国经济学界拥有很高的地位。他对金本位制、银行信用、流通速度等课题的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然而，在这个领域他干得最出色的是对于指数的研究。

在统计方法的领域中，他的地位当然毋庸置疑。作为小数法则的发现者及柳居士学派的领袖，他已经饮誉世界、留芳百世。他惟一的“书”是关于概率的，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甚至当我们不带有对隐含于其中的概率的基本概念的任何偏好去

读这本书的时候。出版这本书时，他心存很大障碍，惟恐这本书没有很高的创造性。在经济学刊物上列举博特基威茨长长的作品索引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适的。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几部作品足以反映出这位经济学家的历史地位。在寻求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措施的重要课题方面(国际统计学第十九届年会)，没有人比他做得更多。我们中的多数人将带着不同目的和兴趣去研读那些优秀的论文：有的关于经验曲线的求积分；有的论及统计学中的同一性和稳定性；有的研究在戈森定律下的变量；有的谈及关于公共财产的错误法则；有的论及改变时的承继性。无需提及他的关于死亡率与保险的任何论文，它们中的一部分是那个领域中的珍贵成果。

为了对他的思想领域的范围有所了解，必须指出的是，他在其他方面的丰富才能远远超出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才能。他的《放射性物体概率研究》1913 年在柏林出版。在翻阅这本小册子的时候，读者可以看出写这本小册子的经济学家的真正的思想高度与深度，由此引发疑问：能否单凭他的出版物来衡量他巨大的潜能呢？

译者后记

本书是在熊彼特去世后，由其夫人伊丽莎白·布迪·熊彼特从熊彼特生前发表过的文章中选编而成的。熊彼特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其观点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阶级性，这里照原文译出，本书中论及马克思学说的部分，并不代表我们的立场。书中文章仅供参考，如有引用，务必参照原文。特此说明。

本书正文部分由以下同志翻译：韩宏、金维德、张建颖、何跃中、董德沛、初曦（何跃中校译）、蒋建华、丁炎辉、郑建新、吴雪云。

前言由韩宏翻译，附录部分由江振春翻译。

全书由韩宏、蒋建华统筹定稿。江苏人民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大力支持，谨表示我们诚挚的谢意。

译　者

1998 年 10 月 16 日

编辑的话

熊彼特的《从马克思到凯恩斯》中译本经过近8个月的紧张准备，终于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作为这个中译本的第一读者（此前，大约在60年代，兄弟出版单位曾经出版过此书的中译本，现已很难见到），我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将它推荐给有兴趣阅读此书的朋友们。我的惶恐来自于对所涉人物及其著作认识的肤浅，同时也来自于对敏感问题（如作者对"马克思的学说"中某些内容的不赞同，以及对社会发展规律所持的观点等）的担忧。

让我们先从作者谈起。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是现代经济学家，原为奥地利人，后入美国籍。他采用静态和动态方法，建立静态经济学和动态经济学两个体系；提出动态利润说，颂扬垄断资本家的作用，为高额垄断利润辩护。其主要著作有：《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主要内容》、《经济发展的理论》、《经济循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等。在其创新理论中，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来自经济生活内部的一种创造性变动，所谓创新，就是实现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一种新组合，而资本经济创新的引进呈波浪式，因此会产生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资本主义会逐步和平演变为社会主义，大企业家

们是社会主义的真正开路人。这一理论抽掉了资本主义生产实质和发生经济危机的根源,因而是片面的。

在了解了这些背景之后,再来看熊彼特撰写的13篇评论文章,就不难理解他高度评价庞巴维克、陶雪格、马歇尔等经济学家的学术成就,同时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剥削理论、阶级斗争学说提出质疑的原因了。他的质疑是否有力,该如何去批驳等等,是每一位读者包括编辑在内都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然而在这里,我无法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详细列示出来,只能对相应的语句作些简单说明(即所谓编辑处理),表明自己的立场。具体的评说,留待读者去完成。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将管见整理出来,作为对熊彼特这本书的出版的回应,当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对此,我只想说这么多。

有关我的惶恐的第一点原因,简单地说,是"书到用处方恨少"。这也是本书历经8个月才面世的重要原因之一。本书对13位经济学家进行了评介,然而书中涉及的经济学家及相关人物等的数量三倍于此,或许还不止。为方便阅读,我尽可能地参考有关工具书,以脚注的形式加以说明。这样做或许多余:对经济学生疏的读者未必会阅读本书,因而主要为这部分读者准备的注释很可能起不到预期的作用;熟悉经济学知识的读者也许根本不需要参考注释。然而,付印时我仍将注释保留了下来,以期为有可能阅读此书的读者提供一些便利。翻译作品中的误译问题一直困扰着译、编、读三方,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对书中涉及的人名、地名、著作名称,我尽可能地加以校正,力求将差错减少到最低限度,尽量避免因此而贻笑大方。限于学识水平,这样的问题肯定仍存在,敬请读者斧正。此外,书中所引用的文字系译者根据英文版转译而来(熊彼特原著整理自己发表的文章,而这些文章并非都用英文写作,英文版是在将其译作英文之后

汇编成书的)，故与国内现有的相关著作的中文版间定有差异，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参照有关文献。

总之，此书有可能成为普通读者不愿读、专家又因能很容易地发现问题而不屑于读的尴尬读物。究竟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